



总序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



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間仍然较大。我们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

有特色、各有优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高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播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总序



总
序

猿 ←

目 录

前 言	员
研究现状及评述	猿
研究说明与史料简介	苑
第一章 美苏战略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由来	苑
1945年 1945年 1月	猿
中国战局溃败及美国对华战略之调整	猿
中美关系的恶化	猿
苏联因素的上扬	源
结 语	缘
第二章 走向莫斯科的外交 1945年 1月	缘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缘
中美交涉	远
中苏交涉	远
结 语	愿
第三章 美国与中苏谈判 1945年 1月	愿
第一阶段	愿
第二阶段	员
第三阶段	员
结 语	员





第四章 苏美军队进入中国	792	元 月 雪
抢占大连的热身赛	792	元 月 雪
苏联红军在东北	792	元 月 雪
美国“海空大抢运”和驻兵华北	792	元 月 雪
莫斯科外长会议的交锋	792	元 月 雪
结 语	792	元 月 雪
第五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	792	元 月 雪
国民党政府的东北接收	792	元 月 雪
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792	元 月 雪
美国在东北问题中的纠葛	792	元 月 雪
结 语	792	元 月 雪
第六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	792	元 月 雪
美国影响与中苏经济交涉的终止	792	元 月 雪
国民党政府接收失败与中共的进一步发展	792	元 月 雪
四平争夺战与中国内战的爆发	792	元 月 雪
结 语	792	元 月 雪
结 论	792	元 月 雪
美苏介入与中国内战的缘起	792	元 月 雪
国共对抗与美苏冷战的爆发	792	元 月 雪
参考文献	792	元 月 雪
中文部分	792	元 月 雪
英文部分	792	元 月 雪
后 记	792	元 月 雪



前 言

从 1937 年开始，伴随着日本在华南地区发起的全面进攻以及随后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中国问题日益引起了同盟国领袖美国的关注与忧虑。为此，美国政府相继利用干预中国政府的军事指挥权以及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团等办法改善中国战局。然而，这些措施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得中美两国的关系走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越来越成为战胜日本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因素。中国战局的溃败、中美关系的恶变、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以及苏联因素的上扬等最终促成了 1945 年 8 月《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出台，从此中国的未来命运与美国和苏联纠缠在了一起。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经过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的艰苦交涉，最终在 1945 年 8 月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双方围绕中国问题的分歧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迅速在东北演变为一场以各自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明争暗斗。部分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刺激，苏军进入东北后不但没有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如期撤军，反而大肆掠夺、破坏和拆运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设备，同时又以鼓励中共在东北发展等手法为与美国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制造重重困难。相应地，苏联的举动又大大激发了华盛顿对抗苏联的决心。由此，美国决定海军陆战队继续留驻中国，继续协助中国政府向东北运送军队并持续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加强对中国政府



的援助。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从 1945年 9月开始，中国政府决定拒绝苏方对东北的经济合作要求，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群众运动。在这种压力之下，苏联一面从东北突然撤军，一面将撤出的大部分地区直接交予中共接管，而美国也在东北调处方面越来越倾向于国民党政府。到 9月底苏军撤出中国边境时，以苏联与中共为一方、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为另一方的对垒已经基本形成，国共双方争夺东北四平的大规模战争拉开序幕，全面内战的烽火从东北燃起。



研究现状及评述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引发了中外、主要是中美学者持续不减的研究兴趣，并且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两个领域，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学术界的相关成果进行简单回顾和评述。

中苏关系的研究首先兴起在美国学术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籍华人学者。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兴趣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丢失中国论”的兴起。伴随着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中国外交“一边倒”向苏联和 1950 年远月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朝野内外开始强烈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指责杜鲁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援助蒋介石政府，从而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丢”给了苏联。这种论调显然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极大地影响了同一时期开始的学术研究。显而易见，苏联以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主要议题。达林是最早一位系统研究苏联东亚政策的学者，从 1951 年开始，他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其中 1955 年的《苏俄与东亚》、1958 年的《俄国在亚洲的崛起》和 1961 年《新苏维埃帝国》都对苏联战后初期的东亚战略有所讨论并提出了诸多见解。例如，他认为苏联战后东亚政策虽然口头上也强调民主与和平，而实质上“目的与手段却与以前一样”，即赤裸裸地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提出苏



联对中国东北的战略由两个目标组成：眼前目标是“通过销毁其与战争有关的工业以确保将满洲的军事和经济潜力中立化”，第二个目标“通过在满洲建立一个‘友好政府’以确保满洲问题的有效和持久的解决。”他很少论及中苏两国政府层面的交涉，却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和夸大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称中共直接“走进库房打开军火库，很快用日本的物资武装了自己。”将毛泽东称为“中国的斯大林”，并将苏军延缓撤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为中共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①。曾经担任中国政府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的一位学者在 1956 年出版了《中国与苏联：中苏关系之研究》，涵盖了 19 世纪到 1956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时期的中俄关系史，是研究中苏关系的一本最早著作。该著的最后三章分别论述了 1924 年的中苏条约、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及 1956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具体涉及中美苏三国围绕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东北问题的论述仅只寥寥数页，例如对宋子文与斯大林的谈判，他只谈到双方在何时举行了几次谈判，但对其内容却没有一点涉及。而对中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交涉，更是语焉不详^②。与之相似的另一部著作《中俄关系史》涵盖从 19 世纪开始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俄关系，但对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谈判、苏军在东北以及马歇尔调处等亦缺乏具体的描述^③。

《中国与苏俄》是 1956 年代另一部揭示当代中苏关系的重要著

- ① 阎惠川《论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载《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载《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本文主要使用第一本，相关论述见第 102-103 页。
- ② 辛尔曼《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载《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谈判见 102-103 页；东北问题的争执见第 102-103 页。
- ③ 悦读辛亥前夜《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载《中国革命军与苏联军事援助》。相关论述见第 102-103 页。



作。该书全面论述了自 1917 年中国爆发革命到 1949 年代上半期的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发展脉络。但同样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1949 年到 1959 年的关系仅只占有一个章节,而且作者所使用的史料多为《纽约时报》、《大公报》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编年史料等。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赖特(1959)在该著的序言中所言,该研究实际上激发了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更多的问题,诸如“苏联在对中共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它真的愿意全面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并愿意让之进入联合国?美国不承认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未来应当做些什么?”^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强调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施瓦茨在 1959 年曾经谈到苏联占领东北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包括机械设备、原材料和一切财富的经济掠夺,以助于苏联的战后重建。他甚至还是以苏联撤出后与中共继续以货易货的贸易活动为证据,提出苏联后来选择支持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未来的经济考虑。然而,对于论证其观点所必需的苏联经济掠夺和中苏经济谈判等主要事件,他却并没有进行起码的论述^②。

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最为详细的是麦克里恩,他在 1959 年出版的《1949—1959 年的中共与苏联政策》一书用了近 700 页的篇幅(占全书的 1/3 之多)论述 1949—1959 年。当然,像同时代的大部分研究一样,他以美国政府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纽约时报》以及《真理报》等作为主要资料,论述了美苏国共围绕东北所展开的外交纠葛,使得人们对这一时期围绕中国问题的复杂国际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尽管没有引人注目的新结论,但作者却敏锐地认

① 1959 年赖特在《苏联与中共关系》一书中指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其目的不在于帮助中共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在于使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赖特,《苏联与中共关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 页)

② 施瓦茨在《苏联与中共关系》一书中指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其目的不在于帮助中共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在于使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施瓦茨,《苏联与中共关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 页)



识到从 1949 年 1 月到 1950 年夏这一段时间是“东亚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琢磨的一章”、“最为关键的 18 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苏联对中共的政策从 1949 年 1 月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转变成了 1950 年清晰和明确的支持政策。”^① 亲身经历中苏关系、曾分别在中国乌鲁木齐、沈阳、长春以及苏联海参崴等城市担任领事和总领事、1950—1951 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科长（阅读档案材料时，美国驻华大使麦克里恩与柯乐布（即美国驻华代办）也作出了同样的呼吁，他在 1951 年出版的《中国俄国大角逐》对自己亲身经历的 1949 年代多有涉及，将 1949—1950 年称为“关键的一年”。令人意犹未尽的是，这“关键的一年”只占其近 1000 页冗长篇幅的 18 页，其中对 1949 年中苏谈判多为议论而非描述，东北斗争仅只 2 页，其中用不到 1 页的两段论及十分关键的中苏东北经济纠纷。他的描述不但极为不够，而且多有错误。例如在中苏谈判部分他重点论述的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而根据后来苏方的解密资料来看，这一会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②。

麦克里恩与柯乐布的呼吁引发了学人们对“关键一年”的研究兴趣。伴随着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中苏关系的分裂以及美国外交史学的研究潮流从传统派走向新左派，1949—1950 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开始摆脱前期的结论定性而走向深化。诸如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利用还未系统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对美国政府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细致研究，指出美国在中国东北有着自

① 美国驻华大使麦克里恩在 1950 年 1 月 15 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

② 美国驻华代办柯乐布在 1951 年出版的《中国俄国大角逐》中提到：“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在 1949 年 1 月—1 月中苏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其中两页为插图，关于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见 100 页—101 页；苏军撤退原因见第 100 页。



身的利益，“门户开放”的要求对中苏谈判的进程和结果以及苏联的未来对外政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孔华润的结论打破了先前学者一味强调苏联与中共的“秘谋论”，提出苏联东北政策变化的动因之一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标志着人们对该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视角，也反映了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实际上，在 1950 年就已经有学者对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提出质疑，认为斯大林当时并不对中共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而且也不想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公开决裂，总的来讲，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还是“小心翼翼”^②。到了 1960 年代，干脆有人提出苏联当时完全可以将资源丰富的东北全部交给中共，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并没有这么做；作者还断言在 1959 年之前，“与在当时以及后来多年内占据西方舆论和政治思维的全世界共产党共谋的说法相反，苏联和中共绝没有秘密携手。苏联既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也没有全力支持中共，它追求的是让绝大多数局外人琢磨不清的矛盾政策”^③。

代表学术研究走入细化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莱文在 1968 年《外交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围绕马歇尔使华和东北问题，他将美国的调停与中国的内战联系起来，使得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围绕东北斗争的复杂场面逐步显露出来^④。一本至今依然令人折服

① 李烈敬撰《说透字刻》“粤台关系史”卷，载《说透字刻》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

② 孔华润撰《说透字刻》“苏联与中共关系”卷，载《说透字刻》第 2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

③ 莱文撰《说透字刻》“美国外交史”卷，载《说透字刻》第 3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

④ 莱文撰《说透字刻》“美国外交史”卷，载《说透字刻》第 3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



的中苏美外交史研究的优秀著作是高龙江的《中苏关系（1945—1955）：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尽管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并且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作者已经自觉地将美苏关系的互动纳入了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之中，对诸如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谈判以及美国的角色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和分析。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使用了大量的中方第一手资料，使得人们对二战时期特别是1945年对日战争后期的中国国际环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遗憾的是，该书截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恰恰缺失了“关键的一年”^①。接着高龙江研究的是莱文的专著：《胜利的铁砧：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1945—1948）》，这是他1974年前那篇文章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尽管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即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得以成功发展与壮大的原因，但是他显然也将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指出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克制与默契是“中国内战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与1940年代的学者不同，他以历史资料（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大量运用了《东北日报》等地方史料）说话，不再强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而从美国坚持援助国民党政府角度重新诠释了国际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莱文称美国是中国内战的“参与者”，而苏联是“非参与者”，由此呼吁对影响中国革命的外部因素真正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美国而不是苏联^②。

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仅就涉及1945—1949年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已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已经译成

① 高龙江：《中苏关系（1945—1955）：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莱文：《胜利的铁砧：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1945—194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中文并为中国学人所熟悉的就有一大串^①。作者难以将其全部涉猎与评述,在此仅列举几本不同年代的并对 1949—1989 年中美苏三国关系以及围绕东北有所涉及的代表性论著: 1964 年菲斯的《中国的纠葛》、1964 年邹说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64 年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以及 1964 年代的瑞阿顿·安德森的《延安和世界大国》。菲斯和邹说的研究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完成在美国外交文件的解密之前,但都大量使用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对当事人的当面采访以及其他相关记录,前者对包括雅尔塔会议、以赫尔利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变动以及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交涉等都有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但以马歇尔使华为截止。后者系统和详细地分析了从珍珠港事件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朝鲜战争美国严重受挫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尽管作者驳斥了所谓的“中国丢失论”,鲜明地提出“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但还是断言,就“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而言,美国整个 1949 年代的中国政策“是失败的”,这一结论与菲斯同出一辙。菲斯和邹说著作出版之时正值美苏冷战最高峰和

① 请参见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45 年,原书第 10 章,陆增平译,雪商务印书馆,1983 年中译本;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71 年,高潮译,雪解放军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47 年,张理京译,雪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1964 年,林海等译,雪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64 年,郭济祖译,雪商务印书馆,1984 年中译本;瞿美波·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43 年,原书第 10 章,上、下册,雪陈启迪等译,雪商务印书馆,1983 年中译本;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1964 年,徐泽荣译,雪三联书店,1983 年中译本;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64 年,原书第 1 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1964 年,陈亮等译,雪新华出版社,1984 年中译本;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9 年,原书第 1 章,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64 年,汪宁、周先进译,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中译本。



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正统派”如日中天,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将冷战责任归咎于苏联。相应地,在论述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时,不但缺乏以史料为支持的基本历史事实,而且都难免留下中共和苏联铁板一块共同对抗美国的影子,特别在论述和分析苏联红军在东北这一段,仍然难以摆脱上述中苏关系学者的断言^①。与他们的研究相对照,沙勒在 1955 年出版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在史料运用和观点中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作者对中国内部形势分析以及苏联政策变化的论述显然比前两位学者有所增加,而且也注意到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此外,该著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国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尽管作者也得出了美国中国政策失败的结论,但与菲斯和邹说极为不同的是,他将导致该结果的责任放到了美国政府的身上,认为“美国几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危机,并同样弄不清楚究竟应如何设想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②。从菲斯、邹说到沙勒,也代表了美国外交史从正统派到修正学派的发展脉络。瑞阿顿·安德森的《延安和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成为中共党史学者广为引用的一本专题研究,尽管也认为苏联帮助的重要,但作者却鲜明地强调了中共外交的主动性、自发性以及自力更生的传统^③。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安文立在 1962 年出版的《冷战与革命》,该著使用了大量的美方和中方档案,对 1945—1949 年间的美苏国共三国四方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其中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论述尤见功底。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他对中文资料的占有和运用令大多数中国学者汗

① 菲斯:《中国的纠葛》,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08 页-109 页。

②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 页-2 页。

③ 瑞阿顿·安德森:《延安和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年。



颜。尽管他对中国政府的论述稍嫌简单,诸如作者没有论述雅尔塔会议后的中国外交,对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以及中苏经济合作的交涉也没有足够详细的论述。但这可称是西方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围绕1945—1949年美苏国共关系的专题研究。令人赞叹的是,作者没有局限于简单的历史过程叙述,他还试图将这段历史纳入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与外来力量间关系的一般命题讨论,独到地指出两极对立国际格局的出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有益作用^①。作者的论述和分析颇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令人深思。但如果将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外因归咎于美苏的冷战环境,却同样存有诸多疑问;毕竟,1945—1949年的美苏关系还正处于一个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冷战还没有爆发。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德国学者海茵茨希在1995年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使用了最新的苏联解密档案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1945年的中苏谈判以及随后的东北纠纷,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价值的肯定^②。

对本课题的研究绝非仅局限在美国,台湾亦有不少学者对其中的相关阶段进行过研究。梁敬惇是一位致力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专业研究人员,对史迪威事件、雅尔塔会议、中苏谈判以及马歇尔使

① 李海基著,张雪梅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中译本。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从事研究的时候,该著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因此相关引文参考依然来自英文原著。

② 德·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10月。



在仅只 1995 年的论述中,大多为苏联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诸如不但将苏联军队不按时撤出的责任完全推给国民党政府,为苏联掠夺东北经济的行为进行辩护,而且大大宣扬了国民党政府的反苏亲美行动,指出在苏联从东北撤出后,剩下的苏籍侨民及苏联官员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谋杀”^①。苏联解体后,随着苏联时代有关文件的逐步解密,这一时段的中美苏关系再度成为俄国学人的关注课题。除了后文专门提及的列多夫斯基之外,还有俄国著名史学家伊万诺夫利用相关苏联文件证明了杜鲁门在 1945 年底派遣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仍然是期待苏联的宣战,然而,从 1945 月下旬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后,杜鲁门不但不企盼苏联的参战,并鼓励中国在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以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②。

中国大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具备美国学术史一样的发展脉络,但围绕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也是以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和中美关系等领域展开的。在中苏关系领域,主要学者有杨奎松、薛衔天、沈志华等。杨奎松是一位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被西方学者称为“曾经进过中共中央档案馆的人”;他对围绕东北问题时期的苏联与中共关系的研究令人赞叹,特别是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的关系以及从二战结束到 1949 年期间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人的旧看法,不但揭示了苏联从 1945 年就开始了系统的援助中共政策,而且通过利用许多中央文件

- ① 月 1995 年 1 月 1 日,《苏联解密档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00 页。另见:月 1995 年 1 月 1 日,《苏联解密档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00 页。另见:月 1995 年 1 月 1 日,《苏联解密档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00 页。
- ② P 伊万诺夫:《苏联参加反对日本战争的问题》,载《远东问题》1995 年第 1 期。并见苏联解密档案中《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蒙古、旅顺港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的会谈记录》,1995 年 1 月 1 日,见其尾注之解释,《苏联解密档案》。



披露了苏联 1945-1946 年间在东北对中共的具体支持经过^①。正因为如此，本文关于中共在东北的部分研究解释直接参考并转引了杨奎松的相关著作。薛衔天的新著《中苏关系史（1945-1950）》出版在本文研究结束后，他对中苏东北交涉多有论述，特别是对 1945 年 8 月苏军派人飞赴延安以及 1945 年底和 1946 年初蒋经国与斯大林会谈两个事件直接使用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俄文档案以及他本人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对之有了新的认识^②。沈志华对苏联 1945 年出兵中国东北的决策过程、目标及其目的进行过专门研究。此外，向青、孙其明、罗志刚等人在近期的研究著作中也都谈到了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合作^③。

在国共关系方面，人们通常对中国内战起源的国际因素重视不够，一个典型是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10 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其中第 5 卷《1945-1949 争取和平民主》的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地区的斗争，尽管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以及国共双方的争夺进行了较多的归纳，但是对苏联以及美国的因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美苏冷战的起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章百家、牛军 主编：《冷战与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58 页。

②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50）》，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58、78-79 页。

③ 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向青、石志夫、刘德喜 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局 1995 年版，第 51-58 页；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45-1950）》，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8-79 页。



素几乎没有涉及^①；该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国共两党的关系框架之内，显然不足以反映当时发生在东北地区的这段历史。令人可喜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在他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 5 卷的《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一书中，对东北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苏联关系的研究有长达 150 页的专门论述，他基本上使用了诸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张嘉璈日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第一手的权威资料，围绕中国政府接收东北对中苏两国政府间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国内首次的详尽研究，其中对中苏经济合作的交涉、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过程、1945 年中国爆发的反苏游行以及东北的战火等都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其分析之细微、史料之丰富都令人折服^②。

中美关系史是中国学术界较为多产的一个研究领域，成果很多，不能一一罗列^③。主要涉及本课题研究的有陶文钊、资中筠、牛军等人。陶文钊对整个 20 世纪的中美关系都多有研究，其中围绕 1945—

① 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 5 卷《1945—1949 年争取和平民主》，主编黄友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5—107 页。

② 汪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雪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四章《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第 143—145 页；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135—150 页。

③ 其中涉及到 1945—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优秀研究成果有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 年 1 月—1949 年 1 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949年的中美关系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①。关于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以及随后的中苏谈判,他在《中美关系史(1945—1949)》中专门使用一节的篇幅进行讨论,尽管没有在东北的三国四方斗争上展开,但却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马歇尔在东北停战问题上的调停经过^②。资中筠在 1984年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 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是国内最早一部直接使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梳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源起、发展以致最终卷入中国内战的过程。其中对美国的援助、马歇尔调停等都有着十分独到的研究和分析。该书在 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新添再版序言,书名稍有修正。尽管序言中专门提到苏联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并且声明这是再版“比较重要的”改动,但实际上对于 1945—1949年间苏联红军驻军东北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与互动还是没有太多的论及^③。也许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在 1994年 12月 15—16日中国与美国史学家在美国蒙塔纳大学举行的“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会议上,资中筠教授强调 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远比中国人想象的复杂得多,并呼吁学人们进一步加强研究^④。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5—1949年》,重庆出版社 1987年版;《中美关系史 1945—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相关文章见《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 1期;《1945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 1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 1期;《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 1期;《战后初期美国是如何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 1期;《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 1期。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5—1949年》,第 140—143页、145—146页、148—149页。

^③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源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4年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源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再版序言”,第 4页。

^④ 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 1期。



研究说明与史料简介

正如资中筠教授的呼吁，源年代后半期围绕中国内战的美苏国共四方的外交斗争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研究空白和不明之处。诸如除了人所共知的美国需要苏军参战的原因外，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还有什么其他背景芽中国的外交存在什么问题芽它到底怎样影响了中国以及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芽从秘密协定产生到中苏谈判开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又为之做了什么芽苑—愿月的莫斯科中苏谈判难道真像许多人所讲，中方在美苏压力下毫无余地并任斯大林宰割芽如果这样，为什么谈判的时间大大超出中美苏三方的预计而前后竟然延续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芽期间的波茨坦会议又对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芽在东北，苏军的经济掠夺以及对中共的支持已经成为基本共识，然而，苏军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接收和掠夺东北工业芽苏联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一直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共芽那么它的目的和战略又是什么芽反过来，其对中共的协助、默认和鼓励以及对国民党政府接收的刁难又怎样影响了中共和国民党政府战略的转变及其相互关系芽在上述这些疑问当中，再加上美国的持久因素，就使得整个问题更为复杂。因此，设法将这一时期美苏国共三国四方间的多边互动关系梳理清楚就显得极有必要和意义。

这不是一个前人没有研究的全新课题，恰恰相反，正如上节的研究史回顾所示，中外学者的前人与当代同行已经从不同角度和领域



对其中的诸多阶段和重要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以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独立的角度分别展开，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每对双边关系的深入，但其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则是对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过分强调都难以避免地忽视其他关系的恰当影响，而且“更有可能扭曲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变的全貌，难以周全地解释一些重大的问题。”因此，极有必要加强对这一时期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整体研究^①。此外，我们也看到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总是随着更多历史资料 and 文件档案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和深化。尽管其中一些事件的细节仍然需要中美苏多方文档的进一步开放与相互印证，但直至目前，现有史料已经足以对这短短一年内的三国四方关系进行一个补缺性的研究与描述。

正鉴于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者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利用最新的第一手历史史料，对从 1945 年由于中国抗战形势逆转美苏介入中国问题开始直至 1949 年 9 月苏军撤出东北而中国内战也同时爆发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多边互动关系进行一个整体研究。在此过程中，作者将尽力避免对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并得到很大程度详细研究的史迪威事件、雅尔塔会议、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马歇尔调停等重要事件进行重复论述。而对被多数学者所忽略或简化的历史事件进行尽可能的详细叙述，这些事件包括诸如中国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由来、协定产生后的中国外交努力、中苏谈判的艰难过程以及其中美国的角色、围绕东北

^① 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苏国共关系》，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85-186页。他的其他著作见《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的三国四方外交斗争、中苏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苏军在东北的经济掠夺等；其中不少事件，诸如中国政府围绕雅尔塔秘密协定所展开的对美对苏外交、美苏围绕大连的纠纷以及美苏国共围绕东北的明争暗斗等尚属首次系统研究。作者的中心目的在于揭示和展现围绕中国问题出现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间的整体关系及其互动影响。文末，作者还试图对美苏从战时合作到战后对抗这一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内战起源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及其对华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共斗争的进程与发展，成为中国内战起源的主要外部原因。然而，美苏对抗助长中国内战爆发只是此间中美苏相互关系的一部分，通过提出中国政府“邀美抗苏”的概念以及对中共利用苏联对抗美蒋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国内的形势又反过来激化和促成美苏冷战的最终爆发。实际上，中国内战爆发和美苏冷战起源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史全部。

本文主要使用的史料包括美国、苏联、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共四个方面。在美国方面，由国务院在 1955 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9—1954 年代特辑》（通常又被称为《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 1971 年代初解密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相应的对苏政策都有所反映，成为解释美国政策的主要史料来源^①。同时，数量巨大、被翻拍成微缩胶卷的《杜鲁门文件》、《史汀生日

① 美国国务院在 1955 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9—1954 年代特辑》（通常又被称为《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 1971 年代初解密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相应的对苏政策都有所反映，成为解释美国政策的主要史料来源。同时，数量巨大、被翻拍成微缩胶卷的《杜鲁门文件》、《史汀生日



案编辑成册并为其他学者所用^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沈志华为搜集、翻译和研究苏联解密档案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并最终在去年出版了猿卷本的《苏联解密档案》,美中不足的是,所有关于中国的档案文件都未能包括进去。然而,当沈教授知道我的研究课题后,还是在百忙之中分两次从他个人未刊的收藏中专门抽编了相关文件缘份,慷慨相赠,成为本文研究当中苏联档案的最重要来源之一^②。

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相关文档主要参见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当中不但包括相关的政府外交文件,也含有一些诸如《蒋经国特派员东北交涉自述》和《军政首长东北接收报告》等重要的个人及部门资料等。能够与这套文件相互印证并互为补充的是秦孝仪主编的另一套重要史料:《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③。在对苏关系方面,台湾“外交部”组织有关学者从 圆园园年 年开始专门编辑《“外交

①列多夫斯基专门编辑了《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 员95年 远月 原愿月》,作者无缘亲眼所见,但德国学者海茵茨希却得到了这份未刊手稿,并在其著作《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员95年 员95年》中大量引用。本文的相关转引则来自该著;此外,列多夫斯基的论文集《斯大林与中国》对斯大林与蒋经国的会见进行了分析并将苏方的四份原始文件全文刊出,沈志华教授的《苏联解密档案》中也有这四份文件,除了在翻译上的一些表述不同外,可以断定他们都是一样的。

②沈志华教授分两次 员95年 愿月和 圆园0年 猿月 雪将有关苏联解密的档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来,一次是题为《中苏谈判的苏联解密档案》共 猿份文件,另一次题为《与苏军交涉档案 圆份文件》,以下我将之统称为《苏联解密档案》。

③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一、二册雪以下简称《战时外交》雪台北,员95年;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第一册雪以下简称《战后中国》雪台北,员95年版;秦孝仪等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 穴以下简称《总统》雪 员95年版,其中 员95年 员95年 分别在卷五 穴 雪和卷六 穴 雪



部”档案丛书——界务类》，其中第二册《中苏关系卷》已经于 1994 年 8 月出版，是民国以来“首将其库藏珍贵原始资料汇编出版者”，其中包含了围绕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多种语言的外交史料和条约内容，是了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份资料汇编，亦对上述两套文件构成了重要的补正^①。围绕东北交涉，当时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一直身处长春交涉第一线并具体负责中苏经济会谈的张嘉璈记述了大量的详细日记；担任东北行营与苏方进行军事交涉的中方军事代表董彦平，后来也依据他自己的记录和相关文件出版了《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据东北折冲纪要》。这两位主要当事人的资料向来为学者所忽略，但他们显然对了解中苏东北交涉不可或缺，成为本文论述东北外交的最重要第一手史料^②。此外，1949 年代以来由台湾“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及其他当事人的资料，诸如《顾维钧回忆录》、《王世杰日记》以及《胡世泽文件》等也是本文的参考资料

①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以下简称《中苏关系卷》）台北，1994 年版，该册由台湾“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系教授唐屹等三人汇编。

②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姚松龄先生后来专门将张嘉璈东北交涉的日记选编出来并分期登载于《传记文学》。张嘉璈的日记原文藏于斯坦福胡佛档案馆，1983 年，该馆编辑出版了相关部分，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据东北折冲纪要》，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78 年版。



之一^①。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1997 年出版的《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9—1989)》是一本十分有用的文件汇编,特别围绕东北问题,该文件集不但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摘录了大量文件,而且也从当时的《解放日报》、《中央日报》等媒体摘抄了相关文献,并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选择和翻译了相关文件,是一本难得的东北外交史料汇编^②。

对中共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近来该领域亦有大量的重要史料披露。除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周恩来 1957 年谈判文选》等文集外,近年来相继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军事年谱》、《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等等都是官方的重要史料来源。此外,在东北问题上,包括最早组成东北局成员的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以及后来亲自参与指挥、进军和争夺东北的林彪、罗荣桓、张闻天、李富春、高岗、肖华、李立三、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万毅、曾克林等重要当事人的传记都已经公开出版,为我们了解当时东北的形势与发展都提供了相当

①“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1986 年版;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1986 年版;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 年中译本。胡世泽精通英、法、俄语,出生在美国,在巴黎接受教育,从 1937 年开始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1943 年起担任外交部次长,他自始至终地参与了宋子文与斯大林的所有谈判,并且在两次谈判期间留驻莫斯科担任联络工作,对谈判过程做了大量的详细记录,挪威学者 约翰·埃森豪在著《悦道》一书,即 1943 年出版的《悦道》一书,对宋子文与斯大林的谈判进行了大量利用,还推测中国政府的官方记录可能在此基础上摘编。有幸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研究项目主任奥斯特曼先生专门为我复印了他们收集的胡世泽对斯大林 宋子文的数次谈判记录,以下将他所提供的资料统称为《胡世泽对斯大林 宋子文谈判记录》。

②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



重要的资料^①。

像其他的历史研究一样，外交史研究的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占有和分析。一位对该课题颇有研究的资深学者在多年前就自谦地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提醒史料上的不足使得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任何判断都只是尝试性的”，呼吁通过每个学者的积累性努力能够“敲开迄今为止还紧闭着的档案之门”，指出“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只不过引起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的兴趣。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回答只不过是把我们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摆在一起罢了。毫无疑问，甚至在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之后，围绕这一历史时期的争论仍然不会消失，各种对立的解释将继续竞争”^②。应当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各种文档和资料的开放情况已经大为改善，但这位学者的总结仍不过时，我们仍然期待着更多档案的开放，期待着更多解释的出现，使得史学家的研究与描述越来越接近于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还须说明的是，本文是一个“小题大做”的课题，因为不管就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而言，还是对于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讲，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都可谓梢枝末节。将美苏因素纳入中国内战起源的研究，不是为了淡化中国自身的作用，而是旨在为我们了

①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北京，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绍畴、刘崇文主编：《刘少奇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他个人传记不再一一罗列，在以后的引文中会直接出现。

②斯蒂芬·莱文：《灾难的边缘：1955年的中美关系》，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袁明、哈里·哈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48页。

解、认识和思考这段历史提供另一个角度。研究过程中,我心中常常浮现出盲人摸象的场景,而自己就是这群盲人中的一个,不同的是,我对每个角度的局限有所认识并常常自我提醒:自己的研究所得只是大象整体的一个微小局部。如果我的这个局部描述能够成为智慧读者进行综合的一部分,从而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行较为全面地认识与理解,我心足矣!同时,我期待着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研究说明与史料简介



研究说明与史料简介



第一章

美苏战略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由来

1945年1月24日

1945年1月24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首脑会议。从1月24日到1月31日，美苏双方经过数次秘密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关于日本的协定》：

美英苏三大国领袖兹协定：于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维持；
2. 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利益，应予恢复，即：
 - (a) 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
 - (b) 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应予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
 - (c) 对通往大连港通海口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对满洲之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应交还苏联。

不言而喻，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美国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之建议，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一致同意，苏联之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应毫无疑问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①。

罗斯福和斯大林对有关谈判进行得极为隐秘，协定达成后又刻意协同对中国保密。因此，中国学者多称之为《雅尔塔协定》或《雅尔塔秘密协定》。作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它规定，战后维持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以及中苏签订一项友好协定等。显然，这些条款都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与尊严，直接导致了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产生，成为左右战后中苏关系的基本文件之一。有学者甚至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派生物”，二者是“子约与母约的关系”^②。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二战爆发以来美国所奉行的中国政策也不相符，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和中国的共同敌人，美国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援助中国抗战，总统罗斯福还谋求将中国扶持为战后四大国之一。因而，这份协定备受关注，成为中、美、苏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受到了相关学

^①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前言第13页。

^②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前言第13页。



者的广泛重视^①。

围绕罗斯福为什么同意斯大林的要求达成秘密协定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多种解释，而且这些不一的说法大多出自当事人之口。如参加雅尔塔会议但未参加秘密协定谈判的罗斯福军事和外交政策主要幕僚人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上将金、李海、李普顿等人都认为，罗斯福着眼于得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承诺以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大战略，与之相比，斯大林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让步^②。当时唯一陪伴罗斯福参加与斯大林在 8 月 11 日秘密会谈之后又具体负责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秘密交涉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对军方的评价不持异议，但却强调罗斯福由于身体的原因而不愿与斯大林

① 学术界对之进行了长期以来兴趣不减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实在难以一一罗列，其中具代表性的如下：台湾学者梁敬鎔：《雅尔达秘密协议始末》，载《传记文学》第 84 卷第 2 期；田源村成雄：《雅尔塔“雅尔塔秘密协定”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时殷弘：《从雅尔塔协议到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近现代国际关系》，1992 年 10 月刊；田居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王春良：《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国领土主权之受损害》，载《史学月刊》1993 年第 1 期；刘华、杨菲蓉：《“雅尔塔秘密协定”新论》，载《学术研究》1993 年第 1 期；陶文钊：《1945 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美国研究》1994 年第 1 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其中被译成中文并有较大影响的有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费斯：《中国的纠葛》。其他还有李剑虹：《从雅尔塔到南京》，载《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李海：《雅尔塔秘密协定》，载《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李海：《雅尔塔秘密协定》，载《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比较新近的还有：李海：《雅尔塔秘密协定》，载《炎黄春秋》1995 年第 11 期；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② 葛罗米柯在 1946 年 1 月 9 日对国会的演讲中，再重复了这一观点。



进行细节的文字纠缠^①；除此之外，他还在事后公开宣称雅尔塔秘密协定对苏联在中国的要求起到了有用的限制作用，认为这些地区已经多年脱离蒋介石政府的管辖，“苏联可以很容易地迎合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满洲和内蒙古在内的人民共和国。”由此，他还对半年后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加赞赏，说宋子文“终于十分满意”^②。哈里曼的后一说法与另一位同样参加秘密协定会谈的美国人波伦^③不谋而合，波伦说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且差不多，他坚持罗斯福此举不乏协调中苏关系与解决中国的国共之争，甚至还提出秘密协定对苏联在中国的进一步野心起到了未雨绸缪的遏制作用^④。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后来却为秘密协定担当重任的赫尔利^⑤却显然又有大相径庭的说法，他认为罗斯福由于身体不适、未能有力交涉，以致牺牲了中国主权，但后来似乎有所认识，并就此派遣他前往秘密协定其他两个签字国进行交涉以求搁置或改变秘密协定^⑥。

除了上述的个人评价外，引人注目的是 1950 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对华政策《白皮书》也对雅尔塔秘密协定进行了说明，并特意建议读者应当对三个背景有所理解：一个是 1941 年底的《开罗宣言》；一

① 瞿涛译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82 年中译本，第 108-109 页。

② 亨利·索耶·洛威尔译，转引自《哈里曼回忆录》，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中译本，第 108 页。

③ 月，转引自《哈里曼回忆录》，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中译本，第 108 页。

④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07 页。关于罗斯福身体的原因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赞同，见



个是在紧接开罗会议后美苏双方曾对将大连变成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口”以及苏联使用中东铁路等问题进行过非正式交涉的德黑兰会议；第三个是1945年远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莫斯科爱琴海宫的访华活动^①。国务院此举显然有不同程度地淡化雅尔塔秘密协定损害中国主权的性质、推卸美国政府的责任以及美化美国对华政策之嫌。实际上，上述三条不但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由来，反而在诸多方面与该协定构成了相左的立论：第一，《开罗宣言》强调的是“满洲、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而雅尔塔秘密协定所赋予苏联租借旅顺以及保证其在中国东北“优越权益”的条款却完全与之精神背道而驰；第二，在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只是提及战后将旅顺设为中美联合军事基地，并没有谈到与苏联共用，但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出于对斯大林参加对日战争允诺的回报，罗斯福却单方面提出“苏联或许可以得到中国的‘自由港’大连的回报”^②，此举显然与他一向所标榜的将中国视为平等大国的政策不相符合；第三，华莱士访华确有鼓励中国注重中苏关系之举，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华盛顿都明确宣称美国政府拒绝以“中介人”或“协调人”的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4卷，第1000页。

② 罗斯福此说不知从何而来，但似乎应与几天前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允诺将旅顺设成战后中美两国的联合军事基地有关。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4卷，第1000页。



身份介入中苏关系^①。

欲盖弥彰，当事人种种不一的说法与评价说明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实际上，正如一位专门从事雅尔塔会议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雅尔塔会议创造的历史远比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要少”^②。像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大国会议一样，秘密协定的达成绝非大国领导人的即席之作，而是会议前数月内就已开始显现的各种因素之错综复杂的演变结果。罗斯福之所以在雅尔塔较为轻松地支持苏联在中国东北取得“优越权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除了大家所公认的对日战争需要外，亦有中国战略地位下降、中美关系矛盾丛生、罗斯福战后美苏合作构想的显现以及斯大林为获取战后东亚利益而进行的精心外交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

中国战局溃败及美国对华战略之调整

随着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经过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正面战场战线也基本稳定下来。国民党政府甚至在 1945 年底制定出了《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筹划对日军发起总

① 对蒋介石提出请美国作中苏关系“中间人”的建议，华莱士当即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945 年初，当一向热心于中苏关系的赫尔利意欲有所作为时，国务院当即明确指示：“不允许中国政府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准备在它与其苏联的关系中承担‘顾问’的责任。去年夏天前副总统华莱士在答复蒋介石的一个建议时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做中国与苏联的‘调停人’，这后来也得到了总统的批准。”^①

② 云云



反攻。从 1945 年秋开始，中美空军逐步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美国最新式的 B-29 远程轰炸机也即将投入使用，利用中国的空军基地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这些都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极大担忧，同时由于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的接连失败，导致南方军与本土联系的海上交通线日益困难。为此，为了开辟一条经朝鲜、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的新交通线，阻止中美空军利用中国基地对日本本土以及海上交通的轰炸，同时摧毁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日军决定在中国战场实施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庞大攻势，并为此投入总兵力 50 万人、战马 10 万匹、大炮 1000 门、坦克 300 辆、汽车 1000 辆，“其参战人员数目之巨大、作战区域之广、作战距离之长、作战时间之久，都是日本陆军以往任何一次会战所无法比拟的”^①。从 1945 年 5 月开始，日军相继实施平汉作战、湘桂作战以及广西作战，到 7 月，已经向前整体推进 1000 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南和广西等省的大片领土，洛阳、长沙、桂林三个省会和郑州、许昌等大小 100 座城市相继陷落，而设立在衡阳、零陵、宝庆、邵阳、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的 7 个空军基地和 10 个机场也被占领。在占领了华东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后，日军直逼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致使中国当局准备迁都至偏僻的昆明。此外，日本的成功攻势还迫使美国在华空军撤离前方基地并丧失了绝大部分原计划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显然，这是自 1938 年 6 月广州、武汉陷落以来中国战场的另一次大溃败^②。

中国战局的溃败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极大担忧，为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个是美国军方对东亚战略的重新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章第 5 节，引言见第 100 页。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5 年 5 月—1949 年 9 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第 100 页；辛世忠：《中国抗日战争史 1945 年 5 月—1949 年 9 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第 100 页。



调整。在此之前,中国一直被作为美国最终反攻日本的重要基地。一份 1945 年 1 月 10 日题为《战胜日本的政策》的美军联合战略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强调“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只有在持续的轰炸削弱了日本战斗力后才能进行,而这种轰炸只能以中国为基地”^①。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作为盟国的责任也是这样界定的,在一份 1 月 10 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蒋介石说:

“中国对盟国之义务与应负之责任,其一为目前应尽全力,保持中国战区现在之阵地,勿为敌寇突破,以为盟国在陆上轰炸日本本土之基地;其次为盟国海陆军迫近中国海岸时,中国陆军及时配合共同作战,以巩固联合国在东亚大陆进攻日本之重要基地”^②。

然而,随着美军太平洋越岛战术的成功,美国军方开始酝酿新的太平洋战略,陆军部在 1945 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战胜日本的计划尚难确定。……应当强调从太平洋而不是从亚洲大陆反攻日本。另一份战略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也称“及早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通过中太平洋发起全面进攻,并以南太平洋两翼实行辅助作战”^③。1945 年中国战局的恶化显然成为美国太平洋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大大加速了调整的进程。1945 年夏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亦首先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开始讨论蒋介石政府被消灭或者重庆失守后

① 转引自 运 1945 年 1 月 10 日 美 军 联 合 战 略 评 估 委 员 会 报 告 《 战 胜 日 本 的 政 策 》, 载 于 《 美 国 战 争 史 》, 第 4 卷, 第 1 章, 第 1 页。
 ② 《总统》卷五下 雪第 1 页。
 ③ 1945 年 1 月 10 日 美 军 联 合 战 略 评 估 委 员 会 报 告 《 战 胜 日 本 的 政 策 》, 载 于 《 美 国 战 争 史 》, 第 4 卷, 第 1 章, 第 1 页。



美国在中国大陆可能的军事行动等^①。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太平洋马里亚纳基地的建成,原计划用于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新式远程轰炸机开始飞离中国,到 1945 年 1 月 21 日,已全部转移到了太平洋战场^②。从 1945 年秋天开始,美国军方正式开始重新考虑反攻日本的战略。在 10 月份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对半年前的将包括台湾和中国沿海城市作为反攻日本首选基地的计划避而不谈,反而强调尽可能避免代价巨大的陆地作战,实施海军和空军行动。到了 12 月上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明确否决了将中国沿海城市作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的可能性。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在得知美国关于需要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的反复声明只是为太平洋作战打掩护时,沮丧地在 12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战区被取消了,没有人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了。也不会派军队来了。”而另一位将军也同样谈到这一战略的改变:

“英国陷入地中海、蒋介石的虚弱和不可靠、日本占领菲律宾时在南中国海使用一支海军的困难,以及美国两栖作战技术的辉煌成绩和快速的航空母舰部队等积极因素,这一切在 1944 年打破俾斯麦防线和取得马绍尔群岛之后就导致了计划的改变。到达东京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马绍尔群岛—马里安纳群岛—硫磺岛,另一条是新几内亚—莱特湾—吕宋—冲绳,两条通道都不涉及中国”。^③

① 转引自 辛德勇《沈从文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第 100 页。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第 100 页。

③ 转引自 辛德勇《沈从文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第 100 页。郭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00—101 页,引言见第 100 页。



中国战局溃败对美国中国政策的第二个影响是美国外交决策人对中国政府看法的改变。在此之前,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①。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积极支持中国政府。1945年10月成立中国战区,并派遣史迪威来华,在缅甸公路被日军截断后,为了继续援助中国,美军还专门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驼峰”路线,使得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6年,美政府又向中国提供了1.5亿美元的无偿贷款,1947年,又根据《租借法案》签署了《中美互助协定》以确保长久地援华抗日。在政治上,1948年1月15日签署《联合国宣言》时,罗斯福特意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之首,一年后,美国又主动与中国签署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正式宣布放弃它在中国享有百年之久的特权。1949年10月,他再次坚持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称《莫斯科宣言》或《四强宣言》签字国,将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在年底的《开罗宣言》中,保证自1945年以来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同月,美国国会还应罗斯福的要求废除了美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排华法案,给予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移民一样的入境限额^②。然而,随着1949年中国战局溃败的接连出现,主要源于重整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内政问题,如在罗斯福的再三要求以及华莱士的访华游说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美国向

① 刁作谦:《美国对华政策》,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0页。

②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00页;王健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01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100-101页;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就是突出事例。这些切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以及内外政策的军事观察组成员，在 1937 年下半年向华盛顿发送了一份份有关中共将成为中国未来主导力量以及建议当局支持他们的报告^①。它们与同时到达华盛顿关于中国正面战场令人气馁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致使对华决策者心目中的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形象大为改观。尽管罗斯福并未完全采纳与中共携手的建议^②。但从 1937 年底开始，罗斯福开始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与中国北方的军事力量进行合作。尽管蒋介石表示遵从，但此时已经对蒋失去信心的罗斯福似乎不抱希望。1937 年底，他指示有关人员准备蒋介石政府垮台后的应急方案。1938 年初，他向李海上将表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此时对保持中国团结一致的努力几乎无能为力”。更为明显的是，到雅尔塔会议之前，他对中国扶持为战后大国的热情也急剧减退，在 1945 年 1 月初的马尔塔会议上，当丘吉尔询问罗斯福是否对在中国的投入与回报有所失望时，罗斯福回答：“中国尚需为期百年之教育与训练，始克能成为一举足轻重之国家”^③。

^① 这些人员主要包括谢伟思、戴维斯和文森特等人，卡恩将他们称为“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中，比较有名的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美国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参见伊·卡恩，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 1982 年中译本。关于这些人的报告，除了在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埃谢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青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3 年中译本、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82 年中译本、雪以及包瑞德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之外，还可以参见 1967 年 12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2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3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4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5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6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7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8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9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0 月 3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1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1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3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4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5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6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7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8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29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30 日《纽约时报》、1968 年 12 月 31 日《纽约时报》。

^② 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 370 页；《中苏关系卷》，第 171 页。

^③ 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 370 页；《中苏关系卷》，第 171 页。



中美关系的恶化

中国军事地位的下降并不是导致罗斯福对华观念变化的唯一因素,但它显然成为中美关系产生龃龉的原发点,继之而来的是两国间爆发的一系列纠纷。首先,中美矛盾在缅甸战场上爆发出来。自从1942年12月缅甸陷落后,美国军方和中国政府积极策划并实施反攻缅甸的战略,但一直由于英国的反对、阻挠和消极应付而无力全面实施,从策划中的1943年春“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变为“茶碟”计划,后来又回到英国“锦标保持人”的缅北作战计划,罗斯福一直迁就英国,直至1945年底,部分出于登陆欧洲“霸王计划”的考虑,罗斯福再次支持丘吉尔并通知蒋介石,美方不能供应足量的登陆艇用于前期计划中的孟加拉湾两栖作战,这实际上就等于将整个反攻缅甸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承担缅北作战的中国军队的肩上^①。这当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无奈只有接受罗斯福的第二个建议:推迟整个作战计划。极度失望的蒋介石在1945年11月初向罗斯福发出了一封既具陈述又含威胁的电报:

“在本年秋季以前,对于重开滇缅甸路,已无希望;中国已遭遇最艰难之环境,而吾人反侵略之战,至今亦已届临最紧要之年,余对全体中国军民甚觉难以置辞,并恐彼等精神或将动摇,以致损及盟国战争之全局;并使阁下真挚援华之热忱,变为失望,以是余为之日夜焦虑不安,深知阁下关怀中国之切,余不欲多作申述,然迫于现势,使余不能不坦陈所怀”^②。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第174-175页。

②《总统》卷五下,第195页。



蒋的这封电报显然是在为争取美国的补偿进行铺垫,几天后,他致电罗斯福再次要求已被拒绝过的 1 亿美元贷款,提出如果美国不能满足这项要求,那么美国在华军事活动经费就由美国政府自己承担,并按照与法币的官方兑换比例 1 美元兑换 20 法币,而同时的黑市比例高达 1 美元兑换 40 法币进行结算。文末,蒋介石无不威胁地写道:“上述两项建议,如均不能接受,则中国只有尽其所能,继续维持抵抗共同敌人之日寇,已竭尽我联合国一分子之义务,于战时经济与参战,亦只可听其自然之变化也。”此外,他又提出将第 14 航空军和中国空军的飞机增加一倍,将通过驼峰运送中国的战争援助物资吨位增加 1 倍。愿月份,罗斯福要求中国为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场提供 10 万人的中国后勤支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①。上述系列事件对罗斯福以及其他决策人对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和态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依照对这些事件有权威研究的学者及有关当事人的评价,蒋介石政府的上述举动,“在华盛顿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蒋委员长提出过分要求和反要求……对美国的建议提出破坏性的条件和索取很高的价格,暗示和威胁与日单独媾和”;“标志着中美关系又倒退了一步是毫无疑问的”,“在美国方面,此时留下了一种沮丧和辛酸的情绪”,“总统给蒋委员长的回电变得逐渐冷淡和不那么随和”^②。

中美围绕缅甸战场的分歧还没有结束。实际上,在接到罗斯福决定停止盟军在孟加拉湾实施两栖作战通知之前,中国驻印度军队已经在史迪威的领导下开始了计划中的缅北作战,并在胡康河谷首战告捷。因此,在史迪威和马歇尔等军方人员的鼓动下,罗斯福开始放弃蒋介石已经接受的推迟反攻缅甸的方案,倾向于继续实施缅北作

^① 《总统》卷五 六 雪第 141 页- 142 页。宋美龄亦为此向罗斯福致函,第 141 页。

^② 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 141 页。



战计划，并在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连续三次催促蒋介石调动中国在云南的军队渡过怒江配合作战，但蒋却不为所动，坚持只有英美盟军大规模的两栖作战配合下驻滇远征军才入缅作战。直到 1945 年 1 月，驻缅日军向印度发起进攻，史迪威和英国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深感援滇指日可待，但蒋介石却感到局势日益险峻，火速催请罗斯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然而蒋介石却大谈中国战场的“形势险峻”，“中国主力军由云南发动攻势，殊不可能”^①。1 月 1 日，罗斯福发来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烈的电文：

“惟阁下之远征军，具有美国之装备，未能前进，以攻击现已力竭之敌第 56 师团，此实使余难以理解。……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

其措辞非常严厉，蒋介石本人也认识到“这是自己与罗斯福“直接通电以来迄所罕见”。接着，马歇尔通知史迪威，除非中国远征军部队入缅作战，否则暂停对它的一切租借援助。在这些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出兵^②。中美间的这一危机才暂告一段落。但它显

① 《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100-101 页，第 100 页；《宋美龄与罗斯福》第 100 页；《宋美龄与罗斯福》第 100 页；《宋美龄与罗斯福》第 100 页；《宋美龄与罗斯福》第 100 页。

② 《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100-101 页，第 100 页。1 月 1 日，宋美龄与美国驻华参谋长霍恩谈话，“明告以美国此种压迫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也。”第二天，她又要求史迪威向华盛顿指明罗斯福的电报措词不当，“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第 100-101 页。



然对罗斯福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巴顿对之作出了十分形象和幸灾乐祸的总结：“他们（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已经完全被逼疯了，以后，我无疑会从前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①。

与中国整个战局恶变相一致，缅甸战场还直接引发了 1942 年另一场给中美关系造成最大危机的“史迪威事件”，围绕这一重要事件，中美史学家已经进行了十分丰富的研究，实无必要进行赘述^②。简言之，面对 1942 年中国战局的急转直下，罗斯福试图重整中国军队，从 1942 年 1 月中国抗战 5 周年纪念日的第一封电报开始，力主蒋介石将指挥整个中国军事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而史迪威的性格、处事方法、对租借物资的控制、在缅甸作战计划中促使中国军队入缅的角色以及随后与蒋介石的种种分歧、特别是他对待中共的态度和主张等都为蒋介石所不容，尽管蒋声称这“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但后来在罗斯福的个人特使赫尔利的协调下，他决定作出让步，

“罗斯福总统来电迫交史迪威以指挥权，殊难忍受，惟考虑结果，对美外交方针，不能不用逆来顺受之道，故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如运用得当，对俄对共或有转变环境之可

① 转引自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54 页。蒋介石自己也称 1942 年 1 月为“为外交逆势最劣之一月”，《总统》卷五下 第 500 页。

② 关于“史迪威事件”事件的细节及影响，可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七章第一节“史迪威事件”，第 147-148 页；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54-155 页。此外，有关专著还有梁敬惇：《史迪威事件》，台北，1987 年版；《史迪威资料》，翟同祖 编译，北京，1982 年；《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陈永发 著，陆增平 译，王祖通 校，商务印书馆，1992 年中译本；《史迪威事件》，陈永发 著，陆增平 译，王祖通 校，商务印书馆，1992 年中译本；《史迪威事件》，陈永发 著，陆增平 译，王祖通 校，商务印书馆，1992 年中译本。



能,乃不特不宜固拒,而且加以信任,期待形势之好转,此一政策之决定,乃为国家存亡成败之所系。……俄美无形之压力,日加无已,诚令人有难以忍受之苦,此种耻辱,实比任何暴力之逼迫为甚。……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压迫,实为十三年来所未有。……今既确定外交政策,则无论任何痛苦与耻辱,必须虚心忍受,如此国家民族终有光明之望也”^①。

但正当该事件恰有转机的时候,史迪威又以蒋介石不配合缅甸作战为由督促罗斯福发来另一封电报,称“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在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线之机会,且直接危害现有之空军途径,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及负完全责任。”蒋称该电“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②。此后,蒋介石不但拒绝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而且还决定将他赶出中国。在双方的严重对抗下,罗斯福最终出于维持中国抗战的需要召回了史迪威。但是,该事件对罗斯福本人和其他外交决策者以及美国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1945年1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文,宣称召回史迪威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府”。以该文章为导火索,大量有关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相继发表,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的评论构成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召回史迪威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官员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失败感”,罗斯福至此“对中国的兴趣大大减少”,“美国失去中国的根源可追溯到以召回史迪威为象征的战时的

①《总统》卷五下 雪第 256 页。

②《总统》卷五下 雪第 256-257 页。



挫折和失败”^①。“蒋介石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要把他拉下马的企图，但这位国民党领袖也同时失去了他曾一度在华盛顿享有的尊敬。到1950年，蒋介石夫妇的形象已经暗淡无光”^②。

伴随着上述中美之间不愉快事件的发生以及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中国当局印象的转变，国务院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份为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所准备的美国对华长、短期目标的政策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为确保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而对之进行武装以使之“成为一个亚洲大国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强调利用美国影响以促进中国内部统一的目标，

“并不必然得出中国一定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尽管就短期目标来讲，蒋介石似乎是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袖。……就长期目标而言，我们的目的是要维持一种灵活性，以使我们能够与任何一个可能造就统一、民主和友好的中国的领袖人物进行合作”^③。

这份文件透露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即他们由此开始放弃先前积极扶持蒋介石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国际警察”的目标，转而倾向

① 魏德迈将军1950年3月26日致罗斯福总统电，转引自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52-153页。

② 莱文：《灾难的边缘：1950年的中美关系》，第152页。

③ 云冈1950年1月26日致魏德迈电，转引自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月底，这份文件又被用来答复和指导军方关于对华政策的质询，接着，它又与另一份相关文件被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名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最高决策层所认可的对华政策说明，本文引言见1月底答复军方的备忘录，转引自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另见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及魏德迈脚注。



一种“灵活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是美国最为关注并逐步介入的两个相关领域。抗日战争早期，中苏关系较为融洽，苏联还一度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西方国家，但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以及 1941 年《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对华援助日渐减少并于 1943 年完全中止。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开始调整，获取外援的主要目标转向美国，中苏关系开始趋冷并产生摩擦。到 1945 年，围绕新疆问题，苏联开始公开谴责蒋介石的政策，两国关系矛盾加剧并日益公开化^①。中苏关系的恶化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1945 年中，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此外，华莱士还代表罗斯福再次正式提出要求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团进入延安。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坚持反对美国的上述建议，但恶化的中美关系显然成为他转变态度的直接原因，他不但承诺改善中苏关系，而且还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在国共关系方面，1945 年 1 月 17 日，罗斯福会见孔祥熙，除了表示对中国军事状况的失望外，特别强调了苏联不支持中共，建议国民党政府应当尽快与中共达成有关协议^②。两天后，罗斯福又授意赫尔利立即向蒋介石表示与中国北方军事力量达成协定的重要性，“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更多，但他得听我的话。你可以向他强调‘俄国人’这个词”^③。罗斯福此处显然暗指苏联的参战问题，然而，急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蒋介石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罗斯福的提醒，迅速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谈判。有的历史学家指出，蒋介石政府未能及时以此为条件向美国政府提出苏联参战后的中苏关系——因为这一时期

①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

② 《孔祥熙致蒋介石》，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94 页-195 页。

③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



正是罗斯福思考远东问题并最终形成雅尔塔决策的关键时刻——从而失去了中国在苏联参战问题上应有的参与机会。对此，文安立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一方面，蒋介石依然相信罗斯福会在有关苏联参战的中国问题上通知中国；另一方面，史迪威事件所导致的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实在难以承受中方的任何新要求，否则将会削弱美国继续支持重庆政府的决心^①。

苏联因素的上扬

随着中国在美国战略棋盘中地位下降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苏联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开始凸现。这主要表现在战争末期斯大林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一方面，斯大林的这一承诺得到了急需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当局的欢迎，而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关注战后问题的罗斯福不得不考虑在战后东亚与苏联的合作问题，甚至包括利用苏联来达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为重建苏俄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展开了精心外交。

斯大林对中国东北的图谋可谓由来已久。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被迫退出东北后，恢复在东北的权益不但是苏俄在远东追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还成为民族复仇与雪耻的一个象征。正如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将日俄战争称为俄国的污点，“给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为了洗刷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10 年了”^②。形象地代表了苏联战后在远东的安全政策

① 文安立著《雅尔塔会议》，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年。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5 页。



旨在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有记录证明,在《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斯大林手指苏联的东部边界,得意地告诉下属:

“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也是我们的了……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①

因此,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中国政府的态度无关,也不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鼓动和压力,而是“实现其战后远东外交战略的起点,是实现,或者说是恢复其在远东权益的既定方针”,它既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一脉相承,又是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斯大林审时度势的战略选择^②。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斯大林在战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俄国打赢过多次战争,但却不善于利用胜利果实,俄国人打仗很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在分享胜利果实时总被抛在一边,任人宰割^③。因此,围绕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谋求恢复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外交举动,斯大林可谓“吸取历史教训”并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主要外交目标的选择。斯大林的首选目标既不是曾经从沙俄手中夺走东北的日本,也不是根据《开罗宣言》即将在战后恢复东北主权的中国政府,而是实力遍及全球的美国。其精明不言自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清楚表明,战后的世界只有美国和苏

①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1995年,第76页。

②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③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另一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第76页。



联两个超级大国,只有征得了美国的同意,苏联的远东利益才能较为轻松地实现。其次,斯大林的心计还表现在他为此展开的对美外交。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斯大林真正决定参加对日作战的时间是1945年10月,主要目的在于继续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取得战后东亚决策的发言权、恢复苏联传统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在中美关系间打进一个楔子等^①。为此,深知美国希望在对日战场上得到苏联帮助的斯大林为此展开了精心的对美外交,早从1944年起就开始,他就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谈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题。如在1944年11月,他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援华问题上表示愿意提及苏联会参加对日作战”;在1945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他再次向国务卿赫尔“在援华问题上谈及对日作战问题”^②;几个月后的德黑兰会议,他承诺将在战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等。然而,对于容易引起对方疑虑的具体参战条件,他却一直讳莫如深。苏联参战的允诺自然得到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斯大林的反复承诺下,苏联参战已逐步成为美国战略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45年10月中旬,就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将中国作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后一周,随丘吉尔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团团长迪恩“在援华问题上”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登陆菲律宾和进攻日本本岛的计划,并正式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斯大林提出了苏联何时参战、集结所需兵力的时间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运载量等三个问题。也正在此时,斯大林对日作战的大政方针才正式确立,他当即保证苏联将在击溃德国后两个月开始对日作战。为了博得美国的好感以确保达到参战的目的,他还破天荒地首次提出苏联届时还将同意美国在苏联东北部沿海相关地区以及堪察

① 辛德海姆著,沈志华译,《斯大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刁志海著,《斯大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加半岛等地建立空军基地,使得哈里曼和迪恩都大感意外^①。最后,斯大林才轻描淡写地提出美国援助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大型战略物资储存基地和需要澄清一些“政治问题”^②。即使如此,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具体要求,他仍然避而不谈。

斯大林的另一个考虑是中国,因为恢复苏联在东北的权益毕竟要最终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为此,他一方面着手在国内制造舆论,“近月来对旅顺港颇多关注之证,不但杂志著论,称旅顺为苏联之宝贝,一如其他苏联领土,且有专书出版,追述旅顺之失,视为遗憾云”^③。另一方面,1945年10月,斯大林向哈里曼以及来华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赫尔利透露了想与蒋介石会面的信息,11月10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又通知蒋经国,斯大林准备会见蒋介石。然而,由于此时因史迪威事件而极端恶化的中美关系,蒋介石当即直觉性地判断斯大林此举“实为苏联离间中、美关系之一大阴谋也,使我我国孤立,而后投入其怀抱,以驱美国实力于东亚之外。”此外,加之新疆局势的不明朗以及罗斯福可能在第四任竞选成功后来华等因素促使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④。

蒋介石的拒绝致使斯大林不得不将外交目标再次锁定美国,一个月后,他正式向哈里曼提出了包括对中国东北要求在内的具体参战条件:

① 阅读《特使》第136页,就会发现,斯大林在1945年10月10日给哈里曼的信中,最初曾提出在旅顺建立空军基地,但哈里曼表示反对,之后苏联又收回了这一承诺,但在几个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再度答应。

② 见《特使》第136页。

③ 《特使》第136-137页。

④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5年11月10日,载《战时外交》,六二卷第136页。

④ 《总统》卷五下,六二卷第136-137页,见《特使》第136-137页。



1. 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应归还苏联,以保证海参崴之安全;
2. 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应租与苏联;
3. 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业应租与苏联;
4. 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①。

高龙江认为蒋介石对斯大林邀请之拒绝对未来中苏关系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蒋介石对会晤斯大林的拒绝意味着未来的中苏关系将不在蒋与斯大林之间进行谈判,而要由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决定了”^②。

尽管此时此刻苏联参战已经成为美国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斯大林的图谋还是引起了美国的警觉,面对哈里曼的汇报,罗斯福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哈里曼本人更显顾虑重重:“中国的整个政治问题,我认为无疑会在我们和俄国人的关系上带来最大的困难。”然而,与对苏联参战的迫切需求相比,他们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忧虑却显得极为短暂,在紧随其后为西伯利亚提供“数量大得惊人”的战略物质讨论中,罗斯福强调:“没有俄国的帮助,战败日本将是十分困难,而且代价高昂,因此,我们应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斯大林的计划。”他接着又询问斯大林在参战前想达成什么样的政治协议,根据对斯大林关于恢复远东权益以及解决使用满洲港口和铁路等问题的了解,哈里曼表示“不会有惊人

① 云冈,《苏联解密档案:中国外交档案解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第100页。

② 参见高龙江《苏联解密档案:中国外交档案解密》关于斯大林邀请与蒋介石会面之事,史学家还有争论,亲身参与当时中苏关系并对前苏联解密档案多有研究的俄罗斯史学家列多夫斯基表示没有斯大林邀请蒋介石的证据,声称蒋介石一直热衷于改善中苏关系,而斯大林则表现冷淡,并一直回避与蒋介石的会面。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苑猿页。



的名堂。……总统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些问题，并作出了果断的决定”^①。罗斯福显然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几天后，他通过孔祥熙和赫尔利提醒蒋介石，但一直苦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蒋介石显然错失了在雅尔塔会议前与罗斯福直接商谈苏联问题的一次机会。

因此，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远东政治要求，罗斯福在赶赴雅尔塔之前就已经全然掌握并决定予以支持和同意。实际上，正如霍普金斯的回忆：罗斯福赶赴雅尔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苏联参战的具体日期和范围完全确定下来^②。结合此刻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以及与蒋介石的重重矛盾，罗斯福在雅尔塔轻松地以中国权益换取斯大林及早参战的承诺以及寻求苏联合作维护战后远东安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一位学者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由于同中国人打交道被搞得灰心丧气，斯大林的许诺就提出了以俄国人代替中国作为美国的战时和战后伙伴的可能性，……并能在战后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进行合作”^③。另一位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到 1945 年 6 月，罗斯福一定开始认识到了，他的培植一个‘强大、统一、亲美的中国’的梦想正在迅速变成一个黄粱美梦”，但为了继续美国的政策，避免苏联

① 《特使》，第 109 页；苏联此时要求的物资援助数量惊人，斯大林将能够支持两个月苏军 100 万人、1000 辆坦克、2000 辆车辆和 1000 架飞机的需要全部向美国开列了清单，加上同一时期的租借物资，整个吨位高达干货 100 万吨、水货 100 万吨。“这些清单经过了修正但没有多大减少，到 1945 年 2 月底，在苏军参战的前 10 天，这些货物的清单已经交到了苏联有关当局的手中。”见 悦读军事精英 悦读精英

② 霍普金斯回忆录，转引自 辛德那

③ 月 10 日，总参谋长陈立夫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一再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苏联在战后远东安全问题上，应给予中国以同等地位。斯大林实际上是在评论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的政策，但作者认为，它更符合对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政策描述。”



对中国真空地带的‘渗透’以及“增加保全一个国民党中国的机会，罗斯福最后向苏联的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寻求积极的合作”。在雅尔塔会议上，面对斯大林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共的允诺，罗斯福同意协助说服蒋介石接受苏联的满洲要求，“舍弃满洲以保全国民党中国，却是一笔远较合算的交易”^①。

结 语

以 1945 年中国抗战形势恶变以及欧洲战场的转折为契机，美苏两国都开始了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战略谋划。为了恢复 1911 年前的远东优势地位和彻底消除日本的威胁，斯大林早从 1941 年起就开始主动承诺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并为此展开了积极和精心的外交。从美国方面来讲，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发挥中国的抗战力量，它从 1945 年不断地介入中国的内部问题并向中国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诸如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要求中方派出军队参加缅甸战役、提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等等。这些政策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了蒋介石的猜忌，使中美关系一度走入战时以来的最严重危机。在 1945 年春夏的蒋介石日记中，多处透露出他对美国动机的疑虑与不安，诸如“……实行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其用心颇不可问，余惟依理力拒而已。最近外交渐趋不利形势。”“今后军事形势严重已极，美又不觉察俄国之奸诈凶恶，反压制我国，且进而利用共党以谋我，是诚可虑也。”“半年以来，美国态度不佳。”“战事与外交最为可忧，故近日内心之痛苦，以及遭受之耻辱，为抗战以来所未有，殊难忍受也”^②。

① 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 155-156 页。

② 《总统》卷五 六 雪第 154 页 155 页。



中美关系的恶化,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美苏外交。对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尽管蒋介石早有觉察,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疑苏惧苏以及“力图补救对美关系”心态的影响,他不但拒绝了直接与斯大林探讨未来中苏关系的可能,而且在对美关系中没有及时地就苏联参战后中苏关系的问题进行有力交涉,以至于斯大林将谋求恢复东北特权的外交方向定位于华盛顿,错失了直接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直接交涉的两次重要机会,从而将这一关键问题的处理推到了克里米亚的小镇雅尔塔。就此,雅尔塔会议也成为美苏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起点。



第二章

走向莫斯科的外交

1945年 1月 1日

雅尔塔秘密协定成为规范美苏两国战后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文件，苏联将据此恢复旧日沙俄在东北亚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而美国则得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然而，被蒙在鼓里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主动的外交努力以求摆脱直接遭遇苏联的命运。其中最为着力的外交举措就是“邀美抗苏”，力图将美国拉入中苏关系，借美国的力量抗衡苏联。就美国而言，随着在欧洲战争后期对苏联外交举动的怀疑上升，华盛顿也没有将自己完全束缚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而是力图限制苏联在未来东北亚的势力扩张。于是，围绕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落实以及拟定中的中苏谈判，中国、美国和苏联在 1945年 1月 1日 间呈现出了相互牵制与相互影响的外交态势。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继续沿着自相矛盾的态势向前发展。一方面是具体负责制定对华政策的国务院，另一方面是直接



得到罗斯福总统支持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前者强调对华政策的灵活性,而后者却坚持支持蒋介石政权。双方的最大危机发生在 1945 年 7 月份赫尔利与驻华美国外交官之间的一场纷争。关于这场斗争的细节无需赘述。在赫尔利返回华盛顿期间,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参赞乔治·艾奇逊(George Acheson)牵头向国务院上交了一封长电,指出了蒋介石政权的种种危机,强调美国的目前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内战的“不可避免”,要求美国对华政策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即在援助蒋介石政府的同时,对“人数众多、富有进取精神并处于重要战略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以及其他中国地方集团也加以援助^①。该建议与此时国务院的政策可谓不谋而合,立即得到了有关官员的重视,从而在华盛顿有关部门引发了一场对华政策的争论。罗斯福最终站在了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一边,参与上述长电的那些外交官们后来都被赫尔利逐出了中国^②。

赫尔利虽然战胜了自己的部下,但他与强调对华“灵活政策”的国务院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的争论愈显突出。在此期间,国务院的对华政策多有强调对蒋介石政府的“灵活”原则。杜鲁门在一份自己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我对中国最初想法”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写道:“考虑到我们的长远目标并准备现政权万一崩溃,我们还力求做到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同任何有可能实现统一和促进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中国其他领导人合作。……我们力求苏联、英国的合作,认为这是成

① 乔治·艾奇逊于 1945 年 7 月 1 日向国务院提交的长电,见《美国对华政策》第五章第六节,第 140-141 页。

② 谢伟思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见《美国对华政策》第五章和第六章;卡恩:《中国通》,第 140-141 页。



相信自己已经说服了蒋介石，他满怀信心地告诉华盛顿：“在我抵达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工具。他现在相信，俄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他现在感到， he 可以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没有外国联系的中国政党，并与它达成协议”^①。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赫尔利积极斡旋于国共之间，并力图通过压制中共的办法来达到消除国共不和而一致抗日。但是，直到 1945 年初，中共并没有按照赫尔利的设想屈服于国民党政府，使得他一直迫使中共就范的目的面临破产的危险^②。

恰逢其时的雅尔塔秘密协约无疑成为赫尔利继续压制中共屈从国民党政府的救命稻草和新的力量源泉，尽管他事后表白自己曾向罗斯福抗议秘密协约有损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后者有所承认并由此派遣他前往伦敦与莫斯科试图对之有所改善或将之搁置。但根据他随后从伦敦和莫斯科发回的电文以及陪同他与斯大林会谈的哈里曼的记录，都难以证实这一说法的成立。相反，他的使命正如自己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得到罗斯福逝世后发给杜鲁门和国务卿

^① 邹说认为“赫尔利对苏联的诚意的信任和对苏联的保证的过分依赖”形成于 1945 年 1 月的访问苏联，《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20-121 页，转引言见第 120 页；关于赫尔利的这次访问记录，见《美国外交关系史资料选编》第 10 卷，第 100-101 页。

^② 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第 120-121 页。



及南满路之股权，中、苏各享其半，苏联对各该铁路并享有特殊利益。(六)外蒙之现状不变”^①。

赫尔利深知该条约的保密性质，他在事后深感不安，于是致电杜鲁门长篇大论地谈论中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要求授权将秘密协定内容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此时正拟派遣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探询苏联对待整个雅尔塔精神的态度，因而拒绝了赫尔利的要求，指出“目前让你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信息都是不合适的时间”，并明确强调待时机成熟后再发出进一步的指示^②。但是，即使在收到这份明确阻止行动的指示后，赫尔利还是擅自作主地将协议内容以及苏联要在参加对日战争之前就此与中国达成一项条约等告诉了蒋介石，并要求为他保密，“予今日之报告，纯系私人性质，意在请委员长速为准备，但非受斯大林或美政府之嘱托而向委员长报告，故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③。

国务院仍然不信任赫尔利。在接到他莫斯科之行的汇报后，东亚司迅速要求参与会谈后刚刚返回华盛顿的哈里曼发表意见，后者认为尽管信息“准确”，但“赫尔利将军对斯大林元帅的反应过于乐观”，提出赫尔利或许会将这种乐观传递给蒋介石，并由此建议要求赫尔

①《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页。

② 裁 粤 总 署 军 事 史 话 卷 五 六 下 雪 第 页。

③《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王世杰自重庆致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知赫尔利大使所谈关于苏联对东北及外蒙等问题之态度电》，民国 年 月 日，《战时外交》六 雪第 页。



利“应谨慎从事以免引起蒋介石没有根据的期望”^①。几天后,驻苏大使馆代办凯南也发来了内容相同的电文,表示苏联对华政策是一贯的,那就是“对与苏联接壤的亚洲大陆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旨在以最少责任去获取最大权势的灵活弹性政策”,凯南担心“赫尔利大使的用词或许会引起家里高层对局势的误解”^②。这两人的意见与国务院对赫尔利的看法不谋而合,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亦提醒凯南,即提醒赫尔利注意,斯大林作出承诺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等到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而中国的统一仍然不能完成时,苏联肯定会“重新检点其政策并根据其最佳利益而对之随时进行修正。”由此,他要求赫尔利必须使蒋介石“全面认识到形势的紧迫”,只有尽快达成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才能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并为未来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③。两周后,代理国务卿格鲁夫再次电告赫尔利,强调“在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上,充分保持灵活性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使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明白,我们的支持不是一张自由取用的空头支票”^④。实际上,对斯大林所谓的对美国中国政策的支持,只有赫尔利一人深信不疑,不说上述对苏联政策颇有了解并怀疑斯大林动机的美国外交官员,就是蒋介石本人也认为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

① 原文为：“应谨慎从事以免引起蒋介石没有根据的期望”。

② 原文为：“赫尔利大使的用词或许会引起家里高层对局势的误解”。

③ 原文为：“只有尽快达成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才能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并为未来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

④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107 页，此处译文应当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不是“一纸空文”。



劳也”^①。

国务院如此谨慎的原因是出于华盛顿此时对苏联动机的新判断。雅尔塔会议后,以波兰政府的组成为标志,苏联在东欧的种种举动在杜鲁门新政府内引发了争论,在 1945 年 2 月 14 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杜鲁门强硬地要求苏联恪守雅尔塔决议,强调这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②。与此相一致,国务院对苏联在未来东亚的意图也愈感担忧,一份由东欧事务科官员起草的《苏联对中国政治对策评估》建议:“为了我们自身利益,我们应当尽一切所能防止苏联成为影响中国的主导国家”^③。因此,当赫尔利 1945 年 10 月 15 日来电声称蒋介石已经得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主要内容并断言中国会接受全部条款时,杜鲁门也陷入了极大的犹豫。在第二天海军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表示“该对是否需要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如果中国持续衰弱,俄国的影响势必会很快进入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一旦苏联人卷入,任何关于一个‘自由中国’的幻想都将不复存在,……随着克里姆林宫的一声令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会勇往直前……”^④。同一天,哈里曼与李海又提醒杜鲁门,苏联参战“最终会控制在外蒙古以及满洲所建立的任何政权”^⑤。

① 《总统》卷五 下 雪第 466 页。

② 这次会谈的气氛颇为紧张,双方可谓针锋相对,杜鲁门“近乎蛮横的坦率”甚至使力主对苏强硬的哈里曼都感到后怕,担心总统对“莫洛托夫的猛烈进攻”会为苏联指责美国抛弃罗斯福政策提供“可乘之机”。见《特使》,第 240-241 页;《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241-242 页。

③ 见《总统》卷五 下 雪第 466 页。

④ 见《总统》卷五 下 雪第 466 页。

⑤ 见《总统》卷五 下 雪第 466 页。



在这种情况下，缘月 苑日，国务院、海军部、陆军部以及哈里曼等人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议题是对与苏联人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进行重新评估。会后，副国务卿格鲁转交给军方一份备忘录，要求对方对他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有所答复，其中前两个都是直接针对雅尔塔秘密协定：

第一、苏联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对美国是否如此重要，以致于要妨碍到我们在它参战前应取得它对 [我们] 在远东实现一些有利政治条件的赞同？

第二、关于苏联远东政治追求的雅尔塔协议，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还是全部或部分地加以履行？

接着，文件直接提出了国务院关于第一个问题中所谓的政治条件，其中前两条涉及到苏联对华政策：

第一、苏联政府必须答应运用它对中共的影响，协助美国政府为达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之统一进行努力。在美国政府就有关雅尔塔协议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前，美国政府认为最有利的中国统一之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关于新疆问题，必须由中苏政府间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加以解决。

第二、苏联政府要确定无疑地遵守关于将满洲交还中国以及朝鲜未来地位的《开罗宣言》。^①

① 英文原文为：“苏联政府应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协助美国政府在远东实现一些有利政治条件的赞同。第三条也涉及到中国，‘第三、苏联政府明确赞同：不管是在日本最终投降之前或之后，一旦朝鲜解放，它应立即被置于美、英、中、苏的共同托管之下。’”



这份备忘录形象地代表了华盛顿此时对苏联担忧的日益增长。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只有原子弹才能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重要砝码，但当时正在积极进行中的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最后结果，“如果认为需要与苏联讨论解决有关满洲和中国这类问题，那么最好还是等美国政府有了这一重要的新式武器，而且全世界都知道它的时候再说”。史汀生在日记中形象概括了当时这种矛盾心理：

“我一直试图指出存在的困难，表示现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少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条件。……但麻烦的是总统现在已经答应在7月上旬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会面，那时这些问题 [有关雅尔塔远东协议和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 将变得十分紧迫，因此也确有必要与苏联将它与满洲、旅顺港以及中国北部的其他部分的关系敲定，当然也包括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些所有相互纠缠的问题之上，S-1 秘密将具有支配作用。但我们可能要到那个时候、那个会议后才能确定我们手中是否才拥有武器。我们认为它很快就会出来，但是在手中还没有王牌之时就在外交中押注如此之大进行赌博似乎太过可怕”^①。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地答复了国务院：第一，苏联参战无疑会缩短战争时间并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但苏联参战本身是取决于其自身实力和政治要求，而与美国的政策无关；第二，苏联在雅尔塔所取得的远东让步依靠的是其自身的力量，“俄国有单方面落实雅尔塔协议，或许千岛群岛可以除外，雪^②的军事实力”，美国对此无能为力，“除

^① 菲斯：《中国的纠葛》第 70 页，见《菲斯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非我们选择使用武力”。就目前时间下,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没有多大好处”第三,同意国务院采取行动以获得它所提出的政治条件^①。

军方的答复非常现实,即苏联在远东参战并获相应利益的形势已是木已成舟,美国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他们赞成国务院关于获得苏联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举动。国务院与军方的这次磋商直接构成了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远东问题的基础。

1945年春夏的美苏关系可谓多事之秋,继罗斯福死前的“伯尔尼事件”,双方围绕波兰的政府组成发生争吵,接着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因阿根廷问题又产生了分歧,缘月上旬,又爆发了停止“租借物资”的事件^②。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两国相互怀疑对方是否坚持雅尔塔精神,为此,在哈里曼的极力推荐下,杜鲁门派遣深得斯大林赏识的霍普金斯于7月1日(译者注)前往莫斯科加以解释和澄清。缘月18日,双方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对于霍普金斯关于苏联的具体参战时间问题,斯大林表示将在8月18日前完成远东调兵,但具体的开战时间将取决于满足苏联要求的雅尔塔协议的履行情况,“只要中国同意了这些要求,苏联就可以在8月份开始行动”。霍普金斯声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直并将继续遵守协约以协调对华外交,斯大林也表示他将直接与8月来莫斯科的中国外长宋子文进行交涉。双方为此达成协议:在苏联与宋子文谈判的同时,美国政府将授权赫尔利在重庆协同行动。接着,曾经参加国务院关于远东政策讨论的哈里曼提出如果在苏联进军东北、赫尔利大使的努力还未见成效时,苏联对中国将持何态

① 转引自《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注册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注册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度？是否仍然能够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协议？斯大林作了爽快的答复：苏联无意改变中国政府对东北以及任何其他地区的主权，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此外，他还对蒋介石个人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哈里曼又问，苏军开进东北后能否让蒋政府组织当地民事管理？斯大林再次肯定，表示在苏军到达的任何地区，蒋介石都可以派遣代表与苏方交涉以建立管理机构^①。至此，哈里曼和霍普金斯基本上得到了国务院 8 月 10 日备忘录中所谈到的政治条件，而这次美苏沟通也为未来的中苏谈判奠定了基础。

中美交涉

中方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关注与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对苏联在东北的未来要求十分警觉并有所知悉。1945 年 5 月，美国海军参谋长李海上将在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的一次谈话中曾探听中方的意见，“料苏俄愿在远东取得旅顺不冻港，英必赞成，美亦无反对之意，询我如何？”蒋介石对这一信息极为敏感，迅速质询顾维钧：“彼特于此时忽提及旅顺事，以兄当时察其辞色与推想此语之所由，其用意何在？请详告。”后者回电表示可能是美国军方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的苏方条件^②。雅尔塔会议

① 哈里曼赴华使命报告，载《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523 页；《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523 页。

② 《驻英大使顾维钧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与美参谋总长李海商讨苏联在远东取得不冻港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5 月 10 日；《蒋主席自重庆致驻英大使顾维钧嘱详告美参谋总长提及旅顺之用意何在电》，1945 年 5 月 10 日；《驻英大使顾维钧自伦敦呈蒋主席报告苏联暗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对日战争条件之一且其杂志专书已视旅顺为苏联领土电》，1945 年 5 月 10 日，载《战时外交》六，第 523 页，第 523 页。



后，蒋介石隐约感到会议可能达成了隐瞒中国的远东条款，在圆月愿日看到雅尔塔会议的第一次公报时，他就怀疑“一如所虑，其果与英、苏协以牺牲我乎？”^①次日，他又将苏联对华外交拖延、中共态度转变归结为“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②原日，他再在日记中写道：“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塔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③。

圆月中旬，蒋介石要求返回华盛顿的赫尔利带函给罗斯福，表示希望知道雅尔塔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细节^④。同时，他又命令宋子文马上赶赴美国与罗斯福进行面谈，但美国政府却以旧金山会议马上召开而总统不便在此之前单独会见中国外长为由加以拒绝^⑤。宋子文再次致函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声称自己将以代理行政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的名义访美，申辩英美苏三国外长已经在雅尔塔会面，而作为联合国会议四大发起国的中国没有参与，因而需要赴美商讨一些机密、共同战略、中苏关系、国共关系以及中国经济状况等。此外，宋美龄本人也亲自致函霍普金斯为宋说客：“子文每日忧虑委员长命其与罗斯福总统面谈之训令，唯恐待 苑周后旧金山会议时为时已晚”^⑥。但是，宋氏兄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美国的首肯。与此同时，蒋

① 圆月愿日日记，圆月原日日记，《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远源 远愿页，也见《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苑苑年，第 员册，第 猿页，但后者认为这是圆月愿日日记，似有误。

② 《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远愿页。

③ 蒋美龄致霍普金斯函，原载于《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苑苑年，第 员册，第 猿页，但后者认为这是圆月愿日日记，似有误。

④ 蒋美龄致霍普金斯函，原载于《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苑苑年，第 员册，第 猿页，但后者认为这是圆月愿日日记，似有误。



介石还下令驻美、英、苏三国外交人员设法探明雅尔塔会议真相。圆月圆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连接发来消息，报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部分告知了有关内容，“证实美、英、苏三国签有雅尔塔秘密协定”，“俄国对东北及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构也”^①。两周后，驻美大使魏道明也来电汇报了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内容，尽管后者没有出示雅尔塔协议的具体条文，但还是将主要内容告诉了魏道明。斯大林对中国提出的三点要求：“六、维持外蒙古现状；六、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六、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温水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不仅如此，罗斯福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主权属于中国，业务管理在增进效率。……委托制度……大约由三方组织之，一为中国代表，一为苏联代表，一或为美国代表，均当为铁路专家。关于第三点军港问题，伊谓此完全为一新问题，而在前所谈大连问题之外，伊当答复史氏〔斯大林〕，谓此为将来之问题，无须太急，伊可与钧座商之。……总统之意，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②

① 《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282-284页；郭德全：《抗战时期驻俄武官回忆实录》，台北：“国防部”时政编译局 1984年，第 28页。

② 《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承告史达林在雅尔塔会议所提有关远东问题之内容及罗斯福总统之意见电》，1945年 11月 14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282-284页；《总统》卷五 六下 雪第 282-284页。后来宋子文又为此专门详细询问过魏道明，得知罗斯福与后者进行的是非正式谈话，但宋认为“只有在罗斯福非正式谈话中才能真正了解他对某一问题的意向”，见《顾维钧回忆录》7第 2册 雪第 284页。



此外，宋子文在 1945 年 8 月中旬与霍普金斯的一次谈话中也部分证实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部分内容^①。因此，在雅尔塔会议的一个半月后，中方就基本上探明了秘密协定的主要内容。

中方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反感不言而喻，但美国的态度更使蒋介石陷入极大困惑。得到魏道明的电报后，他深感“痛悲”，并“意识到此事的棘手，一方面，他对我所说的 1945 年 8 月 14 日顾维钧将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称为开历史的倒车完全有同感；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拒绝罗斯福不是容易的事，中国抗战是离不开罗斯福的帮助的”^②。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史（达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罗对史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归我云。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③

尽管蒋介石也认为中方对此难有作为而赞同顾维钧佯装不知的

① 《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与霍布金斯晤谈关于雅尔塔会议中史达林对东北之要求及史迪威与共党勾结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8 月 14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29 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 11 册，第 152 页；《顾维钧回忆录》六第 129 页。

③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记《总统》卷五六，第 129 页。



建议^①，但他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一方面，他以此为由督促加紧国内整军计划，指出“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②。另一方面，他下令赴美参加旧金山联

① 顾维钧的建议虽然在理，但支持其主张的原因之一却略显幼稚，缘月 圆日，在与宋子文和王宠惠关于应对苏联的讨论中，他表示苏联自知对中国东北的要求“不合世界潮流”，“我国最好佯装不知，尽量拖延，苏或不致提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旧金山呈蒋主席报告与顾维钧、王宠惠研讨对苏应付方案之情形及与美国国务卿史退丁纽斯商谈关于东三省问题之谈话情形电》，民国 缘年 缘月 圆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页- 缘页。

顾维钧建议蒋介石对魏道明 猿月 苑日的电文不要急于答复，结果却导致罗斯福 苑天后又发来了一份催问电，这份起草于 猿月 缘日而在 圆日才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的一大部分专讲关于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但也说到俄国对中国的要求。……特别是总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见《顾维钧回忆录》第 缘册 雪第 缘页- 缘页。顾氏所言应当不假，因为美国外交文件中有一份与顾维钧所谈的电文日期完全吻合的文件，内容也有部分重叠。猿月 缘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致电赫尔利转交罗斯福致蒋介石一份绝密电文，但该文只有建议蒋介石同意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组成人员中应包括民盟与中共的内容，而没有顾氏所讲的“俄国对中国的要求”以及“总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美国大使馆在 圆日才收到这封电文，由于蒋介石此时不在重庆，该文由宋子文转交，但却没有顾氏所讲的“俄国对中国的要求”以及“总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在 缘年 缘月 缘日，顾维钧向魏道明转交魏道明于 缘月 缘日所发的电文，其中提到“总统说了希望早日示复的话”。此外，蒋介石 猿月 圆日回复罗斯福 圆日电文也没有提到“俄国对中国的要求”，《总统》卷五 六 雪第 缘页- 缘页。由此可以推测两种可能：一是顾维钧的回忆有所混淆，二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所公开的这份文件是不完整的。

此外，顾维钧还有记录：“后来，宋子文在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他给我看过一封蒋委员长的来电。此电附有他和罗斯福的来往函电，并表明他想派宋子文去莫斯科作谈判代表。从这个电报我知道蒋委员长已同意罗斯福提出的全面建议了”。见《顾维钧回忆录》第 缘册 雪第 缘页。遗憾的是，顾氏此处所谈到的蒋介石“和罗斯的往来函电”却不为所知。

② 蒋介石 源月 苑日日日记《总统》卷五 六 雪第 缘页- 缘页。



联合国大会的宋子文以及顾维钧等人继续探知具体的协议条文，并展开相应的对美外交，力图将美国拉进中苏关系，达到以美制苏的目的。

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外交姿态。缘月 员日，在与杜鲁门的会面中，他大谈中苏关系恶化，声称自己将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希望美国为此派出一架交通飞机，以图挑起雅尔塔协议的话题，杜鲁门应允飞机，但对协议却闭口不言^①。缘月 圆日，宋子文将莫洛托夫关于邀请他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告知美方，强调“在未来的会谈中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向苏联允诺，坚信自己的主要依靠是美国对重庆当局的支持”，“除非得到美国外交的全力支持，否则他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他还“迫切地希望美国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他不能在莫斯科达成谅解时。”缘月 圆日，从赫尔利处得知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设法使美国表态对远东的一贯政策，“中 国 甚 盼 杜 鲁 门 能 向 史 达 林 切 切 表 示 ， 美 国 必 坚 持 其 对 远 东 一 贯 政 策 ， 使 中 国 之 主 权 、 领 土 与 行 政 完 整 不 受 损 害 ， 凡 在 华 领 土 之 内 ， 不 能 再 有 任 何 特 权 之 设 置 也 ”^②。此外，他还要求宋子文会同顾维钧、王宠惠等商议对策；宋仍然建议依靠美国，并请求直接转请即将访苏的霍普金斯向斯大林提出中国东三省的问题，建议后者“表明美国坚持东三省土地完整”，宋甚至还鼓励霍普金

① 别则曾公署记录，宋子文向杜鲁门提出，希望美国派一架交通飞机，以图挑起雅尔塔协议的话题，杜鲁门应允飞机，但对协议却闭口不言。见宋子文日记，缘月 员日。

② 《蒋主席自重庆致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嘱面陈杜鲁门总统请其与史达林晤面时能向史表示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电》，见缘年缘月 圆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缘页。



斯将东三省问题视为“苏是否可与美真正合作之试金石”^①。蒋介石十分赞同，认为霍普金斯的访苏行动“不仅关系欧洲安危，而对我旅、大所关尤大也”^②。

与宋子文的含蓄相比，其他中国外交官员则直接要求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他们承认中苏局势经变得“非常严峻”，而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只有两个条件：“第一、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外交能否成功地保护中国以对抗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第二、美国是否愿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新经济芽”^③。远月 缘日，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向宋子文转告杜鲁门总统要亲自会见的消息，宋子文再次声明“他们摆脱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唯一希望是与美国的坚实关系。”此外，他还明确表示正在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如果因为否决权的问题不能与苏联达成一致而苏联拒绝签署联合国宪章时，美国“可以最终并确定无疑地依靠中国与美国一起签署在旧金山达成的宪章，无论苏联是否愿意签署”^④。部分由于斯退丁纽斯的建议，在远月 怨日的会谈中，杜鲁门改变了原定等到宋子文赶赴莫斯科时再将协议内容告知重庆的决定，不但向宋子文出示和讨论了准备让赫尔利在远月 缘日递交蒋介石的电文，而且还让代理国务卿在会后亲手将该电

① 《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旧金山呈蒋主席报告与顾维钧、王宠惠研讨对苏应付方案之情形及与美国国务卿史退丁纽斯商谈关于东三省问题之谈话情形电》，民国 34 年 缘月 圆日，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 缘惠- 缘惠页。

② 蒋介石 缘月 圆日日记，《总统》卷五六二雪第 苑页。

③ 配莫自撰世史，述及宋子文在旧金山与史退丁纽斯会谈之经过，见《宋子文回忆录》卷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

④ 配莫自撰世史，述及宋子文在旧金山与史退丁纽斯会谈之经过，见《宋子文回忆录》卷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



文的副本交给了宋一份^①。宋子文虽然没有当面向杜鲁门表态,但却私下里对当时在场的海军参谋长李海表示中方不会接受让苏联控制中国东北的条款,中方甚至会不惜用武力加以解决,即便是在未来五年内。李海此说或许属实,但另一位在场人波伦对宋子文的观察更是入木三分,他说:“宋是个聪明人,他明白签订这个协议时战略考虑是第一位的。我的印象是他把该协议看作是抵御克里姆林宫更多和更广泛要求而为中国人所设立的一道栅栏。实际上,协议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他本人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就援引了它。至于对罗斯福在交易前未能与中国人进行协商,宋识相地接受了杜鲁门关于军事保密重要性的一般化解释”^②。

尽管宋子文一直积极于将美国拉入中苏关系,但美国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政策。在 1947 年 1 月 20 日杜鲁门就任总统后首次会见宋子文时,他对雅尔塔协议避而不谈,督促后者尽早赶赴莫斯科签订一项中苏条约以树立两国关系的“更稳固基础”^③。在 1947 年 2 月 10 日的会见中,尽管宋子文以美国派遣飞机的要求促使杜鲁门对中苏关系表态,但后者还是缄默不言。实际上,在接到霍普金斯的汇报后,杜鲁门已经决

① 斯退丁纽斯在 1947 年 1 月 20 日建议应当由总统本人或授权由他在旧金山将协议条约内容告知宋子文,但杜鲁门坚持由于安全原因“在此时将条约告诉宋是不可取的”,并决定只“给他一个我们政府立场的概况以及我们对斯大林要和他讨论议题的理解”。2 月 10 日,斯退丁纽斯再次进言“总统应当对宋博士完全坦诚,并与其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苏、美、中关系。”

② 杜鲁门的这一决定引起了驻苏大使哈里曼的担忧,但实际上斯大林对此倒未有异议,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 第 107 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 第 107 页。



定通知宋子文,苏联希望他能在 苑月 员日之前达到莫斯科,美方为此将提供所需的飞机,并同意在宋到达莫斯科时,他将直接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以及斯大林所作的有关承诺^①。远月 怨日,当杜鲁门正式通知宋子文雅尔塔协议时,他明确表态遵从罗斯福总统签署的这一协议,并表示他“急需苏联参加作战”^②。远月 员日,在回国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宋子文对中苏关系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表明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提及的关于重建苏联在日俄战争中所丢失的权益实际上已由中苏两国通过双边条约借以解决而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杜鲁门只是含混地表示美国不会做伤害中国的事,“他目下主要兴趣是苏联能够及时参加远东战争以缩短战争时间并拯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③。

按照杜鲁门的指示,远月 员日,赫尔利将包含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斯大林关于对中国政府的承诺一并交给了蒋介石,声明“斯大林希望于 苑月 员日之前在莫斯科与宋子文直接讨论他的方案”,文件首先列出斯大林的承诺:

1. 斯大林向我们作出了明确声明,他将尽其所能促进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

- ① 引自《宋子文回忆录》,第 100 页。
- ② 引文出自《行政院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杜鲁门总统承告已将备忘录经电赫尔利大使面陈委员长电》,员缘年 远月 怨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缘- 缘页。宋子文的记录与国务院的记录在细节上稍有不同。
- ③ 引自《宋子文回忆录》,第 100 页。宋子文说,当时波伦谈到有可能与苏联签订一项多边条约,而且美国也愿意。见《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讨论有关旅顺、大连租界问题谈话记录》,员缘年 远月 员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缘- 缘页。但是波伦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谈到这一点。



2. 蒋的领导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
3. 他希望中国稳定统一，作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他希望中国控制全部满洲；
4. 他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在苏军进入与日本作战的所有地区，他都将尊重中国的主权；
5. 他欢迎蒋介石派出代表与苏军一起进驻满洲，以有助于组织中国对满洲的管理；
6. 他赞同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7. 他同意由中、英、苏、美对朝鲜实施共同托管。

之后是苏联的三个条件以及签署一项中苏协定，赫尔利表示“苏联为参加对日作战所提以上各种要求，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时曾同意予以支持，杜鲁门总统现仍同意支持。”最后，文件还说明这一消息已经通知了宋子文，并要求赫尔利“尽一切力量征得他 蒋介石演的同意”^①。同一天，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去电报，告知宋子文已经离美赶赴重庆并将在 远月 员日之前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同时，赫尔利也奉命在 远月 员日将苏联的条件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告诉了蒋介石，并“竭尽全力地获得委员长的同意”^②。

蒋介石对苏联的保证当然很感兴趣，实际上，这构成了他决定接受雅尔塔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至于与蒋介石为此进行过多次交

① 赫尔利在 远月 员日离开重庆前，曾向宋子文转达了苏联的条件。宋子文在 远月 员日致函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苏联的条件。杜鲁门总统在 远月 员日回信，表示支持。这一消息已经通知了宋子文，并要求赫尔利“尽一切力量征得他 蒋介石演的同意”^①。同一天，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去电报，告知宋子文已经离美赶赴重庆并将在 远月 员日之前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同时，赫尔利也奉命在 远月 员日将苏联的条件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告诉了蒋介石，并“竭尽全力地获得委员长的同意”^②。

② 赫尔利在 远月 员日离开重庆前，曾向宋子文转达了苏联的条件。宋子文在 远月 员日致函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苏联的条件。杜鲁门总统在 远月 员日回信，表示支持。这一消息已经通知了宋子文，并要求赫尔利“尽一切力量征得他 蒋介石演的同意”^①。同一天，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去电报，告知宋子文已经离美赶赴重庆并将在 远月 员日之前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同时，赫尔利也奉命在 远月 员日将苏联的条件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告诉了蒋介石，并“竭尽全力地获得委员长的同意”^②。



谈的赫尔利预测“我深信中国和苏联很快就能达成一项条约”^①。但是,对电文中所提到的中苏条约,蒋介石感到很大的压力,权衡之下,他立即转向邀美抗苏的思路上去,当即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三个问题,并强调“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他在宋子文回来之后快速作出决定”:

第一、美国政府是否会参与共同使用旅顺作为维护太平洋和平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将据此同意苏联的要求,并建议英国也参与进来,以使得战时“四大国”共同使用旅顺为军事基地;

第二、“委员长渴望美国成为中苏条约中的一方”,如果美国愿意让英国参加,他也不反对;

第三、蒋介石建议讨论归还萨哈林和库页岛等问题应在联合国或至少在中、美、英、苏之间进行,而不应只在中苏间进行。^②

① 载《宋子文回忆录》上册,第100页。宋子文在1945年10月10日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赫尔利曾向他提出,如果美国愿意让英国参加,他也不反对。

② 载《宋子文回忆录》上册,第100页。宋子文在1945年10月10日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赫尔利曾向他提出,如果美国愿意让英国参加,他也不反对。有趣的是,蒋介石在收到这份美国文件后,竟然当场要求赫尔利删去其中“斯大林希望于 苑月 员日之前在莫斯科与宋子文直接讨论他的方案”和“这一消息已经通知了宋子文”的句子,他的解释是不想泄露中方让宋子文进行谈判的意图以及如果美方接受了他的建议后美英都会派出代表参加谈判以达成条约。于是,在中国政府所公开的文件中,美国政府这份类似通知的照会就成了《杜鲁门总统建议之中苏协定纲要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条件函》,而且还特意注明这是一份译文。载《战时外交》,六,第 缘苑-缘愿页。根据前后的事态发展,可以推测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的几种可能:第一、宋子文的因素。宋子文对赴苏谈判一直有顾虑,他认识到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订立中苏条约势必背上出卖中国主权的名声受到国内公众批评从而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但身为外长的他却难以推辞蒋介石以及美方和苏方的要求。这最明显的表现在第二次赴苏之前,他要求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并将最后签署中苏条约的责任推给了蒋宋王朝的外人王世杰。蒋介石此处的要求,显然是害怕给人留下宋子文的人选是由苏联和美国确定的。第二、出于对自己的考虑。第三、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考虑。



杜鲁门没有对蒋介石的建议表示热情。元旦晚上，代理国务卿格鲁向杜鲁门汇报了蒋介石提出的三个问题，建议或许可以等到三巨头会晤与斯大林交涉后再予以答复，而且担心宋子文独自一人难以向斯大林提及这些要求。但杜鲁门表示“他所知道的协议，蒋介石和宋子文也完全知道，他们也知道他完全支持协议，而且，他现在不能对之进行扩大解释”^①。由此，格鲁在元旦通知赫尔利，杜鲁门总统对雅尔塔协议的履行持完全支持的态度，

“协议中说的是将旅顺港租给苏联作海军基地，……本政府不便同意参加对作为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的共同使用，也不便成为中国和苏联条约中的一方因为这一条约的目的旨在约束中苏关系，所以苏联会同意一项三边或多边条约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令人怀疑的。”^②

中苏交涉

蒋介石对一项中苏协定的最早担心是在元旦前 5 月，当时包括苏联在内整个西方媒体都因中国战局恶化以及史迪威事件对中国倍加批评，蒋介石对之报以“极大容忍”，但是对苏联的动机，他却私下告诉蒋经国：“窥其用意，在促使倭寇向我急攻，以期我政府之速倒与中国之大乱，而达成其赤化中国之目的也，用心至为阴险刻毒”。几

① 俞大维致宋子文电，1945年12月31日。转引自《宋子文回忆录》，台北，1981年，第100页。

② 蒋中正致宋子文电，1945年12月31日。转引自《宋子文回忆录》，台北，1981年，第100页。



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各报一面诋毁我政府，为中共张目，一面又急寻经国，觅取与我沟通之线索，而其对伊宁附近之我军，又积极进犯；俄国之手段与方法，花样百出，实令人无从捉摸。……如果彼利用整个世界局势，乘我危机，而要求与彼订立一切实之协定，实乃可虑也。”^①

尽管蒋介石对苏联野心的认识入木三分，但他的亲美反苏心态和政策使得他面对未来的中苏关系无所作为，错失机会，将斯大林完全推向美国，从而也造成了自己不得不在美苏共同压力下面对苏联的困境。在 1945 年底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斯大林再次将外交中心放到美国身上。在赶赴雅尔塔之前，他以战争形势为由通知中国政府将拟议中的宋子文访苏推迟至 1 月底或 2 月初^②。在雅尔塔会议上成功地获得美国的支持后，苏联对美国的承诺十分重视，在 2 月 10 日莫洛托夫与新任总统杜鲁门的首次会谈中，当后者表白将坚决支持和继续罗斯福在雅尔塔的承诺时，莫氏专门询问美国在雅尔塔关于远东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对此，杜鲁门作了肯定的回答^③。

部分由于蒋介石亲美反苏的既定政策以及中国国内的强烈反苏情绪，中方也不再积极于拟定中的访苏谈判计划，原定宋子文的 2 月

① 2 月 10 日日记，《总统》卷五下 雪第 128 页。

② 2 月 10 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107-108 页；另见《蒋介石日记手稿》卷五，第 128 页。云云。《蒋介石日记手稿》卷五，第 128 页。云云。《蒋介石日记手稿》卷五，第 128 页。云云。《蒋介石日记手稿》卷五，第 128 页。云云。

③ 云云。《蒋介石日记手稿》卷五，第 128 页。云云。



访苏计划遂不了了之^①。直至 源月底,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一次晚宴上再次谈起宋子文访问莫斯科之事,“云本希望在莫斯科见面,不意先在此会晤,……又公开宣称会议完毕后,欢迎职赴苏一行等语”^②。但莫氏此举似乎难以被认定是正式的外交邀请,因为他没有谈到确定的日期,而且同时参加宴会的法国、捷克、南斯拉夫、智利、奥地利和新西兰等国外长都一并受到邀请。实际上,连美国外交官都注意到“迄今为止,俄国人在刻意回避和中国进行他们战后关系的任何讨论”^③。

苏联直接面对中方的外交转变发生在 缘月。缘月 愿日,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即在眼前,而与中国签署协定也成为当务之急。源月底,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重庆上任。苏使馆外交官私下向蒋经国传话,声称“中国之前途决于 缘月之内”,希望能够就未来的协定早日直接与中方展开初步交涉^④。此时已经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有相当了解的蒋介石也同样“对苏联战后的可能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担忧”,并从 源月底开始控制国内舆论,许多反苏官员受到批评,各主要报纸禁止登载任何诋毁苏联的文章。结合 源月 猿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到任,中国政府掀起了一个渲染中苏友好的宣

① 宋子文再赴北平谈判,惟苏联国策之调整,则因宋氏之通牒,而致苏联之政策,亦随之而变。实际上,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也有表示欢迎宋子文访苏的外交举动,圆月 愿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蒋经国表示希望中苏合作,并由中国先提方案。但这都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俄国态度在三巨头会议后,对我国显有接近之表示,即英、美亦复如此,唯对我究竟如何?令人惶惑”。由此中国政府也未及时回应。圆月 愿日日记,见《总统》卷五下 雪第 愿页。

② 《宋子文致蒋介石》,源年 源月 愿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页。

③ 宋子文再赴北平谈判,惟苏联国策之调整,则因宋氏之通牒,而致苏联之政策,亦随之而变。实际上,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也有表示欢迎宋子文访苏的外交举动,圆月 愿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蒋经国表示希望中苏合作,并由中国先提方案。但这都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俄国态度在三巨头会议后,对我国显有接近之表示,即英、美亦复如此,唯对我究竟如何?令人惶惑”。由此中国政府也未及时回应。圆月 愿日日记,见《总统》卷五下 雪第 愿页。

④ 《总统》卷五下 雪第 愿页。



传高潮。各主要报纸或者回顾 1945 年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或者追忆列宁与孙中山的友谊，甚至还有有的直接提议两国签署友好条约等等^①。但是，主要由于还未获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完全内容，而且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明确表态，蒋介石一直推迟与彼得罗夫的直接面谈^②。苏联对蒋介石意欲拉美国入中苏关系的企图也有所了解。特别是霍普金斯在莫斯科替中国出面提出有关要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与不快，从 1 月初开始，苏联各媒体纷纷登载批评中国的文章，意在表明“疑我对俄交涉，必事事与美国洽商，而延迟时日不与其大使谈判，或疑我必欲待霍普金斯由俄返美后获得消息”^③。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面加紧指示宋子文寻求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得不直接出面周旋苏联。1 月 10 日，他与彼得罗夫就中苏协定进行了首次谈话，提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并“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凡帮助我国收复失土之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此外，“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与苏联以使用，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便之措施。”他还表示如果苏联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必将成为“中苏两国永远合作之基础”，“彻底清除”“挑拨中苏关系的各种谣言”，中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

- ① 1 月 10 日，苏联各主要报纸纷纷登载有关文章，回顾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追忆列宁与孙中山的友谊，甚至还有有的直接提议两国签署友好条约等等。见《总统》卷五下，雪第 387 页。
- ② 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拒绝会见彼得罗夫的主要原因是“对苏联‘中国之前途决于五月之内’的威胁表示不快以及忙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理由似不充分。见《总统》卷五下，雪第 387 页。
- ③ 1 月 10 日日记，《总统》卷五下，雪第 387 页。



国际上反苏运动“采严厉摒斥的态度”，“苏联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如此不但东三省的人力和物资，即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以及所有物资，亦将为苏联与中国之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①。

在周旋苏联的同时，蒋介石加快了对美外交的速度。远月 愿日，他指示宋子文在第二天与杜鲁门的会见中就旅顺港的问题进行试探，并提出三种依次选择的方案：第一，将旅顺交付国际安全机构建成国际海空军基地；第二、由中美苏三国共同使用；第三、中俄共同使用。之后，他在同一天再电宋子文就交涉“技巧”进行指导，要求间接了解美国有无在南满沿岸登陆计划，表示美国的态度“与我对俄交涉方针有极大关系也”^②。蒋介石担心美国不相信他，故而专门对最后一条进行解释，表示这种选择“非寻常外交家所能出之者也”，因为“如我不先表示与俄共同使用一点，则俄不仅对我绝望，而且美更不谅解，益增其疑虑，故与一面严拒其租借之谬说，不得不自动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③。

远月 夙日，彼得罗夫再次请求会见蒋介石，并间接表示“愿中俄双方直接商谈，必易解决云。推彼之意，东北有关问题，最好不牵涉第三国或国际机构，关系愈少愈好”^④。这一信息对蒋的影响很大，加之对远月 猿日与彼得罗夫谈话的乐观估计，他迅速致电宋子文收回对处理旅顺建议的前两条，指示宋可以个人名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有任何“租借”之词，而“其他铁路、军港等问题，只要无损我国行政与主

① 《蒋介石与彼得罗夫谈话记录》见1952年远月 猿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缘页- 缘页；《总统》卷五 六·雪第 苑页。

② 《总统》卷五 六·雪第 苑页- 苑页。

③ 蒋介石远月 夙日日记，《总统》卷五 六·雪第 苑页。

④ 《总统》卷五 六·雪第 苑页。



权,自可洽商之意示之”。并表示“此点可由我国与俄直接交涉为可,不必再托美国转达”^①。5月10日,蒋介石会见彼得罗夫,后者表示苏联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开始谈判缔结友好互助条约和对日开战,但几个“先决条件”包括:

- 一、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 三、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 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 五、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

这些“先决条件”基本上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相符,但其中两点明显暴露出苏联意欲超越秘密协定的迹象:第一,苏联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解释是让外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苏联要在大连港保有

^①《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囑对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电》,远月 10 日;《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囑对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称电》,远月 10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257-258 页;第 257 页。主要由于这份文件,显然指出蒋介石对雅尔塔秘密协定采取了两种大战略,一是借助美国制衡苏联的“狐假虎威”,二是“以不参加任何美国牵头的反苏安排赢得莫斯科的感激,见《悦读中国》编辑部编《悦读中国》第 1 期 15 页。显然,他对蒋的第二种“战略”誉之过高,实际上,蒋只有第一种战略,而后来的脱美姿态充其量只是一种策略,因为几天后正式得到美国政府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通知后,他再次提出让美国介入中苏关系的希望。



特权地位。实际上，这两点成为未来中苏谈判的主要分歧和最大障碍。蒋介石没有当场表态，但对第一条却明确声明“殊无可能”，围绕“租借”一词，他引用 1918 年俄国租借旅顺后德、英、法等国相继租借中国各地的历史，表明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反对的，认为是民族的耻辱”，“所以条约无论是在名义上和内容上，都不好借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以免在中国和外国引起不良的印象”^①。蒋介石对苏联关于“租借”旅顺的要求可谓深恶痛绝，实际上，早在 1 月初考虑对付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对策时，他就决定坚决反对“租借”一词的再现，表示它是“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决难忍辱”，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果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脱起责任也。”“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以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实际上，蒋介石在此对彼得罗夫态度如此坚决的原因，除了中国自身的考虑外，美国占有相当大的成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若余不在此说明，则将来正式讨论时，再作此言，彼必疑为美国所策动，使美为难，否则或疑余必先商美国而后再与以谈判，甚或疑余挟美国以制俄国”^②。

但蒋介石绝非放弃了邀美抗苏的念头，他依然十分关注美国的态度，在第二天向赫尔利的通报中他注意到，后者对他与彼得罗夫关于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未提及美国参加之意”，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将这一决定归结为美国自己“放弃使用旅顺”，“在理论上已无再商得美国同意之必要”等。尽管如此，第二天，他还是再次召见赫尔利，询问美国到底有无共同使用旅顺的意图，如果肯定，他将向苏联提出中美

① 《蒋介石与彼得罗夫谈话记录》1945 年 7 月 10 日，《战时外交》六二卷第 125 页；《总统》卷五六 第 125 页。

② 蒋介石 1 月 10 日、11 日日记，《总统》卷五六 第 125 页。



英苏四国共用，“如俄不允，即使交涉决裂，余亦所不惜也”，但如果美国无此意图，“则余亦可另作计议”。两天后，赫尔利递交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以及斯大林关于对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尽管蒋介石“阅后悲愤不知所至，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密约之全文，然仅此亦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但他还是提出希望美国能够介入中国东北事务的猿个问题。有趣的是，他接着又通知彼得罗夫说明已经接到了美国的条件，意在“使其知此案已由美国从中介绍参与交涉矣”。但是，几天后，美国政府婉言拒绝了蒋的请求。无奈之下，他在 远月 圆日再次会见即将随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的彼得罗夫，转交了一份赫尔利 远月 缘日的电文，表示“本人认为中苏两国有关的事情，应由中苏双方直接商议，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①。

整个 远月份，蒋介石在如何应对未来与苏联的谈判方面颇多周折，费尽心机。他时而向苏方表露已经得到美国的支持，时而又害怕美国因素会妨碍苏联对华态度，时而指示在美的宋子文主动诱使美国介入东北，时而又吩咐后者小心行事。正如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所言“俄使向余提出口头条件，美使亦奉其总统之命，书面转达俄国所拟中苏互助友好协定之草案，对此悲愤无已，疑惧交加”^②。说到底，他将抵制苏联实现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唯一可能性押在了美国政府身上，认为只有通过美国的坚决支持，中国才可能抵制苏联的要求。不幸的是，此时的美国政府所关注的是苏联及早参战而不是蒋介石政府的安危。远月 圆日，赫尔利转达美国政府不参加旅顺管理与使用并完全支持苏联要求。蒋介石虽然口头上称美国不为中苏关系“此乃必然”，自己的举动只不过在履行“手续”而已，但其极度失望的心情可想

① 蒋介石 远月 缘日日记，《总统》卷五六下 雪第 苑圆缘-苑圆苑-苑圆苑-苑圆苑页；《蒋介石与彼得罗夫谈话记录》员圆缘年 远月 圆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怨-缘页。

② 蒋介石 远月 员日日记，《总统》卷五六下 雪第 苑圆页。



而知^①。

美国的表态为蒋介石多日来对苏外交决策的犹豫画上了句号，经过与宋子文等人的多次协商，到 远月 圆日，终于确定了几经修改的对苏交涉要点：

一、为苏联对日参战后军事上之便利起见，旅顺军港中国允许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与行政必须归于中国，至于军港之技术与管理方法，另定之。其军港范围只以旧军港为限，不得有附属地，即旧日所谓辽东半岛连金州、复州等地在内，此决不可能也。

二、大连商港中国愿辟为自由港，一切规章照普通自由港之例实行，但行政自须由中国独立自主。

三、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旅顺之南满铁路，中允许与苏联组织公司，其资金与股权另定之，其中东铁路苏联卖与日本所得之资金，应归中国所有。苏联在战时可在中东与南满两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直达海参崴与旅顺港运输军队，但中途不得停留。又此两路除铁路业务外，不得有附属地及其他所谓采矿之特权，而此两铁路全部之主权及土地皆属中国，至于公司经营年限，及归还中国之年限，亦须明确规定。除中东与南满两干线铁路以外，其他满洲境内各支线铁路，皆归中国所有。

四、民国十三年 [1924 年] 以前，中国与帝俄所订关于东三省一切条约，应照苏联宣言一律废除，并照十三年北京条约之精神重新订立新约。

五、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

^① 裁藻粤督早名... 蒋介石 远月 圆日日记，《总统》卷五六 雪第 苑员- 苑圆页。



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与苏联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即予以军事及外交之自主权。

六、中国在新疆省将与苏联谋经济上更密切之合作，但对于新疆各民族待遇问题，当自求解决，至于新疆之西北部叛变迭起，其他地区皆与苏联之边境连接，且与苏联境内民族有关，应照旧日协定对中苏国境延边之匪徒共同助剿，相约双方不得收容其对方叛徒，更不得卖给其武器与弹药。伊宁、伊犁及阿山各区，已被叛部所占之区域，必须由中国收复，以利中苏国境之交通与两国边境之安宁。

七、中国为求国家之统一，对于全国之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不使具有武力之政党—共产党，假借政党之名义，掩护其武力之割据，而妨碍国家之统一与抗战之胜利，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以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例如苏联各报纸杂志中，为中共宣传而攻击我中央，与直接派遣顾问或助理前往延安等事，应一律停止。）

八、中国政府决定实现民主宪政，凡依法之政党，均予以一律平等之待遇；因之中共一经交还武力，其军令、政令归政府统一时，则政府必予以中共以一般政党同等之待遇，决不歧视。

九、交涉之注意精神与态度：

甲、只要中、苏彼此认为当从友好方面做起，则可超越外交形式，而为坦白的政治协商。

乙、此后两国在国际场合中皆密切合作，政治上的发言，当彼此尊重。

丙、此后两国经济可为更密切之互助。

丁、苏军在东三省应于对日战争结束,即日本投降条约签订之日起,三个月至半年期内撤军完毕。

戊、苏对日参战时,中苏两国组织联合参谋团,协商共同作战计划,或由中国派遣参谋团驻于苏军司令部,以资联络。

己、中国政府不能改组为联合政府,但中共如将军令、政令归与中央统一时,则政府将来可委派中共党员为部长、会长或委员之职^①。

结 语

雅尔塔会议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夹杂了苏联的因素而呈现出自相矛盾的迹象,这种现象随着美国总统的人事变动以及美国当局对苏联外交动机疑虑的增加而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负责政策制定的国务院和负责对华政策具体实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双方对形势权衡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苏联因素的不同判断。在这一点上,华盛顿各方也不尽一致,随着二战后期美苏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分歧的增多,要求对苏强硬和对抗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在缘月份重新评估了是否继续支持苏联得到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的东亚利益。尽管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履行雅尔塔秘密协定,但美国东亚政策的根基就此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杜鲁门当局已经不再对苏联有起码的信任。从缘月到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对苏联的参战政策呈现出了两条并行不悖的政策:一方面,它必须在需要的情况下能够确保苏联的及时

① 《总统》卷五 六 雪第 苑苑- 苑苑页,这是 源月 圆日的修正稿,圆原日讨论的交涉要点见第 苑苑页。



参战,这表现在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恪守;另一方面,他们在等待原子弹的最终结果,为此尽量采取拖延表态的策略^①。正如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言,美国不得不继续支持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原因是因为美国阻止苏联在东亚扩张的手段和时机还没有到来。

美国政策的矛盾给中国政府同时带来了挑战与机会。前者在于中方对美国政策的过分注重而导致了苏联外交的忽视,诸如蒋介石对苏联“先决条件”就缺乏足够的研究与对策,从而使得未来的中苏谈判变得十分艰难。美国矛盾政策带给中国政府的机会在于鼓励中方持续不断地实施“邀美抗苏”的既定政策。实际上,中方“邀美抗苏”外交努力不但没有全告失败,而且部分由于中方的原因,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再次确保了苏联明确声明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此外,中方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美国对苏联政策改变的一个原因。在紧接其后的中苏莫斯科谈判过程中,伴随着原子弹的出现以及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干预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成为制衡苏联的主要力量。

^① 参见《美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三章

美国与中苏谈判

1953年 苑—愿月雪

对比苏方在 远月 愿日提出的 缘个“先决条件”以及中方在 远月 愿日制定的对苏交涉要点,可以看出双方的分歧十分巨大。由此,这次谈判成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 缘年外交工作中“心态上最沉重、对手上最难缠、形势上最受局限、准备上最不充分的一场硬战”^①。围绕 1953年 苑—愿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两国政府的相关档案都已逐步解密,学术界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②。中苏两国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态度及其政策也已基本为人

①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510页。

②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苏谈判特别是第一轮会谈,三国政府档案均已基本公开并为学者所用,中国方面见《总统》、秦孝仪:《战时外交》六二卷和《中苏关系卷》,台湾学者蒋永敬撰写的长文《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连载于《传记文学》第 5卷第 5期、第 6期、第 7期,雪和美国学者 允德社 撰写的在其 悦 著 原 著 中 都 利 用 上 述 前 两 项 国 民 党 政 府 的 档 案。在 美 国 方 面,《美 国 对 外 关 系 文 件 集》中 有 不 少 记 录,馆 藏 于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斯 坦 福 市 胡 佛 档 案 馆。允 德 社 撰 写 的 胡 世 泽 档 案 更 有 详 细 的 记 录。苏 联 方 面, 苑 年 代 以 来 有 大 量 的 档 案 逐 步 开 放,时 任 苏 联 驻 中 国 外 交 官 员、俄 罗 斯 历 史 学 家 列 多 夫 斯 基 由 此 获 得 了 苏 联 政 府 对 中 苏 谈 判 的 官 方 记 录,并 编 辑 成 册《斯 大 林 与 宋 子 文 关 于 苏 中 条 约 的 谈 判》,允 德 社 1993年 远 愿 月。德 国 学 者 迪 特·海 茵 茨 希 在《中 苏 走 向 盟 盟 的 艰 难 历 程》充 分 利 用 了 这 一 史 料。此 外,沈 志 华 教 授 向 笔 者 惠 赠 了 由 他 本 人 收 集 与 翻 译 的 有 关 文 件,统 称 为《苏 联 解 密 档 案》。



所知。但是,对于美国在谈判期间的作用及其政策演变,尽管学者们都有所提及,却一直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实际上,作为导致中苏谈判得以举行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主要决定国,美国政府不但积极谋求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政府,并直接促成了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使团赶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展开谈判。整个谈判期间,以驻苏大使哈里曼为代表的美国官员不但极端关注谈判的进展,而且还积极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力求美国设法影响甚至介入中苏谈判。本章利用中美苏三国的权威资料和其他相关史料,旨在展现中苏谈判期间美国的相关外交活动,以期对美国的对苏和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战略有所管窥,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中苏谈判的了解。

中苏谈判从 苑月 员日开始到 愿月 员日结束,按照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远月 猿日斯大林对宋子文的礼节性会见至 苑月 员日的第 苑次会谈;第二阶段是两次会谈的间歇期,时间从 苑月中旬至 愿月初。就美国在中苏关系中的作用而言,这一阶段尤为关键,以原子弹试爆的成功为主要原因,美国决策者对苏参战以及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并间接影响了下一阶段的中苏谈判;第三阶段从 愿月 远日至 员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下面就根据这三个阶段的时间顺序,并主要以美国的反应及其政策进行叙述和分析。

第一 阶段

根据 缘月下旬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会谈安排,美苏双方在 远月向中国政府采取了协同行动。在美苏双方的共同压力下,刚刚从美国返回就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于 远月 圆日离开重庆赶赴莫斯科。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次长



蒙、大连、旅顺、中东铁路、中国东北、千岛群岛、国共问题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等问题逐个交换意见，按照宋子文的报告，“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①。关于外蒙古的问题，苏方在远月 15 日关于中苏友好条约谈判的缘个先决条件中已经提出了对“维持现状”的不同解释，但却未引起蒋介石的足够重视，在远月 15 日会见即将随宋子文赶赴莫斯科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蒋介石除了重申在未来的中苏条约中不能再出现“租借”“租借地”等词汇外，对于外蒙古，仅只谈到“最好不提”的立场^②。中方对维持外蒙“现状”的理解，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早在猿月 15 日，罗斯福总统首次向中国大使魏道明透露雅尔塔秘密协定时，曾表示“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③。远月 15 日，当杜鲁门正式通知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时，宋子文当即又对维持外蒙的条款进行了“暂予搁置，亦即目前暂不讨论”的解释，而美方也未表示异议^④。

①《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与史达林商谈关于外蒙独立及使用旅顺军港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以及《史大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二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2-153 页。

②《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明中苏之事应有两国直接商谈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2-153 页。

③《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承告史达林在雅尔塔会议所提有关远东问题之内容及罗斯福总统之意见电》，1945 年 猿月 15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2-153 页。

④《行政院长宋子文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三次会谈记录》，1945 年 远月 15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2-153 页。美方对这次会谈的记录中却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有一份两天后宋子文与代理国务卿格鲁的谈话记录，其中有宋子文谈到“外蒙现状”条款可以有多种解释，中方认为“现状”的意思是不提及以及保持它现有样子。”见 1945 年 远月 15 日。但中美双方的记录中都没有美方对这一点的评论，但美国的态度显然是倾向于中方的解释，这可以从几天后国务院回答哈里曼的质询中可以看出，详见下文。



场,宋子文最后表示请示重庆政府^①。

第二天一早,宋子文邀请哈里曼来访,出示了昨天晚与斯大林会谈的详细英文记录,并对外蒙古的问题进行解释,声称它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心理的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国未能对之实施宗主权,但绝不会支持一个宣称放弃这片土地的政府。宋子文还表示杜鲁门总统同意他的这种解释,要求哈里曼“紧急致电以确定美国政府的解释”^②。接着,中国代表团商议对策,代表们都认识到中国急需中苏条约,而且必须向苏联表示善意以遏制苏联进兵后的更多要求,因此,大家都主张重庆政府应当作出一定的让步^③。为此,代表们提出了打破僵局的三条出路:

① 苏方记录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1945年 远原恩月),引言转引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 页,关于苏方的官方记录,以下出处皆来自海茵茨希,不再一一注明;中方纪录见《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二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页。

② 有人指出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使用的是英文而不是中文,显然有误。关于这一段谈判,还存在着其它基本事实的错误,诸如对第二次赴苏谈判的中方人员,美国学者陶涵不但断言蒋经国没有参加,而且还进行了“蒋介石显然预料到,右派人士反弹声浪一定十分猛烈,决定不让他去,以减低遭抨击的强大压力”的猜测。见《蒋经国传》,第 页。但实际上,蒋经国参加了第二次的会谈。尽管不知道这些英文记录是宋本人所为,还是他安排专人进行现场记录或事后翻译,但从他每次能够迅速向哈里曼提供英文记录来看,至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与美国保持及时的沟通十分重视。

③ 胡绳在《宋子文与中苏谈判》(1945年 月)中,用泽用法语写下了长篇的日记,是研究 世纪 年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料。转引自 辛 著《宋子文与中苏谈判》,第 页。



“第一，与苏联签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第二，给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第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因为苏联及英自治领，均有脱离母国之权，如与外蒙以苏联或英自治领之地位，深恐短期内，外蒙即宣布脱离”^①。

但是，重庆政府因蒋介石赶赴西安而没有及时作出答复。正当此时，美国政府向哈里曼发来指示，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杜鲁门总统协商后，认为“鉴于此时中苏双方进行的双边会谈，本政府对雅尔塔协议中的这一条或其他条款试图充当解释人是不明智的”。当然，这与美国政府的历来所宣称的立场相一致。但是在接下来的指示中，贝尔纳斯却指示哈里曼：“你可以非正式地向宋确认你的理解，即就本政府而言，我们没有对与外蒙现状有关的雅尔塔决议条款进行过解释讨论，鉴于此，应当接受的书面意义就应当是维护外蒙古现有的实际和司法的状态。……仅供你参考，我们对此的理解是，‘现状’是中国仍然维持对外蒙古法理上的主权，而实际上并不运用这一主权”^②。美国政府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这种解释显然对宋子文有很重大的影响，尽管贝尔纳斯强调哈里曼只能以个人身份进行解释，而宋本人也表明“仅仅是作为个人参考，无意将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议各条款的解释与理解带入与斯大林的讨论”，但在苑月缘日从哈里曼处得到美国政府的答复后，他当即表示如果由于外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三项办法请核示电》，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缘员-缘圆页。

② 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三项办法请核示电，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缘员-缘圆页。



蒙古问题而达不成协议时，“对话会就此中断”^①。宋似乎不只是向美国表明自己的强硬，这是他拉美国入中苏谈判的一贯策略。雪在当天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明确声明“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断交涉”^②。

美国的转变还不止此。部分由于斯大林对外蒙古、大连和旅顺的过多要求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警惕，远日，贝尔纳斯授意哈里曼通知苏联政府与宋子文：

“作为雅尔塔协定的一方，我们希望中苏政府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达成任何协定之前，能够与我们协商。……我们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向中苏两国政府说明，尽管美国无意参与大连港的管理与控制，但本政府希望得到以下承诺：在中苏两政府达成的任何安排中，在大连以及中苏两国进行安排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尊重国际贸易往来中的不歧视原则。……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斯大林对宋作出有关中国主权与东北的承诺，以及斯大林同意俄国无权在满洲驻军。……关于斯大林提出的满洲主要铁路的所有权归属俄国的声明，我们对雅尔塔协议的理解是它们应当由中苏共管，而且没有条款说明苏联的独家所有”^③。

相比前一封电文，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在介入中苏谈判又迈出了

① 裁藻粤皂遭等缘剿垦上剿藻尔燥曹成收置拉交期匪森雪 燥孕海遥藻此排眺老森杜蔡档 燥藻尔燥曹成收置拉交期匪森雪 燥孕海遥藻此排眺老森杜蔡档

②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请示如史达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是否即中止交涉电》，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缘园- 缘猿页。

③ 裁藻尔燥曹成收置拉交期匪森雪 燥孕海遥藻此排眺老森杜蔡档 燥藻尔燥曹成收置拉交期匪森雪 燥孕海遥藻此排眺老森杜蔡档



新的一步。美国政府的这种变化很大地影响了宋子文。蒋介石的答复迟迟不至，宋子文不得不将原定在 源日的谈判推迟三天^①。到了 苑日，重庆方面仍然没有回音，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政府态度转变的影响，部分由于对苏联追求外蒙独立决心的低估，宋子文决定继续在外蒙古问题上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当晚，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宋子文开篇直告斯大林，蒋介石“同意阁下与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所签订之雅尔达方案，即为维持外蒙现状。吾人不能承认外蒙之独立，其理由至为简单，自存为第一自然法，任何中国政府倘签订割让外蒙之协定，均不能存在，但吾人同意于现状。”但他接着重申中国同意苏联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驻军外蒙古、给外蒙以高度自治等条件。斯大林对外蒙古独立的要求态度坚决，两人为此进行了尖锐的交锋，宋子文坚持外蒙古独立不在雅尔塔协议之内及其为中国政府生存带来的困难等，而斯大林则称“该方案为苏联之方案，即系莫洛托夫所起草者，彼等仅照式签字而已”，他甚至称中方所谓同意苏联驻军外蒙“将为苏联与中国冲突之根源”。双方的冲突非常尖锐，以至于斯大林两次声明要中断会谈，并最终在 源日多分钟后不欢而散^②。宋子文本想利用美国政府的立场来迫使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却未料到斯大林的态度如此坚决，他由此变得犹豫不定，会谈后致电蒋介石：

史仍坚持必须承认外蒙独立之主张，谓中苏两国，现即拟订立同盟条约，必须将两国可能冲突之因素消除，外蒙如不独立，苏联进兵外蒙，即系进兵中国领土，易为将来冲突之源。经职解

①《莫洛奇科夫关于推迟宋子文与斯大林例行会晤的电话记录》，见 1945 年 苑月 源日，苏联解密档案。

②《史大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三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缘页- 远页。



释中苏实无因此而冲突之可能，并详述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外蒙独立之理由，如果承认必难立足。史始终坚持，并谓雅尔达决议案含义即为承认外蒙独立，条文系苏方起草，英、美未加修改，史本人可向英、美面质等语。查美国务卿最近电致美驻苏大使，谓所谓保持现状乃系中国在蒙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惟事实上不能执行。史未谓，中国既不能对此同意，则无法有何协定云云。此事关系国家前途至巨，究竟如何应付？查本月十一日为外蒙独立纪念日，届时苏联谅必有所举动，倘不继续谈判，职返国之期应在该日之前？务乞钧座立赐电示^①！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决定以个人身份单独会见斯大林以求转机。谈话中，斯大林对外蒙古独立的决心更是表露无疑，坚持外蒙对防止日本、中国甚至美国等第三国侵犯苏联的战略价值。面对蒋经国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外蒙独立的解释，他表示：“也许你说得对，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需要我们帮忙。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我需要外蒙古……我拿不到外蒙古，是不能甘心的”等等。此外，斯大林还在会谈中表露了对美国野心的高度警惕，其中有“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如果能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得到利益，苏联可以让步”以及“希望千万不要信赖美国”等^②。

关于此次会谈，至今为止仍有许多不明之处。首先是会谈的起因，蒋经国自称接到蒋介石的指示，但人们却一直没有发现这样的文

^①《行政院长在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大林晤谈关于外蒙独立问题之谈话情形并请示如何应付电》，见1945年 苑月 苑日，载《战时外交》六二 卷第 缘页。

^②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1989年版，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员册，第 源页。



件。也有人认为是“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迺谒史，作会外之接洽”^①。其次，具体的会谈时间不明，按照所商定内容来看，应当是在苑月圆日之后，但是在苑月圆日的宋斯会谈中，当谈及美国转告的斯大林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时，斯大林有“是否指余与霍普金斯之谈话，抑或由蒋委员长公子转达之言？”又说明两人此前已有沟通^②。最后，关于此次谈话本身存在与否也大有疑问。中方资料中除了上述广为引用的蒋经国个人回忆外，没有其他佐证，苏联解密档案中也找不到相关记录，因而前苏联学者认为此次会谈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苏联档案中却有一份蒋经国在苑月愿日第三次会谈后雪与彼得罗夫的谈话记录，后者在外蒙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至关重要，苏联政府坚决要求接受它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若中国代表团不同意此项建议，谈判未必能摆脱困境”，他还警告谈判时间不多，建议蒋经国“说服他的父亲对苏联所提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建议持明智态度”。德国学者海茵茨希作出了两种估计：第一，“蒋经国提高谈判对手的身份为的是提高他自己的身价”，由此也断定蒋经国的陈述是“不准确的”，第二，如果真的有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那么“有可能因新闻检查而继续被关闭，因为斯大林关于外蒙主权问题的谈话太赤裸裸了”^③。但是，不管蒋经国是与斯大林还是与彼得罗夫的会谈，中方的此次外交并没有改变苏方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

①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1 册，第 297 页；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102 页；梁敬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美国远东门户开放政策之没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 10 卷第 1 期。

② 《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二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11 卷第 1 页。

③ 《彼得罗夫关于蒙古独立问题与蒋经国的谈话备忘录》1953 年 7 月 1 日，载《苏联解密档案：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 104-105 页及第 105 页脚注 1。



收到宋子文电报后，蒋介石当即从西安赶回重庆，召集王世杰、孙哲生、戴季陶、于佑任、吴稚晖等国民党大员专门讨论外蒙问题。大家认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国二十余年”^①。实际上，接受苏联条件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对苏联的惧怕之外，蒋介石还考虑美国的因素：如果拒绝美苏要求，不但有开罪美国的可能，更会导致苏联利用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的优势以及对日作战的机会，单方面依据雅尔塔秘密协定强行获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相反，如果同意进行中苏谈判，不但有可以利用条约限制苏联更多要求的可能，更可以使得美国不能置身于中苏关系之外。因此，与苏联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对中国“虽然不是保护国运‘充足的’，然而却是‘必要的’”^②。因此，蒋介石尽管在当晚的会议上表示考虑反对意见，但第二天早上决定让步。这一决定并不容易，他在日记中写道：外蒙古已经长期被苏联占领，中国的主权也只是一个“空名”，为“形式”而冒“国家灾难”的危险是不明智的：

余考虑再三，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履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实际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

①王世杰 苑月 缘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雪第 页- 页。

②尽管对蒋介石的决策细节仍缺乏了解，但从当事人的有关资料中，可以作出大致合乎逻辑的推理。王世杰、胡庆育：《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台北，员年，第 页；卜道明：《中苏条约》，收入中央日报社编印：《我们的敌国》，台北，员年，第 页；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页- 页。



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①。

但蒋介石依然寄希望于美国，在作出上述决定的第二天，他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进行通报，“惟盼美国政府对东三省问题予以同情的支援”^②。同时，他指示宋子文“但宋显然在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前没有收到雪“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能完全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授意宋向斯大林提出三项前提条件：

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以及行政必须完整。

甲、旅顺军港之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乃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

乙、大连为自由港，照各国自由港例，行政管理权皆归我领土主权国主管。

丙、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而决非双方共管之谓，但苏应予中国租借物资或经费，以为报酬铁路之股款。

丁、其期限照苏英与苏法同盟条约为例。

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双方边境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此项应照面授之交涉方针第六项，切实进行。

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国会正式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

^①蒋介石 苑月 缘日日记《总统》卷五 六 雪第 苑苑页。

^②王世杰 苑月 愿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苑愿- 苑玖页。



府。此应参照前交涉方针第七项，切实交涉。

只有上述三条都得到满足后，中国“则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由投票方式解决”，“以上各项为我国最低之期望，亦为我国最大之牺牲……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意，不惜停止交涉，待兄回国报告后，再对苏作正式之答复”^①。蒋介石上述三点要求，并非一时之作，而是早有准备。在彼得罗夫随宋子文离开重庆赶赴莫斯科之前，他特地派遣白崇禧两次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了解苏联对待国共、新疆等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有意向苏联阐明政府致力于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努力，并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②。

尽管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条件，因为上述三条已经包括在远月 苑日的《对苏交涉要点》之内，但他显然想以外蒙让步来确保上述问题特别是中共问题得到解决。尽管经过 苑缘年中美关系低谷后，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策似乎明确会在战后继续支持他及他的政府，但这些并不能确保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他一直认定中共背后有苏联的支持，甚至视中共为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中共问题实际上成为他追求中苏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当天，他再次致电宋子文，特别强调中共问题，要求宋务必使苏方作出十分具体的承诺，并将之作为中止谈判的标准^③。实际上，这里反映了蒋介石对待解决

- ① 蒋主席自重庆致宋子文院长指示外蒙独立必须俟我国能真能确实统一时方能考虑并告以所谓国内统一巩固之要旨电，苑缘年 苑月 远日，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 缘猿- 缘源页；《总统》卷五下 雪第 苑苑- 苑愿页。
- ②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苑苑页；彼得罗夫就苏联在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作用与白崇禧的会谈记录，苑缘年 远月 苑日，载苑苑年苏联解密档案。
- ③ 《总统》卷五下 雪第 苑苑- 苑愿页，转引自 宰源缘年 苑月 苑日，载苑苑年苏联解密档案。



国共之争的一个根本态度：即他反对美国倡导所谓的“联合政府”，希望能够通过谋求获得苏联的支持而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因此，在当天向美国政府的通报中，他详细罗列了中国政府对东北问题上的要求，而对后两条，则仅以“苏联同意不给予中共或新疆叛乱组织以任何帮助”一句话带过^①。

收到新指令的宋子文迅速找到美国大使哈里曼，讨论当天晚上与斯大林进行第三次谈判的对策。哈里曼表示蒋的方案“不现实”，因为苏联依此“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是完全不可能的。”因而，他建议宋不要因为蒋介石的方案与苏方难以调和而与斯大林搞成“僵局”，奉劝宋“要尽可能地以友好的方式结束这次讨论，以显示回到重庆后会郑重地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争取斯大林同意发表一个公报，为未来的进一步会谈创造一个“有利和友好的气氛”。哈里曼认为宋子文态度不够坚决，“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方面，他个人已经准备超出委员长方案。……倘若协定的形式能够使得国民党政府可以‘体面’地接受，倘若他对苏联政府不仅宽泛地而且实质性地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而感到满意，他准备做出现实的让步以获得这样一项协定”^②。不仅如此，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又对宋做了进一步的评论：

“我发现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

① 我深为遗憾，宋子文在通报中，只提了“苏联同意不给予中共或新疆叛乱组织以任何帮助”一句话，而忽略了“苏联同意不给予中共或新疆叛乱组织以任何帮助”这句话。

② 我深为遗憾，宋子文在通报中，只提了“苏联同意不给予中共或新疆叛乱组织以任何帮助”一句话，而忽略了“苏联同意不给予中共或新疆叛乱组织以任何帮助”这句话。



(三) 大连供各国商船共同使用,另辟内湾之一,专供中苏海军使用。

(四) 为保护区内之安全,苏联有权派遣海、陆、空军驻扎,并可在区域内调动其军事设备及保护安全,由苏方负担。

(五) 灯塔及其他海途设备,由苏联担任建置。

(六) 大连市政府由中、苏政府各派五人组织,市长苏籍,副市长华籍,大连港主管人应为苏籍。

(七) 除旅顺、大连以外之区域,由中国政府管理,但中国政府所派主要民政人员,应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

(八) 本区域内当局对地方治安所发命令,民政方面应遵照。

(九) 期限四十年。

乙、关于铁路

(一) 中国政府承认苏联恢复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旅顺段所有权益,因此上述权益应移归苏联所有,包括一切产业,如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各项建筑物、积存器材、土地、煤矿及已开发之森林。

(二)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政府参加管理经营之权,组织中苏联合公司。

(三) 中苏联合公司董事 7 人,其中四人苏籍,三人华籍,董事长苏籍,副董事长华籍,事务以投票方式取决,董事会设在哈尔滨,经理苏籍,副经理华籍。

(四) 盈亏各半。

(五) 中国政府保障供给铁路用煤,办法另定。

(六) 铁路职员、工人及路警限于中苏两国人民。

(七) 期限四十年,合同期满后,所有权无偿交还中国。

(八) 为执行协定,中、苏各派三人在一个月内存议,两个月



内完成详细办法 签订合同^①。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苏方所提大连、旅顺及铁路等条件之内容电》，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287 页。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曼在 8 月 1 日一大早就得到了宋子文关于苏方所提要求的英文文本，其中与中方的记录相当一致，甚至有的措辞更为直接，如甲款第 7 条“安全区内的军事管制和内部安全之责任应归苏联，为了内部安全，民政当局应当遵守军事管制的命令。”乙款第 6 条“两国政府参加该公司，无权将全部或部分股份或权利转让其他国家。”之后，哈里曼将苏方要求与蒋介石的方案以及宋子文本人的意见等向杜鲁门与贝尔纳斯作了一一汇报，从一个角度反应了宋子文对美国的重视以及美方对中苏谈判的关注。

此外，苏联解密的档案中披露了莫洛托夫 8 月 6 日交给宋子文《关于旅顺港、大连及其毗连地区的协定》，但没有铁路部分，其中与宋子文传给重庆的相去不大，但在措辞上有一些重要的不同，诸如苏方文本中有第一条，其中还有“中华民国同意在旅顺和大连及其毗连的陆海地区的各城市和港口建立……管理制度”“旅顺”“对于其它国家的军用和商贸船只它将是封闭的港口”等。为了便于读者比较，现全文摘抄如下：

遵照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缔约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内容：

第一章：为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民国的安全，中华民国同意在旅顺和大连及其毗连的陆海地区的各城市和港口建立以下所指的管理制度，其范围根据第二章的规定，并同意共同使用所列举的港口。上述所说的管理制度的建立，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

第二章：在第一章中确定的地区范围已经在附件中绘出，并在地图上标明。

第三章：缔约双方同意，旅顺港作为异常重要的军事港口，将只供苏联和中国船只使用。对于其它国家的军用和商贸船只它将是封闭的港口。旅顺军港和城市的管理将由苏联方面负责。

第四章：大连港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所有国家的商贸船只开放。大连的一个内海湾将被保留，以备苏联和中国军舰的急需。

第五章：为了确保上述所有区域的安全，苏联政府有权在这个区域内供养自己的陆、海、空部队和确定这些武装力量的部署，同时将自己出资建筑这些部队和这一地区防御所必需的设施。

第六章：苏联政府负责以同样的方式设置和建筑灯塔，以及航海安全所必需的其他设施和标志。

第七章：大连市的管理工作由市政府管理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 3 名苏方代表和 3 名中方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的任命将按照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规定的程序进行。大连市政府管理委员会主席将从委员会苏方代表中选出，而副主席——从委员会中方代表中选出。港口负责人由苏联方面选派。

第八章：除旅顺港以外的共管区域的民政管理工作，由中国方面负责；民政管理局领导职务的更换，将根据中国方面与苏联军事指挥部协商进行。

第九章：区域内的军事指挥和防御所必需的内部安全工作，委托苏联方面负责，民政局必须执行军事指挥部下达的关于保证内部安全的命令。

第十章：本协议签署期限是 10 年，该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对照斯大林的要求与蒋介石的方案，前者追求的是苏联控制下的辽东半岛以及在整个东北的特殊地位，后者则是在中国完全主权下与苏方在东北的局部合作，双方立场可谓难以调和。但是，蒋介石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的让步显然又为谈判带来的新的转机。因此，苑月怨日晚斯大林与宋子文的第三次正式会谈成为整个中苏交涉中的重要的一次谈判。会谈首先从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的电报开始，即在东北、新疆以及中共问题上对苏联提出要求：在东北方面，宋复述了蒋介石的方案；在新疆问题上，提出“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俾贸易交通可以恢复，至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在中共问题上，宋要求“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在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和击败日本后，中国政府“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之区域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旧地图为准”^①。

斯大林对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应当感到满意，但深谙谈判技巧的他并没有喜形于色，反而指责宋子文将满洲与蒙古相提并论，重申他自己对雅尔塔协议中“维持现状”的解释，奉劝中方立即宣布外蒙独立，而不应等到日本战败后，他甚至还表示采纳投票方式对中

^① 宋子文在此所谈显然与蒋介石 苑月 苑日的指示有所不同，应当出自两种可能，一是代表团对蒋的电文进行了修正，以使对苏的要求更加具体；二是这些内容本身出自宋临行前所携带的指示当中。见《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284-286页。



国将更为不利^①。但是,在紧接之后的中共问题上,斯大林的表态让宋子文十分满意,除了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认可与援助外,还答应与中方报纸一起停止相互间的批评和指责等。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也“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职告以中国政府收复陷区,当恩威并施,如和平方法不能解决,则当用武力,史认为甚然。”前两次饱受斯大林强硬和冷遇的宋子文此时喜出望外,他一味强调斯大林的肯定之词,而忽略了其弦外之音^②。实际上,斯大林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显然已经有所准备,早在 1945 年 1 月 1 日,在重庆的赫尔利就已将中国国共问题的进展和问题全盘告诉了彼得罗夫,当后者询问中国是否会在谈判中提出内政问题时,赫尔利指出这实际上是宋子文要在谈判中解决的第二个重要议题^③。斯大林在中共和新疆问题上的慷慨显然是为了争取在东北的利益,他先发制人地明确表示“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 1946 年,吾人不能满意,……吾人可同意 1947 年,但不能少于 1948 年,此为吾人确切之答复”。接着双方讨论苏联所提出的

- ① 宋子文在解释中方同意外蒙独立的极大牺牲时,谈及自己曾在 1945 年拒绝日本天皇的约见以抵制日本追求满洲独立的企图。见《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25 页。苏方记录当中也存在这些内容,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转引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 157 页。
- ②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1 月 1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25-126 页。但是按照苏联的记录,斯大林对军火走私的存在表示怀疑,而且对中国的要求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见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 157 页。细察中方的谈话记录,其中存在斯大林“吾将搜集情报,吾人或将再谈一次,关于禁止边境私运军械一节,倘确有若干漏隙,吾人愿为所能为以赴之”的内容。见《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25 页。
- ③ 《彼得罗夫就中国政治形势问题与赫尔利的会谈备忘录》,1945 年 1 月 1 日,载《苏联解密档案》。



铁路所有权以及旅顺军港毗邻的所谓“安全区”。似乎受到了斯大林态度感染的宋子文准备在东北问题上再度让步，在会谈结束后连夜发给蒋介石的汇报中，称斯大林“甚为切实友好”、“让步甚多”等，认定“目前大问题业已大致解决”，并请求“其他如铁路及大连自由港之管理等项，不得已时，似宜酌情迁就，钧意如何？”^①

在等待蒋介石答复的同时，宋子文在 8 月 16 日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焦点依然还是东北问题。双方除了进一步明确各自在中东铁路所有权及其辅助企业、铁路防务、中苏铁路局组成人员、旅顺口军港安全区是否包括大连雪 在大连设立单独备用军港、大连和旅顺的管理等问题上的分歧外，莫洛托夫反而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诸如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为借口要求取消苏军在 3 个月内撤离东北的条款，建议增加中东铁路交付中国政府后不得转让外国的条款等。在围绕中东铁路和大连市管理两个问题上，莫洛托夫引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确保苏联在东北“优越权”的条款，声明这是“该协定的基础，明确指出必须保障苏联的优先权”，赤裸裸要求苏联优于中国的优势地位。为此，宋子文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认为雅尔塔协定是不可侵犯的”^②。应当说明，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所提出的保证苏联之“优越权”，应当是针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而不可能指苏联在东北有高于中国的“优越”。因此，莫洛托夫以此为由要求苏方在铁路局和大连市管理两方面占有优越于中国的地位，显然是在滥用雅尔塔秘密协议。可惜宋子文没有当场指出这一点，只是愤然表示雅尔塔秘密协议并非“不可侵犯”，显然没有足够的说服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8 月 16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33-1534 页。

② 该会谈在中方档案中没有记录。上述论述源自《莫洛托夫接见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会谈记录》，1945 年 8 月 16 日，来自苏联解密档案。



力。

袁日，蒋介石电示同意中国可在战后以适当方式宣布外蒙古独立，同意中苏条约期限改为 10 年，但是在东北问题上，他基本上还是坚持前见不改：

(1) 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又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内，组设一中苏两国军事委员会。

(2) 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至仓库运输等事，可用商业方式酌定办法。

(3) 中东、南满铁路之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惟其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

针对宋子文发回的苏联方案，蒋介石对其中甲 穴 雪 乙 穴 雪 表示坚决反对，即对苏联要求安全区除大连旅顺外其他地区中国委派主要行政人员须经苏联同意一条“中国绝不能承认”，而对于苏方提出的铁路产业，他表示“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至土地当然应归中国所有，而帝俄时代在铁路沿线所开发之小煤矿及业已开发之森林亦不应包括在内。”此外，他还指示宋子文要强调“平时铁路不能运兵”，关于中共问题，商请苏联“列入谈话记录，或其他书面中，并宜明白声明不仅不能供给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各方面，苏方宜不得与中共以支援”^①。

蒋介石与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可谓相去甚远。苑月 袁日

^① 《蒋主席自重庆之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解决外蒙、旅顺、大连及中共等问题之意见电》，1945 年 苑月 袁日，载《战时外交》穴 雪 第 1 卷第 1 期；《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 第 1 页。



宋子文与莫洛托夫的交锋已经预示了在克服外蒙古问题后东北问题已经成为双方谈判的另一严重障碍。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哈里曼、宋子文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上午和下午两次与哈里曼交谈，分别通报 14 日与斯大林以及当天与莫洛托夫的谈判内容。雪也注意到“在港口和铁路的分歧上一点进展也没有”，实际上，他在 14 日已经感觉到中苏谈判不可能在近期达成，由此建议美国政府立即准备一份全面的政策评估，包括确定对有关条款的解释以及在维持外蒙现状方面希望中国政府的下一步行动等，以备波茨坦会议之用^①。

15 日晚，斯大林与宋子文进行了第 3 次谈判。在撤军问题上，斯大林作出了战后两三周内开始、两个半月内撤完的承诺，并答应用换函的方式加以确定^②；关于在东北境内的运兵，在宋子文的一再反对下，决定铁路运输“当以军用物资为限”；对于东北主权、新疆以及中共等问题的承诺，答应在其他问题解决后“以书面表示”；苏方还答应取消对铁路的“所有权”，在路警方面，也不再坚持，但要求“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咨商，保证铁路之保护”。但是，在铁路管理局的人员组成、旅顺军事安全区是否包括大连以及大连管理权等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不可调和。斯大林依照莫洛托夫前一日的论调，以雅尔塔协定中确保苏联“优先权”的条款坚持铁路局的董事局以及公司经理都必须是苏联人、大连必须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安全区内并专设一军用海港、大连主管应当由苏联人担任。宋子文则针锋相对，表示中国对

① 宋子文 1945 年 8 月 15 日致哈里曼电，转引自《宋子文回忆录》，第 100 页。

② 关于这一点，中方的谈判记录与苏联的谈判记录中都没有，仅只出现在宋子文的汇报电文中。但根据后来达成的协议，可以断定有这一说法。《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苏联撤兵及铁路管理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8 月 15 日，载《战时外交》第 100 页。



莫斯科, 审订已经达成的文件^①。

在宋子文的精心劝说下, 斯大林认识到已经无望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解决分歧, 于是他同意了宋的这一要求^②。他也显然十分关心在融洽的气氛中暂时中断中苏谈判以免影响未来的波茨坦会议, 而这也正是宋子文按照哈里曼建议所追求的。因此, 当斯大林询问“阁下切盼避免谈判中有决裂之印象乎?” 宋子文当即回答“并无谈判决裂之事”。接着双方就谈判中断期内禁止对外透露谈判细节、双方共同发表公报等达成一致等。宋子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欣喜之情难以抑制, 向蒋介石汇报与斯大林的会谈“空气极为合观”^③。而斯大林也确

① 宋子文所言蒋介石指示在中苏档案中都没有发现, 他所谈到的基本要点与 苑月 苑日的蒋介石电文别无二致。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宋子文并未收到更新的指示, 其中关于铁路管理组成人员的新建议是他个人所为, 因为该建议并没有超越蒋介石关于铁路管理人员组成平等的原则。哈里曼对此有如下记录: “关于铁路的管理, 他提出了中苏董事人数平等、中国人担任主席、但没有管辖权、仅只表示对中国的礼貌”。此外, 解密的苏联档案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在 苑月 苑日赫尔利与彼得罗夫的谈话中, 赫尔利有如下之说: “当蒋介石向他出示自己致约·维·斯大林最后一封信的文本时, 他, 赫尔利立即确信, 这是出自于宋子文之手。这份文件的执拗特点——是宋子文影响的痕迹。” 见《彼得罗夫关于中国请求修改克里米亚决议事宜与赫尔利的会谈备忘录》, 苑月 苑日, 苏联解密档案。

② 中方记录中有在宋子文提出这一要求后莫洛托夫立即回答“此实不便”, 而斯大林则表示“余同意宋院长之计划”, 说明斯大林是临时改变了主张, 因为在前一日的会谈中他拒绝了宋的同一请求, 莫洛托夫只不过是依照斯大林昨日决策的回答。见《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六次谈话记录》, 苑月 苑日, 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远- 远页。

③ 《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六次谈话记录》, 苑月 苑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返国日期并请转饬各报对与苏交涉一事暂勿发表评论电》, 苑月 苑日, 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远- 远页; 第 远页。



实尽力征得中方好感，甚至在最后还向宋子文通报了孙科已将雅尔塔协议转告了中共的消息，这一点似乎为后来的史学家横加猜测并断言斯大林此举不惜以出卖中共而讨好国民党政府的依据，但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来，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 远月 圆日 中共代表王若飞与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的谈话内容，该情况是中共主动告诉苏联的^①。这一澄清至少可以修正人们由此对斯大林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无端猜测。

远月 员日 中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空气极为友好亲切”^②。之后，宋子文和彼得罗夫返回重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奔赴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员日，苏联报纸发表公告谈及中苏两国在过去数日中进行了谈判，“谈话之目的为改进中苏关系，有关双方极重要之问题均曾谈及，会谈在友好空气中进行，并表现彼此广泛谅解之存在。谈话因史丹林、莫洛托夫赴三强会议而中断，宋院长暂返重庆，谈话将于最近将来继续进行”^③。至此，中苏谈判第一轮暂告结束。

第二阶段

从 远月 员日到 愿月 苑日 第二轮谈判开始为中苏谈判间歇期，在此期间，美英苏在柏林召开了战时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议，尽管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德国和欧洲的战后安排，然而，围绕暂时中断的

^①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会谈记录》，员年 远月 员日，载《苏联解密档案》；《斯克沃尔佐夫就战后中国政治格局、苏美政策等问题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员年 远月 圆日，载《苏联解密档案》。

^② 《驻苏大使傅秉常电部苏联热烈招待宋院长》，载《中苏关系卷》，第 源- 源页。

^③ 《驻苏大使傅秉常电部中苏会谈展开》，载《中苏关系卷》，第 源页。



中苏谈判,美国对苏政策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场变化同时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关注中苏谈判并主张对苏强硬的美国外交官自下而上的政策建议,另一个是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原子弹为外交动因所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两个层面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美国在中苏谈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驻苏大使哈里曼一直是要求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的主要呼吁人之一,处在观察中苏谈判的第一线,他以斯大林对中国的要求超出雅尔塔协定为由,反复提醒政府认识苏联政策的危险,呼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国反对苏联的要求。在他的建议下,国务院在 7 月 16 日提出了一份《对雅尔塔协定以及中国可以在外蒙古和满洲进行适当让步条款的美国解释》的政策备忘录,对外蒙古和东北在中苏关系中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总结。文件对外蒙古的现状做出了如下解释:“在法理上中国对外蒙古享有主权,而实际上从 1911 年开始就没有实施这种主权。”对于苏联方面关于“维持外蒙现状”即中国应公开承认外蒙古为一独立国家的要求,备忘录认为“这种处理将不会实质性地妨碍任何美国的基本利益”,由此提出“现实的”的政策建议:“根据现实情况而言,相信应当好好建议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这种实际上业已存在许久的现实,与此同时竭力利用苏联政府由此产生的善意,以获得苏联政府在承认并加强中国在内蒙古和满洲地位的切实承诺。”但是在东北问题上,备忘录却提出了极为不同的政策建议。它认识到苏联在所谓承认中国在东北主权和实质上追求控制东北铁路干线、控制大连管理权以及在旅顺实施的排他性权利之间的“毫无疑问的不一致”,指责苏联此举是“一种最恶毒的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利益、政策和信念等各方面来讲都颇为令人失望”。在对雅尔塔协议当中“大连国际化”以及铁路共同管理的解释方面,备忘录明确“将支配性的管理权转交苏联”以及“将排他性的所有



权转交苏联或赋予苏联在管理中的支配性地位”等“都不是我们的理解”。由此,备忘录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单独地、或者与英国一起影响苏联在有关大连和铁路方面接受有利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雪的修正,相信我们应当做出这样的努力”。备忘录之所以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与外蒙古截然不同的建议,完全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权衡:

“当然,美国在满洲的商业和贸易方面有必须保卫的重要的切实利益。在涉及中苏两国关于满洲的任何协议方面,我们都必须从他们两国获得明确的承诺:在成为条约内容的任何政策操作和所有地区,国际交往中的不歧视原则都须受到尊重。我们必须要求这一原则也应用在美国对大连港口设施的平等获取权、在那里用于商业和居住目的的租借和购置土地优惠权(在日本控制下基本上被否认的一种权利)以及对铁路交通设施的自由和完全使用权。”^①

提出这份政策建议的不是别人,正是与哈里曼“志同道合”的副国务卿格鲁。如前所述,早在缘月中旬,格鲁就牵头和军方展开了一场美国是否继续支持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如何以此获取苏联更多政治承诺的讨论,最终由于军方的意见未能推翻雅尔塔秘密协议,但却促成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在莫斯科得到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在波茨坦会议之前他再次提醒杜鲁门,苏联正在迫使中国政府平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而后者正在“无理地”要求自身武装的自治,他

①“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代表哈里曼和苏联代表斯大林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哈里曼在会议期间多次向斯大林提出,美国希望苏联在战后能给予中国更多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在大连港口和铁路设施方面。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并承诺在战后给予中国平等的权利。这一承诺成为雅尔塔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



认为苏联这一举动有违美国利益 呼吁杜鲁门采取有关措施^①。

格鲁的这一认识代表了当时杜鲁门政府内众多官员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一种普遍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将苏联视为一个战后崛起大国及其所需要的相应安全，也由此成为冷战爆发的主要意识形态原因。反映到中国问题上，这种观念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将中共视为苏联在中国的代理，视中共和苏联铁板一块。持有这种认识的官员在美国政府中大有人在，其中在中美关系方面比较重要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弗雷斯特、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格鲁、驻华大使赫尔利以及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等。最能代表他们观点的是陆军部在 1947 年 1 月份提交的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报告，这份由陆军部军事情报科 1947 年 1 月 1 日编印的长达 100 多页报告、小册子以及书籍”基础上形成的长达数百页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苏维埃式的民主；
- 二、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是由莫斯科支持和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 三、有理由相信苏俄计划在满洲、朝鲜以及可能在中国北部建立由苏联控制的地区；
- 四、没有满洲和中国北方的自然资源，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难以生存；
- 五、为了防止将满洲和北部中国从中国分离出去，如果苏俄

^① 别列兹涅夫在 1947 年 1 月 1 日编印的长达 100 多页报告、小册子以及书籍”基础上形成的长达数百页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参加战争，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将中国（像欧洲一样）分为美英和俄国的军事占领区^①。

这份报告十分重要，标志着以谢伟斯、戴维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对中国内政有较全面认识的“中国通”在亚美事件后的影响正在被新的共识所替代。而正是在这种新共识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中的诸多外交官员才积极主张美国在中苏谈判中支持中国以抵抗苏联的扩张。在到达波茨坦会议的当天，曾经在 1941 年针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提出著名“不承认主义”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再次向杜鲁门进言，要求苏联必须承诺不违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苏联控制或禁止从大连或满洲其他商港进行贸易的图谋“决不能让步”，必须保障“对任何国家在满洲贸易中的不歧视”，“我明白宋文溥持此观点，在这一点以及任何导致背离一项长久以来并最受尊重的美国政策——门户开放演上，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这显然也与我们在东方明确而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敌对”。史汀生还称租借旅顺的海军基地已经是“走向错误道路的一步”，坚持“在大连半岛以及满洲其它地方再也不能允许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权力或控制——让步”。史汀生的态度非常坚决，即使在杜鲁门告诉他已经与斯大林“敲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后，他还是坚持应当设法使斯大林将这一承诺以书面方式加以固定^②。

因此，在对苏强硬的政策建议方面，哈里曼的呼吁决非空谷足音，然而针对未果的中苏谈判，他显然是最积极和最重要的代表人

① 这份报告在 1945 年被编辑出版，成为中苏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史汀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的传统政策，也是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基础。他主张美国在谈判中必须坚持这一原则，防止苏联在满洲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

② 史汀生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中许多对华派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在谈判中表现出软弱，苏联将会得寸进尺，最终损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迫使苏联做出明确的承诺。



物。在离开莫斯科赶赴波茨坦会议前的多次报告中他反复提醒杜鲁门，苏方在铁路和大连问题上的要求将会关上满洲对外贸易的大门。翌日，他又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提出了一份题为《涉及中国的雅尔塔协定》的备忘录，提出与格鲁相似的政策主张：在外蒙问题上，尽管斯大林的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严格解释”，但中国的让步却不会“不利地影响美国的利益”。但“我相信宋博士的上述最后方案恰当地履行了雅尔塔协定”，他依照自己与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亲身经历，对所谓确保苏联的“优先权”给出了与宋子文一样的解释：即交通过境权。最后，他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美国政府介入对港口的管理，以真正实现所谓“国际化”；第二、让苏联控制大连和铁路的管理“将违背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既定政策和原则”，鉴于斯大林数次表示他支持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尊重中国在满洲主权的事实，“我建议我们应当对上述雅尔塔协定的解释立场坚定”^①。

两天后，哈里曼再次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提交备忘录，提醒后者中国已经在中苏谈判中做出了最大让步，

“有关双方的分歧已经到了一个解释雅尔塔协定的时候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国不处在一个能够抵抗苏联时下过分要求的有利地位。……我相信总统本人对具体涉及大连港口管理和铁路操作分歧的雅尔塔协定作出他的解释符合我们的利益。除非如此，我害怕宋会作出让步，这些让步会与我们的基本对华政策有所不符并有悖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相信，争取苏联政府书面上再次确认：斯大林关于支持我们的‘门户开放政

^① 宋子文给杜鲁门的备忘录，1945年7月16日，见《宋子文回忆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第100页。



策’及其对东北政策的承诺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①

文末，哈里曼还专门草拟了一份美苏就此问题应当达成的草案：

中华民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就满洲的具体铁路运作以及对大连国际港口的管理达成协议，作为便利西伯利亚与外部世界贸易往来的一种方式，这些谈判中的协议源于承认苏联维持西伯利亚途径满洲到弗拉迪斯沃托克和不冻港大连的过境铁路交通之利益。基于既不歧视也不特惠的待遇原则，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让苏联贸易有途径满洲走向大海的不受阻碍的通行权。

苏联对中国政府在满洲的主权应给予完全的承认。

就相关协议进行谈判的两国政府应对历史性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机会均等原则予以完全的同意。由此，对铁路和大连自由港的具体管理和运作必须符合对所有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贸易和国民的完全机会均等，在诸如税率、场地、在铁路上处理和运送货物以及相关法规和收费等等所有方面都应保持待遇平等，这应同样适用于在大连的船只停靠以及港口的货物进出等。

此外，对铁路运作以及大连自由港管理的具体落实还应与中国有贸易条约关系国家的国民在居住、追求商业投资、文化事业以及条约所包含的其他领域等诸方面所获得的权利相一致^②。

① 哈里曼在1945年10月15日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提出，美苏在满洲的协议应基于既不歧视也不特惠的待遇原则，其目的是让苏联贸易有途径满洲走向大海的不受阻碍的通行权。

② 哈里曼在1945年10月15日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提出，美苏在满洲的协议应基于既不歧视也不特惠的待遇原则，其目的是让苏联贸易有途径满洲走向大海的不受阻碍的通行权。



几天后，哈里曼再次上书贝尔纳斯，表明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谈判中被迫作出更多让步，而如果“宋超出其原定方案的让步是与美国利益相违背的”，因此，他坚决要求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如下交涉：

一、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拒绝了斯大林要求租借大连港的动议案，坚持它应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贸易港（参见本人 18 日备忘录）；

二、我们不能同意将该港口包括在苏联军事区或将之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三、如果斯大林不同意宋的方案：即大连为一自由港口，由中国管理，但为苏联的过境交通提供专门的港口商业租赁，那么我们将提出组建一个由中、苏、美以及可能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管理委员会来监督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口的运作^①。

哈里曼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努力是 8 月 10 日得知宋子文等于 8 月 10 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中苏第二轮谈判的消息后要求贝尔纳斯对他前两次备忘录所谈及的内容进行答复和授权^②。除了哈里曼，担任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科长的文森特·沃森（Vincent P. Warren）是另一位中苏谈判的关注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共起草了 12 份关于中苏谈判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与哈里曼的建议可谓异曲同工。他首先明确界定了美国传统以及当前的对华政策目标：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

① 哈里曼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努力是 8 月 10 日得知宋子文等于 8 月 10 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中苏第二轮谈判的消息后要求贝尔纳斯对他前两次备忘录所谈及的内容进行答复和授权。

② 除了哈里曼，担任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科长的文森特·沃森（Vincent P. Warren）是另一位中苏谈判的关注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共起草了 12 份关于中苏谈判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与哈里曼的建议可谓异曲同工。



等的原则；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发展。告诫美国政府，斯大林旨在依靠军事和经济优势在中国东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对美国的传统与当前政策和目标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危及美国的利益与安全。他称斯大林“在雅尔塔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又在进行新的讨价还价”，呼吁“我们应当站稳立场，并帮助中国站稳立场反对任何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他还要求美国政府在满洲铁路、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苏军军事安全区等问题上支持宋子文的建议，甚至成立中、美、苏、英组成的国际机构监督对大连的管理。他还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及早在波茨坦与苏方进行交涉，并可要求宋子文本人前来参加讨论。文森特显然是受到了哈里曼多封电报的影响，但引人注目的是，文森特还提出了由美国政府参与的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导致中国无力在中苏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基本原因，因而美国政府对介入中苏谈判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在雅尔塔的承诺和使中国接受这些承诺的保证把美国完全置于承担责任的地位，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将这种责任转移给中国人”^①。

格鲁、史汀生、哈里曼以及文森特等人的持续建议并非没有得到杜鲁门以及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注意，实际上，以成功试爆的原子弹为起点，他们两人在对苏政策方面已经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哈里曼等人的建议互为因果，最终导致美国在中苏谈判问题上的巨大变化。关于原子弹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最早出现在缘月份国务院和军方对美国是否继续支持雅尔塔协定的联合评估中，当时包括杜鲁门在内的诸多决策者都提出了是否仍然需要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必要。熟知曼哈顿计划的史汀生、马歇尔以及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等人已经将原子弹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但由于当时原子弹

^① 转引自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104-105 页。



的成功尚不清楚以及严格的保密要求，他们最终还是支持了国务院的建议，即尽量争取苏联在参战前对未来的中国政策作出明确承诺。这次讨论最终成为霍普金斯和哈里曼 缘月底 远月初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交谈远东问题的指导，并相当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但原子弹外交的真正运用还是在它成功试爆后的波茨坦会议上。苑月 苑日至 愿月 圆日的波茨坦会议是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的第三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就在会议举行的前一天，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尔多 苑月 苑日成功试爆，它迅速成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对苏外交的重要砝码，并清晰地反应在美国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转变上。杜鲁门得到了原子弹成功试爆的报告时，史汀生就注意到“总统受到这一消息的极大鼓舞”，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相信日本佬将在俄国进来之前垮台，我确信当曼哈顿出现在他们国家上空时他们一定会这样”^①。 愿日看到原子弹试爆的全面报告时，杜鲁门“极大地为之所激励，……表示这给他一种全新的自信感”^②。杜鲁门的这一“自信感”在当晚的会谈中就表露出来，面对斯大林几天来在波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他展开了激烈“反攻”，致使细心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苑月 苑日指出“到目前为止这是总统最神气的一天”。丘吉尔似乎也对杜鲁门当天的举止有所不解，直至第二天看到原子弹成功试爆的报告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杜鲁门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当时我没有理解。当他读了这份报告再来开会，他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他在会上要俄国人听从他的指挥，总的来讲，他操纵了整个会议。”然而，或许因为斯大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原子弹的威力，或许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决定

① 见史汀生致哈里曼电，载《美国外交关系档案》，第 100 卷，第 1000 页。

② 见杜鲁门致哈里曼电，载《美国外交关系档案》，第 100 卷，第 1000 页。



坚持到底 杜鲁门的“反攻”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①。

此时的波兰已经处在苏联红军的枪口之下，杜鲁门自然回天乏术。然而，原子弹的出现为太平洋战场提供了新的机会。1945年8月，当史汀生与哈里曼再次就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对中国政府提出过高要求、在黑海海峡要求苏联军事基地、插手意大利前殖民地以及可能借美英拒绝讨论香港托管而拒绝朝鲜半岛的共同占领等要求发出警告时，杜鲁门当即称斯大林的上述举动“虚张声势”，并声明美国将坚定自己的立场。史汀生当即就认为形成总统对苏联强烈反应的基础是格罗夫于1945年7月向哈里曼哈顿计划主管雷的报告。杜鲁门显然决心杜绝欧洲局势在亚洲的重演，会谈结束时，他要求史汀生迅速征询马歇尔的意见：打败日本是否还需要苏联的参战^②。史汀生第二天告诉杜鲁门军方认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可以不要苏联的帮助，以此为契机，美国政府开始了单方面逼降日本以及迅速占领东亚地区的一系列计划。

对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疑问，在杜鲁门政府中可谓由来已久，缘月中旬围绕雅尔塔协议的重新评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可以理解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毕竟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而且雅尔塔会议以及霍普金斯缘月底与斯大林的会谈都明确了苏联的参战计划，因此，追求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不仅是既定政策也理应是杜鲁门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实际上，杜鲁门也正是这样看待的。7月15日早上，斯大林前来拜访杜鲁门并主动谈及中苏谈判，将会谈的不顺利归结为中国“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老是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争论不休，而看不到大局”^③。但是，他明确表示苏联可

① 美国演、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第152-153页。

② 美国演、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第153页。

③ 美国演、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153页。



以在 愿月中旬参加对日战争，并明确表态支持杜鲁门最关切的门户开放。据此，杜鲁门认为他“已经敲定了满洲的门户开放”，当晚，他写信告诉妻子：“我已经得到了此行的目的：斯大林在 愿日参战而且没有条件。他想解决中国问题，而实际上也在这样做，比我预想的形式还要好些”^①。

但是，如果不是故意给人们留下他是继承罗斯福遗志追求与苏联合作的印象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杜鲁门的上述表白最多也只是代表他此时此刻对苏联参战部分看法，因为就在斯大林刚刚离开后，他便向贝尔纳斯和李海透露了自己的担忧：中苏协定的达成大概只有通过“中国方面的极端让步”，而实际上不管是否得到这些让步，苏联都会参加对日战争^②。此外，在前一天与丘吉尔的首次会面中，他也明确表示美国人决不会“乞求”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实际上，他还拒绝了英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要求^③。

不少史学家都对杜鲁门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发出了质疑，有人指出他并没有在日记中真实记录自己的思想，因为杜鲁门经常在日记中专门留下一些旁白，说明他有强烈的为读者而记录之嫌疑；也有人指责他是在故意向人们表白自己追求的是与苏联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④。实际上，如果结合杜鲁门在 愿月中旬就已经对苏联参战后对东亚格局的影响报以相当的担忧和警觉，并支持国务院和军方对

① 见杜鲁门日记，1945年8月15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② 见杜鲁门日记，1945年8月16日。

③ 见《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100页。

④ 见《杜鲁门日记》，1945年8月15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美国是否还要履行雅尔塔协定进行重新评估的行动,就不难看出杜鲁门对待苏联参战存有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罗斯福的既定战略和太平洋战争的实际需求都需要苏联的参战,实际上,直至波茨坦会议前夕,军方对太平洋战场的官方评估都将苏联参战看成是取得对日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从杜鲁门及其主要决策人的个人感情方面来讲,由于对苏联疑虑的日益增加,他们都不愿为苏联更多插手东亚提供机会,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杜鲁门的上述矛盾表现。可以恰当地说,针对苏联的参战问题,以缘月份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的重新评估为标志,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立而又并行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它们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的人物和机构之间,更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的思想之中,杜鲁门便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代表。因此,尽管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不是导致杜鲁门政策逆变的唯一动机,但它显然构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以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为起点,杜鲁门政府内主张防止苏联参战的念头逐渐占据了上风,以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为代表,他们不但对苏联参战的问题刻意回避^①,而且已经悄然着手实施阻止苏联参战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修正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以加速日本的早日投降、下令军方应付日本提早投降的

^①在缘日的非正式会晤和缘日的正式会议上杜鲁门和斯大林分别涉及到苏联参战的问题,对于前一次,小查尔斯·米提醒读者“我们应该再一次记住,杜鲁门不再感到迫切需要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战争问题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也是他提起他先前的诺言的。”见《在波茨坦的会晤》,第缘页;对于后一次,仍然先由斯大林提出,阿尔珀罗维茨称之为“远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冷淡的回应说明总统对苏联提供帮助的兴趣已在消减”,见《美国外交史》,第缘页。



准备、回避与苏联直接讨论有关占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等^①。

反应在中苏关系方面，他们则力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苑月 四日，贝尔纳斯的私人助理布朗 六 辛 雪 注意到：“贝尔纳斯 希望宋将站稳立场不屈服，那么俄国人将不能参战。他觉得日本会在俄国参战前投降，这样中国就可以得救。如果俄国参加了战争，他深知 斯大林将接管，中国定会深受其害”^②。贝尔纳斯将中国问题与苏联参战联系起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斯大林在与杜鲁门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参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成与中国的协议；另一个是蒋介石当天发送给美国政府的电报。苑月 八日，蒋介石会见了与宋子文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以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的“重大牺牲”，坚持要求苏联在东北领土、主权和行政的完整、国内共产党问题以及新疆叛乱三个方面的支持，并且对旅顺、大连和铁路问题上坚持中国在先前谈判中的立场^③。当天，蒋介石就将这次谈话内容向杜鲁门进行了通报，蒋此举虽不无提醒美苏两国以防止重演雅尔塔的目的，但更重要的却是在请求美方介入中苏谈判，他在最后说到：

① 布朗 六 辛 雪 注意到：“贝尔纳斯 希望宋将站稳立场不屈服，那么俄国人将不能参战。他觉得日本会在俄国参战前投降，这样中国就可以得救。如果俄国参加了战争，他深知 斯大林将接管，中国定会深受其害”

② 辛 雪 注意到：“贝尔纳斯 希望宋将站稳立场不屈服，那么俄国人将不能参战。他觉得日本会在俄国参战前投降，这样中国就可以得救。如果俄国参加了战争，他深知 斯大林将接管，中国定会深受其害”

③ 《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告以解决外蒙问题之先决条件并对旅顺、大连及铁路主权与管理方式等问题提示意见谈话记录》，见 苑月 八日，载《战时外交》六 辛 雪 第 一 二 三 页。



“以上是我给斯大林元帅信息的内容。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是,您,总统阁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履行了雅尔塔协定的最极限,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已经超出了那条底线,我们已经到了中国公众舆论所能忍受的最大程度。或许,我们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最大极限。我相信在与斯大林元帅的会谈中,您会积极说服他接受我们所采取的不同寻常地合乎情理的立场,使他不再坚持不可能[的要求]。希望你能采取及时的行动与支持,并期待您的回复”^①。

杜鲁门显然不想与斯大林再提中国问题以免直接面对苏联的参战问题,但贝尔纳斯却对通过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办法十分热衷,接到蒋介石的上文后,他迅速为杜鲁门起草了一份简单而生硬的回复,苑月 圆日,杜鲁门以此致电蒋介石:

“我让您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没有让您作出任何超过该协定的让步,如果您与斯大林元帅对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有异议,我希望您将安排宋返回莫斯科继续你们达成完全谅解的努力”^②。

贝尔纳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道明了此举的用心,表示自己在于“鼓励中国人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继续谈判。我有一些这样的恐

① 转引自《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的会谈》,载《战时外交》,雪第 100 页。

② 转引自《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的会谈》,载《战时外交》,雪第 100 页。



惧：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斯大林也许就会立即投入战争。……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斯大林和蒋还处于谈判，这也许就会拖延苏联的参战而日本或许就投降了。总统同意这一观点”^①。实际上，细心的布朗当时就探明了贝尔纳斯的用心，“杜鲁门回应了蒋介石的电报，说他不希望中国屈从于超出雅尔塔协定的条款。允用贝尔纳斯全名的简写演然在争取时间，相信原子弹之后日本会投降，那么苏联就不会在战争胜利时出现在现场并从中大大获益，由此也处于向中国提出条件的有利地位”^②。

同日，得到赫尔利关于宋子文辞去外交部长以及不愿意再赴莫斯科的消息通报后，贝尔纳斯亲自致电宋子文，要求后者尽快联系有关事宜以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③。同一天，他将这种想法告诉了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后者在日记中写道：“贝尔纳斯说他最着急的就是想在俄国人进来之前将日本的事情搞定，他特别提到了大连和旅顺港。一旦苏联人进去了，他觉得就很不易再将他们弄出来。正是怀着这种想法，贝尔纳斯演倾向于宋返回莫斯科以便使得这一话题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④。贝尔纳斯对通过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步伐的方法的确进行了努力，直至1945年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为四届不同内阁部长充当顾问的菲斯对他进行采访时，他还念念不忘

① 月 日 美国历史学家 著 莫斯科 1945 年 再 见 中 国 史 话 通 论 第 10 章 第 10 节 第 10 页

② 辛 月 日 美国历史学家 著 莫斯科 1945 年 再 见 中 国 史 话 通 论 第 10 章 第 10 节 第 10 页 转引自 中国历史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第 10 页

③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就继续进行的中苏谈判有关问题的会谈备忘录》，1945 年 7 月 10 日，见 1995 年 1 月 1 日《苏联解密档案》，见 1995 年 1 月 1 日《苏联解密档案》第 10 卷 第 10 章 第 10 节 第 10 页

④ 月 日 美国历史学家 著 莫斯科 1945 年 再 见 中 国 史 话 通 论 第 10 章 第 10 节 第 10 页 转引自 中国历史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第 10 页



地表白“他曾试图鼓励宋延长谈判直至美国结束战争”^①。

正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这种基于原子弹外交上的变化，结合一大批重要外交智囊的持续政策建议，导致了美国在中苏谈判问题上的显著变化。愿月缘日，正在返美途中的贝尔纳斯向哈里曼发去了美国政府对待中苏谈判的新指示，它基本重复了哈里曼的前期建议，下令后者通知斯大林美国关于中苏谈判的立场：

第一、我们无意收回对雅尔塔协议方案的支持，我们相信宋已经履行了雅尔塔的要求，我们迫切希望大元帅不要再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

第二、我们要求不能达成让中国作出更多让步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利益的协议，特别是在没有与我们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将大连港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应当记得罗斯福总统曾拒绝了苏联要求租借大连的最初方案并坚持将之作为一个自由港进行国际化。由于我们门户开放政策的利益所需，我们反对将大连港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或将之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

第三、根据你7月28日备忘录附件的建议，我们将进一步提出在达成中苏协定的同时，必须当即完成和发表一个关于确认斯大林对在满洲遵守“门户开放”政策之口头承诺的书面协议，这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因为我们的公众舆论非常反对可能损害我们长久以来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安排。

文末，贝尔纳斯还表示美国政府非常赞成宋子文将大连建成一

^① 与“贝尔纳斯说”相类似，宋子文在1945年7月28日致哈里曼的备忘录中也提到：“我曾试图鼓励宋延长谈判直至美国结束战争”。这一说法在宋子文1948年出版的《外交回忆录》中也有提及。转引自《宋子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个中国人管理的自由港但为方便苏联的过境交通而在港口内商业租赁部分地区的方案,但他同时指示哈里曼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宋子文和斯大林建议美国不反对设立一个由中苏美或许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大连的管理^①。

就在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鼓励中方继续中苏谈判并希望以此拖住苏联参战步伐的同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为促成中苏谈判的继续而积极斡旋于中苏之间。9月16日,赫尔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声明杜鲁门拒绝了中国政府修正雅尔塔协定的要求,并建议宋子文返苏继续谈判。他接着对宋子文大加贬低,说他是蒋介石政府内最大的“反动派”,由于其个人极其严重的虚荣心以及逃避责任的心理,对中苏谈判持一直反对态度,相反,蒋介石和蒋经国却“是争取中苏谈判成功的最坚定的和最可靠的人士,因为他们两位都真诚地和热烈地希望这种成功”。赫尔利还表示如果宋子文继续妨碍中苏谈判的进程,那么他将向蒋介石建议“通过蒋经国收拾宋子文,尽管这可能会引起一场争斗”。最后,在分析中苏谈判的前景时,赫尔利似乎特别强调蒋介石本人受到国内民意的限制,由此建议苏联政府

“预先很好地编制使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地图和措词,也就是使中国政府的任务更轻松些,即:向全世界,首先是向中国表明,这是一份非常好的、非常有益的、对中国是非常优惠的条约。绝不能使条约显出有损尊严,必须特别强调中国主权的神圣性,绝不能让条约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可以通过适当的和委婉的

^① 资料来源:《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0页。



措词对协定达成一致意见”^①。

1950年10月1日,赫尔利再次向彼得罗夫“通知”10月2日谈话后两个情况的新进展,第一个是宋子文要辞去外交部长并表示不愿再去莫斯科谈判,但是经过赫尔利的“吓唬”,最终还是同意再赴莫斯科。第二个是王世杰将接任外交部长并随宋一同前往莫斯科,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王世杰是“最近才开始与蒋介石接近的”,并表示对王世杰在未来谈判中的“唯一担心”是“王世杰曾经在英国学习过,并以自己的亲英的立场著称,因此,在自己的政策中有可能遵循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方针”^②。赫尔利不惜讨好双方以促成中苏谈判自然有其目的,他依然企盼借助苏联力量达到迫使中共接受国共合作的目的。遗憾的是,赫尔利的这一判断始终没有恰当地把握苏联对华政策的真谛,从而导致他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他本人外交生涯的结束。尽管赫尔利此时并不完全了解杜鲁门与贝尔纳斯由原子弹所激发的观念与政策的变化,但是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哈里曼、格鲁、史汀生一起,这三股源自不同动机的力量共同构成了一致的美国政策:促使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发生了一场人事变动。10月10日,宋子文约王世杰谈话,将第一轮会谈的六次谈话记录交付后者,要求后者接任外交部长职务,并随往莫斯科进行第二轮谈判。第二天,蒋介石

① 《彼得罗夫关于中国请求修改克里米亚决议事宜与赫尔利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10月10日,苏联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

② 赫尔利得以成功“吓唬”宋子文的武器是如果他不去莫斯科,蒋介石就会前往,而“宋子文担心蒋介石会有这样的行程。”赫尔利此说实是异闻传说,不知从何而来。《彼得罗夫与赫尔利就继续进行中苏谈判有关问题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10月10日,苏联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



告诉王世杰“子文因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为此”，并安慰后者“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顾虑”以奉劝王世杰任外长。王世杰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如果接受外长之职则难免承担未来中苏条约的责任，因为除了外蒙问题，还牵扯到能否收回东北；另一方面，如果拒绝接受，又有“畏惧负责之表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关系极大之时，半身之毁誉不宜在予考虑中也”。最后，王世杰提出同意接任外长，但不愿前往莫斯科。但是在苑月 猿日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后，宋子文不但坚持要求王世杰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第二轮谈判，而且还表示中苏条约最终须由外长签字^①。愿月 缘日，宋子文带领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蒋经国、即将出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以及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再次赶赴莫斯科。在赶赴莫斯科的途中，王世杰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

“予一路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千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有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②。

第三阶段

愿月 苑日至 愿日，中苏双方又进行了六次会谈，其中斯大林亲自参加了第一、二和第五次会谈。首次会谈是在美国首颗原子弹成功投放日本广岛后一天以及苏军对日参战前一天的 愿月 苑日晚正式开始的，双方的基本争论仍然没有太大变化，主要话题还是旅顺和大连。

①王世杰 苑月 圆原 圆缘 圆苑 猿日和 愿月 员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员圆- 员圆 员圆- 员圆 员圆- 员圆 员圆 员圆页。

②王世杰 愿月 缘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员圆页。



在旅顺及其周围苏联军事管理区的问题上，蒋介石部分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即基本上同意恢复到沙俄时代军事管理区的覆盖范围，但要求将大连及其相关铁路排除在外，斯大林不同意将大连排除于军事安全区之外，但提出苏方在和平时期不参与大连管理的折衷办法；对于此前苏方提出旅顺以南 150 公里内岛屿中国不能设防的条文，中方坚决反对，“史太林似可放弃其原意，为对于距港甚近岛屿，或尚另提洽商”。对于安全区内的民事管理，苏联要求主要民政官员的任命都须经苏方“认可”，而中方则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提出成立两国联合军事委员会协助共同使用港口和解决有关纠纷^①；大连仍然是双方分歧最大的焦点，中方坚持管理权全部归中国，保证向苏联长期出租码头以确保其货物中转的需要，而苏方则以日本的潜在威胁以及雅尔塔协定中确保苏联的“优先权”为由，坚持苏联参与大连管理，斯大林甚至有言：“既然贵方想与我们达成妥协，那么就不应该只在纸面上许诺给我们权利。那样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们将继续为维护中国的主权而战斗，而流血，这一点你们自己从来没有做到过”。直至最后他提出大连市董事会主席由华人出任、港口主任必须是苏联人的要求，中方还是不妥协，双方各不相让，“尚成僵

^① 中国政府对所谓旅顺地区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只是顾及“面子”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这一点在苏联档案以及宋子文会后和哈里曼的谈话中都明显的反映。如苏方记录中有宋子文如下发言“关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意思并非是要干预军事安全事务。这一地区的防卫交给苏方。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知道我们拥有发言权。蒋在重庆曾告诉彼得罗夫让斯大林不必担心这一安排会对安全造成影响。……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共同使用旅顺港。实际上由于我们没有舰队，我们在这方面发挥不了多少作用。”见《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1955年 10月 20日，转引自原《苏联解密档案》。“为了面子才提出建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转引自《苏联解密档案》。



局”^①。

谈判最后提到的“战利品”引起了哈里曼的格外重视。他怀疑斯大林有将占领区内的日本产业当成苏联战利品的企图,因为当“宋询问具体意欲何为”时,“斯大林予以回避并推说以后讨论”。哈里曼注意到这是斯大林首次向宋提出该问题,而且“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这是斯大林张大胃口的另一例证”。他警告说如果苏联对东北占领区战利品的界定和德国一样,那么“苏联剥夺满洲一些特定工业并且永久性地完全控制满洲工业就成为可能”。为此,他建议“我们要抵制他对日本企业股份权的要求,根据美国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定义及其历史惯例来严格界定战利品所包括的内容”,并要求政府对该问题的立场进行迅速指示。斯大林的举动还引发了他对相关战争赔偿的担忧,建议“我们的立场应当是不管是满洲还是其他地方的日本资产都应该通过盟国间的协议对所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由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我担心除非我们此时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苏联人以为他们可以在红军占领的区域内单方面地定义战利品”。哈里曼注意到宋子文对此次的谈判结果“非常沮丧”,为此向后者出示了美国政府要求他通知斯大林三点指示的最后一条:即中苏协议要确保“门户开放”政策^②。

①《宋子文、王世杰致蒋介石》,民国三十年八月九日,载《战时外交》六卷第 128 页;《中关系卷》第 208 页;《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民国三十年八月九日,载《宋子文原苏联解密档案》。

②哈里曼向政府的汇报中说是斯大林提出的这一点,并“显示包括日本企业股份在内的部分日本人资产将被视为红军占领区内的苏联战争战利品”。实际上,根据中方和苏方的记录,战争赔偿问题首先由中方提出,蒋介石有一电报专门要求宋子文向苏联声明东北各种工业设备等应归中国所有。见《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订约之前向苏联声明东北原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电》,民国三十年八月九日,载《战时外交》六卷第 128 页。斯大林表示给中国以“同情考虑”并答应进行具体协商。因此,不知哈里曼此说从何而来,推测应不外乎两种:宋子文出于“邀美抗苏”的战略而故意夸大斯大林对中国的野心;哈里曼自身对斯大林的敌意抑或鼓励政府认识到苏联的野心。资料来源:宋子文原苏联解密档案。



哈里曼的举动并非于此即止。当天下午,他和凯南就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谈判问题等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正式会谈。哈里曼首先表示鉴于中苏双方的谈判涉及到满洲港口与铁路的使用,要求斯大林能够将口头允诺过多次的遵守“门户开放”写成书面文件并随中苏协定一起发表。对此,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接着,双方讨论美国起草的这份文件的草案^①,针对其中“基于既不歧视也不特惠的待遇原则,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让苏联贸易有途径满洲走向大海的不受阻碍的通行权”的措词,斯大林认为雅尔塔秘密协定提到的苏联“优先权”不是指贸易,而是确保苏联在“港口管理方面苏联的优先地位”,为此坚持苏联必须参加大连的管理:由中苏代表各缘人组成市政管理委员会,中方任主席,港口主任为苏联人;此外,大连必须包括在苏联的军事安全区内。这一点正是斯大林在前一日与宋子文谈判中所提出的办法,但中方拒绝接受。对此,哈里曼表示杜鲁门总统已经了解到了中方的立场,“总统认为宋的方案已经满足了雅尔塔协定,希望元帅不要向宋施加压力以获更多的让步”,而且,杜鲁门“已经接受了宋的方案,如果中苏双方超出了它们,他希望能得到通知。”斯大林坚持自己的要求并没有超出雅尔塔协定,指出“对中国人已经够慷慨的了”,批评中国人把“俄国人当成不受欢迎的客人,欲将俄国人置于不能行动的境地”。斯大林显然借中国间接表示对美国的不满,针对哈里曼的表态,他指出不反对杜鲁门“介入这件事情,但他觉得总统不应只听中国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一听俄国人的意见”。当哈里曼坚持中国反对将大连包括在军事区内时,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现在这么说了”。双方在大连问题上各持己见,都难以说服

^① 见哈里曼在 1945年 8月 15日提交的草案,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向斯大林交涉时,取消了最后一段。资料来源:《苏联外交档案》,第 100 页。



对方。最后，哈里曼再次提出在大连的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表示“保证贸易的全面自由，不会在通行问题上设置障碍，门户开放的精神将占主导”^①。尽管如此，哈里曼还是对苏联的承诺表示担忧，谈判结束后，他提醒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尽管斯大林作出了上述承诺，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安全控制下以及苏联管理下，大连能够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港口，我看不到雅尔塔协定中有任何使我们支持这种安排的内容”^②。

谈判各方都在固守自己的立场，而谈判桌外的战争形势却是瞬息万变。就在哈里曼刚刚走出克里姆林宫不久，莫洛托夫召见王世杰与傅秉常，声明苏联将于第二天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几个小时后，集结在中苏与中蒙边境上的 150 万苏联红军即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东北发起突然进攻，日本关东军全线溃败，一周之后，苏军就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莫洛托夫关于苏联选择此时参战原因的解释在于雅尔塔会议上曾与美国协定在德国战败三个月内对日宣战的承诺，但真正的原因显然源于美国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以及日本可能的迅速投降。

苏联参战不但影响了中苏谈判的日程，斯大林原定在 8 月 30 日与中方的会谈被推至 9 月 1 日晚，而且对中方代表团的態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方代表团对早日结束谈判的愿望明显强烈起来。9 月 1 日，中方将自己的友好同盟条约、东三省军政协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协定、旅顺口协定、大连协定、对中国中央政府态度问题、中国对东三省之主权问题以及关于新疆叛乱问题之照会、蒙

① 哈里曼对贝尔纳斯和杜鲁门说：“尽管斯大林作出了上述承诺，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安全控制下以及苏联管理下，大连能够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港口，我看不到雅尔塔协定中有任何使我们支持这种安排的内容。”

② 莫洛托夫在 9 月 1 日对王世杰和傅秉常说：“苏联将于明天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几个小时后，集结在中苏与中蒙边境上的 150 万苏联红军即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东北发起突然进攻，日本关东军全线溃败，一周之后，苏军就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



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以及从东三省撤出苏军问题等 怨份草案正式转交苏方^①。斯大林在前一日与哈里曼的谈话中还抱怨宋子文拖延谈判，“他说话很多，并且都把时间浪费在记录上，致使他们难以确切了解他到底有什么提议。他们要求他将自己的方案付诸文字，但他还没有做”^②。在 怨日 晚的会谈中，宋子文和王世杰都明确表示希望在日本投降前结束谈判，宋在谈判开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们急于在日本投降之前签订条约，这样更易于向我们的人民做出交待”^③。实际上，鉴于苏方在上次谈判中对大连问题上的强硬，宋、王在 怨日 已经致电蒋介石要求授权“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紧迫，不容过事牵延也”^④。哈里曼在与宋的会谈中也明显觉察到了后者的这种态度，故而专门提醒后者如果作出任何新让步，那么必须获取苏联在其他方面的相应支持为条件^⑤。哈里曼对斯大林在大连问题上的强硬以及中方可能的让步十分担忧，实际上，就在鼓励宋子文不要作出单方面让步的谈话之后，他又致电杜鲁门建议美国政府考虑进军包括大连在内的关东半岛的重要港口，争取在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实施抢先占领^⑥。

① 《顿金与中国代表团刘泽荣的谈话纪要》，1945年 愿月 怨日，载《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

② 宋子文致哈里曼电，1945年 愿月 怨日，载《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见《宋子文外交档案》（宋子文外交档案），第 怨页。

③ 《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1945年 愿月 怨日，载《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

④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对苏联坚持参加管理大连行政问题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电》，1945年 愿月 怨日，载《战时外交》六二第 怨页；《中苏关系卷》，第 怨页。

⑤ 哈里曼致宋子文电，1945年 愿月 怨日，载《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见《宋子文外交档案》（宋子文外交档案），第 怨页。

⑥ 哈里曼致杜鲁门电，1945年 愿月 怨日，载《解密档案》（苏联解密档案），见《宋子文外交档案》（宋子文外交档案），第 怨页。



美国介入中苏谈判的压力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也使得苏联希望早日结束谈判。因此,在 1945 日晚的谈判中,斯大林在大连和旅顺上的态度都出现了松动:对于大连,他同意将市政管理全部交给中方,但坚持港口主任必须由苏联人担任,而且大连必须包括在苏联的军事安全区内,但在和平时期苏方不对城市管理进行干涉;在旅顺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放弃南部外岛禁止中国设防的要求,但拒绝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在东北撤军、不支持新疆、尊重东北主权以及不援助中共等问题上他同意以书面形式加以确定;但是,在中东和南满铁路局长、外蒙古边境以及旅顺的管理问题上,斯大林仍然拒不让步^①。即使在苏联解密的会议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争执十分尖锐。在关于苏联承诺只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共时,斯大林要求在友好条约中加入“中国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和进一步实现民主化”的条款,中方认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并表示拒绝,而斯大林则表示“如果贵国继续打击中共,您能期望我们支持中国政府吗?我们不会干涉,但当你们向共产党发动进攻时,我们很难从道义上给你们以支持”。此外,在外蒙古的疆界问题上,中方坚持以自己出具的地图为标准在承认其独立前确定下来,而苏方则反接受中国的地图,要求中方接受“现有的边界”,并尽快承认外蒙古的独立^②。

这次会谈为大连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第二天,蒋介石也给宋子文发来了指示,同意他在大连问题上的授权要求。蒋介石显然也是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在苏闻悉日本求降及与史达林晤谈关于解决大连市、外蒙疆界及旅顺口外岛屿等问题之谈话结果电》，1945年 8月 15日，载《战时外交》六卷第 125页；《中苏关系卷》，第 155-156页。

② 《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1945年 8月 15日，载《苏联解密档案》。

军事档案网
http://www.military5.com/



受到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因为当天早上他收到了杜鲁门关于讨论接受日本投降事宜的电报。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他说：“自日本宣布投降后，整个局势已为之大变，……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码头与港务，则准雇佣苏员办理，是与苏联目的并无损害，惟此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中勿遥制”^①。斯大林的让步和蒋介石的授权使得困扰谈判的大连问题得以解决，宋子文决定基本接受斯大林 1945 年会谈中的折衷方案。但是，外蒙古疆界问题再次突出，尽管双方在此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但这里的争论典型地代表了双方的互不信任。对苏方来讲，斯大林担心的是中方以边境未定为借口，拖延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时间；而中国则担忧苏联不承认中国出示的地图，并为以后进一步图谋中国特别是新疆的领土留下口实。1945 年以前，新疆阿勒泰地区曾属蒙古，蒙古独立后，阿勒泰地区被划归新疆，苏联在 1945 年代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 1945 年苏联新出版的地图却将阿勒泰地区中一块约为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外蒙古的一部分，1946 年的北塔山事件以及苏联支持的新疆叛乱就始于阿勒泰地区。因此，国民党政府认为只有在明确了阿勒泰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后才能承认外蒙独立^②。1945 日和 1945 日，中方代表团又与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基本上在大连行政管理、旅顺周围军事安全区民政人员任命、旅顺南部 10 公里之内岛屿设防、中东南满铁路路警以及铁路附属产业、东北撤军等方面都达成协议，但是在外蒙疆界、铁路局长、以及旅顺联合军事委员会三个方面仍然没有突破。为此，宋、王再次致电重庆政府“职等默察情势，以上数点恐难再强苏方让步，今日拟

① 《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以大连自由港问题准予权宜决定电》，1945 年 8 月 19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25-126 页；《中苏关系卷》，第 125 页。

②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雪第 125 页。



再做一度磋商，倘今明内钧座别无指示，拟即就商定与苏方签字”^①。

蒋介石对上述三个问题都拒绝作出让步，接到上述电文后，他接连向中国代表团相继发去两封急电，要求“由兄正式提出，或派经国以个人关系送交”斯大林：

此次中苏友好协议，不惟为消灭我两国纠纷之症结，亦为建立一两国百年合作之基础，此为余唯一之志愿，想亦为阁下所期许，故特恳切就商与阁下如下：（一）外蒙如希望独立，而对于疆界此不先有一基线之协定，则以往外蒙之症结，不惟未能消除，而且反增今后之纠纷，此决非吾人之本意，故外蒙界线此时必须有一基准之图，籍以为将来勘界之依据。（二）旅顺共同使用之机构，吾人既同意共同使用，则无论在事实与名义上，旅顺必须有一中苏军事委员会，以为共同合作之枢纽，否则形式上实无异于旧日之租借地，此今日中国国民与政府皆无法承当也，关于此点有关政治性者，余已面告彼得罗夫大使，言之甚切，吾望阁下对于政治上特予谅解。以上两者乃为我中国立国条件最低之限度，过此则无以立国于世界，且违反我国民革命之原则，苏联与阁下来皆以辅助中国之独立平等为宗旨，且盼阁下对我以上之请求获得友谊之同意，则中国政府与全体人民对苏联友谊与精诚，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苏方对外蒙疆界不愿在换文中作任何规定或声明及对路局局长及军事委员会问题均不愿让步拟再做磋商电》，见《蒋年愿月 愿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愿愿页；《中苏关系卷》，第 源愿- 源愿页。



必永志不忘矣^①。

对于铁路问题，他要求中方继续坚持南满铁路局长由中国人出任，因为“南满以东支线，极其重要资源皆在其东区，若非由我方任局长，则将来以东各支线，将成为废物也。至少奉天与长春二站长，必须任华人也”^②。在上述两份指示后，蒋介石又发去一电，要求宋子文和王世杰坚定立场，将中国接受大连港可用苏人以及接受大连在战时受旅顺军港约束的交换条件是南满路局长为华人和在旅顺设立联合军事委员会，而且在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惜，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③。

蒋介石的上述电文在中国代表团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宋子文、傅秉常和蒋经国等都坚持形势危急，力主不顾蒋的指示而继续与苏方谈判以迅速达成协议，王世杰也认为“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蒋的上述要求“显然办不到”，但他却建议再电重庆说明情况，因为没有蒋的最终同意或授权，既是签署了协议也很难得到国内的批准^④。由此，中方通知苏方暂时改变当天

①这两封电文没有出现在《战时外交》六二雪但在《总统》以及 1945 年台湾外交部出版的外交部丛书中都有，应引起注意。《蒋主席电宋子文院长外蒙独立意见电》，1945 年 8 月 10 日，《蒋主席电宋子文院长旅大问题之意见》，1945 年 8 月 10 日，载《中苏关系卷》第 196 页；《总统》卷五 六二雪第 1963-1964 页。

②《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嘱大连港务如必须任用苏员则南满路局长必须任用华人电》8 月 10 日，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 1963 页；《中苏关系卷》，第 196-197 页。

③《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嘱转告苏方如南满路局长任华人则管理大连港无可用苏员及外蒙疆界须在承认其独立前勘定界线电》，1945 年 8 月 10 日，载《战时外交》六二雪第 1963-1964 页；《中苏关系卷》，第 197 页。

④王世杰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1963-1964 页。



与斯大林的约定，宋、王两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未决事宜予以授权处理：

侵、文、震三电均于近日奉到，职等原定今晚与史太林作末次商谈，接电示后已以电话请其暂停晤见，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其因颇多，似非苏方故意，预为将来留一惹起纠纷地步，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兹时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置之权，并恳急示无任企禱之至^①。

但直至 员袁日中午，蒋介石仍未答复，宋子文主张恢复与斯大林的会谈，但王世杰却坚持至少在外蒙问题上等到蒋介石的授权后方可进行，最后，两人决定在当晚 员圆时与斯大林会谈^②。王世杰了解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的担忧，他当即以个人名义再致电后者，对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详细说明：

职与宋院长上钧座元子电计已呈阅，钧座侵电囑由经国兄转达史达林之理由，两日前已代表钧座向史氏剖切申述，史认二十五年来外蒙疆界并无纠纷，现如提出徒引起外蒙人之种种要求，我如要求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史未能同意云云，职当认去载新疆外蒙之冲突即是一种边界纠纷，史氏认此事起因并非边界问题，职又请苏立即派人来渝划定国界，史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为速缔立中苏条约以防生变请对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权宜处置之权电》，员圆年 愿月 员圆日，载《战时外交》六二卷第 员圆页；《中苏关系卷》，第 员圆页。

② 王世杰 员圆年 愿月 员圆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员圆页。



氏亦认为不可。史氏始终亦未提出苏方外蒙地图,窥其原因不外二者,一则苏方预计附之地图,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者,非我所能接受,揆之实际,确不能于放弃外蒙领土之外,复放弃任何新疆领土。二则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现则已成苏联另一属国,总之,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成果,不胜惶恐。但默查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就我方利益而言,则此次缔约可以稳定中苏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军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种种则为统一建国所必须,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式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权衡至再,职与宋拟于接到钧座授权解决之电令时再向史氏作一度谈判,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在疆界为限之字句列入换文中。盖有此一语在约文上,我国显然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之疆土为外蒙疆土。事态严急,用特经陈,并乞垂示^①。

在宋、王两人的连续催促下,蒋介石最终“不得已”而发去了内容仅只一句话的回电:“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②。尽管如此,但这封不冷不热的电文却仍然使得中国代表团难以决断,似乎谁也不敢承担责任。实际上,早在赴莫斯科之前,王世杰就已经向蒋介石询问过政策底线,即“予等此去莫斯科必须确定态度,究竟是否必须得结论,抑对若干未决问题必须坚持我方主张到底”。但蒋介石却明确必要时来电请示^③。最后,蒋经国出面表示愿意

①《王世杰电蒋主席宜权直接受苏联各项条文电》,载《中苏关系卷》,第 185 页。

②《蒋主席自重庆之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告以对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宜处置之权电》,员 1945 年 8 月 1 日,载《战时外交》六 雪第 185 页;《中苏关系卷》第 185 页;《总统》卷五 六 雪第 185 页。

③王世杰 员 1945 年 8 月 1 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185 页。



承担接受斯大林条件的责任,才使得当晚的谈判得以进行^①。

1945年8月14日零时至15日凌晨4时15分,中方代表团与斯大林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宋子文声明“蒋委员长接受了现有边界”,要求在中苏两国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换文中加上了“以其现有之边界为其边界”,斯大林表示同意;在铁路管理方面,苏方仍然拒绝中方关于南满路由中国人担任局长的要求,但同意铁路理事会主席由中方出任,且有决定票的权利^②;在大连港口设备的所有权方面,苏方同意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免费租用一半,但苏方又要求中方不能将港口、码头及有关设备租与其他国家,中方不愿以书面形式承诺,最终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宋子文正式进行了口头承诺并记录在案^③;在旅顺港口方面,斯大林接受了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的

①这一说法出自1956年8月14日对王世杰之子的采访,转引自《宋子文回忆录》,《宋子文回忆录》,《宋子文回忆录》,《宋子文回忆录》。

②苏方会谈记录如是说,实际上,最终的协议中规定“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载《中苏关系卷》,第233-234页。

③关于这一点,中方政府文件中没有出现,苏联会议记录中有所谈及,尽管可以从中推测,但也不甚清楚,对话如下:

宋子文:好的。贵方想共同拥有大连的港口设施。我们希望是中方所有。但我方将免费租给你们设备。

莫洛托夫:我们有一个提议。接受中方关于设施的措辞,但必须有一致的记录。拟交草案雪

宋子文:第二段可以接受,但不要写成文字——一个君子协议。

斯大林:它将被汇报给中国政府吗?

宋子文:是的。

斯大林:我们不欺骗我们的盟国,我们认为那是犯罪。

宋子文:我们同样认为那是犯罪。

斯大林:很好。

《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回忆录》,《苏联解密档案》。此外,《宋子文回忆录》认为苏方的这种要求是针对实质上由苏方全控的旅顺港,显然有误,《宋子文回忆录》,《宋子文回忆录》。实际上,王世杰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此有明确记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13页。



要求,由 猿名苏联人和 圆名中国人组成,且苏联人任主席,中方实际上没有一点权力。至此,前后经过一个半月围绕外蒙、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双方争论就此告一段落。但在会谈最后,斯大林又提出要求中国支付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开支,宋子文和王世杰皆以中国财力不支加以拒绝,这本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他们却由于对中苏条约紧迫性的理解而加以回避,最终以斯大林单方面的“如果你们不出钱,我们就不得不用票据获取食物。这将由中国政府来偿付”结束了该话题,从而为苏联未来在东北发行钞票与掠夺东北经济物资留下了余地^①。

愿月 员源日晚,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各自代表自己的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及其两份照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及其议定书》、《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其附件》以及《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几份文件,中苏谈判正式结束^②。

结 语

员缘年 苑—愿月的中苏谈判,是雅尔塔会议以及美苏压力的结果。然而,在从雅尔塔到莫斯科的发展过程中,三国的政策都出现了单方面以及互动性质的变化。就美国而言,以杜鲁门入主白宫和美苏关系敌对发展为契机,力图抵制苏联在战后东亚扩张的意识形态持

^① 《中苏条约谈判第二阶段会谈记录》,员缘年 愿月 员源日,资料来源:《苏联解密档案》。

员缘年 苑月 员源日,王世杰、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及其附件,见《中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员缘年,第 猿- 远页。

^② 《中苏关系卷》,第 猿- 远页。



续发展,从缘月份重新评估雅尔塔秘密协定开始,到苑月下旬原子弹出现后支持中国抵制苏联在谈判中的过分要求,以图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并最终达到限制苏联在东亚发展的目的。尽管姗姗来迟的美国政策变化既没有起到帮助中国的作用,也因为苏联的提前参战而落空,但这显然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分水岭,也成为美国在中苏关系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积极援助中国政府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主权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谈判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显然都低估了它难度,苏联外交部在准备这次谈判的安排中,连迎送中国代表团在内的日程只安排了缘天的时间^①,中方也估计中苏条约会在谈判一周内签署^②。但实际上,谈判的时间之长和分歧之大都远远超过了双方的预期。宋子文在谈判结束见到赫尔利时,“两手一摊说:我是个筋疲力尽的人,过度的紧张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深受病痛。……与苏联的这个条约对主要负责人在政治上是具毁灭性的”^③。谈判结束几周后,在给顾维钧的信函中,他依然称自己“身心俱疲”^④。即便是专门从事宋子文外交研究对其外交成就备有褒奖的陈立文,也不得不对宋在中苏谈判中的

①《苏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宋子文等人访苏事宜的报告》,苏联解密档案。

②远月 圆日王若飞与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彼得罗夫已与宋子文飞赴莫斯科雪会谈,提到孙科告诉他“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 圆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一周以后签署。”《斯克沃尔佐夫就战后中国政治格局、苏美政策等问题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苏联解密档案。

③ 裁源等主编:《宋子文外交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④宋子文致顾维钧电,苏联解密档案。转引自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猿页。



利一样。宋子文和斯大林的协定 ,对悲观主义者来说 ,包含的火药味比近二十年来的任何一次外交活动都要少。这两个人的签字 ,在保证和平方面所起的作用 ,同我们的全部飞行堡垒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和平 ,活生生的但是真正的和平就在当前”^①。

在国民党政府最高防务委员会的专门会议上 ,也有人指出 :

“这个条约出乎任何预料地满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应该疏忽的正是那种情况 ,即 :苏联保证只帮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时还不要忘记 ,如果不批准这个条约的话 ,未必能够考虑返回南京和东北的问题”^②。

遗憾的是 ,主要由于美国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以及未来美苏对抗的形成 ,美苏两国军队先后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得到中苏条约中的任何苏方承诺 ,反而使得整个东北地区成为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角逐场 ,而东北也最终成为“蒋氏王朝”没落的开始。

①《哈里门回忆录》,第 58 页。

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费德林就中国国内对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反应事宜与夏衍的会谈备忘录,1992 年 10 月 10 日,《苏联解密档案》。



第四章

苏美军队进入中国

1945年 8月 15日

1945年 8月中下旬，进入东北两周后的苏联红军迅速控制了整个东北。8月 15日凌晨，集结在中苏与中蒙边境上的 150万苏联远东军同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包抄性的“闪电战”式进攻，在一套严密的战略与战术组织下，1500多架轰炸机对海拉尔、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重要城市的铁路枢纽、飞机场、军工基地等实施集中轰炸。苏联的意外打击导致日本关东军士气迅速瓦解，指挥系统陷入瘫痪。除了在边境地区的少量抵抗外，苏军迅速推进，到 8月 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苏联红军已从各方面向前推进了 1500多公里，进至东北平原腹地，对整个日本关东军形成了分割包围之势。之后，苏军一方面通过组织空降和机械化特遣支队进入各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另一方面对负隅顽抗的日军继续实施打击，到苏官方结束战争的 8月 25日，苏军已基本占领东北



全境^①。

就在苏联红军依照中苏条约进军东北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围绕对日战争的结束以及善后事宜开始积极援助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下令中国境内（东北除外）的日本军队只能向中国政府军队投降、协助中国政府军抢先进入受降地区、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一些重要的战略性港口、运送中国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等。美苏两国在中国的竞争性政策不但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内部形势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美苏双方间的对抗。到 1945 年 6 月中下旬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时，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它们之间的一个最显著分歧。

抢占大连的热身赛

就在苏联向中国东北发起强大攻势的同时，美国政府部门也在酝酿着一个争夺大连的计划。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最近处仅 106 海里，控扼渤海湾，素有京津门户之称，北面直通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广大腹地。此外，大连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避风条件极好，是我国北方唯一不淤不冻的优良深水港。正是由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战略与地

①对于苏军针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最详细的研究是美国军事专家的两本著作。那森·比佛利著《日本关东军覆灭记》，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83 年版；徐焰著《北国狂飙——苏联出兵东北》，沈阳出版社 1983 年版；徐焰：《日本关东军覆灭记》，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83 年版；向青：《苏联与中国革命》第 1 卷，1—100 页。



理优势,大连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作为重要的屯粮基地和通商口岸。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大连更成为西方列强相互角逐的对象,先后被英、法、俄、日相继霸占并经营发展,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到 1913 年,其货物吞吐量增至 160 万吨,超过了日本岛的任何重要港口,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自由贸易港^①。

大连在远东太平洋的重要位置,正是斯大林一直视之为苏联特殊利益,而美国则坚持将其建为国际共管通商口岸的原因所在。美国对大连的谋划起源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苏谈判,对斯大林向中国提出超过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要求十分不满;特别是在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要求维持大连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斯大林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与宋子文的会谈中不但继续坚持在大连的特权要求,而且还提出将东北重要的工业设备作为苏军战利品。在中方表现出难以抵制苏联压力并不得不作出更多让步的情况下,哈里曼对大连和东北极为担忧,当即建议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派遣美国军队在大连和朝鲜等地提前登陆接受日本投降,“考虑到斯大林向宋进一步增加要求的举动,我建议至少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实施这些登陆以接受日本投降。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尊重苏联军事行动区域的义务。迪恩将军也同意上述建议”。哈里曼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一时之念,实际上,正如他在电文中所言,其依据是他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从马歇尔和金上将处得知军方已经考虑新的计划:即如果日本在苏军进驻大连和朝鲜之前投降,美军则实施在这两地的登陆行动^②。

该计划确实酝酿于原子弹成功试爆后的波茨坦会议期间,当杜

① 李靖宇:《大连 20 世纪创建现代化国际名称战略对策》,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0 页。

② 李靖宇:《大连 20 世纪创建现代化国际名称战略对策》,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0 页。



鲁门得知“打败日本无需俄国人帮助”以及第一颗原子弹可以在 8 月 1 日准备就绪的时候，他当即召见马歇尔和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探讨太平洋战事，之后，英美前线都收到了准备应付日本提早投降的指令，马歇尔还要求麦克阿瑟迅速提供美军能够快速占领日本和朝鲜的相关情报^①。在两颗原子弹的打击下，日本在 8 月 15 日表示可以提出接受盟国的投降条件，唯一要求是保留日本天皇。当天下午，杜鲁门召集会议，多数人同意日本的要求，但贝尔纳斯反对，表示此举会导致总统在政治上的麻烦。最后，会议决定对日本进行肯定的回答，但措辞应不反对无条件投降的精神。下午，会议讨论贝尔纳斯起草的回复，其中写道：“天皇以及统治国家的日本政府将听从盟国最高司令”，按照商务部长华莱士的回忆，贝尔纳斯“在读他的草稿时停顿了一下，专门强调战胜裕仁的最高司令是一名美国人。”当贝尔纳斯表示英国已经同意了他的草案时，杜鲁门突然“以最猛烈的方式”插言，表示俄国肯定不会有答复，但美国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史汀生声明苏联肯定想拖延日本的投降，以便苏军在满洲的进一步推进，对此，杜鲁门针锋相对地声明美国的利益确保使“他们不能推进得太远”^②。

① 马歇尔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法，“即使我们甩掉俄国人而自己干，并且迫使日本接受我们的条件而投降，这反正也不能阻止俄国人进军满洲……并在他们提出的投降条款上实际取得他们所要的一切。”见《马歇尔传》第 108 页。

② 8 月 15 日，杜鲁门在白宫发表声明，称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他在声明中说：“日本已投降，这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日本投降，这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日本投降，这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门接受了哈里曼的建议，第二天早上，他指示联合参谋部准备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大连以及朝鲜半岛重要港口的计划，并将这份指示作为一份补充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①。第二天，陆军部部长助理麦克洛伊（Frank M. Meyer）为此向贝尔纳斯质询，后者回答：“在天津和中国北部的港口问题上，总统同意了我关于占领大连和旅顺的建议，但没有过多地指出我们也应当在中国北部的港口之一实施登陆”^②。正是在贝尔纳斯的鼓励下，在 8 月 10 日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方协调委员会关于受降区的会议上，更是有人提出美军还应在库页岛部分地区接受日军的投降，建议政府对东亚受降区的安排尽快达成一致，并提议将包括满洲和朝鲜 38 度纬线以南的地区全部划归美国受降区。与此同时，杜鲁门、哈里曼、福雷斯特尔、贝尔纳斯以及麦克洛伊等人都极力主张美国应当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而且此举不能事先通知苏联，以免它可能的反对或者抢在美国之前提前占领。就这样，在麦克阿瑟接到关于美军将要占领的地区名单上，显著增加了朝鲜和大连，同时李海上将还通知联合参谋部：出于政治考虑，应当尽快占领不属苏联行动区域内的其他中国内陆港口^③。

白宫此举为专门负责起草日本投降令的联合参谋部人员带来了困惑，因为他们此前已经否决了将美国占领区扩大到大连的内部提

① 杜鲁门总统命令，1945年8月10日，关于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大连及朝鲜半岛重要港口的计划。转引自：[美]哈里曼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00页。

② 麦克洛伊对贝尔纳斯的质询及回答，1945年8月11日。转引自：[美]哈里曼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01页。

③ 李海上将通知联合参谋部的信件，1945年8月10日。转引自：[美]哈里曼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02页。



议,原因是害怕引起苏联的反对以使整个投降令难以实施。但显然由于白宫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在要求政府批准业已酝酿很久的书面投降令的同时,准备另一份特别备忘录,以备美国确实需要登陆满洲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呈交总统。该备忘录中有一份杜鲁门届时将直接发给斯大林的电文,向苏方解释美军在黄海的行动主要旨在保护有关港口码头设施,“纯属军事目的”,并不“妨碍最终的和平安排”。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份备忘录被交给杜鲁门并改变了他的命令^①。倒是白宫的命令引起了军方极大不安,马歇尔为此专门与贝尔纳斯进行了探讨,发现后者不但主张美军要占领大连,而且还应包括辽东半岛上的其他港口。他十分迷惑,要求有关人员立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当美国军方与白宫就大连问题进行澄清的时候,元旦,斯大林对投降令的答复到达了白宫,他对投降令的内容没有表示反对,但强调“我认为辽东半岛是满洲的自然组成部分”并提出将库页岛全部和北海道的北部划入苏占区^②。

斯大林对投降令的基本认同、特别是对朝鲜 38 度纬线为美苏占领分界线的默认使得美国决策者十分满意,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苏军有能力占领朝鲜全岛而可能拒绝与美国的合作。但斯大林同时提出的其他要求却给杜鲁门带来了挑战:苏军要求进入北海道表明了斯

① 保罗认为杜鲁门看了这份备忘录,但决定推迟告诉斯大林。马歇尔认为,如果杜鲁门真的告诉了斯大林,那么斯大林就会要求美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仅限于保护港口和设施,而不包括占领大连和其他港口。但加里奇奥却认为杜鲁门根本就没有看到该备忘录,因为起草者们认为只有在需要登陆满洲时才呈送总统批准。

② 马歇尔认为,斯大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要求苏军占领北海道是不合理的。马歇尔认为,斯大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要求苏军占领北海道是不合理的。



大林与美国分占日本本土的野心,这一点决不为美国所容,因为此时的美国政府已经决定独占日本,而且此前美国已经明确拒绝了莫洛托夫关于任命一名苏籍最高指挥官与麦克阿瑟配合作战的要求。此外,斯大林对库页岛的要求以及对辽东半岛的界定表明苏联或许已经对美国抢先占领的意图有所觉察。8月1日,贝尔纳斯要求陆军部评估美国和苏联可能占领大连的时间。海军部虽然认为美国有能力迅速开赴大连,但他们显然兴趣不高,认为四面都在苏军包围下的大连没有很大意义。陆军部本来就对抢占大连的决定持怀疑态度,当天下午,他们通知贝尔纳斯:苏军将于8月10日到达大连(实际上,苏军在8月20日才抵达大连)^①。因此,在8月10日给斯大林的答复中,杜鲁门拒绝了苏联对北海道的要求;对库页岛问题,他基本同意由苏联占领,但提出美国有权在其中一岛上建立一个军事和商业基地;而对斯大林关于辽东半岛的界定,他避而不谈,实际上予以默认^②。

就这样,部分出于军方的消极,部分出于对库页岛的要求以及对拒绝苏联分占日本本土要求的补偿,酝酿一周的抢占大连计划就此搁浅。杜鲁门总统这一最终未能实施的命令还有其他的相关证据。一位名叫舍曼的海军上将(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8月10日从美国返回前线途经关岛时,尼米茨海军上将(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曾经通知他在苏联之前设法抢先占领日本旅顺基地附近的大连港^③。此外,在8月底一

① 这一消息源于苏联远东军主力第15集团军司令林德尼科夫(1945年)的回忆,他还列举了另外两个例证(一个是美国海军试图登陆大连,另一个是美国空军曾在旅顺上空飞行),称该命令“暴露了美国在二战最后阶段的计划”,说明“美国政府与军方确实力图改变现状”。见《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转引自《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转引自《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

② 这一消息源于苏联远东军主力第15集团军司令林德尼科夫(1945年)的回忆,他还列举了另外两个例证(一个是美国海军试图登陆大连,另一个是美国空军曾在旅顺上空飞行),称该命令“暴露了美国在二战最后阶段的计划”,说明“美国政府与军方确实力图改变现状”。见《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转引自《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

③ 这一消息源于苏联远东军主力第15集团军司令林德尼科夫(1945年)的回忆,他还列举了另外两个例证(一个是美国海军试图登陆大连,另一个是美国空军曾在旅顺上空飞行),称该命令“暴露了美国在二战最后阶段的计划”,说明“美国政府与军方确实力图改变现状”。见《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转引自《苏联对旅顺基地的占领》。



次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的讨论中，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伊曾经告诉副国务卿艾奇逊，“占领中国华北一些港口、包括一些现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着的港口”是“一个大计划的最后部分”^①。

苏联红军在东北

苏联红军从 8 月 15 日进入中国境内，到 9 月初就基本控制了东北的各大城市。东北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特别是经过日本多年的刻意经营，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其工业设备和生产规模在当时都属国际先进水准，东北也因此有“东方鲁尔区”之称^②。因此，对待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和日本财产，中苏双方都极为关注。早在中苏谈判期间，双方都对此有所提及但未展开讨论。9 月 15 日，外长王世杰在赶赴伦敦参加外长会议之前，特意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声明日本在东北的所有公私财产将被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的一部分，提请苏军在进入东北后予以注意，“予意在使苏军知日人在东北之工商产业为我之产业”^③。两天后，中方同时向美、苏、英三国发出外交照会，声明中方将没收日本在华资产作为赔偿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答复并表示“大致同意”中国的要求。在伦敦会议期间，王世杰又向莫洛托夫申明了中国的立场^④。但苏联方面一直没有回音，实际上，伴随着红军进入东北，苏联方面就开始了东北整个

① 麦克洛伊告诉艾奇逊：“占领中国华北一些港口、包括一些现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着的港口”是“一个大计划的最后部分”。

② 《中央日报》（上海），1945 年 8 月 15 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04 页。

③ 王世杰 1945 年 9 月 15 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 127 页。

④ 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关于中苏条约问题与王世杰的会谈备忘录》，1945 年 9 月 15 日，《苏联解密档案》。



经济和工业设备的系统破坏、掠夺和拆迁。

苏联对东北经济的野心可谓筹谋已久。有的学者指出苏联占领东北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包括机械设备、原材料和一切财富的经济掠夺,以有助于未来的苏联战后重建,有人甚至以苏联撤出东北后与中共继续以货易货的贸易为证据,指出苏联选择支持中共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经济考虑^①。中苏谈判期间,斯大林曾间接提到苏军在东北的“战利品”问题,宋子文当即声明东北的所有工业均归中国所有,而斯大林则表示“属于特权公司组织者”的满洲企业均划归苏军“战利品”。该问题当即引起了中美两国的极大关注与警觉,苏方在后来的谈判及其条约中都刻意回避了这一敏感问题,但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上述谈话却记录在案,为以后苏军在东北的经济掠夺留下了伏笔。因为根据张嘉璈的分析,斯大林所谓“特权公司”是指由日本与满洲国政府参与投资的公司企业,包括“各种金融机关、重工业、军需工业、交通及通信事业、拓殖事业、特种农产改进事业、电影图书事业等,几乎无所不包”。据此,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支柱产业都将可能成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②。

苏联的目的正在于此。他们掠夺东北工业设备的计划几乎与中苏谈判同时进行。伴随着红军进入东北,从莫斯科派出的大批技术人员也一同赶赴东北专门负责设备的选择与拆卸^③。《纽约时报》后来报道这一命令直接来源于斯大林,他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命令:“不要留下任何能够移出满洲的东西”^④。主要为了实施这一计划,苏联从 1945 年 8 月 14 日开始紧急施工,将哈尔滨通向苏联的铁路(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干

① 张嘉璈《张嘉璈回忆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0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00 页。

③ 张嘉璈《张嘉璈回忆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0页。

④ 张嘉璈《张嘉璈回忆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00页。



线)均改为苏联制式的 缘英尺宽轨(当时的铁轨为 缘英尺),到 猿月 猿日,从莫斯科开出的第一辆直通车抵达哈尔滨^①。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 猿月 猿日与东北行营的第二次会谈中直接通知中方,苏联将把日本人所办的企业均视为战利品,由此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接收、搬迁和破坏。包括南满铁路所辖各项重工业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的大小工业均被苏军接收,据 猿月中旬赶赴长春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报告,“各种重要工厂机械已被多数拆去,即两大水利发电厂重机亦已拆去一部分。”伪满中央银行还没有发行出去的现金也均被苏军提去,公路客车都被征用。很大程度上由于苏军的经济破坏和掠夺,整个东北地区的金融、交通、通讯与工厂均被迫关闭和停工,“前途十分棘手”^②。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到达长春的第一印象是“都市成为一空城”,甚至长春康德宫中的各种书籍、字画和灯泡都被搜刮一空^③。

苏军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是不可否认的,根据张嘉璈 猿月 猿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汇报,由于对日战争胜利后的人为破坏及设备拆迁, 缘豫的煤矿、 苑豫的机械工厂、 缘豫的针织厂、 缘豫的钢铁厂以及 圆豫的食品加工工厂都已无法开工恢复生产^④。而根据后来亲自前往东北调查的美国赔偿委员会主任鲍莱(鲍莱社 宰授 宰授)的报告,苏军对东北经济的破坏是“令人震惊的”,其价值应当不少于 圆亿美元。报告指出,苏军从一进入东北就开始了“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库存物资进行系统的征收,从 怨月初又开始了有选择性地拆迁机械设备”,“俄国人拿走了大量能够运转的能量生产和

①《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缘愿页。

②《战后中国》(一),第 圆愿- 圆题页。

③《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缘愿- 缘园页。

④《大公报》(上海), 猿年 猿月 猿日。



转化机器、发动机、实验工厂、实验室以及医院设备。”“他们不但在拆卸过程中破坏了工厂厂房与车间，而且还特意拆走了诸如发电机和煤矿工业泵的一些关键部件，致使它们失去运作能力。他们还用水淹没了一些煤矿，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报告还提到苏军还从满洲银行提走了价值 1 千万美元的黄金和 1 亿元的东北货币，此外，苏军还发行了高达 1 亿元的军事流通券^①。鲍莱报告公开发表后，苏联方面难以否认和辩驳对东北设备的拆迁事实，但却声明其价值仅为 1 千万美元，而且指责美方混淆战利品与赔偿的概念，说鲍莱报告“处处充斥着谬误和捏造”^②。

掠夺只是苏联在东北经济野心的第一步，在拆迁和转移重要工业设备的同时，苏军还对东北的工业进行了系统接收。其中的接收细节一直不为人所知。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张嘉璈获得的一份苏方秘密文件中，可以对苏军强行接收东北重工业会社（日本及伪满政府控制整个东北重工业的主要机构）的经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1945 年 8 月 15 日，以该企业曾帮助战争为由，苏联远东贸易公司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对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东北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与张嘉璈进行经济谈判的苏方代表）要求满州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将该会社全部移交苏联当局。高崎指出如果交与苏联以后无法向中国交代，斯拉特科夫斯基则表示“对于中国方面之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高崎由此要求苏方出具正式接收命令，苏方不但拒绝，反而以武力相威胁，并要求由高崎主动出具移交申请书。在压力之下，高崎递交了下列“申请要求”：

① 苏联对东北的掠夺，见《苏联对东北的掠夺》，见《东北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② 月 15 日，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苏联人要求我交出东北重工业会社，我拒绝了。”



“与满业有关各公司之多数，系为军事目的而经营，故本人见解认为得由协约国（张嘉璈此处的‘协约国’是指二战时期的‘同盟国’，以下不再一一说明——作者注）军队代表之苏联军接收之。若因此办理，切望使有关各公司速恢复正常状态，并使职员各归职守，更安定其生活。”

但苏方对此并不满意，经过数次交涉，高崎最后在 10 月 29 日又被迫向苏方交出了下述一份由他本人和个下属公司负责人联合签署的“申请书”：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之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含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我等希望当记载于前列名簿中之事业开工时，对于所有之专门家、技术者、事务员、工人等，向在此等事业中工作者，不问其民族如何，均予以职务，且保证其生命财产与生活^①。

据此，由满洲重工业公社在辽宁、抚顺、鞍山、大连、阜新以及哈尔滨等地下辖的各企业均在 1945 年 10 月 1 日至 1945 年 10 月 31 日全部移交给了苏军当局。与此同时，苏军以同样的手法也迫使满州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提交“接收申请”而接收了满州的电业。对比高崎起草以及在苏方逼迫下最后定稿的两份“申请书”，可以看出苏联接收东北企业的手法与策略：第一、强调这些工业均服务关东军并用于战

^①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37 页。



争 ;第二、坚持由各企业公司自己“主动”提出移交申请 ;第三、避免使用“协约国”,要求直接移交苏联东北占领军当局 ;第四、接收后均停业整顿。此举显然便于苏军进行系统拆卸与搬迁。上述这份文件上还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批示:“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阅下之工作”。读完这份秘密文件后,张嘉璈对苏联在东北的野心有了进一步认识。

“余阅上述文件后,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业,必欲染指,实为排斥美国势力之入侵,阻碍我方军队运输之一重大原因。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摄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卸重要机件入于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先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亦卓然可见。”^①

尽管如此,张嘉璈对苏联在东北的经济野心仍然估计不足,苏方上述目的并非全然在于排斥美国利益与非难中方接收,而确实有意在东北追求实际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准备在未来东北经济中有所作为。除了改修苏联到哈尔滨的铁路外,苏军还在东北发行了军用券,据报到 1945 年底数量已高到 100 亿元^②。1945 月下旬,哈尔滨电政局中的中国职员均被换成苏籍人员,安插了苏籍人员的中国银行开业(而其他地区的中行依然停业);在奉天,中国银行被关闭后,由苏军另行组织的商业银行却开张营业;此外,苏军还用军用票 1000 万元强行收购远东贸易公司房屋。1945 年 10 月 15 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中方通报苏联在东北成立的远东银行、远

① 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5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526-527 页。

② 1945 年 10 月 15 日,中苏在重庆签署了《中俄财政协定》,规定苏军所发行的军用券由政府负责收回,其损失由日本赔偿。《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526-527 页。



东运输公司、粮食出口公司、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公司等经济机构，而且粮食进出口公司还使用三架飞机往来东北各地。第二天，斯氏再次带领苏联国家银行及远东银行代理经理等人，催促粮食进出口公司的飞机营运以及要求远东银行及其在大连和沈阳等地的机构开业，当张嘉璈谈及外国企业在中国注册应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时，苏方竟然无理地表示该行已在 1945 年经中国财政部立案批准，并公然施压，宣称“中国政府对于该行复业，不应有任何问题”。19 日，苏军军事代表又向董延平提出，要求将苏军占领期间在东北所开辟的苏联赤塔—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海参崴以及伯力—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两条军事航线改为民营。第二天，苏方又提出允许在东北境内专设电信线路以及中转站，以方便与旅顺大连的联络。19 月底，苏军又提出沿长春铁路架设专用电线，以便“为本国与旅顺军港通讯便利”等^①。

上述种种举动无不表明苏联有长期控制东北经济的图谋。实际上，在对东北的主要工业进行系统搬迁和接收后，他们开始提出与中国政府进行东北经济合作的问题，此题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它迅速成为中苏东北交涉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苏联红军延长驻军东北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应当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即 1945 年 9 月 15 日之前）全部撤离中国，但实际上一直到 1946 年 1 月底苏军才全部撤出，期间苏方三次延长撤离日期，为中国政府接收东北制造了重重障碍。当然，造成苏军缓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来自同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①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9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28 页、129 页、130 页、131 页、132 页、133 页、134 页、135 页、136 页；《战后中国》（一），第 138 页、139 页。



美国“海空大抢运”和驻兵华北

抢占大连的计划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该事件却形象地反映了战后中国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又开始了大规模卷入中国事务的军事和外交行动。1945年8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魏德迈在1945年10月1日）“美国太平洋战区部队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在日本投降后采取的行动是继续目前的军事援助，以支持中国中央军队在日本占领的全部地区进行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运送中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台湾和朝鲜。该文件还明确要求美军只能与中国中央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和机构，……在华日军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零散的，都只向蒋介石委员长或他的代表投降”。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国政府军队迅速运到中国的关键地区。你还可以在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给予中国军队其他援助”^①。几天后，在杜鲁门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关于日本投降的第一号命令中，再次确认除东北之外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战区的所有日军的投降均归蒋介石^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给十分了解中国形势的魏德迈造成了困难，因为在强调全力援助蒋介石的同时，命令还谈到一个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打自相残杀的战争”。1945年8月14日，魏德迈向马歇尔发来电文，声明美国准备协助蒋介石军队前往的“比较重要的

① 魏德迈在1945年10月1日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美国太平洋战区部队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的计划。

② 1945年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在广播中宣布了这一命令。



绝蒋介石的命令，一方面继续受降行动。毛泽东连续向中共晋绥、晋察冀、华中等各大分局发出指令，要求日军和伪军“凡华北各城市及要道只能移交八路军，不能移交蒋介石政府”。魏德迈称违反其命令者“为人民之公敌”。同一天，朱德向美、苏、英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说明中共接受日军投降并参与未来任何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之合法性，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说帖还呼吁美国停止租借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与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①。

但美国无视上述呼吁，继续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 1945 年 8 月的命令，并在中国实施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事调动”^②。为此，美国空军第 13 航空队、第 5 航空队、空运司令部以及用于“驼峰”运输的所有运输飞机都被统一组织起来，到 1945 年 10 月中下旬，相继将国民党新 1 军、2 军、3 军和 4 军分别从芷江、柳州、靖远、九江和武汉等地运到南京、上海，然后再转运北平、天津等地。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斯特拉特迈耶）10 月初在一次公开场合宣称，截至 1945 年 10 月 1 日，美方已成功地将 100 多万名中国士兵从柳州运到了上海，将 100 万名士兵从芷江运到了南京，到 1945 年 10 月 1 日之前，美国空军将把 100 万人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设备运送到各个指定地点^③。

美国的行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既定战略。在一份 1945 年 10 月上旬美

① 《延安总部命令》（第 137 号），1945 年 8 月 1 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英美苏三国说帖》，1945 年 8 月 1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年 8 月）》第 137 页；魏德迈 1945 年 8 月 1 日，载《毛泽东军事年谱（1945 年 8 月）》，第 137 页。

② 魏德迈语，见资料中筠：《追根溯源》，第 137 页。

③ 魏德迈 1945 年 10 月 1 日，载《毛泽东军事年谱（1945 年 10 月）》，第 137 页。



国驻华使馆军事参赞致国务院的每周形势报告中，明确谈到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对中共已经在山东、河北以及江苏北部的成功接收所构成的威胁，“目前很难预测中共在未来能多大成功地控制这些地区，因为计划中向中国东部和北部空运而来接管日军的中央政府军队一定会对中共的战略构成严重的（如果不是最终的）打击”。报告还谈到由于美国空运的国民党军队的陆续到达并取代了当地的日伪力量，中共已经在山东济南和青岛等地被迫放弃既定抢占城市的计划而改兵北进，向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以及东北地区前进。一周后的另一份报告谈到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相关地区，国民党政府迅速在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以及湖南、湖北、江苏、河南等地建立了军事指挥机构，为此，报告认为已经集结在南京和上海等地的中共力量可能会由于国军的到来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①。

但中共并没有像美国大使馆所预测的那样大规模撤退，他们而是利用地理和实力优势，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大规模到达之前加速从日军手中接收各战略要地。中共的发展显然刺激了美国军方，他们决定在国民党军队未到达之前先行抢先控制相关地盘。为此，在 1945 年底和 1946 年初，两个海军陆战队师分别在塘沽、烟台、青岛相继登陆，并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到 1946 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已达到 15 万人。美军在华北的出现势所难免地造成了与当地中共之间的摩擦。早在 1945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刚刚抵达重庆不久，魏德迈就抱怨一名美国军人在苏州火车站被中共杀害。1946 年底，在进入东北要道的山海关附近，美方报道几名士兵被中共扣押。1946 年 1 月 1 日，在从秦皇岛到山海关途

^① 资料来源：《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与中共革命》，载于《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与中共革命》，载于《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与中共革命》，载于《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与中共革命》。



中,又有两名美国士兵遭到枪击。几天后,美军保护下的唐山至秦皇岛的铁路运输又遭到枪击,美军不但进行还击,而且还要求对附近的村庄进行空中轰炸,魏德迈最后批准可以在书面交涉和警告无效后实施军事报复^①。

中共也对美军的行为进行了多次抗议。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到达中国的当天,《新华日报》就登载了一篇对美军在天津登陆的评论,指责美军登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其目的不是为了解除日军的武装,“而是为了要利用登陆美军以反对八路军的占领平津,更进而至于反对华北的所有八路军”。对于美国,文章说到:

“是则美军之出此,不论其主观用意如何,实际上必然会干涉到中国的内政,必然会帮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及一万万解放区的人民。这种干涉,显然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走向民主的和平,却反而会加深中国内部的分裂。……美国政府为了远东和平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应当不是帮助中国的这一党反对那一党,以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而应当是以公平合理的态度以促进中国国内各党派的团结。”^②

中共的担忧不差。蒋介石正是在最大可能地利用美军达到

① 魏德迈在天津登陆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军事要求,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在天津的军事行动,并允许美军在天津登陆。国民党政府拒绝了魏德迈的要求,并命令魏德迈立即停止在天津的军事行动。魏德迈在天津登陆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军事要求,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在天津的军事行动,并允许美军在天津登陆。国民党政府拒绝了魏德迈的要求,并命令魏德迈立即停止在天津的军事行动。

② 《新华社记者为美军将在天津登陆时发表的评论》,《新华月报》,1945年10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9)》第15卷,第15页。



限制中共的目的，他不但继续使用美军保护国军已经达到的城市，将运送到各地的政府军主力用于对付中共以及转运东北。一份美国军方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海军陆战队宣称登陆华北的目的是协助中国政府接管和遣送日军，而美国海军和陆军部的统计资料却表明，截至 7 月 15 日从中国大陆遣送回日本的人数只有 2 万人，而与此同时从朝鲜半岛、菲律宾、太平洋以及日本附近岛屿遣送的日本人却高达 20 万人^①。7 月 14 日，周恩来直接向魏德迈指出了美国政策的矛盾：“美国公开宣称的对华政策是不干涉，但与此同时的政策却是向中国北方运送国民党军队、守护铁路和非常缓慢地解除日军武装，一句话，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魏德迈表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矛盾，但他接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而作为一名军人，他不得不执行这一命令。此外，他还透露出解除日本武装之所以缓慢的原因是源于中央政府的要求^②。

魏德迈到底有无上述言论难以证明，但他接下来的行为似乎可以证明这些言论的客观性。在要求马歇尔给予政策澄清而没有回复后，魏德迈一边继续执行这一矛盾政策，另一边加紧质询华盛顿。在 8 月下旬讨论美军登陆华北时，他明确指出由于这些港口附近的国共对峙，美国的出现势必会起到“加强政府军队地位”的作用，而这“正

① 魏德迈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海军和陆军部的统计资料却表明，截至 7 月 15 日从中国大陆遣送回日本的人数只有 2 万人，而与此同时从朝鲜半岛、菲律宾、太平洋以及日本附近岛屿遣送的日本人却高达 20 万人。”

② 魏德迈的上述表示是周恩来转告美国大使馆二秘迈尔贝（Meyer）的，后者在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的边上加上有附注：“我敢以（美国）元打赌，魏德迈将军绝不会做如此声明。宰援（即美国驻中国代办）和我也一样。”



是 魏 德 迈 委 员 长 所 期 待 的 ”^①。 7 月 初 , 蒋 介 石 要 求 将 原 计 划 运 往 台 湾 的 第 1 军 和 原 计 划 运 往 青 岛 的 第 1 军 分 别 改 运 至 塘 沽 , 魏 德 迈 当 即 拒 绝 , 表 示 除 了 即 将 到 达 青 岛 的 第 1 军 之 外 , 他 已 经 按 照 美 国 军 方 的 命 令 将 用 于 受 降 和 解 除 日 军 武 装 的 足 够 中 国 政 府 军 队 运 送 到 了 指 定 地 点 。 不 仅 如 此 , 他 还 提 出 美 国 海 军 陆 战 队 应 当 在 7 月 15 日 以 前 撤 离 中 国 。 在 回 答 马 歇 尔 的 有 关 质 询 中 , 魏 德 迈 指 出 他 之 所 以 拒 绝 蒋 介 石 的 要 求 并 提 出 美 军 早 日 撤 离 中 国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蒋 介 石 一 直 要 求 他 协 助 向 东 北 运 送 政 府 军 , 而 中 国 “ 从 俄 国 人 手 中 重 获 满 洲 完 全 是 一 个 中 国 和 俄 国 的 问 题 ” 。 他 要 求 军 方 将 他 的 撤 兵 建 议 “ 作 为 一 项 紧 急 事 务 进 行 确 认 , 因 为 委 员 长 一 直 向 我 们 施 加 压 力 , 要 求 将 美 国 联 络 人 员 随 中 国 军 队 一 起 派 进 满 洲 , 并 使 用 美 国 的 资 源 在 满 洲 境 内 运 送 中 国 军 队 ” 。 7 月 15 日 , 没 有 得 到 军 方 回 复 的 魏 德 迈 再 次 致 电 马 歇 尔 , 指 出 他 已 经 将 经 过 特 别 挑 选 的 1 个 中 国 政 府 军 运 至 北 平 — 天 津 — 大 沽 — 秦 皇 岛 , 但 蒋 介 石 却 一 直 利 用 这 些 军 队 扩 大 地 盘 并 进 军 东 北 , 并 让 美 国 海 军 陆 战 队 “ 应 付 中 共 以 稳 定 形 势 ” , “ 美 国 人 没 有 义 务 协 助 运 送 更 多 的 中 国 政 府 军 抵 达 华 北 , 而 他 们 毫 无 疑 问 地 是 用 来 对 付 中 共 的 ” 。 他 谈 到 国 民 党 军 队 在 当 地 的 管 理 上 非 常 无 能 与 腐 败 , 相 反 中 共 却 在 当 地 得 到 了 民 众 的 支 持 与 欢 迎 , 认 为 中 国 中 央 政 府 在 对 抗 中 共 占 领 东 北 方 面 “ 完 全 没 有 准 备 ” , 为 此 建 议 美 国 劝 告 蒋 介 石 只 有 完 全 控 制 长 城 以 南 和 长 江 以 北 的 地 区 并 确 保 交 通 线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进 入 满 洲 。 两 天 后 , 在 关 于 美 军 与 中 共 发 生 军 事 冲 突 的 汇 报 中 他 再 次 提 醒 华 盛 顿 , 中 共 在 故 意 制 造 美 军 干 预 中 国 事 务 的 事 件 , 而 客 观 上 避 免 干 预

① 魏 德 迈 委 员 长 所 期 待 的 是 中 国 政 府 军 队 运 送 到 指 定 地 点 以 后 能 够 解 除 日 军 武 装 的 足 够 中 国 政 府 军 队 运 送 到 了 指 定 地 点 。 不 仅 如 此 , 他 还 提 出 美 国 海 军 陆 战 队 应 当 在 7 月 15 日 以 前 撤 离 中 国 。 在 回 答 马 歇 尔 的 有 关 质 询 中 , 魏 德 迈 指 出 他 之 所 以 拒 绝 蒋 介 石 的 要 求 并 提 出 美 军 早 日 撤 离 中 国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蒋 介 石 一 直 要 求 他 协 助 向 东 北 运 送 政 府 军 , 而 中 国 “ 从 俄 国 人 手 中 重 获 满 洲 完 全 是 一 个 中 国 和 俄 国 的 问 题 ” 。 他 要 求 军 方 将 他 的 撤 兵 建 议 “ 作 为 一 项 紧 急 事 务 进 行 确 认 , 因 为 委 员 长 一 直 向 我 们 施 加 压 力 , 要 求 将 美 国 联 络 人 员 随 中 国 军 队 一 起 派 进 满 洲 , 并 使 用 美 国 的 资 源 在 满 洲 境 内 运 送 中 国 军 队 ” 。 7 月 15 日 , 没 有 得 到 军 方 回 复 的 魏 德 迈 再 次 致 电 马 歇 尔 , 指 出 他 已 经 将 经 过 特 别 挑 选 的 1 个 中 国 政 府 军 运 至 北 平 — 天 津 — 大 沽 — 秦 皇 岛 , 但 蒋 介 石 却 一 直 利 用 这 些 军 队 扩 大 地 盘 并 进 军 东 北 , 并 让 美 国 海 军 陆 战 队 “ 应 付 中 共 以 稳 定 形 势 ” , “ 美 国 人 没 有 义 务 协 助 运 送 更 多 的 中 国 政 府 军 抵 达 华 北 , 而 他 们 毫 无 疑 问 地 是 用 来 对 付 中 共 的 ” 。 他 谈 到 国 民 党 军 队 在 当 地 的 管 理 上 非 常 无 能 与 腐 败 , 相 反 中 共 却 在 当 地 得 到 了 民 众 的 支 持 与 欢 迎 , 认 为 中 国 中 央 政 府 在 对 抗 中 共 占 领 东 北 方 面 “ 完 全 没 有 准 备 ” , 为 此 建 议 美 国 劝 告 蒋 介 石 只 有 完 全 控 制 长 城 以 南 和 长 江 以 北 的 地 区 并 确 保 交 通 线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进 入 满 洲 。 两 天 后 , 在 关 于 美 军 与 中 共 发 生 军 事 冲 突 的 汇 报 中 他 再 次 提 醒 华 盛 顿 , 中 共 在 故 意 制 造 美 军 干 预 中 国 事 务 的 事 件 , 而 客 观 上 避 免 干 预



也是“极端的困难”^①。

对于魏德迈提出的问题,华盛顿并非视而不见。实际上,针对海军陆战队的问题,华盛顿的相关决策机构之间正进行着一场中国政策的大讨论,并基本上形成了军方和国务院之间的对垒。接到魏德迈10月12日电报的第二天,国务院、海军部和陆军部的三位部长就进行了专门讨论,以助理陆军部长麦克洛伊为代表,军方主张进一步援助蒋介石政府,麦克洛伊表示当时下令美军协助运送国民党军队本身就是“我们持续支持蒋的整个东亚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而现在美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当的投资”,“到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都是美国支持和加强蒋之声望的证据”。他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干预。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说持不同意见,他询问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后的可能后果,表示美国难以解释继续协助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原因。双方观点对立,而且都难以说服对方,会议最后也没有得出具体结论^②。之后,陆军部通知魏德迈,对于他拒绝协助中国政府进一步运送军队的决定以及撤出海军陆战队的建议,军方现在无法回答,并将该问题交付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方协调委员会寻求政治指导,但是在未接到新的指示之前,“军事援助应当按照现存的命令继续进行”^③。

① 魏德迈10月12日电报,见《魏德迈回忆录》,第100页。魏德迈在电报中写道:“我们持续支持蒋的整个东亚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而现在美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当的投资”,“到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都是美国支持和加强蒋之声望的证据”。他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干预。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说持不同意见,他询问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后的可能后果,表示美国难以解释继续协助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原因。双方观点对立,而且都难以说服对方,会议最后也没有得出具体结论。

② 魏德迈10月12日电报,见《魏德迈回忆录》,第100页。魏德迈在电报中写道:“我们持续支持蒋的整个东亚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而现在美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当的投资”,“到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都是美国支持和加强蒋之声望的证据”。他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干预。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说持不同意见,他询问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后的可能后果,表示美国难以解释继续协助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原因。双方观点对立,而且都难以说服对方,会议最后也没有得出具体结论。

③ 魏德迈10月12日电报,见《魏德迈回忆录》,第100页。魏德迈在电报中写道:“我们持续支持蒋的整个东亚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而现在美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当的投资”,“到处飘扬着的美国国旗都是美国支持和加强蒋之声望的证据”。他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干预。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说持不同意见,他询问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后的可能后果,表示美国难以解释继续协助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原因。双方观点对立,而且都难以说服对方,会议最后也没有得出具体结论。



就在陆军部电报发出的同一天，魏德迈来电表示蒋介石再次要求在华美军协助中国军队进入东北，请求陆军部对“这一紧急事件”给予相关指示。两天后，《纽约时报》头版刊文《进入满洲大门的战斗》，报道了国民党和中共围绕山海关的战事，声称这是中国“未宣布的内战”的开始，并透露美国的支持是导致国民党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篇文章激发了要求撤出驻华美军的公众呼声，为此，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在 7 月 15 日和 16 日发表公开声明，解释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仅只是帮助国民党政府处理日本投降问题，与国共之间的冲突毫无关系。为了强调该任务的艰巨，陆军部长帕特森（~~何塞·帕森斯~~）还故意夸大在华日军的数目，将 3 万说成是 5 万^①。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中国政策成为三方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的重要话题。然而，几次讨论下来，军方和国务院仍不能达成一致，根据有关会议记录，双方“分歧巨大”，“国务院的代表觉得应当取消在华军事行动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复杂，但是陆军部的代表却坚持相反的立场”。海军部和陆军部都指责国务院的中国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导致了海军陆战队目前的困难处境，坚持在没有新政策出台之前应当继续既定的援助政策，不但不能撤出海军陆战队，而且还应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②。

军方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然而，真正加剧、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目前在华美军困境的却是军方自己。实际上，在 7 月 15 日，事关中国政策的几个最重要行动的策划和实施都出自军方：一个是 7 月 15 日下令魏德迈动用空军和海军力量运送中国政府军队前往相关地点接受日军的投降，一个是 7 月 16 日再次明确要求魏德迈协助“尽可能地在解放了的地区建立基本的中国军队力量，特别是满

① 帕特森再次阅读电报内容，确信魏德迈的数目被夸大了，但为了显示对蒋介石的支持，他决定在公开声明中使用这个数字。资料来源：辛茨月译，见《美国外交史》。

② 资料来源：辛茨月译，见《美国外交史》。



洲^①。最后一个是在 1945 年 8 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国华北。关于后者，国务院东亚事务科科长文森特还是在报纸上得知，他十分惊讶并立即提醒副国务卿艾奇逊（贝尔纳斯此时正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该行动的可能后果，建议应当得到总统的批准并及早与军方沟通，“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军事理由去这样布置海军陆战队，否则该计划应当予以取消，最好让中国军队去占领这些港口^②”。艾奇逊当即联系陆军部，麦克洛伊先是表示占领中国华北的一些重要港口是军方“一个大计划中的最后部分”，但第二天又专门打电话解释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需要美军登陆维持这些港口的秩序以便利遣返日俘^③。

之后，军方不但主张继续驻军中国，还要求授权魏德迈更多的权力以协助中国政府运送军队。1945 年 9 月中旬，麦克洛伊向三方协调委员远东组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首先列举了在华北的各方力量对比数据：国民党部队 100 万人、美国海军陆战队 20 万人、中共部队 100 万人、亟待遣送回国的日俘和日籍平民 100 多万人。其用意不言而喻：如果没有美国的进一步帮助，中国政府军队无力完成遣送日俘的任务，而魏德迈现在也无法完成继续帮助中国的任务，因为现有的命令限制他继续运送更多的中国军队。为此，他要求军方改变原有命令，授权魏德迈协助中国运送更多的军队，“即便它意味着支持国民党对抗中共”。麦克洛伊在最后还谈到了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可能危害：“将破坏战时所追求的一个统一中国的目标，难以维持有关国际协议所

①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8 月 19 日登陆中国华北，这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唯一一次在亚洲大陆进行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

② 文森特在 8 月 17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告诉文森特，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导致他们放弃华北。”

③ 艾奇逊在 8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告诉艾奇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导致他们放弃华北。”



日俘任务中是偏向国民党政府而反对中共的，表示坚决反对军方更多地介入国共之争，并反对协助国民党政府继续向华北运送更多的军队。为此，他要求魏德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和确认：美国军队为遣送日俘而继续驻扎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你是否认为在没有美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能够首先在华北继而在东北清除日本人？再进一步，你是否相信国民党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地从华北和满洲遣返由俄国人留下来的日本平民？”最后，还要求魏德迈对进一步援助的具体程度和范围、美军撤出中国和继续留驻中国的后果进行评估。当晚，陆军部将上述问题发给了魏德迈，但同时指示在华盛顿没有新决策产生前应当继续原来的使命：海军陆战队继续留驻中国^①。

1945年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12日和10月13日，魏德迈连续发回源封长电。针对贝尔纳斯的问题，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关于遣返日俘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不可能独立完成，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相当大部分的军队以及现成的日本力量来保护交通线并对付中共，再加之由于船只的不足以及中共的军事行动，在现有情况下，如果将100万的日本人成功遣送回国，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对于协助继续运兵北进，他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东北，他认为蒋介石政府完全没有能力接管和控制，为此专门建议对东北实施美、苏、英、中四国的联合托管。魏德迈也多次提到苏联的因素，断言中共受到了苏方的支持，并把中国视为美苏争夺世界的试验场，他说：

“中国代表着东西方间的一道桥梁。当今，由于强大苏俄的出现，中国也自然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国家美国和苏联的政

^① 魏德迈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反对中共接管华北和东北，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建议美国应继续留在华北，以保护交通线并防止中共接管。他还提到，他已向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提交了相关报告，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治和经济竞技场。如果中国变成苏联的一个傀儡国，准确的也就是指中共取得胜利，那么苏俄也就等于实质上控制了欧亚大陆。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控制着这么大一块区域将会危害世界和平。我们曾致力于防止日本将中国变成傀儡国家，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俄国人也得被制止。”

当然，魏德迈也非常明白此中的代价，“如果主张由中国国民党军队统一中国和满洲是美国的政策，那么就必须接受介入一场内战甚至一场可能与苏联的战争，当然美国为此还需要派出远远超过在中国战场上现有的军队”。因此，他一再要求华盛顿当局改变现行的矛盾政策，要么及早撤军，要么重新下达命令，全力支持中国政府恢复对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的控制。就其个人观点而言，魏德迈认为后一种政策难以得到国内的支持，因此提议美国军队应当早日撤出中国^①。

魏德迈关于撤出中国的建议没有得到军方的认可，但是他对东北局势以及苏联政策的分析却引起了军方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们恰好印证了军方对苏联越来越强烈的敌对观念，反而起到了加强支持中国政府的效果。1945年，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向贝尔纳斯递交了一份冗长的联合备忘录，声明美国的一贯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包括满州在内的中国统一，要求国务院制定一项能够保证魏德迈进一步支持中国政府的指导政策。实际上，苏联因素的考虑已经使得军方不再顾虑对于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后果，

① 魏德迈在1945年10月15日写给魏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信中写道：“如果美国主张由国民党军队统一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介入一场内战，甚至是一场可能与苏联的战争。美国为此需要派出的军队数量将远远超过在中国战场上现有的军队数量。因此，我建议美国军队应当早日撤出中国。”



他们已经在蒋介石政府和中共之间作出了选择，提出魏德迈对中国政府控制华北和东北的悲观估计“绝不能够作为美国行动的基础”。对中共军事力量与中国政府军事力量的对比，备忘录断言“据相关可靠情报显示，中共武装的力量和活动被相当大地被夸张”，“被宣传为一场大战的所谓山海关之战，实际情况是国民党政府军队在通过长城时几乎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共产党抵抗”。为此，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陆军部和海军部认为对国民党政府的继续援助和支持，至少等于间接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力量。然而，这种情况绝非是对过去几年来持续政策的改变。如果这种援助要继续通过军方起作用，通过诸如从华北遣送日俘的方式，那么下达给相关指挥官的命令就必须变得更为现实。”^①

为了说服国务院接受其主张，联合备忘录还列举了大量数字，说明在中国需要解除武装和遣送回国的日本人人数和任务都非常巨大。但这恰恰是整个问题的症结，在魏德迈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报告中，多次谈到蒋介石不但不将自己的军队用于解除和遣返日俘，反而全力用于对付中共，甚至还利用现成的日本军队保护铁路及城镇以防止中共的进攻。因此，在第二天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及其主要副手的会议上，当贝尔纳斯谈及联合备忘录的内容时，副国务卿艾奇逊当即指出遣送日俘是牵动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首先，如果能够将更多的中国政府军运送到北方，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在军事后勤方面提供援助？其次，鉴于将日本人送走后中共可能占领这些地盘

^① 原文为：“如果这种援助要继续通过军方起作用，通过诸如从华北遣送日俘的方式，那么下达给相关指挥官的命令就必须变得更为现实。”



取代日本人眼前在东亚的地位”^①。发生在当天午餐会上的另一件事是有人提议派遣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使中国，以弥补赫尔利突然辞职所造成的政治震荡，杜鲁门采纳了该建议，并在当天下午亲自致电说服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他下令国务院迅速拿出一项明确的中国政策以指导马歇尔的中国之行。

赫尔利对国务院的指责以及杜鲁门在午餐会上的表态^②对贝尔纳斯产生了影响。在他的授意下，远东司司长文森特在第二天拿出了一份《中国行动建议方针大纲》，尽管这份备忘录仍然坚持将遣送日俘作为美国在华军队的主要任务，但是它显然接受了军方的部分主张，即美国“准备帮助运送中国军队进入满洲港口以确保中国将之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建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准备协助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致力于迅速复员并遣送在中国北方的日本军队，……在国际层面上承认和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备忘录声明“不能通过军事介入其相互残杀的内战的方式支持中国政府”。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文森特为美国的援助设置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政府军队必须和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其他军事

^① 月念八日，杜鲁门在午餐会上对马歇尔说：“我们应当立即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遣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使中国，以弥补赫尔利突然辞职所造成的政治震荡，杜鲁门采纳了该建议，并在当天下午亲自致电说服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他下令国务院迅速拿出一项明确的中国政策以指导马歇尔的中国之行。”

^② 除了在这一天午餐会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对苏强硬的表态外，他在命令国务院起草中国政策的同时，还授意海军参谋长李海上将另行起草中国政策，李海告诉别人总统不相信国务院。“总统是对的，他支持蒋，国务院这些带红色的人都不可信”。他尽管没有指出贝尔纳斯也属于这些“带红色的”，但认为贝氏也难以“从他的国务院中有共产党倾向的参谋那里完全免疫。”



势力达成停战协议，并召开一个全国会议寻求结束目前的内战局面，备忘录最后写道：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按照上述所言带来和平与统一，那么美国将尽一切可用的方式来协助中国重建国家、实施建设性的方法来发展和提高中国的工农业经济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履行中国在维持和平与秩序方面的国内和国际义务的军事机构。具体来讲，美国将积极考虑给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派遣中国可能需要以及美国能够派出的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顾问、以合理的条件给中国需要的借款和贷款用于发展一个健康的中国经济和发展美中间的健康贸易关系等。”^①

马歇尔对文森特的备忘录很不满意，认为它“不能被公众充分理解”、“会引起严重的误解与怀疑”，在为给魏德迈下达一个确定命令方面“太过模糊”；对国民党运兵行动的任何拖延都只能有利于中共，而最终将使苏联从中获益。于是，在陆军参谋部的协助下，马歇尔对文森特的备忘录进行了重大修改，他实际上重写了整个备忘录，在对李海上将的解释中，马歇尔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十分清楚我们不能将海军陆战队遍布中国，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们必须将他们集中在一些港口以保护我们的登陆地。通过这样的行动，[蒋]委员长将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港口来运送他的绝大多数军队，让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以腾出军队

①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15日给文森特将军的信中，对文森特将军的备忘录进行了重大修改，他实际上重写了整个备忘录。马歇尔在信中写道：“我十分清楚我们不能将海军陆战队遍布中国，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们必须将他们集中在一些港口以保护我们的登陆地。通过这样的行动，[蒋]委员长将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港口来运送他的绝大多数军队，让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以腾出军队”。



接管华北的铁路交通线以替换现在担任护路任务的日本军队。”^①

经过马歇尔修改后的陆军部政策声明，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上变得十分明确：“美国和其他联合国都承认中华民国的现任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根据《波茨坦宣言》：

“美国有帮助中国政府解除和遣返日本军队的明确义务。据此，……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中国政府运送更多的中国军队以使之重建对华北和满洲解放区的控制权”。……这些援助对任何持不同政见势力的附带影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美国的支持不会发展到以美国军事干预作为其解决中国内争的目标”^②。

对文森特奉为援助条件的停战和全国会议，该文件只是表示“美国政府分别呼吁”。这份陆军部政策声明草案的核心就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运兵北进作为首要目标，而将调停国共关系放到了第二位。压力之下，国务院决定折衷，8月18日，由国务院正式提交的《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基本上是以马歇尔的修正稿为基础，除了部分用词上的修正，文森特又特意增加了两段，其中一段对中、苏两国政府都有所指，强调中国有责任消除内部分歧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

① 原文为“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中国政府运送更多的中国军队以使之重建对华北和满洲解放区的控制权”。……这些援助对任何持不同政见势力的附带影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美国的支持不会发展到以美国军事干预作为其解决中国内争的目标”^②。

② 原文为“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中国政府运送更多的中国军队以使之重建对华北和满洲解放区的控制权”。……这些援助对任何持不同政见势力的附带影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除了这些附带的影响，美国的支持不会发展到以美国军事干预作为其解决中国内争的目标”^②。

（原文中下划线部分着重号是著者所加）



国政治统一的取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介入都是不合适的”，美国愿意与英国和苏联政府一起协助中国结束武装冲突。文森特添加的另一段说道：

“为了有助于结束敌对以及拟议中的全国会议能够达成相关临时协议，美国将停止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到诸如华北等区域，特别是当这些调动有碍于军事停战和政治谈判目标的情况下。”^①

也就是说，国务院仍然反对无条件地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向华北运兵的要求。但是，文森特的增减当即引起了陆军部官员的反对，他们提出鉴于满洲的“严重局势”、美国运兵的时机以及暂停运兵可能对中共造成的“好处”等，应当将文森特上述段落“尽数删去”，而另一段也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国务院坚持保留该段，那么美国的政策就应当进行重大修正，老实声明美国试图在‘等着看’，并承认在‘等’的过程中美国帮助中国遣送日俘和保卫解放区的能力肯定会受到削弱”^②。

陆军部和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持续到 8 月 20 日和 21 日的两次会议。前一次由贝尔纳斯、马歇尔、艾奇逊、文森特等人参加，后一次由杜鲁门、贝尔纳斯、马歇尔和李海组成。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仍然是决策者制定中国政策的主要顾虑，在 20 日的会议上，贝尔纳斯强调如果美国不尽快调处国共纷争，“俄国将最终掌控满洲并保持对华北的决定性影响，他的观点是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自己控

① 文森特在 7 月 20 日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为了有助于结束敌对以及拟议中的全国会议能够达成相关临时协议，美国将停止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到诸如华北等区域，特别是当这些调动有碍于军事停战和政治谈判目标的情况下。”

② 文森特在 7 月 20 日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如果国务院坚持保留该段，那么美国的政策就应当进行重大修正，老实声明美国试图在‘等着看’，并承认在‘等’的过程中美国帮助中国遣送日俘和保卫解放区的能力肯定会受到削弱。”



制满洲，那么俄国人出面接管将是唯一的可能”。7月1日的会议主要还是围绕军方和国务院的分歧进行讨论，并最终对双方的建议进行了折衷：即海军陆战队继续留驻中国并协助政府军队处理日俘问题；授权魏德迈动用美国海军和陆军力量继续协助中国政府向东北运送军队及其后勤援助；为了遣送日俘，继续准备援助运送更多的中国政府军进入华北。前两项行动均无争议，但第三项却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如果因为中国政府的原因使得马歇尔的调停失败，美国应当怎么办？关于该问题，在7月1日7月1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将撤销对蒋介石所允诺的一切帮助，并在遣返日俘问题上“直接与共产党进行交涉”^①。然而，在7月1日和杜鲁门总统的商讨中，马歇尔却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本政府将不得不忍气吞声”继续帮助中国政府军进入华北，“总统和贝尔纳斯先生都对此表示赞同，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继续支持魏德迈委员长，协助他将军队运送到华北以完成遣返日本人的任务”^②。尽管如此，同时参加会议的李海上将的记录却颇为不同，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总统告诉我他对国务卿贝尔纳斯昨天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的惊讶和不满”^③。而根据贝尔纳斯在7月1日会议中的表态，可以推测出他在7月1日的会议中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即如果蒋介石政府阻挠调停，美国将撤销对他的一切帮助，其中包括所有的军事和民用贷款、供应以及建立军事顾问团等。这当然是引起杜鲁门不满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中国国共之争持客观与不介入态度的国务院已经成为决策部门中的异类。实际上，

① 贝尔纳斯在7月1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表示，如果蒋介石政府阻挠调停，美国将撤销对他的一切帮助，其中包括所有的军事和民用贷款、供应以及建立军事顾问团等。

② 马歇尔在7月1日和杜鲁门总统的商讨中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本政府将不得不忍气吞声，继续帮助中国政府军进入华北，以完成遣返日本人的任务。

③ 李海上将在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国务卿贝尔纳斯昨天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的惊讶和不满。



自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已非仅仅局限于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国和运送政府军队进驻华北和东北，在中国政府的外交要求下，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积极策划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延长对中国的租借、延长中美合作所等等办法以加强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战斗力^①。

美国决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底线在 1945 年 1 月杜鲁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再次得到确认，马歇尔的谈话记录这样写道：

“我声明我明白给我的指令当中有一段没有写成书面文字，但我认为自己对他 [杜鲁门] 的想法有着十分清晰的理解，即在我不能确保委员长采纳我认为是合理与可行的必要行动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然必须通过我，根据美国政策已经宣布的政策条款，继续通过蒋委员长支持中华民国的民国政府。总统声明我的上述言论是对他的指示在出现局势新发展情况下的一个正确总结。副国务卿艾奇逊先生也确认了他对我的指令的同样理解。”^②

就这样，很大程度上由于军方的参与和要求，在苏联红军驻军东北的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也以协助受降和遣返日本军队为由登陆华北，积极协助中国政府运兵进军东北。美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决策者对抗苏联的意识。反过来，他们的行动又直接影响到了东北苏联红军的行动，实际上，就在美国当局决定全力以赴地协助中国政府运兵北进的时候，苏联也开始拖延如期撤军。于是，围绕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在 1945 年中下旬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上，美

① 资中筠对这三个方面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见《追根溯源》，第 140-143 页。

② 资料来源：《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 140 页。



苏两国外长发生了一场正面交锋。

莫斯科外长会议的交锋

根据雅尔塔会议规定，苏美英三国外长每隔一个月的时间要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以探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之后，三国外长分别在旧金山（源月）、波茨坦（苑月）和伦敦（怨月）^①进行了会晤，会谈结果并不乐观，特别是伦敦外长会议，主要围绕日本的战后管制问题，苏美两国的分歧非常突出，以至于会议连一份公报都难以达成，最后还是在美国授意下由中国外长王世杰宣布闭会^②。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贝尔纳斯在 苑月 圆日致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呼吁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三国外长会议，得到了后者的赞同^③。一周后，贝尔纳斯提出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在 愿个要讨论的题目中，他列出了两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即第 缘点的“缴械和遣返北部中国^④的日本军队”和第 远点的“将东北的控制权交还中国政府”。对于前一条，贝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电文中解释为“让苏联方面明白我们在华北驻军

① 与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非正式三国外长会议有所不同，怨月 园月份在伦敦召开的是根据波茨坦会议建立的外长委员会（即波茨坦会议委员会），其任务是完成波茨坦会议的未竟事宜，主要包括战后欧洲的和平条约，中国和法国也参加了该会议，中国代表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② 哈里曼：《特使》，第 缘页。王世杰自 苑月 缘年至 苑月 愿日离开重庆参加外长会议，日记中有较多记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员- 员页。

③ 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回忆录》，第 员- 员页。

④ 这里的英文表述是“Northern China”，实际上是指华北，但由于后来莫洛托夫提出是否包括东北的质疑，故直译为“北部中国”。



释所谓“解除日本武装”并不包括中国东北地区^①。

8月15日，在三国外长会议的首次正式会议上，莫洛托夫向美方发难，他手执哈里曼转交的信件，宣称美国不愿意讨论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贝尔纳斯立即反驳，表明美方愿意讨论从所有独立国家撤军的问题。莫氏顺水推舟，当即提出将美国从中国、英国从希腊以及从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撤军的问题都纳入正式议题，与此同时，他又提出鉴于苏联和中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从东北撤军的有关协议，建议将贝尔纳斯方案中关于东北控制权交还中国的第12条从正式议案中删去。莫氏这种将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与美国在华驻军以及美英从世界各地的撤军直接挂钩的建议使得美方感到为难，贝尔纳斯立即示弱，表示他之所以将东北问题纳入正式讨论议案，“不是为了讨论苏联军队的行动，而是旨在纯粹得到一些关于满洲形势发展的信息”。他接着表示不应把从希腊、伊朗和印尼撤军的问题纳入正式讨论议程，同时对莫洛托夫将东北问题从正式讨论议程中删去的建议不得不予以默认。由此，在会议的正式讨论议题中，有关中国问题仅只为第四条“解除华北日本军队的武装并将之遣返日本”^②。

从正式议程中删掉东北问题是苏联外交的胜利，但贝尔纳斯并未放弃督促苏联主动谈论东北撤军的目标。当日下午，贝尔纳斯将杜鲁门总统在15日发表的中国政策声明以及自己对美国驻军华北的目的与现状的说明交付苏联和英国外长。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又主动对美国在华北驻军的情况进行了说明：目前华北的美军有15万人，日军15万，其中一半已被解除武装，但由于缺少船运设施以及中

① 裁减军备总委员会第11号决议规定，日本在满洲国的军事力量应限于维持治安和警察目的。莫洛托夫在1945年8月15日三国外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援引了这一决议，并声称苏联政府已同意在满洲国实施这一决议。然而，莫氏在会议中却故意曲解了这一决议，声称苏联政府已同意在满洲国实施这一决议，但这一决议并不包括中国东北地区。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裁减军备总委员会第11号决议明确规定，日本在满洲国的军事力量应限于维持治安和警察目的，这显然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

② 莫洛托夫在1945年8月15日三国外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将美国从中国、英国从希腊以及从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撤军的问题都纳入正式议题。然而，莫氏在会议中却故意曲解了这一提议，声称苏联政府已同意在满洲国实施这一决议，但这一决议并不包括中国东北地区。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裁减军备总委员会第11号决议明确规定，日本在满洲国的军事力量应限于维持治安和警察目的，这显然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



国共双方的冲突,上述两项工作进行得都十分缓慢,为此,杜鲁门总统还特意派遣马歇尔出使中国,力促调停中国内部冲突,有助于上述任务的早日完成,使得美军早日撤离中国^①。在 1945 年的首次非正式会谈中,他再次挑起话题,声明“会议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猿人讨论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形势,以确保互相了解对方的行动”,并提及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会议关于归还日占中国领土的政策和斯大林对不支持中共的承诺等等,在说明美军驻扎中国华北时,贝氏言及中国政府急于向东北派遣军队而无暇顾及华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将其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华北。”对于贝尔纳斯的用意,莫洛托夫心知肚明,实际上,他已经在 1945 年 9 月 15 日的说明交给了前者。但此时贝氏将华北美军与东北苏军的因果联系使之难以保持沉默,他首先解释了中方两次要求延缓撤军的请求,“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请求,苏联的军队现在已经撤出了满洲。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撤出了南满。”他话锋一转,表示对贝氏言及在中国华北仍然存在 100 多万未被解除武装日军的事实感到惊讶和不解,“在投降 3 个月后仍然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是非常不正常”和“难以容忍的”^②。10 月 1 日,莫洛托夫再提交一份备忘录尖锐指出,大量拥有武装日军的存在违反了盟国间有关投降条款的规定;其次,美方关于驻军华北以解除和遣散日军和恢复中国国内稳定的说明令人生疑,一则“解除日军武装和从中国撤出美军的日期没有声明”,二则“与此同时,据悉部分日军已被运用到中国政府对非

① 1945 年 8 月 14 日,杜鲁门总统在致国共两党的声明中,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并呼吁国共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同日,杜鲁门总统还向国共两党发出呼吁,要求双方停止内战,并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同日,杜鲁门总统还向国共两党发出呼吁,要求双方停止内战,并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② 1945 年 10 月 1 日,莫洛托夫在致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大量拥有武装日军的存在违反了盟国间有关投降条款的规定。他同时指出,美方关于驻军华北以解除和遣散日军和恢复中国国内稳定的说明令人生疑,一则“解除日军武装和从中国撤出美军的日期没有声明”,二则“与此同时,据悉部分日军已被运用到中国政府对非



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之中,也就是说,日军已被扯进中国人民的内部斗争中。”按照麦克阿瑟 员号令,华北受降应当由中国政府军队接收,“该区内解除日军武装的任务不应授予任何外国军队。”鉴于双方都有军队在中国的事实,备忘录最后提议:

“苏联政府认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达成一项理解是正确的,即他们同时从中国撤军,并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确保不晚于 1946 年 1 月中旬之前完成。”^①

莫洛托夫的这一建议将贝氏置于困难境地并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在 1 月 10 日的会谈中,他表示“美国已经做了它能做的一切,自己也对莫洛托夫详细解释了一切”,诸如美国在华北驻军的目的在于恢复中国的国内稳定,而只是解除那里的日军武装并将之遣返回国。尽管贝氏也承认华北受降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但鉴于蒋介石的能力和请求,美国决定不能袖手旁观,“说到最后,如果中国政府无法完成该任务,美国就会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完成”。但莫洛托夫对之听而不闻,一口咬定只想知道双方同时从中国撤军的“确定日期”,表示“美国军队在中国华北的出现是一个新发展,苏联政府与中国签署协议时未曾考虑到这一点。”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当莫洛托夫再一次询问“确定日期”时,贝尔纳斯干脆调侃莫氏之所以反复询问同一问题“仅仅是因为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莫氏不乏幽默,但依然执著:“贝尔纳斯先生的声音是很甜美,但如果能说出一个同时撤军的日期就

① 莫洛托夫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的会谈中,表示“美国已经做了它能做的一切,自己也对莫洛托夫详细解释了一切”,诸如美国在华北驻军的目的在于恢复中国的国内稳定,而只是解除那里的日军武装并将之遣返回国。尽管贝氏也承认华北受降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但鉴于蒋介石的能力和请求,美国决定不能袖手旁观,“说到最后,如果中国政府无法完成该任务,美国就会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完成”。但莫洛托夫对之听而不闻,一口咬定只想知道双方同时从中国撤军的“确定日期”,表示“美国军队在中国华北的出现是一个新发展,苏联政府与中国签署协议时未曾考虑到这一点。”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当莫洛托夫再一次询问“确定日期”时,贝尔纳斯干脆调侃莫氏之所以反复询问同一问题“仅仅是因为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莫氏不乏幽默,但依然执著:“贝尔纳斯先生的声音是很甜美,但如果能说出一个同时撤军的日期就



更甜美动人了”^①。

贝尔纳斯对美国在华北驻军目的之解释确难让苏联政府理解。实际上,不管怎么解释,他都难以使得苏联人相信他的说法。在当晚与斯大林的会晤中,后者也质询美国“不愿意从华北撤军”的原因,并表示苏联无意反对美国驻军,只是认为此举反而不利于帮助蒋介石政府^②。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华北,也许一位亲身参加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表述更为准确:

“在去华北途中,我们被告知是去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在我们抵达之前,中国人已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后来甚至重新武装了一些日军部队,以加强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最近,我们被一再告知,我们长期留在这儿的原因是代替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军队扼守这一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待在这儿是为了保护蒋将军的利益,以防范可能爆发的共产党造反。我们在这儿做的每件事情的直接目的或间接目的,都是为了压服共产党人。”^③

莫斯科外长会议最终发表了一份围绕中国问题的笼统声明,双

① 转引自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 15 页。

② 转引自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 15 页。同贝尔纳斯的哈里曼对此亦有感慨,“哈里曼那个晚上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倒不是斯大林继续不断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嘲弄而是蒋的明显的虚弱。这时候他觉得,这位委员长由于把大量军队放在华南,在满洲和华北留下一个真空,让毛的共产党人在同俄国人合作下称心如意地去填补。”见《特使》,第 15 页。

③ 转引自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 15 页。



方在表面同意“需要一个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的统一、民主的中国；需要各民主力量广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部门；需要停止内战”，在重申不干预中国内政原则的同时，双方也各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公开宣称自己的驻军是源于中国政府的要求，声明在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及早从中国撤军等。对于这份声明，美国外交官柯乐布认为它“使得一件事情完全清晰可见：带着老牌列强式面目的争斗在中国卷土重来”^①。至此，围绕东北问题，美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中的交锋显然受挫，贝尔纳斯原本想以自己在华北驻军问题上的主动换取苏方如期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承诺，或至少将东北问题拿到桌面上加以讨论。但最终却使自己在解释华北美军时不得不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加以肯定^②。一位学者为此指出这是贝尔纳斯“小小的外交失败”，因为最终的公报声明“把在华美军的地位放到与在满洲的苏军相等的水平上”，由此为苏联政府后来谴责美军在华存在提供了借口^③。

结 语

1945年夏秋，影响中国未来形势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莫过于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和两个月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尽管双方的直接原因都在于协助中国的对日战争，但谁也难以掩盖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按照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说法，苏联“以极小的代价恢复了沙俄时代在满洲曾经享受的绝大多数优势”^④。不仅如此，在其占领期

① 故 国 之 声 援 会 在 美 国 政 府 官 报 上 公 布 的 声 明 中 提 到 美 国 政 府 在 中 国 的 政 策 是 以 中 国 人 民 的 利 益 为 依 据 的 。

② 阮 英 生 著 《 中 国 内 战 的 国 际 背 景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1981 年 出 版 。

③ 邹 说 《 美 国 在 中 国 的 失 败 》 第 100 页 。

④ 悦 读 与 内 战 第 100 页 。



间,他们还对中国东北的经济进行了系统的破坏、掠夺和拆迁,使得东北的整体经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体现了苏联赤裸裸的利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就美国而言,协助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海空大抢运”、派驻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协助国民军队进入东北、延长驻军中国的时间以及马歇尔来华调停等等,无不在于将中国政府视为其战后重要东亚盟友,并以此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一起实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目的。

美苏两国驻军中国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不是单向的,恰恰相反,他们相互影响并互为因果。从上述美国政府关于海军陆战队的决策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在诸多美国军方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者对苏联的判断和定性,是他们对华决策的主要依据和动力。对苏联而言,美国因素具有同样的作用,实际上,对美国全球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判断,同样是苏联决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影响,围绕中国的东北问题,美国、苏联、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三国四方上演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明争暗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五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穴雪

1945年 8月 15日

1945年 8月中下旬，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两周后的苏联红军迅速控制了整个东北。但他们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及时撤军，而是一面加强对东北进行经济掠夺，一面对中国政府的东北接收制造重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苏军的这种政策来源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以及东亚政策的基本判断与反应。由于伦敦外长会议、美军登陆华北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等因素，苏军从一开始就鼓励中共进占东北并以此制衡国民党政府的接收计划。这样，苏军在东北的出现同时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提出了不同的机会与挑战：重庆方面的目标是希望苏联履行自己在中苏谈判中的诺言，将整个东北毫无条件地交还中国政府并按时完成撤军；对中共来讲，苏军在东北的暂时留驻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发展一块战略要地的大好时机；美国的目标是希望苏军在东北不要妨碍美国的在华利益与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并尽力协助中国政府敦促苏军早日撤军，以免苏联在东亚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为此，以苏联驻军为焦点，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展开了一场相互牵制与影响的军事与外交角逐。



国民党政府的东北接收

国民党政府对战后收回东三省可谓用心良苦。中苏谈判之如此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围绕东北的斗争。正如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要求相关部门批准中苏条约时所言：中国政府在承认外蒙独立以及旅顺大连等让步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收回东三省。在正式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系列文件中，除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和旅顺等协定外，双方还专门签署了《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以及《中苏谈判苏军参战后由中国领土撤退之记录》，前者规定中国政府派员在苏军收复的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并行使管辖权，派遣军事代表团进驻苏军司令部负责联络军事接收事宜；后者确认斯大林承诺在日本投降三星期内开始从东北撤军，而且“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①。国民党政府中许多人将之视为中苏条约的最重要成果，“此约之订立，虽使吾人对于实际上已脱离中国统治二十余年之外蒙不得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得不自东三省撤退”，甚至有人因此将王世杰称为东三省的“救星”^②。

为了确保顺利接收，国民党政府首先着手东北的机构组建。愿月底，愿月初，蒋介石下令将东北地区重新划分为愿个省，任命熊式辉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下设政务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熊式辉兼任政务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由张嘉璈担任，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同时还任命了愿个省的政府主席、大连和哈尔滨两市市长以及各省市的军事、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教育等部

①《中苏关系卷》，第 缘缘- 远园页；《战后中国》（一），第 圆四- 圆原页。

②王世杰，愿缘年愿月 圆四 圆五 圆六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 员员- 员苑- 员缘页。



门主要负责人。怨月中上旬，这些军政人员集中北平等待时机进入东北^①。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紧对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活动，一方面争取美国协助运送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另一方面积极催促苏联当局早日拟定撤军计划并允许中方派人进入东北展开接收工作。然而，进入东北一月有余的苏军都迟迟不见回应，致使蒋介石大起疑心，他在怨月愿日的日记中写道：“俄人演至今犹未许我政府派员前往东北，准备接收国土，俄国是否践约守信，谁亦不能保证”^②。直至 愿月 员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才正式表示苏联将依照条约按时撤军，主力部队将于 愿月中下旬开始撤军，并计划在 愿月底全部撤出；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苏联东北占领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全权代表，于 愿月 员愿日在长春与中方进行撤军谈判^③。国民党政府立即回应，外交次长甘乃光（外交部长王世杰正在出席伦敦外长会议）当即告诉彼得罗夫中国政府军队将于本月 愿日左右乘坐美国军舰从香港九龙到大连登陆，请苏方予以协助。与此同时，甘乃光还下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将该消息“电转苏联政府，另饬该地区苏联部队知照”^④。但是，彼得罗夫却当即以大连为商港、军舰进入有违条约之借口加以拒绝。彼得罗夫的答复决非个人意见，苏联政府显然早有准备。一周后，驻苏大使傅秉常也转来了苏联外交部的同样答复：

^① 《战后中国》（一），第 源苑- 源苑页；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员缘年 愿月 愿日版，员缘年 愿月 愿日第 愿次印刷，第 源苑页。

^② 《总统》卷五（下），第 愿苑页。

^③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为苏军撤退事面陈宋子文院长照会》，员缘年 愿月 员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源苑页。

^④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告我军登陆大连照会》，员缘年 愿月 员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覆军令部告国军海运大连经通知苏方电》，员缘年 愿月 员日；《外交部为国军登陆大连事致莫斯科傅秉常大使请洽告苏方电》，员缘年 愿月 员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源苑- 源苑- 愿愿- 愿愿页。



“按照中苏条约，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因其违反中苏条约”^①。

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对能从苏联手中顺利接交东北完全抱有信心，但苏联这一无理刁难还是“出乎中国政府理解之外”。1945年12月19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专门召见彼得罗夫，对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军队登陆大连“系违反中苏条约”发出抗议^②。他认为苏联这一政策的起因“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日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王世杰刚刚结束伦敦外长会议返回重庆，对美苏分歧十分了解。在几天后向参政会报告外长会议时，明确指出“美苏关系之恶化，使我国今后外交工作日趋困难”。显然，苏联在东北采取刁难中国政府 and 协助运兵的美国政府就因此而起，因为在外长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苏方曾数次与中国协商，希望中方赞同苏方关于共管日本的建议，但中方对此一直不报积极态度，反而在诸多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③。

1945年12月19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率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以及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等飞抵长春，并于当天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交谈，后者表示中国军队可以在安东、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苏方将给予协助并允许中方先派人赴三处视察等，

① 《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2月19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4页；《洛索夫斯基关于国民党派一个师乘美舰前往大连事宜与傅秉常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2月19日；《彼得罗夫关于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地区调动问题与甘乃光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2月19日，《苏联解密档案》。

②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之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2月19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4—155页。

③ 王世杰 1945年12月19日、12月20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54—155页；《米克拉舍夫斯基就在华日军投降和成立远东委员会等问题与王世杰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9日，《苏联解密档案》。



在提供交通工具方面,也“原则表示同意”^①。但是,在第二天双方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当中方再次提出从海上运兵东北拟在大连、营口、安东、葫芦岛等地登陆;为空运少数军队而在沈阳、长春等城市设立航空站;请苏方在恢复东北交通、协助中方接收人员前往有关省市实施接收以及提供车辆、飞机以及轮船等交通工具等要求时,马林诺夫斯基除了重申在 1945 年 10 月 1 日全部撤出中国境内的承诺之外,没有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作出具体答复:关于大连登陆,他声明应由两国政府加以解决,安东地区不在他的管辖区内无法回答;对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他勉强表示同意,但同时强调中国政府军应从铁路进入东北;对设立航空站以及中方人员赶赴各地行政接收等都“须请示莫斯科”;对恢复交通以及提供交通工具,均表示“无力帮助”^②。马林诺夫斯基态度转变的原因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相关指示,苏方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中方人员的极大忧虑和担忧,实际上,在会谈之前,马林诺夫斯基还告诉蒋经国在东北发现了从事破坏苏军运输线及其军事设备的“中国秘密组织”,要求中方设法阻止。参加会谈的蒋经国与张嘉璈都明确感到了苏联方面的不合作,“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对于经济问题避而不谈,恐是拖延作用”,“无积极援助之意……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③。

①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 年 10 月 10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505 页-506 页。

②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十月十三日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谈话要点》，1945 年 10 月 1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505 页-506 页；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0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 505 页-506 页。

③ 《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之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 年 10 月 10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505 页-506 页；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0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第 505 页。



实际上，双方的首次接触很不愉快，据张氏日记所载：“行营既不自由，无法与当地工商界人士及经济事业机关主管接触，直同身处异国”。在行营举行第一次“临时汇报”上，大家“对于俄方态度与俄军行为，莫不表示愤慨情绪”^①。

马林诺夫斯基会后声称要回莫斯科请示，由此将第二次会谈安排在源天之后。在此期间，彼得罗夫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声明苏方反对中国政府军队从大连登陆^②。大连是通向东北最便利与快捷的路径，中国政府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员远日，蒋介石下令外交部和东北行营务必坚持大连登陆，“运兵计划应准备海运与路运并行。海运决不能以苏方阻止大连登陆而停止。……吾方认定海运部队必须在大连一港入口也。此应坚持到底”^③。因此，在员远日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熊式辉再次郑重提出大连登陆事宜（而不谈营口与葫芦岛）以及空运宪兵与警察派驻各大城市、由行营收编组织保安队维持治安、派员视察各大城市准备行政接收、先行接收伪满政府、日本政府所经营以及与中国私人合营之工业等要求。像上次一样，马林诺夫斯基只是重复苏军在员远月猿日（而上次是员远月猿日）撤出中国边境的计划，对中方的其他要求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大连登陆问题避而不谈，只表示同意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依然鼓励中方从陆路进入东北；对空运军队入城的要求，表示只能在苏军撤退时办理，少数宪兵可在苏军撤退前四五日内办理；对组织保安队，表示须向莫斯科请

①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员远年 员远- 员远月卷，第 圆页。

②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外交部长甘乃光反对我军登陆大连照会》，员远年 员远月 员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第 员页；员远年 员远月 员日，中国政府关于布署军队问题给驻苏大使馆的通报，员远年 员远月 员日，《苏联解密档案》。



示,而对日人所办之工厂,马氏则声明均视为苏联军队的战利品^①。

蒋介石决定在大连登陆问题上亲自出马, 1945年8月15日,他约见彼得罗夫,重申中国大连登陆的决心,要求后者“尽可能快地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本人转达他的关于积极解决大连港问题的请求”,他还甚至提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租给我们几艘轮船用于运送中国军队到满洲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将不胜感激”^②。同一天,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三次会谈,“告以中央政府坚决主张在大连登陆”,并请后者转告莫斯科。马氏建议熊式辉回重庆重新商议。1945年8月16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与苏军副参谋长会谈,再提大连登陆,而且还要求在大连设立航空站并派人前往视察等。中方在大连登陆问题上的一再催促不但没有引起苏方政策的改变,反而强化了苏方的反感与对既定政策的坚持,第二天,苏军副参谋长正式回复董彦平,不但拒绝中国军队登陆大连,对设立航空站和派人视察等也一并回绝^③。1945年8月17日,彼得罗夫也通知蒋介石,斯大林反对大连登陆,认为“无异破坏同盟条约”,蒋介石当场指出“大连乃我国领土,如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乃真破坏条约也”。但他最后还是“不愿以条约与法律对尔争执,将条约与法律问题避而不谈,而仅与斯大林以个人关系,及同盟互助精神,要求史曷斯大林准予我军在大连登陆也”^④。苏方没有再作进一步回答,但第二天却以东北地方报纸《光复报》登载斯大林身体健康欠佳为由,武力搜查了国民党设在长春的吉林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特

① 张嘉璈 1945年 8月 15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第 244-245页。

② 王世杰 1945年 8月 15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 447页;《总统》卷五(下),第 281页;《杂记》(《彼得罗夫与蒋介石就调动军队问题举行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 8月 15日,《苏联解密档案》)。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第 244-245页。

④ 蒋介石 1945年 8月 16日日记,《总统》卷五(下),第 281页。



派员办公处，拿走了所有的档案文件和款项，并拘捕多人进行传讯，之后明令禁止一切活动。接着，苏方又告知行营暂停业已同意派人前往热河等地的采购计划。1945年10月10日，又通知行营派往各地的调查人员“均不能去”^①。1945年10月15日，苏方向行营提出抗议，表示自行营人员来长春后，东北各地相继发生武力反苏事件，并有“打到莫斯科去”等反苏宣传口号，因此苏军决定实行其军事行动期间之最高权，禁止“行营人员赴各地考察”。此外，“昨今二日苏军并在长春郊外作大规模之演习，长春警察局长亦改派共党接任，本党党部亦被封闭，日内恐将借执行最高权力之名，限制行营活动及检查邮电”^②。苏方官员“态度之骄，架子之大，实在难受”。之后，包括马里诺夫斯基在内，时常以各种借口回避或拒绝与中方会面。到1945年12月底，“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③。

苏联态度的变化引起了蒋介石的担忧，权衡之下，他不得不放弃大连登陆计划。1945年10月10日，他指示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军改由葫芦岛和营口登陆。“苏联已在坚拒国军自大连登陆，显系有意阻挠我接收东北，为争取时效，乃自动提议，在未商谈妥洽以前，国军暂不在大连登陆。”实际上，早在1945年10月10日他就已经下令空运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不必接美军之防务，并将此军准备于本月抄由铁路经山海关，先入东北接防也。”^④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第 254-255 页。

②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 10月 15日；《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苏军限制我行营活动函》，1945年 10月 15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153 页。

③ 蒋经国 1945年 10月 10日日记，《东北交涉日记：五百零四小时》，载《战后中国》(一)，第 254-255 页。

④ 《总统》卷五(下)，第 252 页；《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 252 页。



大连问题只是苏联意图的一个反映,实际上,他们已经决意阻挠蒋介石接收东北。尽管 1945 年 9 月 18 日彼得罗夫通知在东北的苏军已同意协助在营口和葫芦岛的登陆,但前一天准备到葫芦岛进行登陆侦查的国民党先头部队却遭到射击并被迫撤回青岛,这显然是苏联所为^①。同一天,马林诺夫斯基转告熊式辉,苏军只能保证营口的登陆安全,葫芦岛由于苏军数量太少而无法给予同样的保障。对中方先行派人登陆两处准备工作的要求,他表示“须请示莫斯科再答复”。此外,对行营编组地方保安队、空运部队至沈阳和长春、对其他地区的行政接收等,要么设置困难,要么借口请示加以搪塞^②。实际上,中苏双方都明白营口水浅不能进驻大型军舰,只有葫芦岛才能完成大规模登陆。因此,蒋介石在得知苏方不能确保葫芦岛安全登陆后焦急万分,下令熊式辉再次郑重交涉:

“必须要求其在葫芦岛应尽同盟义务负安全之责,我军方能安心登陆,否则如能允我在大连登陆,则我未得苏联同意以前,不托任何第三国军舰进入大连港口,此点可先声明,不然葫芦岛既不能安全登陆,而大连登陆亦未得苏方洽议,营口大运舰又不能入港,则我军势不能如期由海道进入东北接防。……中拟本日约苏使面告其原因,要求其政府与苏军仍在葫芦岛负安全登陆之责也。”^③

①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告共军占领葫芦岛国军折回青岛电》,1945 年 9 月 1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 页。

②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 18 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要点电》,1945 年 9 月 1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4-155 页。

③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告务须要求苏军在葫芦岛负安全登陆之责电》,1945 年 9 月 1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5 页。



蒋介石深知接收东北只能依靠苏联的合作。因此,针对苏联政策的恶化,他严格要求有关人员小心应付,杜绝给苏联更多的借口。针对苏军查封吉林省党部一事,他下令“东北所有党部人员,一律归该主任熊式辉负责指挥监督,如有不守纪律,违反政策,及有反苏言之人员,应作反动分子取缔,此时各地党部应一律停止活动可也”^①。与此同时,他还将在长春发表公开反苏言论的接收大员齐世英调回重庆,并告诉熊式辉和蒋经国,“在长人员不准有反苏言行,否则一律勒令送回重庆”^②。8月1日,他鼓励备感气馁的蒋经国“竭力忍让,以期获得妥协,使我东北接收乃能顺利进行也。此时只可以尽我人事之力,至于成败利钝,惟有听诸天命,但公义正道之努力决无失败之理,此可深信,故不必以经过之艰危挫折为意也”^③。同一天,他又下令准备到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部队“对于友军,军事演必须密切联络,尤须忍耐戒慎,不可发生误会”。^④

但蒋介石的“忍耐戒慎”并不能改变苏方阻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的既定政策,8月2日,当中国军队营口、葫芦岛登陆准备就绪时,马林诺夫斯基突然通知:

(一)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已由锦州进入营口,苏军因力量过小,已由营口城退出,故今后对于我军在营口登陆事,不能负责;

①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8月1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2页。

②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受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载《文史资料》第198辑,第152页。

③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出本公义正道而努力不必以艰危挫折为意电》,1945年8月1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2页。

④ 《蒋委员长致何应钦总司令并转杜津明司令长官令飭登陆接防部队务必忍耐戒慎电》,1945年8月1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2页。



(二)葫芦岛亦被十八集团军所占,苏军已经退出;

(三)苏军自本月十日起,即由南向北撤退,至撤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①。

苏军的这一答复实际上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再次放弃营口和葫芦岛的登陆计划。苏军此举显然有意而为之,因为按照苏方通知中国的撤退时间表,苏军从该地区的撤出时间应当是 8 月 15 日,而现在却在未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上述两地撤军。熊式辉十分不满,双方在会谈中针锋相对,相互质询何谓“中苏友好精神之表现”,谈判“几成僵局”^②。至此,中国政府军通过海运直接登陆东北的计划完全破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策划的空运和陆路运兵计划也同样遭到了苏方的重重阻碍。在空运方面,中方在 8 月 15 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在长春、沈阳和哈尔滨设立飞机航空站,但苏方则表示须请示莫斯科。第二次会谈时,中方要求空运一部分军队到长春配合行营维持治安,苏方表示须等苏军撤离后方可进行。在 8 月 16 日的第四次会谈中,中方再次提出空运地面准备人员,要求苏军在撤退前 7 天允许中方空运人员着陆,但苏方坚决拒绝派遣地面准备人员,表示中方着陆在苏军撤离前一两天尚有可能,但 7 天则必须请示莫斯科^③。8 月 16 日,

①《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籍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1945 年 8 月 15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8 页。

②蒋经国 8 月 15 日日记,《东北交涉日记:五百零四小时》;《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十八集团军进占营口等事至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备忘录》,《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 年 8 月 15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8-159 页。

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 年 8 月 16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9-160 页。



苏方通知行营,空运部队可在苏军撤退前 源天在长春降落。之后,双方在具体的天数方面又多有交涉,直至 员月 员日,苏方正式就空运问题作出答复:中国空运部队可自 员日在沈阳起降落、 员日在长春降落,而且“驻地须由俄方指定”,并且每次只能降落一架飞机等。然而,两天后,行营却发现长春机场出现了大量的中共部队并“布置齐全”^①。空运计划就此夭折。在陆路运兵方面,中国政府在 员月 员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已经提出,但对方却表示要进一步请示。第二次谈话中马氏答应了中方关于苏方协助修整山海关到锦州铁路的要求,然而 员日的第三次会谈又生变化,声称苏军无力修复锦州以南的铁路,而且对政府军队的安全亦无法保证。 员日的第四次会谈中,熊式辉声明中国陆军将在 员月 员日前出山海关进军锦州并要求排除障碍,苏方表示不能负责,但是在 猿日与蒋经国的会谈中,马氏却明确表示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驻有中共部队,希望政府军出关后能避免与之冲突^②。

至此,国民党政府从海、陆、空三个方面进兵东北的计划都由于苏方的刁难而严重受挫,而此时孤立在长春的东北行营连自身安全都难有保障。但苏方继续刁难, 员月 员日,苏军政治顾问又通知蒋经国,苏军在查封的国民党党部得到有关证据,表明党部组织地下军十万余人“破坏交通,袭击苏军”,他由此“警告”行营“不能组织地方部队”。依照熊式辉和蒋经国的判断,苏军“用意不外防止行营收编地方部队,便利他方面着手吸收”^③。同一天,东北行营遭到当地群众的示

① 蒋经国 员源年 员月 员日日记,《东北交涉日记:五百零四小时》,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圆- 员圆页。

② 蒋经国致蒋介石,《总统》卷五(下),第 员缘- 员页。

③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军政治顾问与蒋经国特派员谈话内容电》, 员源年 员月 员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圆- 员圆页。



威反对，同时在长春郊外的大屯机场和长春市内都发现了中共武装部队。袁日，王世杰约见彼得罗夫，通报上述情况以提请苏方注意。彼得罗夫对此未置可否，不但对中方关于营口被占和长春出现中共的抗议以及“使中国政府派兵进入东三省接防发生重大障碍，今后如何办理，我政府正在考虑中”的警告置之不理，反而继续表示中方不能多运军队进入长春，坚持“中国空运长春等地部队，以宪兵、警察为限”^①。第二天，驻守行营的警备力量被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缴械，行营受到包围，自来水和电话被切断，中共甚至要求派人进来谈判^②。东北形势如此恶化，以至于东北行营宣慰使兼中长铁路副监事长的莫德惠认为此时东北的险恶“几等于九一八之前的状态”，建议“必须先即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东北，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③。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铤而走险，从长春撤出东北行营。这种办法早在袁月缘日苏方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出现反复时熊式辉就已经提出，建议“重行考虑”整个接收政策，蒋经国虽然坚持“为大局计，……决不可轻易放弃”，但也认为“确已至无可再忍之地步”，蒋介石更是认为苏联已根本无意履行条约及协定的义务：

“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扼住吾人之咽喉，使稍有呼吸之间隙，当事未到着手之时，则其言如蜜，悦耳动听，既到其时，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营口，先诺而后皆背其约，籍口已有中共部队到达，彼乃临时撤退，不能保全安

①《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纪要》，袁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缘- 员缘页；《总统》卷五（下），第 愿页。

②《万毅将军回忆录》，第 员缘- 员缘页。

③张嘉璈 袁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缘页。



全交防，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彼后对东北之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①

愿日，他一方面决定将登陆地点从营口、葫芦岛改在华北的大沽口和秦皇岛，然后由山海关强行进入东北，“苏联如不能负责交防，则我之最后一着，便只有宣告撤出长春行营，使其不能推诿责任。”另一方面下令行营主要负责人返回重庆商议对策，并将空运部队进驻长春作为“接收东北之最后办法”和最后希望^②。然而，几天以后，蒋经国在长春市和飞机场发现了中共部队，空运计划完全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最终决定撤出东北行营。愿日，他致电蒋经国表示尽管不反对继续与苏军进行周旋，甚至可以向苏方表示“非欲在东北建立强大武力”、“空运长春部队仅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度”、“东北政治，各县可用自治方式，组织民选政府”以及“东北经济合作决与苏联合作”等尝试，但他还是决定“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路进入东北”。同时指示对苏联“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③。愿日，中国外交部正式照会苏联政府，表示因为“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种种阻碍，……以致东北行营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的军事、行政以及外交共愿日全部迁至山海关，只留下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作为军事代表继续

① 蒋介石 愿日日记，《总统》卷五（下），第愿日-愿日-愿日页。

② 蒋介石 愿日日记，《总统》卷五（下），第愿日-愿日-愿日页。

③ 《总统》卷五（下），第愿日-愿日页；《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电》，愿日，载《战后中国》（一），第愿日页。



留驻苏军司令部“随同进止，以资联系”^①。

这一决定对蒋介石来讲并非易事，几天前在复员整军会议上他还连续与各战区司令谈话，声称东北“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鼓励下属“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勉，格外努力！完成一策，一竟全功”^②。这一铤而走险的外交决策显然是对苏方刻意刁难中国接收东北下的无奈选择，张嘉璈认为蒋介石的行营撤离“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③。但不可忽视的是，蒋介石希望以此唤起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该决定时说道：

“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于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勘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④

就在通知苏联政府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将撤出行营的消息通知了美国驻华使馆，两天后，蒋介石又亲自向杜鲁门发出长电，将中国政府在接收东北所受到的种种挫折知照美国政府，声明苏联已

①《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4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7页。

②《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第157-158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月10日，第157页。

③《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157页。

④《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源章 157节，第157页；猿章 源节，第157-158页。



经违反了中苏协定,东北行营被迫迁移,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声明“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呼吁美国政府作出“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与此同时,外交部又向各驻外使领馆通报了东北接收遭遇苏联种种刁难的经过,意在引起国际舆论对东北的关注^①。

苏联显然不愿意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和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已经与日俱增的疑虑和不安感。对此,苏方迅速作出反应,1945年11月15日上午在行营撤退的飞机起飞之际,苏军副参谋长赶到机场,设法挽留,并表示刚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苏军将停止撤兵,加强城防,协助行营在东北建立政权“以协助中国政府履行1945年8月14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中方愿意,苏军可以延迟撤退一两个月等等。当晚,苏方再次来人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行营安全,提出尽快安排行营接收长春市政府及安全机关。同一天苏联大使馆也照会外交部否认苏方曾帮助中共部队,承认在苏军撤退地区中共的存在,但其责任不在苏方,而是因为“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他承诺苏军将积极协助中方到长春和大连的空运,同样谈到苏军可以延缓一两个月撤退,以便利中央政府的接收工作^②。1945年11月16日,苏军长春城防司令专门召集在长春的中外记者,宣布任何媒体不得反对国民党政府、不许反对蒋委员长、不许反对中苏友好、不许反

①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5日;《外交部致驻外使领馆告接防东北困难情形暨苏方态度电》,1945年11月15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58-160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144-145页;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44-145页;《1945年11月16日米克拉夫斯基关于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事宜与王世杰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1月16日,《苏联解密档案》。



对英美联盟、不许刺激国共关系等，下令撕下街道上所有反对中央政府之标语，换上“拥护联合政府及国际合作的口号”。苏方此举无非是在向中方表示善意，但又同时也对自己前期刻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行为有不打自招之嫌，正如张嘉璈指出的那样：“惟新易标语殊难索解，是否写此标语者系苏方授意，抑系中共所为”^①。

伴随着东北行营从长春的撤离以及苏方态度的转变，中苏东北外交进入第二个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苏方不再一味地设置障碍，而是采取了合作与抵制、利诱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法。尽管蒋介石依然对苏方的转变抱有顾虑，“以免中途再受其挟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应特别谨慎，不在急于接收也”^②。但苏联转变毕竟是中方所希望看到的，为此，外交部长王世杰迅速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会见彼得罗夫，声明鉴于东北接收经过在长春一个多月的交涉，国民党政府军队海陆进入东北都遭到挫折，而中共部队开入长春，致使空运计划也无法实施，“一切办理迄无成就”，故中国政府认为应由双方政府重新订立一个新的计划，包括中方的具体接收办法以及苏方的撤退时间^③。王世杰向彼得罗夫提交了中方的新计划要点：

一、为使中国政府能以飞机安全运输军队至长春、沈阳起见，苏方允负责对于在长春、沈阳市区及其飞机场附近任何未经政府承认之武装人员，解除其武装，并允许中国空军运送飞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先至长春、沈阳飞机场，指挥飞机起降等工作。

二、中国政府如须利用北宁铁路及东北港口运输军队时，苏

① 张嘉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70 页。

② 蒋介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记《总统》卷五（下），第 270 页。

③ 《外交部为另定接收计划办法与延期撤兵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 年 8 月 15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270 页。



方允予以可能之便利。

三、苏方对于中国政府担任接收工作人员允予以各种道义的及物质的协助；关于该项人员赴各地方编组地方团警之工作，尤愿予协助^①。

几天后，彼得罗夫送来了苏联政府的回复，对于中方的第一条，“苏联政府毫无反对意见”；对第二条的要求，因为苏军已经依照双方协定撤出了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地区，因此苏军“实无可能协助”；对于中方关于中共部队在长春的出现致使空运搁置的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因为中国之任何非政府军队，从未开入长春，故此贵部长所指出之中国军队在长春降落之阻碍，过去未曾存在，现在亦不存在。”最后，苏联政府建议仍然由中苏代表在长春进行具体交涉^②。

尽管苏方在口舌和舆论上拒不让步，但东北行营的撤出确实使得苏联的东北政策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在彼得罗夫这份照会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就已经提出由行营提名长春市公安局长的新人选，并希望行营返回长春，指出中国政府军队未到达以及政权没有建立之前苏军暂不撤退等。圆日，他们又恢复了原任长春市市长。在当天与张嘉璈的会谈中，马氏再次显示了合作的态度，声明已经下令禁止中共在沈阳发行钞票，表示政治情况一定会有所好转，甚至询问中方可以用飞机撤退人员，为什么不用之空运军队前来。当张嘉璈试探空运缘万军队来东北时，“渠不置答，似已默许。因其言辞向极锐利，如不赞成，往往立即拒绝。余更进一步主张八路军退出榆关至沈阳沿

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员年 员月 员日，载《战后中国》六·雪第 员页。

②《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复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员年 员月 圆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 员页。



线,渠亦不加可否。似亦不致帮助八路军久占铁路线”^①。

圆日,王世杰对苏联保证中国部队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受障碍的承诺表示“殊为欣慰”,对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地区无力协助的解释表示“甚谅解”,关于空运以及编组地方团警、苏联撤军时间等具体接收办法,中方也同意苏方建议,表示马上派出代表赶赴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重开谈判^②。愿月 源日,蒋经国与张嘉璈从北平飞抵长春,第二天与马林诺夫斯基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中方提出:(员、中方将空运一个师的部队抵达长春;(圆、省市政人员到任,准备带少数宪兵和警察,为维持地方秩序需编组若干保安团队;到任时希望苏方派联络官同去;(猿、希望苏军解除区内非法武装;(源、省市行政人员就任后,凡未经中央承认之政权,一律取消。如有抗拒,苏军协助解除之。对此,除在编组保安队和苏联派员陪同接收外,马氏均表示将积极配合^③。

苏联政策的转变绝非没有代价,事实上,另一个阴谋开始浮出水面。在这次会谈中,马林诺夫斯基正式向中方提出了两国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以及苏军暂时延缓撤退的事宜。这两个问题迅速成为第二阶段接收谈判的焦点。关于苏联军队的撤退问题,根据愿月 员日双方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系列文件中的一项特别记录,斯大林承诺苏联红军将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中国境外。为此,苏联政府在愿月底曾向美国政府表示苏军不再占领更多的地区,而且将“很快撤退”。愿月 员日,又通知中国政府苏军将于愿月中下旬开始

①《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缘远- 缘怨页。

②《外交部为派代表另商接收东北办法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员愿年 员月 圆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缘- 员远页。

③《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员愿年 愿月 缘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愿- 员怨页。



从南部向北撤出，并计划在 1945 年底全部撤出东北^①。但直到 1945 月中旬，除了营口和葫芦岛因阻止中方海运登陆而声称已经撤出外，苏军仍然按兵不动，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实际上，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两方面，苏方都无意履行诺言，在不引发国际舆论反对的前提下，苏军在东北的停留显然已经成为它对美国和中国的重要外交砝码。因此，当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撤离长春时，苏联方面迅速抓住这一机会，主动提出为了便利中国政府的顺利接收，苏军可以延缓一个月撤退，即将最后撤出期限延长到 1945 年 11 月 1 日。而实际上几天前中长铁路的苏方副理事长就已经非正式向董事长张嘉璈提出由于中苏交接问题，苏军北段车务队需延缓撤退 1 个月，并“希望中国政府以此意向苏联政府提出”^②。

苏方的提议令蒋介石十分为难：一方面，他的整个外交目的在于迫使苏军早日撤出中国，而且也只有苏联红军撤出才是东北主权回归的主要标志，但另一方面，苏军的暂时留驻显然又有利于政府的接收，因为此时政府军队才抵达锦州，如果苏联如期撤退，包括沈阳在内的以北广大地区势必为中共抢先占领。但棘手的是，如果由中方主动提出缓撤，在国内外舆论上都难以交代。因此，当张嘉璈曾请示蒋介石能否讨论缓撤问题时，他明确指示决不能由中方主动提出以免陷入被动。但苏方此时的缓撤提议显然又符合中方的利益，因此中方对此未持异议，并将之与顺利接收相互挂钩，在王世杰 10 月 3 日给苏军的《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中，中方仅只表示在“以上办法，经双方同意后，则原定苏军自东北各地撤退之时间表，延长一月，

① 刁明庭著《东北苏军撤离时间表》，载《东北苏军撤离时间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转引自 宰深著《苏联在东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00 页。

② 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1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00 页。



即以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为苏军撤退完成之期”^①。但到 1 月底，苏联塔斯社却公开宣称苏军缓撤乃应中国政府之要求，1 月 28 日，彼得罗夫再来照会，表示“苏联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所表示之愿望，同意苏联军队自东三省延期一个月撤退，即延期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为止。”蒋介石无奈，只有感叹“其强词夺理，以至于此”^②。

苏军的第一次延缓撤退就此被双方默认，但围绕第二次缓撤问题，双方再次上演了一场外交口舌之争。在 1 月 28 日中方代表蒋经国和张嘉璈在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展开的第二阶段的首次会谈中，按照蒋经国的汇报，马氏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这一时限，则苏军“日内即须由沈阳附近开始将兵北撤。……不知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在此短期内建立政权，否则，似可改为苏军自一月三日起，开始自南北撤，在二十天或一个月完全撤离中国国境”，“马氏声明此乃其个人意见，中国政府如同意一月三日开始撤兵一案，希即答复”^③。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苏方先提出撤军问题，“关于撤兵问题，巴弗洛夫斯基中将提出下列意见：苏军奉命加强数处城防防卫之后，已有数量庞大之军队陆续到达。如决定在 1946 年 1 月 28 日撤退完竣，则苏军撤退工作，须即日开始。而中国方面亦须于 1 月 28 日以前接收完竣。否则苏军势须留置一部分军队协助中国政府接收”^④。同样需要苏军缓撤的中国政府决定顺水推舟，王世杰在两天后会见彼得罗夫，除了通报中方将派遣蒋经国在本月 28 日左右赶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以及中方将在 1946 年 1 月 28 日左右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消息外，“对于马

① 《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6 年 1 月 1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8 页。

② 蒋介石 1946 年 1 月 28 日日记，《总统》卷五（下），第 182 页。

③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6 年 1 月 28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8-159 页。

④ 张嘉璈 1 月 28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58-159 页。



元帅之建议即苏军迟至于明年二月一日以前完全撤离中国国境，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可予以同意”。王世杰显然也认识到苏联政府同样对此十分敏感，因而特意说明这一协定可在 1945 年底发表，而且在发表时“不说明为任何一方之提议”^①。同一天，蒋介石还亲自致电张嘉璈和蒋经国，要求在苏军撤退问题上务必小心谨慎，表示可由外交部直接与苏联大使馆“再商变通办法”，强调“此系双方之同意，我方可在口头上表示赞同”、“此时不必对外宣布”等^②。1945 年 12 月 10 日，张嘉璈与蒋经国通知马林诺夫斯基，中国政府同意苏军撤退之最后期限延至 1946 年 1 月 1 日，具体将由中国外交部与苏联大使馆交换文件^③。

然而，1945 年后，彼得罗夫却专门找到王世杰，声称首先提出再次缓撤的不是马林诺夫斯基而是中方代表张嘉璈：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曾告中国政府诸代表谓，因为苏军至一月三日为止，须自满洲撤退完毕，故彼须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之间，将苏军自沈阳撤退，继之则自长春撤退。张嘉璈代表对于马元帅之声明，曾表示恐如此将对中国方面造成困难，指明可将问题解释为苏军于 1 月 3 日开始自满洲撤退，并声明关于此点，他将请示中国政府。”

结合上述张嘉璈、蒋经国的记录，如果不是苏方首先提出撤军问题，也是他们强调苏军如期撤退会给中国政府的接收所造成困难，以

① 《王世杰部长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要点》，1945 年 12 月 10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153 页。
 ② 《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1945 年 12 月 10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 页。
 ③ 张嘉璈 1945 年 12 月 10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52-153 页。



此为由引诱中方直接提出第二次缓撤。但苏联绝不愿在舆论上造成是自己主动要求延缓撤军的印象，因此，在 1945 年 10 月下旬接到中国外交部关于“兹依照贵我双方代表在长春会商之结果，中国政府赞同将苏军自中国东北诸省撤退完成之期，改定为 1945 年 10 月 15 日”的照会后，彼得罗夫迅即致函王世杰，声明“苏军自满洲撤退再度延期问题，系由中国方面提出，”中方的照会“未反映出事实真相”。与中方的建议正好相反，苏联政府不但要求将第二次缓撤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而且还必须指明“究由何方发动”。苏联当然了解中国政府的处境和心态，因而他还在文末不无威胁利诱地表明“如中国政府对此项报告予以证实，苏联政府可迎合中国政府之请求，准备将苏军自满洲撤退日期，延至 1945 年 10 月 15 日”^①。

苏方的声明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大批苏军却驻扎在东北各大中城市，毫无撤退迹象，如果不“迎合中国政府之请求”，苏军又怎么可能在 10 月 15 日之前全部撤出中国边境？或许中方的军事代表董延平看到了问题的核心，他说苏方“显然是以协助接收为诱饵，希望能给我国政府同意暂缓撤兵的日期；而我国政府为了尊重条约的精神，也必能同意在事实需要范围内展缓”。最终，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威胁，两天后，王世杰致函彼得罗夫，声明“对贵大使关于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长春谈话过程之说明，不持异议”，对彼得罗夫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军再次延缓撤退而苏方可以接受的说明也“予以证实”，“本部长认为苏军自我东北诸省撤退完成之期，已改定为 1945 年 10 月 15 日”^②。

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外交部长王世杰声明延期撤兵态度函译文》，1945 年 10 月 15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153 页。

②《外交部长王世杰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函》，1945 年 10 月 17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3 页。



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与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备遭刁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东北取得了迅速发展。实际上，苏联将支持中共作为阻碍蒋介石顺利接收东北的一个手段。因此，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展脉络相一致，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以及和苏联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时间一致而内容相反的两个时期：“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抢先占领期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发展壮大期。

中共对东北的谋划始于抗日战争中后期。早在 1945 年，毛泽东就与刘少奇谈到过抗日战争结束后，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建国。1945 年 10 月，主管中央城市工作的刘少奇还提出“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到满洲工作”^①。在 1945 年 10 月的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公开讲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呼吁“准备二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去得到技术条件”^②。会议期间，他还数次找到各个解放区的东北籍代表召开座谈会，并亲自对林枫表示“你是东北人，要准备到东北工作”^③。

在苏联对日参战的第二天，八路军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就“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而发布一系列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队分别从山西、河北和山东向东北进发，现驻扎在河北、热河、辽宁的李运昌向辽宁和吉林进发。10 月 10 日，毛泽东又

① 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8 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5-106 页。

③ 穆欣：《林枫传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102 页。



亲自下令山东分局抽调 10 个团、冀鲁豫 1 个团、冀中 1 个团（每个团不少于 1500 人）组编后由万毅率领经河北向东北进发，“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几天后，中央又指示“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要求晋察冀和山东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出发，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大大放手发展。中央同时还下令由陕甘宁配备 1 个团、晋绥配备 1 个团和中央 1 个团组成干部团，由吕正操和林枫带领开往东三省^①。但是，主要由于还不完全了解苏联的态度，中共此时在战略部署上仍显犹豫不定。在 1945 月中旬听到中苏谈判的消息后，中共重庆代表王若飞在一次会议上警告不要依靠苏联太多，说未来的中苏条约不可能让苏联“放手支持中共以对抗国民党”^②。此外，斯大林还在 1945 年 8 月 19 日和 20 日分别三次发来电报，告诫中共应当避免再打内战，建议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并承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由美苏负责^③。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赶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特别是 1945 年 8 月 2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

① 《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 1935—1955》六卷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0 页注 10。

② 《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 年 8 月 20 日，转引自 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1993 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5 页；《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5 页，20 日的电报应当是潘友新和季米特洛夫在 1945 年 8 月 18 日起草的，而且还得到了莫洛托夫的同意。参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中译本，第 145 页；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 145 页。

③ 这些电文是苏联解密出来的，但在中共的文件中没有找到。具体详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1993 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5 页；《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5 页，20 日的电报应当是潘友新和季米特洛夫在 1945 年 8 月 18 日起草的，而且还得到了莫洛托夫的同意。参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中译本，第 145 页；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 145 页。



后,尽管中共没有完全改变干部团继续向东北开进的计划,但毛泽东在当天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示部队只开至热河与东北的交界处,“相机进入东四省”。^①中央通知有关军分区“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三省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尽管如此,他还是命令林枫率领干部团继续前进,但“不要声张”,“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系,亦不请红军给我们以帮助,如果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们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战线上为难”^②。

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最早进入东北并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的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属的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和唐凯率领的部队。接到朱德 11月 16日的第二号命令后,他们于 11月底绕道山海关进入东北, 11月 24日与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分队会合,“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气氛异常热烈”。在曾克林的说服下,苏军又与他们一起回头攻占了山海关。之后,他们一路接管沿途的绥中、兴城、锦西等地,并在 12月 1日到达沈阳。但沈阳的苏军却拒绝曾克林部队下火车,后经三次交涉且看到中共部队大受当地居民欢迎后才允许其进驻沈阳,但在迅速请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后主动建议曾克林部队不要使用八路军的名义,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允许其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之后,双方密切合作并派出部队接管辽

^① 《毛泽东年谱》(下),第 501 页;《曾克林将军回忆录》,第 201 页;《林枫传略》,第 101-102 页。



宁各地^①。在此期间,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守,他们将各种武器运出,“先后拉了猿天猿夜,拉出步枪 圆四四四枝、轻重机枪 员四四挺,还有 员缘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战炮和山炮”。与此同时,曾克林部队的人数得到大大扩充,竟在短短时间内从猿四四四人发展到 圆四四四人。“我出关部队基本上控制了辽宁的局势”。怨月 远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带领 缘四四四人进驻山海关,当地苏军还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②。

中共在辽宁的发展使得当地部队和苏军都急需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为此 怨月 员日,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出贝鲁诺索夫与曾克林飞赴延安。员日,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专门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对东北形势的报告,并在当天向中央各局机关进行了通报。之后,朱德和伍修权又亲自与苏联代表进行会谈,但后者带去的消息颇为“耐人寻味”,贝氏表示按照中苏条约规定,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以前中国政府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由此要求已经进入满洲的八路军“退出苏军占领区”。但经过交涉,贝鲁诺索夫允诺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锦州和热河两省交中共接管,表示苏军撤出后对中国军队进入满洲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和

①实际上,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共力量还不是这些部队,而是原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日军占领东北期间撤离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与苏联政府建立了联系,早在 员缘年 远月,周保中就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司令部的顾问,并经常参加有关会议。苑月中旬,约 圆缘名抗日联军的军官被派到西伯利亚接受专门训练。他们得到苏军的信任并随苏军一起进入东北,而且被安排掌管各地的管理工作,如冯云中、周保中和李兆麟被分别安排负责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管理,与苏军一起驻扎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省会城市。他们立即与挺进东北的中共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尽管没有自己的独立部队,但他们显然为后来到达的中共部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见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 员缘页。

②曾克林:《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员怨怨年版,第 苑愿- 愿远 愿愿- 愿圆 愿圆页;薛衔天:《中苏关系史》,第 源缘- 缘页。



只存在于城市，但他同时又表示不反对中共力量在东北农村的发展，并且同意东北局进驻沈阳协调双方的关系^①。杨奎松等人认为贝鲁诺索夫除了正式转交要求中共撤出城市的信函外，还与中共进行了“非正式会谈”，中共答应服从苏方关于撤离大城市的要求，在东北的部队不以八路军而改称其他名义，而苏方同意中共继续秘密进入东北并予以协助，且不干涉中共在苏军未控制地区的活动，杨还引述了贝鲁诺索夫的一段话：

“在满洲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满洲不提‘自治区’，不要说不允许国民党派部队进满洲，因为这将给美国和重庆以口实，并使苏联处于困难的境地”^②。

尽管笔者难以对上述学者的论述进行验证，但他们的解说都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样，当时暂代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之所以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应当是受到贝鲁诺索夫某种程度的承诺与鼓励。实际上，不管是苏方的明确鼓动抑或间接暗示，它与曾克林的乐观报告一起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决定进军东北的主要动因。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远人组成东北局。彭真和陈云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后专门增补的候补书记，现将两人同时派出，足见中央对东北的重视。此外，为了便于与苏军打交道，中央军委还当即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的军衔。第二天，远人随苏联飞机飞

^①海茵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道路》，第 151 页。

^②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151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 页。



赴东北并在 1945 年 10 月 1 日抵达沈阳。由此，以沈阳为中心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开始挂牌工作，中央同时通报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①。

在派出东北局的同时，刘少奇也一改中央先前的犹豫和谨慎政策，1945 年 10 月 1 日，他分别致电中央各局和有关军区，要求从华北和华中派出 10 个团的干部，“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尽可能派去”。在两天后致重庆谈判代表团的电文中，他一再强调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及其对中共的战略价值：

“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为重大”^②。

刘少奇的建议迅速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为了能够抓住时机迅速决策，他们建议将中共的整个战略决策权一并交给刘少奇^③。当天，刘少奇就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建议加强晋察冀和晋绥力量，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扩大冀热辽军区；将山东大部分力量调往冀东和东北；同时将华东新四军补充到山东和冀东，并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

① 《伍修权将军自述》，第 152-153 页；《彭真生平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2 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第 190-191 页。

③ 1945 年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刘少奇年谱》（上），第 190 页。



浙东部队向苏南撤退,而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在人员调配上,陈毅、饶漱石到山东,罗荣桓到东北,林彪到热河。总体来讲,就是将整个主力向北移动,而中心则放在东北: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①。

这就是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刘少奇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他们回电表示这一计划“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并要求“越快越好”。为了加强东北力量,中央又决定再将林彪调往东北,10月21日,一封从延安发出的“万万火急”的电报追到了正在赶赴山东军区途中的一批重要将领的手中,命令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改变去山东的原定计划,立即转道奔赴东北^②。10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彭真和陈云,要求他们“依靠山东力量,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 10万—15万能作战的军队,才能完成任务。望你们立即派人到山东接引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同时命令山东部队和干部“寻找一切可能的道路,立即出动,进入东北和冀东”。为了确保山东分局的重视,同一天,一份由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发出的指示达到罗荣桓等人的手中,命令山东先行派出 10万—15万基干兵团在一周内到达乐亭、秦皇岛一线,“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一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住蒋军从陆路

① 《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1947年 10月 1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7年）》，第 1056—1057页。

② 罗印文：《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05页。



进入东北的企图”。1945日,当得知苏军在 1945月 10日以前如期撤退的消息后,中央再次致电各中央分局:“争取东北时间急迫,迟则来不及。希望各地方勿失战机,令所有向东北前进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前进,不再延迟”^①。

抢占东北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在 1945月 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认为此时的美国政策仍然是压制中共的发展,但却不会与苏联全面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把东北这样一个城市和工业中心比较集中的地区搞到手”^②。然而,大军徒步北迁,谈何容易。此时一心关注抢占东北的刘少奇又注意到从胶东半岛直接渡海到达东北的捷径,立即在 1945日和 1945月初分别致电山东和东北局,表示“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必要的确实的办法组织队伍和干部渡海,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必须在 1945天至 1945个月内渡过 1945—1945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因山东部队和干部如须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还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必将进入东北”。因此,“你们双方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在随后的指示中,刘少奇口气严厉地表示:“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③。

就这样,在中央的一再督促和要求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调兵遣将行动。从 1945月底开始,中央派出的各路部队和人员开始到达沈阳并向周边发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万毅领导的“东北挺进纵队”,从 1945月份从山东出发,到 1945年底已经连续转战于南起沈阳,北至吉林、长春,东起通化,西至法库的广大地

①《刘少奇年谱》(上),第 194页-195页。

②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45-1957》(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4页。

③《刘少奇年谱》(上),第 195页。



区,经历了大小战斗 400 余次,取得毙、伤匪徒 1.5 万余名、俘匪 1.5 万余名的战果,解放了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大部分地区,并派出干部参加或协助地方建立了政权。在此过程中,部队人数从进入东北的 1.5 万人发展到 15 万人,

“挺进纵队的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予的任务,剿灭了指定地区的匪徒,占稳了脚跟,安定了后方,为随后粉碎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①。

与此同时,林枫率领的“东进支队”干部团以及吕正操率领的部队也都在 10 月下旬到达东北并以保安旅的名义进驻沈阳^②。从 10 月到 11 月,包括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与将领奔赴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 15 人(“七大”共选出中央委员 15 人)、候补中央委员 15 人(“七大”产生候补中央委员共 15 人)等各级干部 10 万名和 15 万大军挺进东北,也成为中共党史上一次最大的干部调动。到 11 月底,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达东北的军队已达 15 万余人,党政干部 1.5 万余人。另有军队 10 万、干部 10 万人还正处于日夜兼程的急进之中^③。到 12 月底,陆续到达东北的部队已有 15 万人,再加上新发展起来的部队,中共在满洲已有 15 余万的新老部队,在主要城市中已有了初步的布置,广泛地建立了与群众的关系,发动了一部分群众,一批干部已开始到达了各个地区^④。

①《万毅将军回忆录》,第 15 页-16 页。

②《林枫传略》第 15 页-16 页;《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16 页。

③《邓华将军传》,第 15 页。

④《肖劲光回忆录》,第 15 页;《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8 年 11 月 15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 年 11 月)》,第 15 页-16 页;《刘少奇年谱》(上),第 15 页。



有趣的是，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人飞抵长春为行营进驻东北进行准备工作时，他声称这是中苏两国军队在远东战场上的“第一次会师”^①。殊不知此时中共在东北已经有了数万人的军队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沈阳等城市的管理。到1945年中上旬，中共的力量在东北各大城市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领导中心的沈阳，不但市政管理基本被中共接管，而且东北局还准备在1945月下旬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并拟成立东北人民政府。从各地赶来的上万名干部在东北局的安排下奔赴东北各地开展工作。东北局书记彭真在1945月下旬的沈阳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的报告，号召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接收政权，建立根据地。在南满的营口，吕正操和李天佑等将领还亲自带兵前往营口和辽南了解地形，准备阻止在营口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在长春，由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在苏军以及抗联将领周保中的支持下，不但秘密进城替换了整个城市的警察力量，而且还积极部署准备迎击国民党政府的空运部队与人员。在哈尔滨，中共的党政领导机构也得以建立，他们积极扩大武装并准备接管整个城市^②。

中共如此大规模地调动军队和干部顺利进入东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苏联方面的鼓励。像曾克林的汇报一样，东北的形势发展极好，他自己的部队在几天之内就扩员数倍，而且可以从苏联占领的日军军火库获得武器。因而，1945年10月间新近达到的各路部队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充，配备了新枪和很多装备。尽管没有具体的清

①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据东北折冲纪要》，台北：中华大典编印，1983年版，第100页。

② 《林枫传略》，第100-101页；《彭真生平大事年谱》，第102页；《吕正操回忆录》，第100页；《万毅将军回忆录》，第100-101页；《李天佑将军传》，第100页。



单,但初期进入东北的部队显然得到了苏联在装备上的极大支持。实际上,到达沈阳的彭真一行与苏军协商后,在 1945 年 9 月 15 日向延安汇报:“友军已下最后决心,此间的家务全部交我”。据此,中央才下令各地赶赴东北的部队不必多带武器,可在到达时接受现成装备^①。譬如东北局的叶季壮曾亲自到日军的库房看过,“里头有大衣、服装、鞋子、帽子等物资,东西多得很,可以尽量去拉”^②。吕正操在 1945 年 9 月中旬曾受命前往商都与苏军联系,并接收了苏军从伪蒙军手中缴获的一些武器,到达沈阳后,他还亲自前往辽阳等地“看日军仓库,接收日军枪、炮等武器”^③。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包括两个支队)从沈阳继续北进,其中第一支队经过与苏军交涉后接收了日军在东大营的军火库,整个支队迅速换上了崭新的日本 7.62 毫米式步枪,每班还装备了一挺 7.62 毫米式轻机枪,每个机枪连都装备了 82 毫米式重机枪。“干部战士情绪特别高涨”,“比起山东来,可阔气多了”。第二支队协助苏军重新夺回了被土匪占领的法库返回铁岭时,受到铁岭苏军的热烈欢迎,“苏军赠给我们 82 毫米式重机枪,二支队的装备由此大大改善”^④。

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合作未必全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身处东北前线的中下层苏军军官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怀有好感和同情,为中共的大胆试探以及得到苏军支持和默许提供了机会。例如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在 1945 年 9 月底达到沈阳附近时遭到苏军的拦截,双方语言不通,但忽然有人唱起《国际歌》,“双方指指点点。居然明白了,他们也就不阻拦我们了”,“东北挺进纵队”居然安全通过苏

①徐焰:《日本关东军覆灭记》,第 150 页。

②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0—101 页;《伍修权将军自述》,第 152 页。

③《吕正操回忆录》,第 126—127 页。

④《万毅将军回忆录》,第 150—151 页。



军的盘查,继续向北挺进。达到长春后,他们与此时担任苏军长春负责人的周保中建立联系,在接到东北局关于准备在长春机场打击国民党空运部队的命令后,一名苏军少校不但亲自带领万毅前往机场观察地形,还“以他的军事眼光和作战经验,为我选了四五个有利对空作战的位置。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讲起毛泽东、朱德,把大拇指竖起来”^①。

与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天然亲近相对比,一位颇能代表当时大多数身处现场的苏联官兵感受的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顿·原斯塔科维奇却表现出对蒋介石政权的极大反感,他称前往沈阳视察的莫德惠为“苏联最凶恶的敌人”,说他的目的在于“了解工业和金融圈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组织一个反对我们的集团以及搜集经济情报”。他本人甚至拒绝了莫德惠的宴会邀请,“我不能忍受与一个大写反苏文章的人共坐一席”。他同样对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沈阳颇有微词,说他以宴会分散苏军注意力,在背后召开秘密会议试图“搞乱我们费了很大精力才准备开业的银行工作”。对后来到任的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沈阳市长董文崎,称之为“一位反动的国民党官员、从美国大学毕业、极力煽动亲美情绪”。有一次在酒精的作用下,董发牢骚说他无法制止各种职位的买卖,当问及中国的局势时,他回答说比以往更糟糕了。“从一位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满州首府市市长的口中听到这些,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中国内地的情形了”^②。

中共对苏军并不是完全的索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苏军也需要中共协助进行当地的治安与管理。科夫顿·原斯塔科维奇谈到苏军进入沈阳后,很难得到大多与国民党有关的沈阳现存当局的支持,而刚

①《万毅将军回忆录》,第 15 页。

② 资料来源:《沈阳日报》,1946 年 10 月 10 日。



刚进入沈阳的中共自然成为最直接的理想候选人，于是，“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任命著名中国将领张作霖的小儿子 张学思 担任了省长。城内的老百姓都很高兴，不同公共团体的代表都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表示感谢”。“市长也被一位合适的人选所替代，警察局长的职位也给了一位受共产党信任的下级警官。这些变化使得我们的工作容易了许多”^①。

刘少奇显然将东北作为未来中共的核心和长期基地。他的这一思路非常明晰，在 1945年 10月 10日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给东北局的第一份《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中，他强调：

“只要红军不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②。

尽管 1945年 10月份曾克林部队与苏军的首次接触以及接下来的局势发展也促使他一再强调抢占各大城市，但他关于长期经营东北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截至毛泽东回到延安主持工作之前，他在 1945年 10月上旬接连数次致电东北局，明确指出东北的军事部署“不是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他要求东北局派遣部队和干部到西满、东满和北满开展基础的群众工作，接收各工厂企业，组织当地政权，尽快成立东满、西满和北满分局，

① 刘少奇《刘少奇与东北局》，《刘少奇文集》，第 1 卷，第 104 页。

②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 10月 1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年）》，第 1 卷，第 104 页。



“部队必须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壮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所有到达东北的干部,应迅速有计划的分散到全东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决不要迟疑”^①。

但是,1949年1月1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似乎不赞同刘少奇的这种东北发展战略。他更注重在东北内部集中兵力,从内线阻止蒋介石进入东北,甚至将东北当成打击蒋介石的主战场。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的这种冒进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苏联拉进与美蒋的对抗之中^②。此说难以证明,但毛的战略显然基于苏联的鼓励以及中共在东北的急剧发展^③。1949年初,苏联对中共开始了更加明显的支持,他们提议中共立即调入10万—15万人部队,鼓励中共派人接收城市以及重要的工矿企业,甚至还提出中共将整个总部移到东北,并暗示必要时可以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军队等等^④。在这种情况下,毛认定蒋介石不敢对中共动武。在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的前一天,他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陪同下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当后者问及他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看法时,毛泽东表示蒋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苏联的国际影响,他不敢完全依赖美国。而依靠苏联,又感到担心”,而决定蒋介石中共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中共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声望、新

① 《刘少奇年谱》(上),第 100 页。

② 具体详见 刘少奇年谱(1949—1956) 第五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拉锯 第一节 毛泽东在东北的战略

③ 薛衔天利用部分苏联解密档案认为苏联大使馆并不支持毛泽东,《中苏关系史》,第 100 页。如果此说成立,这或许反而刺激了毛泽东决心将苏联拉入东北斗争中来的决心

④ 刘少奇年谱(1949—1956) 第五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拉锯 第一节 毛泽东在东北的战略



疆的局势以及苏联军队在东三省的存在”^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冲突的危险去支持蒋介石，他在重庆谈判结束后曾说过：“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②。

正是在认为蒋介石对苏联敬畏有加而不敢冒犯、美苏也不可能为中国事务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判断下，毛泽东决定独占东北。他从重庆一回来就迅速投入了东北决策，**1945年10月10日**，他提出“我党的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保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这显然与刘少奇前几日要求东北部队和干部分散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很不相同。**10月11日**和**10月12日**，他又接连下令东北局组织力量，“坚决动员全力，控制东北”。**10月13日**，他下令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重整整个东北的军事力量，任命林彪担任司令员，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第二天，他通报各战区：

“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线、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陆上部队之到达，并

①《**1955年** **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 **季谢尔波得罗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00**，目录 **1000**，案卷 **1000**，转引自《斯大林与中国》，第 **1000**—**1000**页尾注 **1000** **1000** **1000**。该文作者列多夫斯基声称他当时作为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秘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

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000**页。



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①。

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受到了葫芦岛事件的鼓励。在美国军舰护送下的蒋介石军队在 10 月底试图登陆葫芦岛但遭到了当地中共部队的阻止，而苏联方面却对此予以默认。这极大地鼓励了毛泽东独占东北的决心。10 月 20 日，他要求彭真不管美军是否协助国民党军队，都要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北：

“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下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如我在葫芦岛、营口、安东坚决抵抗，可能使蒋军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②。

为了有效地落实“全力占领东北”的计划，毛泽东在下令东北局积极准备内线作战的同时，还指示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设法寻求苏联延迟撤军，以及阻止国军登陆的外交行动，苏方虽然表示延迟撤军非常困难，但却声明可以阻止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而且答应向中共提供武器、通讯设备和相关交通。苏军也的确做到了这些，在长春除了市长外的所有官员都换上了中共人员，在营口与葫芦岛，他们也默许和帮助中共占领了这两处战略要地^③。

毛泽东决定坚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10 月 16 日和 17 日，他再次督促东北局“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赴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由林彪或罗荣桓统一指挥黄克诚、梁兴初等 10 万主力部队，“举行反攻，每次歼灭 1 个师，最后全面消灭三个军”。“总之

① 《毛泽东年谱》（下），第 1000—1001 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第 1001 页。

③ 参见《东北局的工作报告》、《东北局的工作报告》、《东北局的工作报告》。



从内战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①。毛泽东在此所谈到的“三个军”,是指从秦皇岛登陆并正直逼山海关的国民党第 员猿军、第 缘军和第 员军。这三支部队直接来自香港和越南,配有最先进的美式武器,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此时毛泽东竟要求将之一举全歼,足见他的信心以及对东北的依重。蒋介石深感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的中共战略变化,他在 员月 猿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返回延安未及旬日,而各种横逆叛乱较前尤烈”^②。

但是,紧接下来的两个事件使得毛泽东的战略变得极不现实,就在毛泽东一连多份电报指示将国军拒于关内命令的同一天,国民党第 员猿军和第 缘军占领了山海关,通向东北的门户被打开,绥中、兴城、连山(锦西)、葫芦岛相继被占, 员日,国民党军队又占领锦州并直逼沈阳^③。毛泽东一直主张的内线作战、拒敌于东北之外的战略遂告失败。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事件是苏联对中共态度的逆转。 员月 员日,苏军正式通知(此前已有所提醒),包括东北局在内的中共各机关及人员必须限期撤离长春铁路沿线以及撤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在沈阳,正在进行中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被迫中断,在交涉中,东北局书记彭真还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发生了很大争执,后者竟然威吓“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④。东北局最终被迫迁到本溪,之后又一再被迫迁移抚顺、本溪、梅河口、长春和哈尔滨等地。在长春,马林诺夫斯基对周保中和万毅准备袭击国民党空降部队的计划大发脾气,甚至还忿忿地要撤销周保中的旅长职务,不准周保中再穿苏军军装,而担任警察任务的“东北挺进纵队”第 圆支队也被

①《毛泽东年谱》(下),第 源页。

②《蒋总统秘录》第 员册,第 圆页。

③《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员缘年 员月- 员月卷,第 愿- 愿页。

④《伍修权将军自述》,第 员- 员页。



迫撤出长春。在哈尔滨，苏联人的保安总队的第二和第四大队也被迫撤到了附近的宾县^①。苏军政策变化对中共的影响还体现在军火方面，由于东北苏军在军火方面的支持，随后赶到的许多部队都将武器留在了关内而徒手北上，特别是由黄克诚与洪学智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约万人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等个省，历时两个月最终在 11 月下旬达到东北，而此时苏军却声称由于国际原因要对原定交给中共的武器另行处理，造成了中共部队“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局面，伍修权更称之为“新兵新枪、老兵没枪”^②。

山海关的失守以及苏联政策的突变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中突出表现在毛泽东战略的失败以及给他本人造成的影响。从重庆谈判回来后身体一直欠佳的他完全垮了下来，并终止了指挥工作；从山海关失守前一天给东北局下达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等 10 份命令后，直到 1948 年 11 月 10 日出席欢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宴会，一向亲自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毛泽东仅亲笔起草了 10 份文件，除了《1948 年解放区工作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三份电报较长外，其余 7 份文件均只有“数十字至百字余”^③。受到苏联政策变化冲击的不光是毛泽东，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许多负责人。实际上，自从大量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以来，在中央和东北局都一直存在着在农村和城市哪个优先的讨论和分歧。在此之前，苏方的支持使得人们认为在沈

①《万毅将军回忆录》，第 152-153 页；《李天佑将军传》，第 152 页。

②黄克诚谈到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徒手进东北的命令，而是下令部队携带了基本的装备。《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2-153 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152 页。但在后来出版的《自述》中，伍修权删去了“老兵没枪”说法，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56 年》，香港明流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2-153 页。



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大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很大，但此时苏联政策的突然改变又使得大家回到了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传统策略。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形象地总结道：

“在沈阳最热闹的是 11 月中旬。大批的军队干部来了，同时也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和准备成立东北人民自治政府。此时苏联也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他们打算把地方交给我们。可是恰恰在 11 月 21 日开始形势又有了变化，苏军也不撤了，代表会议也暂时休会了，自治政府也不成立了，军队呢，也撤出沈阳。此时我们的头脑也比较冷静一点了”^①。

尽管如此，苏联政策的突变并没有造成中共最高决策层整个东北战略的混乱。这主要体现在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直主张将东北作为未来的长期根据地，此时苏联政策的逆转使得中央认识到继续盘踞大城市的危险，反而成为统一思想的契机。刘少奇再一次替代毛泽东成为东北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中央迅速转向先前已有的战略：将对东北的控制从城市转向农村，从长春铁路干线转向铁路两侧的纵深发展。11 月 16 日，刘少奇通知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但“在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跟蒋军斗争”。在两天后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他将之总结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②。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转变，中心都是围绕东北问题，而之后的深层背景却是苏联政策的变化。

为了有力地贯彻变化了的战略，刘少奇当天又起草了《中央关于

①《林枫传略》，第 100 页。

②《刘少奇年谱》（上），第 100 页。



东北撤出大城市后我党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未来与国民党的斗争“取决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要求东北局：

“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做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仅靠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①。

此时的东北，一面是从山海关步步北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态度变得强硬的苏联红军，另一方面是亟待发展的远离长春铁路和三大城市的东北广大乡村。压力与机会并存，而时间尤为重要。但东北局似乎还有留恋大城市的迹象，1945年12月24日的一份《东北局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城市“已暴露”的党的机关、干部和军队“迅速坚决撤退”，大城市的任务改为“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即组织地下党，组织地下军，并利用各式各样的合法宣传形式、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以便将来配合城外大军，顺利占领或夺取现在暂退的大城市”。该指示一再强调配合苏联“在外交上站稳脚跟”，“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②。

可见，东北局此时还没有领会刘少奇关于发展根据地的战略要领。伍修权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也认为东北局在撤离沈阳时的指导

①《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我党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9）》，第1007页。

②《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年12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9）》，第1008—1009页。



思想还是围着沈阳转,并准备在苏军撤离后再次攻占沈阳。^①为此,刘少奇反复致电东北局,指出东北当今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据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东北的优势”。他分别在 1945 年 12 月 1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5 日、12 月 18 日、12 月 20 日、12 月 25 日、12 月 28 日和 12 月 31 日分别致电东北局或就东北问题告知其他分局,要求将发展根据地当成东北的主要任务。在 12 月 28 日的指示中,他提醒东北局:

“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犹如汉高祖之汉中。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②。

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的电文中,他再次强调:

“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于被动。现在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

①《伍修权将军回忆录》,第 152 页。

②《刘少奇年谱》(上),第 152 页-153 页、154 页、155 页、156 页、157 页、158 页、159 页、160 页,引言见第 152 页。



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①。

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落实，处在休病中的毛泽东也在 10月 18日专门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

“我党现在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点。……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够在热河和东北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②。

中央的指示得到了东北前线许多将士的拥护。11月底，已经赶赴哈尔滨工作的陈云、张闻天和高岗对东北局势的变化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联名向东北局和中央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除了主要对北满的工作提出建议外，电报还着重分析了整个东北的局势并提出政策建议，他们首先承认“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苏联的满洲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尽管这一政策会随着“国内国际

①《刘少奇年谱》（上），第 250页；《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沿线控制广大乡村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 10月 18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9）》，第 105—106页。

②《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256页。



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有所变化,但这两个方面是“一贯的、不变的”;第二,电报对苏联从 1945 月中旬以来的政策恶变表示“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认为苏联的延缓撤退既是为了确保各大城市及铁路干线移交国民党政府,也是“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第三,他们认为中共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与独占满洲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建议在锦州和沈阳等前线给国民党军队以可能的打击以争取时间,将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①。

这份电报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被立即转发东北局。就这样,在中央的一再要求下,东北局调整战略,相继成立了东北局南满、西满、北满和东满四个分局和各自的下属军分区。自此,中共走出东北大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展开了一向拿手的发展根据地的战略,使得东北发展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那份有名的陈、高、洛电报中所言:“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的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②。

至此,苏联方面自 1945 月中旬开始的压力反而使得中共转入了在东北的新发展,到 1946 年初,在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分局的努力经营下,中共在整个东北的广大乡村已经占据了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优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再次在东北获得了成功,在这

^①《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5-406 页。

^②《陈云文选》,第 406 页。



种力量对比之下，中共在东北的反攻与最终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美国在东北问题中的纠葛

苏军进入东北后的对华政策之所以如此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来自美国政策的影响。围绕东北问题，苏联对华政策的美国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美国对东北利益的直接关注与要求所激发的苏联对东北控制与抢夺的加强；美国积极援助国民党军队收复东北所引发的苏联对中国政府接收工作的刻意刁难。美国对东北利益的直接关注首先体现经济利益和大连的“国际自由港”地位问题上。在第二轮中苏谈判时斯大林曾提到苏军在东北的战利品问题，当即引起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的激烈反应，后者还为此专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交涉。斯大林当时答应可以在中苏谈判结束后专门发表一项书面声明，表示苏联将尊重大连的自由贸易。然而，中苏条约签署后，苏方却坚持中苏条约并没有否认大连的自由港地位，从而也不再有必要发表书面说明^①。此举显然加深了美国官员对苏联的疑虑和担心，哈里曼、格鲁以及史汀生对一个被苏联控制下的大连的“自由港口”的可能性根本不抱希望。而这也是导致哈里曼建议抢占大连的一个直接理由。之后，哈里曼两次去电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压力，迫使斯大林以书面形式确认大连以及东北铁路的“门户开放”。贝尔纳斯最后同意了哈里曼的建议，授权后者再次专门会见斯大林，要求苏方以书面形式保证东北的“门户开放”。尽管斯大

① 贝尔纳斯在1945年10月10日致哈里曼的信中，要求斯大林在苏中条约生效后发表一项声明，保证苏联尊重大连的自由港地位。斯大林在10月12日的复信中，表示苏联将尊重大连的自由贸易，但并未明确承诺尊重其自由港地位。哈里曼在10月13日的回信中，对斯大林的复信表示失望，认为其并未满足美国的最低要求。史汀生在10月14日的电报中，建议美国政府向斯大林施压，要求其以书面形式确认大连的门户开放政策。最终，贝尔纳斯在10月16日的电报中，授权哈里曼再次与斯大林交涉，要求其以书面形式保证东北的门户开放政策。



林在会谈中表示同意与中国政府协调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①。

围绕东北的战利品，正是由于中美双方的强烈反应，斯大林才在中苏谈判期间刻意回避战利品问题。谈判结束后，宋子文直奔华盛顿向杜鲁门表示“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其次为菲律宾，再为美国，至苏联不应要求；五外长会议，美当注意东三省敌人之财产处分等语”^②。苏军占领东北后，尽管对外国记者进行了严格管制，但美英记者还是设法得到各种消息，1945年8月1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记者安德鲁斯（Andrew Ross）的一篇报道，声称苏军掠夺东北经济的行为直接来源于斯大林，一位苏军高级将领称为了实施该计划，莫斯科还专门派出了1000名专家对许多重要设备的拆迁进行技术指导与监管，此时已经将吉林和抚顺等地的100台大型发电机以及各大城市数百台涡轮机和中小型发电机尽数拆卸一空。该报道还表示美国的情报人员已经得到了一份相关命令的复印件，以及一些苏军拆卸和破坏工厂和当地居民百姓家室的照片^③。

这些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注，美国媒体对苏联行为的批评也越来越多。美国这种举动给苏联造成了很大压力，实际上，与其他因素一起，它直接导致了苏联东北政策的三次变化。第一次是

① 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与美总统商谈中国战后问题经过电，1945年8月15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05-106页。

② 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与美总统商谈中国战后问题经过电，1945年8月15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05-106页。

③ 安德鲁斯：《苏联掠夺东北经济》，载《纽约时报》，1945年8月15日。



在 1945 年 8 月中旬即苏联开始秘密支持中共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其直接动因是正在召开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对日本共同占领，只同意在华盛顿设立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远东顾问委员会。此外，除了对美国在坚持东北的门户开放、拒绝苏联介入管制日本的因素外，苏联对这一时期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军队快速进入华北和东北的“海空大抢运”也感到不满。一位美国人写道：“1945 年，我们对国民党部队的空运，必定给俄国人以深刻的刺激。因为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显然是一个反共行动，而且在日本投降后仅仅几天就发生在一个与俄国相邻的国家中”。他估计美国为此花费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①。这些都对苏联产生了很大刺激，不仅“损害了斯大林作为第二大世界强国领袖的自尊心”，而且导致苏联对美国在整个东亚的用心产生怀疑，因为斯大林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彻底削弱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它最终促使斯大林调整苏联的整个东亚战略，在东北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②。

苏联东北政策的第二次变化是从 1945 年 9 月份开始阻止国军在东北的登陆，并加大对中共的援助。其原因显然与美国协助中国政府运送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有着直接的关系，后者似乎出乎苏联的预料，因为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与宋子文的会谈中，斯大林曾表示“美国方面希望吾人在满洲有甚多之军队，彼等不愿在中国登陆，彼等希望以全力在日本登陆，吾人讨论美国之计划时，彼等并未预计在中国登陆，仅预计在日本登陆”。由此，他在苏军撤离东北问题上表态“倘中、美双方均无延长留驻之要求，则除旅顺驻军外，当于三个星期内撤

① 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第 124 页。

② 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杨奎松文集》。



退”^①。莫洛托夫后来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坚决要求美苏军队同时撤出中国，并表示“美国军队在中国华北的出现是一个新发展，苏联政府与中国签署协议时未曾考虑到这一点”^②。苏联政府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首先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接着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军的介入，据相关苏军军官的回忆，就在马林诺夫斯基勉强同意营口葫芦岛登陆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竟向旅顺的苏军发去电报，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随后他还将满载国民党军队的军舰开至大连并要求上岸侦察^③。苏联官方历史学家鲍里索夫认为，苏联外交转变的“条件”是美国向国民党地区派出自己的“顾问和密使”、美国陆战队在中国港口登陆、直接参加了反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军事行动以及用飞机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中共控制的各个地区，为此“苏联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步骤，阻止华盛顿在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幌子下在中国进行的侵略”^④。

美军除了登陆华北和积极援助中国政府军进入东北，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一次直接交涉。1945年11月中旬，美国直接与苏联交涉要求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市开设美国领馆^⑤。引起了苏方对美国进入东北野心的关注。在1945年11月20日东北行

① 《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五次谈话记录》，1945年10月15日，载《战后中国》（一），第128页-129页，引语见第128页和129页。

② 《苏联外交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年，第100页。转引自《苏联外交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年，第100页。

③ 俄文原文：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载《在中国道路上》，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年，第128页，转引自薛衔天：《中苏关系史》，第128页。

④ 俄文原文：鲍里索夫：《苏联外交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年，第100页。

⑤ 俄文原文：彼得罗夫就恢复驻华美国领事机关事宜与美国外交人员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11月20日，《苏联解密档案》。



营与苏军司令部的第四次会谈中,苏方的态度十分强硬,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苏军在大连港口发现了要求进入大连港的美国军舰。参加会谈的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马林诺夫斯基一再提及美军舰驶入大连港及舰长登陆之事,可见其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进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他还注意到马氏提到美国时“声色俱厉”^①。马林诺夫斯基并非无中生有,当时担任旅顺防务的苏军旅顺司令林德尼科夫详细回忆了美苏军方在大连港口海面上的这次有趣会面:美国第 苑舰队在青岛到黄海西岸间调动频繁, 苑月末的一天,大连苏军突然接到美国的广播信号要求进入大连港口进行“紧急谈判”,苏方加以拒绝并下令美国军舰只能停泊在大连港口之外,但美舰舰长赛特尔海军中将(文雅原译自译者译)却派遣一名使者前来要求进入港口。经过请示,苏方大连城防司令科兹洛夫中将前往美舰了解美军进入大连的原因,最后,他们不但拒绝了美军的上岸要求,而且还下令美舰离开苏军防区。“但赛特尔却不愿遭此拒绝,科兹洛夫没有选择只有提醒他负责海岸防务的苏军只有履行职责。在科兹洛夫返回大连后,美国军舰才离开我们的水域”^②。此外,林德尼科夫还谈到了发生在旅顺的另一次美苏交锋事件: 苑架美国飞机出现在旅顺上空,有的还飞行得非常低,苏联飞机立即起飞对峙,“我们的一位飞行员将一架美国飞机都快逼到了海面上,这位不速之客一定觉得非常不舒服”。当苏军通过无线电要求美方对此进行解释时,他们回答“美国空军欢迎旅顺港的苏联人”,苏方则要求“这样的‘欢迎’不要再发生了。”林德尼科夫表示还有更多的事实证明美国人想“试探将满洲变成他们战略桥头堡的可能性,……

① 张嘉璈 员源年 苑月 苑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缘苑页。

② 林德尼科夫回忆录,《旅顺苏军防务》,第 苑苑页。



我们都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予以制止”^①。另外,从苏联的解密档案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份苏联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库切罗夫海军元帅关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美苏双方飞机在旅顺水域上的一次交火^②。

上述举动都大大地加剧了苏联对美国东北野心的警惕与担忧。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苏双方的第五次会谈中,苏方态度大变,张嘉璈当即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方不愿吾方依赖美国运输军队。换言之,即不愿美国插足东北。美军舰人员之在大连登陆视察,激起苏方之反感”^③。蒋经国也明显感到苏军对美国的敌意,指出苏联害怕中方收复东北后将美国势力引入东北:

“甚至在将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决定利用八路军,使我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此乃苏联最近之策略。马林诺夫斯基屡次对儿作不满美国之表示,并在语气中,含有‘中国不应过于依赖美国’之含义”^④。

美国政策引起苏联东北政策的第三次改变发生在 1945 年 8 月,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事实上,在东北问题上,深受美国影响的不仅只是苏联,还有国民党政府。从 1945 年 8 月中旬中苏关系出现缓和时,

① 张嘉璈日记,1945 年 8 月 15 日。另见台湾学者陈孝威谈及在 1945 年 8 月中旬美国军舰在大连港口外游戈,有数名大兵登岸游览,并称“国军在美国军队支援下,即将以武装登陆。”引起苏方的激烈反应。见《为什么失去大陆》,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8 月 15 日卷,第 15 页。所谓美军登陆游览,在当时情况下似乎没有可能。

② 张嘉璈日记,库切罗夫就旅顺港地区发生的事件致梅普尔兹少将的信函,1945 年 8 月 15 日,《苏联解密档案》。

③ 张嘉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5 页。

④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5-16 页。



蒋介石并没有消除疑虑而相信苏联，他下令从山海关进军到锦州的部队就地停止前进，表示“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据，再看它将来如何解决这一与国际和安全有关的东北问题”。其目的无非在于“先安定关内，再图关外”^①。但是，蒋介石在 1945 月底改变了他的这种既定战略，其中除了苏方一再显示出的友好外，主要原因来自美国政策的变化。接到蒋介石控诉苏联东北行为的电文后，杜鲁门表示“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之后美国明显在援华方面加快了步伐：1945 年 10 月，双方正式签订了购置美军在华剩余物资协定；接着，中美三峡水电开发合约在美签署；11 月 1 日，魏德迈在上海公开宣布美国在华军队暂不撤退，而协助中国重整军队的计划已在进行之中；11 月 10 日，美政府决定缓撤在华陆战队，加运国军到华北和东北，设军事代表团。11 月 15 日，魏德迈携第七舰队新任司令巴贝（~~巴贝~~ ~~魏德迈~~）~~魏德迈~~ 赶赴重庆，与斯特拉特梅耶等主要在华美国将领与蒋介石协商加紧运送国军进入华北和东北的计划。依照马歇尔的话来讲，“我国政府必须派遣军队从苏联的手中接收东北”，“中国东北占有战略上的头等重要地位。倘若东北不在‘对美国友好者’的手中，则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自由民主的阵营必败”^②。12 月 1 日，中国争取已久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正式宣布成立。12 月 1 日，美国国外清理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处理在华剩余物资，同时，印度和缅甸战区的剩余军用飞机 700 多架也开始移交中国政府，而已经延长到 1946 年 1 月 1 日的租借军事物资也正在魏德迈的指挥下陆续交付中国政府。1 月 1 日，美国海军决定在青岛设立一学校，专门训练中国军队使用两

①《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10 月—11 月卷，第 100—101 页。

②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上册，第 100—101 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编二章八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10 月—11 月卷，1945 年 11 月 10 日。



栖武器，“使中国水兵及军官能够操纵受降船只”^①。美方的上述举动极大地鼓励了蒋介石决定改变既定计划，他后来对当时的这一决策颇感后悔，认为当时不该接受美国和苏联的诱惑。他后来写道：

“当时俄方一再做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于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于这个最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②。

关于美国因素的影响，最形象地反映在斯大林 1945年 9月底和 1945年 11月初与蒋经国的谈话中。关于此次蒋经国访苏与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为史学家所引用的主要原始史料是蒋经国的回忆。蒋经国指责斯大林不但有“侵略”中国的野心，而且时时“企图离间中、美两国的关系”，他引用的斯大林谈话内容：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它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所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

①《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 10—11月卷，第 507—508、509—510页。

②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一篇 源章 10节，第 101—102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 10—11月卷，第 507—508页。



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党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信赖他”^①。

但 20 世纪 80 年代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这次会见有十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一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索夫斯基向斯大林准备的关于蒋经国访苏的预测报告、斯大林和蒋经国的两次会谈记录以及一封斯大林给蒋介石的信件^②。蒋经国与斯大林共进行了两次交谈。8 月 14 日双方谈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统一。蒋经国希望斯大林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共产党与政府进行合作，但斯大林对此含糊其词，时而表示“苏联政府从延安召回了自己的全部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中共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并不隶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不愿提出日后不被采纳的建议。加之中共也不来征求意见”。他还专门谈到俄共曾经建议中共前往重庆谈判，却“在中共党中引起恐慌不安”。时而又表示“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过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也未征求过意见”。当蒋经国提出有人认为中共反对政府是因为受到苏联的支持，斯大林仅只回答“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第二、中苏关系。蒋经国表示“蒋介石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反苏的事情，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等。对于

① 《访苏交涉记》，见《战后中国》（一），第 151-152 页；《蒋总统秘录》，第 151 册，第 151 页。

②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 14-15 页；《苏联解密档案》。



这种表白,斯大林不但没有什么反应,反而指出“迄今为止,中国代表一向反对苏联”,而且特别提到在旧金山和联合国会议以及伦敦外长会议。第三、东北问题。蒋介石向斯大林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主动提出中国愿意在东北门户开放政策的前提下“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并同意将“半数的企业转给苏联”,但不能以战利品的名义转让。此外,蒋还要求将苏联提交的 100 多个合办企业中部分重工业留给中国。斯大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做得使中国不感到有任何难堪”。但坚持经济谈判应继续进行,具体协议“可以在晚些时候签署”。第四、新疆问题。斯大林答应苏方出面调停。第五、中国对美国的態度问题。蒋经国表示中国期望中美苏三国结盟,并对美军驻扎华北进行说明,斯大林对华北日军未被解除武装的解释感到不解,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进入东北”。蒋经国还表示美国政府将协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的说法“不过是宣传而已”。但对此十分了解的斯大林当即指出“美国人已经帮助中国人在华南建立了几个师”。最后,双方还谈论了美国的对日管制政策等^①。

双方的第二次谈话是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与第一次一样。斯大林首先提出了战利品问题,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形式使苏联军人感到气愤。苏联军人说:他们流血牺牲,因此,应当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蒋经国对此未置可否。斯大林对中国内政的看法是蒋经国想极力弄清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扯到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但像上次一样,斯大林一直试图回避对该问题进行明确的表态,倒是莫洛托夫指责“在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协议以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斯大林

^① 1945 年 8 月 10 日,《苏联解密档案》,亦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第 285-286 页。



之后也表示了“苏联政府对国民党不满”、“中国需要建立忍让的制度,在忍让的情况下,其他党才能同国民党共存”。美国问题仍然是双方极为关注并涉及多方面的话题,斯大林虽然表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现在不能给予中国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望美国援助”。但是,他却对“美军不解除日军武装”大发疑问,莫洛托夫当即指出美国不但没有撤军表示,反而声明“为保障把中国军队调往东北并维护道路治安起见,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 10 万人”。在谈到接受外国经济援助时,斯大林专门举出了波兰最近拒绝了美国 1 亿美元的贷款,原因是“这些钱应按美国人的意愿花完,波兰人认为这个条件破坏了波兰主权”。他为此还鼓励中国“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沦为奴隶,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对于美国一再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蒋经国谈及杜鲁门政府曾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不反对在中国奉行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表示他曾告诉美国政府苏联不是东三省的主人,即使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也表示过“这是中国的事情”,“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斯大林显然不希望中国向美国门户开放,他接着表示“外国希望苏联门户开放。如果真的那么做,苏联政府就要完蛋”。并建议作为弱国的中国可以在表面上同意,但“为了建立自己的工业也只好晚些时候再关门”。在会谈最后,斯大林告诫蒋经国:“中国需要有自己对东三省、而不是别人对东三省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①。此处的“别人”和“其他国家”显然都是指向

^① 参见《斯大林与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1950年1月1日,《苏联解密档案》。在谈及苏联与门户开放政策时,海茵茨希的研究中表示斯大林的原话是“外国曾希望苏联开放,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了”。笔者推测这里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好在不影响对斯大林态度的了解。见《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道路》第 150 页。



美国。

苏联的解密档案出来后，相关学者纷纷对先前中国方面的相关资料产生了怀疑。诸如中国学者也不再使用蒋经国的陈述，薛衔天更指出蒋经国对斯大林的谈话内容进行了“重要篡改”^①。列多夫斯基则根据这些文件以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此次会谈肇始于中国方面的主动，甚至断言“多年来蒋介石本人一直想前往莫斯科，亲自同斯大林讨论苏中关系的全部，但莫斯科一直回避这种访问。”^②海茵茨希不但认为“蒋介石和蒋经国在论述这次谈话时并没有总是说出真话”，而且还推测中方之所以没有公开此次谈话记录，主要原因是蒋

①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薛衔天：《中苏关系史》，第187页注②。

②《斯大林与中国》第27页，中方提出蒋经国访苏是“应斯大林之邀”，见《总统》卷五（下）第272页；蒋介石后来对斯大林邀请他访苏以及他拒绝邀请一节，《苏俄在中国》第156-157页作了专门说明：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于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数据。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了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于斯大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斯大林，而皆为斯大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才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斯大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两国关系。若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经国的表现太过“软弱”^①。上述学者的判断都有一定道理，然而，蒋经国也并非刻意隐瞒此次会谈的内容，实际上，在返回长春后，他就将此次与斯大林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张嘉璈，后者在日记中记道：

“经国兄来谈，此次赴苏，代表蒋主席，晤史太林二次，谈约六小时，所谈大致如下：(1)关于东北经济问题，渠云战利品字样，不能取消，合办企业可分为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妥，撤兵后发表。(2)关于共产党问题，渠云国民党可与共产党共存，因无共产党，则国民党将日趋腐化。次后端看两党如何竞赛，终究必有一党获胜。(3)关于门户开放问题，渠云此为帝国主义之侵略手段。中国一面门户开放，一面应准备关闭门户。(4)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渠云中国表面与苏联亲善，暗中实在反苏，如此无法永久^②。”

张嘉璈所罗列的这源个问题基本上与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话内容一致，可是不知蒋经国为什么没有专门提及美国，但结合他随后向蒋介石的汇报，可以看出美国显然是斯大林东北政策中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在两次谈话中，他都明确地表露出对美国在中国华北驻军的不满、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敌视、反对美国介入东北事务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政府的美苏政策等进行了批评。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影响苏联此时此刻对华政策的一项主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外交部为斯大林准备的《关于蒋经国的来访》的评估报告中，该报告除了分析蒋经国来访的目的、可能谈到的问题、苏联应当争取的问题以及蒋经国的个人情况外，这份报告引人注目地多次提及美国，报告起草人苏联外交

^①海茵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道路》，第 58 页。

^②张嘉璈 1945 年 1 月 15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83-284 页。



部副部长洛索夫斯基认为蒋经国一定会打出美国牌，“显然在谈判开始或最后，蒋经国奉命将就美国在华作用问题安抚苏联。……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蒋介石为了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既想利用苏联，又想利用美国，尤其是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党政府和改造中国”。他认为在东北经济方面，“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的设备数量相当大”，可能会以“运入美国的设备”威胁要求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要求苏联投入资本和技术力量协助东北的工业发展，“他们将毫不掩饰地暗示美国资本将渗入东三省”。为此，备忘录建议苏联应当通过组织中苏合资公司、加强大连港口建设、组建苏中航空公司以及铁路等“积极参与东三省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无非是在杜绝美国对东北的可能渗透：

“如果说战前住在中国的是英国人和部分日本人，那么现在住在中国的则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渴望向华北和东三省渗透。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已经在我国边境上避开了日本，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①。

美国因素对苏联东北政策的影响，跃然纸上。

结 语

伴随着二战后期美苏矛盾的不断增加，两国关系逐步从战时合

^① 参阅《洛索夫斯基关于蒋经国来访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报告》，见1992年10月10日，《苏联解密档案》。



作走向战后对抗。原子弹的出现成为两国关系中的转折点，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美国不仅设法阻止苏联的参战，而且以各种手段对抗苏联可能的利益扩张。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围绕中国东北，美苏两国通过各自的支持对象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的对抗战。在美国政策的直接影响下，苏联的东北政策几经变化，从支持国共和谈到鼓励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从故意刁难国民党政府顺利接收到将中共驱赶出大中城市、从延缓撤军到提出经济合作等等，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和结构性因素。

在美苏两国的直接干预下，国民党政府将自己的主力军队逐步转移到了没有雄厚根基的华北和东北，中共也调整整个战略，将东北当成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根据地，并全力派出主力部队与指挥人员进入东北地区逐步发展壮大。由此，国共双方可能的冲突地理位置不但整个北移，而且也由于美苏的军事援助使得未来可能的冲突烈度大大升级。实际上，在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6 月期间，美苏在东北的对抗还都是暂居幕后，到 1946 年初，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两国在东北的争斗逐步浮出水面，并最终演化成为一场以美蒋和苏联中共为对垒的军事冲突。



第六章

三国四方在东北穴雪

1945年 1月 雪

从 1945年 1月中旬开始，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政策再次逆转，东北接收随之走入第三阶段的“停滞时期”。中共经过前两阶段的发展，在东北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并公开要求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围绕中苏经济合作的谈判，美国从幕后走出前台，公开批评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在各方压力下，苏联开始从东北各大城市撤军，但却将撤出地区的管辖权直接交给了中共。就此，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东北的较量逐步从前期的隐蔽方式演变成为公开斗争。

美国影响与中苏经济交涉的终止

1945年 1月中旬以来，中方不惜以外交破裂而撤出东北行营的做法使得苏联政策发生变化，中国政府的东北接收也随之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到 1945年 1月中旬，长春、沈阳和哈尔滨三大城市以及松江省、嫩江省都被行政接收；军事方面从山海关到锦州的部队也继续向北开进，在接收了新民之后，准备军事接收沈阳。然而，由于没有基本



的军事安全保障。上述多数接收有名无实，所谓行政接收只不过一纸空文，在很多地方，只身前往的行政接收人员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难有保障，更谈不上开展进一步的接管工作。实际上，苏联态度的好转并非全是由于中国压力而真心履行东北交接的协议，它的另一个目的则是旨在参与和控制东北的经济。因此，伴随着国民党政府行政接收的进展，中苏双方围绕东北经济问题又开始了另一场艰难的外交。

东北经济合作的要求是苏联在大量掠夺、接收和控制东北重要工业的最后一步，旨在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将霸占东北经济设施的既成事实合法化并对东北经济控制永久化。在此之前，苏军对其掠夺遮遮掩掩，对经济合作也是避而不提，在 1945 年 9 月 10 日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前者对张嘉璈关于苏军拆迁工业设备的询问仅表示“此事甚为复杂，……当知东北工业大部分已为敌人破坏”^①。然而，到 1945 年 9 月 14 日东北行营开始撤出长春的当天，斯拉特科夫斯基找到张嘉璈，表示苏方极愿意同中国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这是苏联首次正式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其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试探中国在东北经济方面与苏联合作的诚意与立场；第二、将苏联已经派人进驻诸多企业的既成事实通知中方，并强调苏方将以之作为合作的基础。苏联迫切希望掌控中国企业的事实尽快得到中方的承认，因而对经济合作表示出非常主动的态度。斯氏在会谈中多次表露这种心态，反复询问双方合作的“成功希望”。张嘉璈没有当场表态，表示一切均须请示政府，但表明中国难以接受这种以苏方为主人邀请中国加入的方式，继而提出可以部分以苏联为主中国为辅和其余以中国为主苏联为辅的方式进行合作，因为他熟知苏军已经接管了许多企业，因此提出希望

^①张嘉璈 1945 年 9 月 10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526—527 页。



“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之所负责任太大。且苏方之种种阻挠，已使我方无法信任”。张嘉璈的判断不差，经历莫斯科谈判磨难的宋子文反对在这种时候谈论任何形式的合作，而王世杰则坚决主张在没有顺利接收东北以前，不谈任何经济问题，否则“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①。宋、王两人的态度基本决定了中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张嘉璈最后得到的交涉原则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苏军未完全撤退与中方未完全接收之前，此类讨论“将予外间以不良之误会”；

第二、中国愿在行政接收完成后“与苏方详商经济合作办法”；

第三、中国政府在自己的法律与经济建设方案的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②

这三项原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苏联东北经济合作的要求。5月缘日，蒋经国、张嘉璈再次赶赴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行营撤离后的新一轮谈判，在首次会谈中，苏方对中国的各种要求都表现得极为合作，但最后再次明确提出尽快开始经济合作的谈判要求。“其言外之意，经济问题与接收行政，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张嘉璈当即表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工业资产，均应作为赔偿中国作战损失之用。在接收完成、苏军撤退后，中国愿与苏方谈判以下各点合作办法：第一、订

①张嘉璈 1945年 5月 22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44-245页；《总统》卷五（下），第 245页。

②张嘉璈 1945年 5月 22日日记；5月 24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45页。



立以货易货协定，以员- 圆年为限；第二、中方延用苏方技术人员；第三、东北工矿业如需开发资金，苏联可根据中国有关法令进行投资经营；第四、苏方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进行讨论。最后，张嘉璈解释中方此举的主要原因在于“避免引起国民之误会”。针对中方上述声明，马林诺夫斯基针锋相对地反复强调必须首先开始经济合作谈判，他还暗示苏方将把经济谈判和整个接收相挂钩。会后，张嘉璈对中苏双方的政策步伐与策略变化颇有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

“苏方因撤兵时间急迫，处处争取时间。如 11 月 15 日我方以行营撤退决定通知苏方，苏方即于 17 日通告我方苏军缓撤，帮助我在东北建立政权。此通告含有两种作用：一来表示其遵守中苏协定之精神，一则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其外交手段之敏捷，令人佩服。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尤以宋院长认为对于苏方交涉，不能有所成就，结果无非徒劳，王部长谨慎小心，处处从法理观点立论，今在重庆与各方接触后，深虑中苏交涉或将归于失败”^①。

苏方不理睬中方的立场，11 月 21 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再次催促张嘉璈对苏方经济合作方案进行正式答复，在这次会谈中，两人围绕战利品、苏联接管满洲重工业的方式等发生严重争执，当张嘉璈表示“中国舆论始终不明了何以将以前日人集中重工业于一处的办法仍须继续”时，斯氏激烈地抗议中方将苏联与日本相提并论是对苏联“莫大侮辱”，强调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自己承认服务于关东军，说明

^① 张嘉璈 1945 年 11 月 21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45-246 页。



苏军接管的合理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斯氏最后表明“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之解决”^①。

几天后,斯氏再送两份清单,一份是苏联要求中苏两国合办的企业清单,另一份是苏联政府决定要交还给中国政府的企业清单。在前一份清单中,主要包括煤矿 19 座、电厂 15 处、钢铁工业类制造与选矿工厂 12 处、铁矿 10 处、砖厂 10 处、非金属与轻金属类 15 处、机器制造厂 12 处、化学工厂 10 处(其中包括炼油厂 10 处和页岩油工厂 10 处)、盐场 10 处、洋灰厂 10 处、民用飞机场 10 处等,共计工矿 100 处和 10 个民用机场;后一份清单包括电厂 15 处、煤矿 19 处、钢铁厂 15 处、机器制造工厂 12 处、电机制造工厂 10 处、其他制造厂 10 处、洋灰厂 10 处、炼油厂 10 处、炼煤厂 10 处、纺织厂 10 处、食品工厂 10 处,共计 100 处。苏方备忘录说明属于两国合办的企业估价为 100 亿元、归还中国的为 100 亿元,并建议成立北方煤矿、南方煤矿、钢铁、非铁金属、机器制造、水电厂、火力发电、化学工业、洋灰工业、民用航空、松花江轮船等 10 家公司,苏方将在钢铁、非铁金属、水电厂、民用航空和北方煤矿 10 家公司中占股份 50%,其余为 50%,在占据 50% 股份的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正职均由苏方担任,副职为华人。正如苏方提前告诉张嘉璈的那样,苏方要求合资经营的企业已经超出了它先前一直强调的军工产业,如大连造船厂、四平街炼煤厂、锦州炼油厂以及分别位于本溪湖、大连、哈尔滨和抚顺的洋灰厂等^②。

张嘉璈对两份清单进行了详细比较和研究,并写下了长篇的分

① 张嘉璈 1945 年 10 月 20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00-101 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00-101 页。但是,在诸多的台湾资料中,一直声称苏方在 1945 年 10 月 1 日就已经将一份包含 100 种企业清单交给了中方,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10 月 1 日卷,第 100-101 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00 册,第 100 页;李守孔:《民国革命史》,第 100-101 页。



析报告,对各种工矿的产量、藏量、发展状态与前景以及各种企业的现状、发展等都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并一一分析中方是否应该与苏联合作、合作的程度、范围等等。他认为苏方虽然依仗已经抢占和接管的主要重工业为基础,不乏以此要挟中国进行合作之嫌,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不少方面也的确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与必要^①。为此,他向重庆提出可以借助经济合作采取局部让步以换取政治顺利接收,建议派遣资源委员会有关人员赴长春主持经济谈判,但重庆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依然拒绝具体合作事宜的讨论,并坚持首先解决战利品问题。缘日,从北平返回长春的蒋经国带来了蒋介石的指示:不能承认苏联的战利品,但可以将部分日本投资由中国政府作为苏军在东北战争中的损失予以补偿;关于组织中苏工矿公司的问题可以商定;“苏方要求合办事业之种类,能挽回若干,即做若干”^②。

蒋介石的指示与苏方的要求相去太远,张嘉璈决定飞赴南京亲自游说与请示。缘日,蒋介石、王世杰、蒋经国、张嘉璈等再次协商决定如下:第一、给予苏方延期撤兵补偿费国币(即东北流动券)亿元,不再谈战利品问题;第二、关于苏方提出的合办东北企业的种类,将由经济部讨论后再派人赴长春与苏方讨论;第三、可以分成若干合作公司,以避免以往沙俄以及日本在一个机构之下的合作方式(如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但电力事业不能合办^③。回避战利品即等于不承认苏方已经强行接收的资产,实际上也等于回绝了经济合作的探讨。无奈之下,张嘉璈不得不对苏方的经济外交攻势采取推诿和拖延。日返回长春后,他到日才通知苏军经济代表,声明关于今后的经济谈判将由政府派专人来长春进行交涉,并转告了中国政府

①《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缘缘-缘页。

②张嘉璈缘年缘月缘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缘页。

③张嘉璈缘年缘月缘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缘-缘页。



的上述几条原则。之后,他以前往沈阳和哈尔滨视察工作为由离开了长春。苏方对中方的拖延极为不满,在 1945 月底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斯大林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取消战利品字样,合办企业可以接受中方的意见分为若干公司,但一切均须在撤兵前谈妥,撤兵发表”,他还警告“中国表面与苏联亲善,暗中实在反苏,如此无法永久”^①。显然,中方在经济合作上的态度已经成为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在经济合作的谈判悬而未决之时,双方在房产问题上再生纠纷。1945 年 1 月 17 日,马林诺夫斯基要求中国政府批准苏联商业机构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购买房产。原来,苏方已经完成了这些购买(我们不了解“购买”细节,但估计与上章所讲的接收东北重工业株式会社的经过差不多),但在当地政府办理登记手续时遭到拒绝,理由是在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曾宣布所有敌伪产业一律没收归政府所有,当地政府无权处理。张嘉璈对此也是未置可否,但以联合国国家宣言中有“凡敌产均不得任意处分”的条款加以说明,表示将请示外交部^②。之后,几经折冲,外交部决定不满足苏联的要求,指示“苏方在国内购置房地产,因首先现行法律与条约之限制,无权做其他之处置”^③。

苏方“大为不满”,斯拉德夫斯基加紧催促中方对经济合作方案进行答复,“似甚着急”。1 月 21 日,经济部谈判代表孙越崎到达长春,并带来了如下原则:

① 张嘉璈 1945 年 1 月 15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83-284 页。

② 张嘉璈 1945 年 1 月 17 日日记,1945 年 1 月 17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83-284、285-286 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85-286、287-288 页。



第一、东北地区的所有日伪产业均为中国所有。鉴于中苏友好期间,中国愿意拿出一些具体的工厂与苏方进行合作;

第二、关于具体合作办法的正式谈判须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后才能开始;

第三、在苏方未撤退完成前,中国方面先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与苏方进行初步会谈,交换意见;

第四、东北电力不在合办之列;

第五、矿冶也应极力避免合办,如果苏方坚持“可合办少数煤矿”,中方须占多数股份,而且其董事长与总经理均由华人担任;

第六、可以合办的仅只包括本溪湖钢铁厂和一部分机械制造厂,所有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均由华人担任,“总经理应保留由中国人充任之机会”。根据对经济部长翁文灏后附了一份很长文件的分析,中国政府实际上只同意合办中苏煤矿、中苏钢铁和中苏机械三个公司。

张嘉璈对这份期待已久的最后方案十分失望,认为这种只注重“主权与法理”的态度将会严重妨碍政治与军事的顺利接收。当晚,他致电蒋介石和翁文灏,“力陈目前东北情势,危机四伏,大局岌岌可危。请将我方所提,再加放松。……盖距离苏军撤兵期,只有半月。如此迁延,徒使苏方做种种不利于我方之准备与布置,将更增接收之困难”^①。

次日,他与蒋经国、孙越崎一起讨论了整个局势,认为中方应在经济合作方面作出更多让步,他们仔细分析了东北的工业状况以及

^①张嘉璈 1945年 8月 26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44-245页。



对照两国政府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在煤矿、电气、非金属工业和化学工业领域增加与苏方合作的厂家数目的两步方案，在呈送蒋介石和翁文灏的电文中，张嘉璈表示：

“对苏工矿合办事，经璈与越崎再四研究，因撤兵期近，此时彼方急要解决，商谈较易。否则撤兵以后，彼方籍口战利品，按照开列合办原单各事业，派兵保护接收时交涉，恐更困难。若中央决策，照越崎携来指示，始终不再让步，本无不可。否则不如趁彼方希望合作之时，先作让步，表示诚意与坚决，能得一气呵成，反可少受损失。”^①

张嘉璈还是低估了重庆的反苏决心。两天后，蒋介石亲自来文，不但完全否定张嘉璈的让步方案，而且还提出了比先前指示更为强硬的方针：在基本原则方面，要求对战利品“不承认”也“不应提及”；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附属企业以及抚顺煤矿（张嘉璈建议进行合作）“决不在合办之列”；前南满铁路路线以西地区的所有企业工厂“皆不合办”，而张嘉璈建议的北票煤矿“自不在合办之列”；东北航空以及松花江航运“不应列入合办案内”；各种工矿合办公司，我方股份必须占缘豫，而且董事长及总经理均由华人担任。在具体的合作方面，蒋介石要求鞍山钢铁、木粕工厂以及部分化学肥料必须由中方经营，非铁金属矿“此时不谈”^②。接到这份新指示后，张嘉璈感叹“由此可知外交部之尚在斤斤计较于原则与法理，而昧于东北中苏关系之特殊，与国家大局之危机”。他认为影响蒋介石东北决策的原因：

① 张嘉璈 1945年 9月 13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46-147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46-147页。



“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咏霓。宋王两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尔仅作工矿合办事业选择之贡献。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紧缩，不宜太宽之指示。”^①

苏方攻势不断，圆日，斯氏送来参加合办企业的公司及个人名单，再次催促中方表态。张嘉璈无可奈何，决定将之转交经济部。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翁文灏都感觉张氏的艰难，纷纷来电鼓励与劝慰，翁文灏希望张氏继续与苏方商谈，但声明关于苏方所提具体方案“当由主座专电指示”。圆日前来长春慰劳苏军的宋美龄也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书信，告诉张氏无需担心责任问题，“长春交涉，此时只有兄折冲协商，好在非正式，故未有主管之责任”。无奈之下，张嘉璈几天后将中央的《中苏合办东北工矿企业办法原则》以及《租地购屋备忘录》一并交给了苏军经济顾问。与苏联的方案相比，中方方案不但大大削减了合作企业的数量，而且对合作企业的质量也进行了刻意筛选。斯拉德科夫斯基抱怨中方将电气、非金属、航空以及鞍山钢铁厂剔出合作方案，“无异拒绝与苏联合办钢铁事业”，而所提出的合办煤矿，“大部分含有灰质，产量不高，设备不充，估计全部产量只有 元”，表示这样的经济合作实无“商业基础，等于在沙漠地带种红萝卜，势将中苏合作精神，完全牺牲”。斯拉德科夫斯基表示中方的方案“无法使每一个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请张氏再加考虑，并直接威胁“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②。圆月 员日，马林

①张嘉璈 员 圆 年 员 月 员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远 圆 页。

②《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远 圆 页 远 圆 页 远 圆 页。



整体门户开放政策”。为此,他和马歇尔一同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坚持满洲日本工业资产不是战利品并不能用于战争赔偿的立场,抵抗苏联要求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尽快这样做,并力求独立于中苏对话”^①。1月10日,马歇尔告诉王世杰,对于苏方的经济合作要求,在中国政府地位没有加强的情况下,“不必立与解决云云”^②。

苏联对东北的经济野心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整个苏军占领东北期间,美国各大媒体始终关注苏联的举动,美联社、合众社等对此均有报道^③。1月10日,一名在沈阳的美国记者向《纽约时报》透露,美、英记者亲自察看了沈阳附近的工厂,发现了“机械设备被精心拆卸的证据和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掠夺的痕迹”。这位记者还称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顿·斯坦科维奇曾公开讲到:“关于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三巨头协定,不能留在原地,所以才发生了一些设备被拿走的事件”^④。该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联政策以及东北形势的担忧,贝尔纳斯专门为此出面解释美英苏三国从未达成“允许苏联可以没收满洲境内之机器或工厂设备”的任何协议^⑤。苏联的经济掠夺在美国政府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尽管苏联在德国也实施了同样的行动。但人们普遍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苏联在东北参战的时间屈指可数,苏联东部本土没有遭遇日本的严重破坏,而且东北还是中国

① 王世杰1945年1月10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② 王世杰1945年1月10日日记,《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③ 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第105-106页。
④ 新华社1945年1月10日电,《新华月报》1945年第1期。
⑤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128页。



的领土。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当局占领满洲期间，他们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却奉行了掠夺性帝国主义的最赤裸裸的原则”，“如果英美联军赶走法国的纳粹后将法国的工业设备一并拆卸并运回英美，法国人会做何感想？”^①

为了进一步引发美国对中苏经济交涉的关注，圆月缘曰，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了中苏两国的非正式经济合作谈判。结合哈里曼以及马歇尔的上述建议，东北局势立即引起杜鲁门政府的关注，怨曰，国务卿贝尔纳斯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强调各国均享有平等的贸易机会，同时，他要求美国驻苏代办凯南以及驻华大使馆分别向苏联和中国政府发出正式照会，声称中苏两国处理满洲工业的交涉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依据中苏条约，苏联与中国共同控制东北的主要干线，但条约“没有提及任何对满洲工业的相应控制问题”。然而，美国政府十分“不安”地听到中苏两国正在进行“对满洲工业实施排他性地中苏控制”的谈判，“依据这种情形，其他国家人民将不得自由进入满洲，而失去参与满洲经济发展的平等机会。因此，美国认为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东北工业的有关谈判，将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成为对任何可能参与满洲经济发展的美国人士之明显歧视，并可能使美国商业利益于将来与满洲建立贸易关系时居不利地位”。接着，照会矛头直指苏军的战利品定义，

“本政府认为对包括满洲工业在内的日本海外资产的最终处理将涉及到为打败日本而共同承担重负的所有联合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关注。……因而，在此关头，任何以‘战利品’名义拆迁满洲的工业设施或以中苏政府协定对之进行控制或掌握的做法

① 宰 舞 宇 奕 魏 国 悦 舞 宇 奕 魏 国 悦 舞 宇 奕 魏 国 悦 舞 宇 奕 魏 国



对日本的海外资产作出最后的处理都是非常不合适的”。^①

照会最后还要求中苏两国能够将任何涉及处理东北工业的讨论及时告知美国政府。中、美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公开表态也引起了英国政府对苏联东北政策的关注，其外交部远东司官员认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行为是其全球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完全恢复 1911 年前在东北亚的优势地位。苏军的延缓撤退显然在于有足够的时间“尽可能地以战利品名义拆迁日本设备”、“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权”，并试图将美国自中国华北撤军作为苏联从东北撤军的条件等等，令人十分“担忧”。他们建议英美高层拿出一项对苏联“联合政策”并决定是否有必要向苏联“显示我们的牙齿”。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英国政府也正式向苏联政府和中国发出外交照会，表明英国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拆迁行为十分“不安”，声明英国政府在与盟国共同处理日本战争赔偿方面“保持所有自己的权利”，提议由日本资产和设备的所在国政府对之进行接管，并从未来的赔偿中扣除。英国立场显然与美国同出一辙，主张由中国政府而不是苏联接管东北的日伪产业^②。

美英照会以及哈里曼等人对东北的担忧体现了中国外交对美国的影响。反过来，美英的外交行动又对中苏两国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

^① 我英外交部对美英照会之反应，载《美国外交文件》第 13 卷，第 124 页；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见《战后中国》（一），第 244 页；《总统》卷六（上），第 278 页。

^② 我英外交部对美英照会之反应，载《美国外交文件》第 13 卷，第 124 页；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见《战后中国》（一），第 244 页；《总统》卷六（上），第 278 页。



影响。圆月初,当张嘉璈回到重庆准备为说服蒋介石以经济合作换取东北接收做最后的努力时,已经对美国态度有所知悉的蒋介石当即指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张嘉璈深知此中原委,当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大肆宣扬美国反对苏联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反对中苏双边经济谈判时,他就认为美国政策将“使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者,觉得吾方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此后谈判将益增困难矣”。但他还是提醒蒋介石如果一味拒绝苏联的经济要求,将会进一步延迟苏军的撤退,最终导致苏方全力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建议“一则绝对不再与苏方讨论经济合作;一则再提答案,做最大之让步。同时亦提出希望苏方必须履行之条件,再与苏方商谈一次。商谈地点,应在北平,或在重庆,免有对外交涉地方化之形踪”。蒋介石答应考虑,并在几天后决定允许将苏方要求的鞍山钢铁厂和鹤岗煤矿加入合作之列,也同意将东北航空纳入合作之列,称之为“最后之让步”。然而,在接到美国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立即作出改变,决定不再派遣翁文灏赶赴北平与苏方进行经济合作谈判,继续由张嘉璈返回长春交涉^①。蒋介石的这一决定显然来自美国照会的影响,就在接到美国备忘录和贝尔纳斯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消息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中苏之间没有正式谈判,但就经济合作事宜进行着非正式商谈,“并无不可公开告人之事,美国政府如有此愿望,则我们当可随时告知”^②。

中苏经济谈判以及苏军再次延宕撤退等消息的公开,激发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对东北局势的关注和强烈的反苏情绪。以 1945 年 8 月 14 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秘密协议为爆发点,圆月中下旬由重

^①张嘉璈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47 页。

^②《总统》卷六(上),第 247 页。



切不能解决”^①。同日,他向王世杰提交书面备忘录,抗议中国国内的学生运动,声明游行“系有组织举动,且侮辱苏联最高领导者,中国政府应负责”^②。在此期间,苏联又公布了与外蒙古重新订立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③。与此同时,留驻长春负责东北接收的军事代表董彦平报告原定松江、嫩江、辽北、黑龙江、合江等地的接收工作“渐遭掣肘”^④。此外,苏军不但增加旅顺的部队,并在东北各地相继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政府示威:

“俄军在长春大举演习,且在沈阳直逼我军驻地,仅距离100公尺,向空鸣枪发炮示威,但我军沉着镇定,未予还击,彼乃自行退去。又苏俄自东北运走工业设备,夺取我已接收之长春电气总公司,停止我金州一带电力之供给,使我工矿事业不能开工,一面掩护‘共军’扩张势力,使之为虎作伥,制造傀儡,分裂中国。而其在新疆亦复如此,苏俄侵略我国之野心,昭然若揭”^⑤。

在为中方接收东北制造困难的同时,苏军看到东北经济合作已经完全没有了指望,由此继续加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猿月中下旬,中国政府驻海参崴、伯利、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等地的外交官相继

①张嘉璈 1945年 圆月 19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第 124页;王世杰日记中没有提及彼得罗夫的上述语言,谈到后者对中方的反苏游行表示抗议。《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雪第 104页。

②《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24页。

③“至此,外蒙古在所谓‘独立’名义之下,并入俄人势力范围矣。”《总统》卷六(上),第 120页。

④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 104页。

⑤蒋介石 1945年 猿月 19日日记,《总统》卷六(上),第 120-124页。



报告看到大量的装载东北工业设备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到达苏联境内^①。

在对中国政府强硬的同时,苏方也针锋相对展开了对美外交。猿月缘日,苏联政府对美国圆月怨日的照会进行答复,提出战利品和战争赔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苏联政府“不可能同意中苏谈判与日本赔偿的问题直接关联的立场”,“也绝不可能同意你们的声明:即上述中苏公司的设立会导致中苏两国对满洲工业的排他性控制,因为正如上文中所言,只是一部分工业企业被转到了中苏公司的管辖之下。对于上述中苏谈判会导致对美国人的歧视以及与门户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声明是毫无根据的”。苏联的答复当即引起了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凯南的警惕,他提醒国务院这意味着苏联是战利品内容的“唯一裁定人”,“该解释明显使下述现象成为可能:即因为没有其他政府能够质疑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毫无节制地扣留或搬迁满洲任何他们看上眼的设备与资产。……这种态度明显与我们处置日本赔偿问题的方案相互冲突”^②。

国务卿贝尔纳斯显然也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就在凯南向国务院发送上述苏联回复及其警告的同一天,贝尔纳斯也向驻苏大使馆发来了一份新指示,通报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圆月怨日照会的答复,要求凯南通知苏方,美国“完全赞同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也明确表明美国支持中国政府的态度:

“本政府不接受对包括诸如满洲日本工业和设备等工业企业或其组成部分在内的任何战利品的解释,因此,也绝不接受

① 《战后中国》(一),第 圆原- 圆原页。

② 裁割流用某子情界之精曹战此界力运决技自顺情之深固明以志地瑞立则影兼云能杂成踪,增器怎考察课费技新玩因- 苏苏裁



不与任何第三国合作。苏联民性纯真，惟有以鲜血维持友谊”^①。

同一天，苏联塔斯社发文谴责中国“秘密中央”下令在东北组织秘密反苏活动。1945日，东北苏军司令部以及莫斯科广播播发了长春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的讲话，称苏军延缓撤退的原因纯系中国政府的需要，并将苏联的撤军与美国在华驻军联系起来，声称：

“东北苏军指挥部规定苏军撤出东北，一定会在美军指挥部把美军撤出以前，但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迟于他们。这样一来，在许多中外刊物上登载关于苏军故意延期撤出东北的各种消息，是反动的反民主分子的造谣，和仇视苏军的结果，这些分子会企图切断中国人民对把东北由日寇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红军之信任与好感”^②。

美国的政策以及美苏的公开分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舆论和民众的对苏态度，结合1945月底开始的全国性的反苏爱国学生运动，东北迅速成为194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张嘉璈忧心忡忡，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
- ①董彦平还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在酒醉观看戏剧时对他讲：“‘别的国家帮助你们中国，是为了他们本身利益，而我们苏联帮助中国，仅是基于衷心的正义。你们国家认识不清楚，也是你们的错误。如其他国家挑拨吾人之友谊，侵犯吾人之利益时，我们应当共同起来反抗，并予以教训。’元帅夫人急掩元帅之口，劝其观剧，勿作多言。”《苏俄据东北》，第144页；张嘉璈1945年12月10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144页。
- ②《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2月卷，第144页；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44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第144页。



谈判恐难于苏军撤退之前商谈”^①。

实际上，这是中方就苏军在 圆月 员日未能如期撤军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抗议，也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东北工业设备的拆迁问题，断断续续维持了数月的中苏经济交涉也就此被中方正式拒绝。至此，中苏外交走向公开破裂，中国政府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的整个计划也完全化为泡影。

国民党政府接收失败与中共的进一步发展

苏方对中国接收东北的全面刁难从 员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在苏军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 员月 员缘日得知中方拖延经济合作谈判后向中方发出警告的第二天，连续发生了数起重要事件，标志着苏联政策的再次逆转。第一，苏方代表拒绝了已经答应的派遣苏军协同行营接收吉林的某一矿区，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停战令，苏联不想干预中国内政，而且如果中共不攻击苏军，苏军“即不予顾问”。第二，行营在长春编组的保安队 员月 员日 员人外出训练重返长春市时，被苏方缴械且将全部人员扣押，张嘉璈当即指出“要在去岁十二月中，苏方提出经济合作方案后，中央即应派一小组，包括有关部会来长，日夜讨论，就地磋商，迅予解决，则中共非法武装之滋长，不致如此迅速。苏联扶植中共，势必略存观望。当然苏方态度更不致有如今日之恶化”^②。第三，苏军违背协议，突然撤销了对东北行营派往接收抚顺煤矿的专家张莘夫一行 苑人的安全保护，并拒绝接收，使之在

① 王世杰 员缘年 猿月 猿源缘远苑日日记；《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大使馆照会》，员缘年 猿月 远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圆页。

② 张嘉璈 员缘年 员月 员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员圆页。



空手回沈阳的途中遇难^①。这显然与斯拉德夫斯基的警告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声称鉴于中方剔除了苏联方案中的诸多要求合办的企业，“苏联不能不认为所有未列入之事业，即中国方面不愿与苏联合作。因此苏方不能不认为所有剔出之事业，均归苏方所有”。因此，他们不但拒绝向张莘夫转交抚顺煤矿，而且间接导致了悲惨事件的发生^②。

以上述事件为起点，苏方对国民党政府接收工作的阻挠全面展开。员月上旬，杜聿明的部队进驻并军事接收了营口，但几天之后，中共就在苏方的支持下对营口发起围攻，并在中旬占领了盘山和鞍山等地；员月员源日，杜聿明受命前往接收新民和彰武，苏军不但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自行撤退，反而在中国军队进驻城市后继续增兵，新民的圆园人增至猿园人，彰武的缘园人增至员缘人；员缘日，中国政府军按照事先约定乘火车进驻沈阳，但在接近沈阳火车站的同一地方分别两次遭到苏军的枪击^③；员月下旬，苏方拒绝提供保护，提出由行营自行设法赶赴大连接收；通知中方禁止中国政府收编沈阳和奉天的秘密武装；在中长铁路局的组成方面，苏方又新提出增设助理局长，“大起争辩，约费两小时半，无结果”；员月猿园日，当行营派人前往接收长春附近的九台县时，在火车站遭到当地武装力量的包围而不能下车，董彦平要求协助但苏方明确拒绝。至此，东北接收进入“停滞时期”^④。

与接收问题的出现相一致，苏军的撤退问题再度激化。随着圆月员日最后撤退期限的临近，苏方不但没有任何撤退迹象，反而还在诸

① 陈嘉骥：《张莘夫殉国猿年》，载《台北雪传记文学》第圆卷第猿猿源缘期，员猿年圆月。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猿页。

③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猿-愿页。

④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猿苑-猿猿页；《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接收报告》，载《战后中国》（一），第愿-愿页。



多地方增加兵力。员月 圆日，中苏友好协会来人传话，由于“若干问题未达解决”以及中长铁路的燃料不足等，苏军的撤退日期“恐须延展”。“若干问题”当然指的是经济合作^①。圆月 员日，原本为苏军撤退完成的最后期限，苏军不但没有任何表示，而且在中方军事代表董彦平专程询问时，还无理地表示苏军在运输和燃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已经在员月 员日开始从沈阳撤军，“至于自长春、哈尔滨撤退日期，因限于交通条件，无法确定，现在即使将撤退日期通知，恐亦不能确实履行也”^②。在重庆，中国政府分别于员月 圆日和圆月 员日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和次长刘诤亲自出面，正式致函苏联大使馆质询苏军撤退问题，但彼得罗夫均以没有接到政府指示为由尽力回避。苏方不能如期撤兵的解释或许不全是借口，但直接原因还在于经济合作，因为就在圆月 员日撤退期限的最后一天，马林诺夫斯基亲自出面与张嘉璈会谈，主要内容皆围绕经济合作问题，马氏说道：

“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籍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余深悉中苏决不至作战，但惧有狼披上羊皮之外国势力侵入满洲。且日本虽已战败，难保数年后，不再成为作战之因素。……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犹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到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故应对此问题，谋诚恳的、现实的解决。而华方所提对策，决不能使此问题获得解决。……总之我

^① 张嘉璈 员圆年 员月 圆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远页。

^②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 愿页；《张嘉璈主任委员之蒋经国特派员告苏军缓撤之理由电》，员圆年 员月 圆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页；张嘉璈 员圆年 圆月 员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远页。



方希望从速解决一切问题，俾苏军可从速撤退。”

马林诺夫斯基的坦率与警告使得张嘉璈大为焦急，“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不能再事迁延不决矣。故决定即返渝一行”^①。然而，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对苏联经济合作要求的表态、苏联对东北经济掠夺的日益公开、苏军第三次延长撤军以及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等，蒋介石最终决定完全终止经济合作的任何对话，并将苏联拒不撤军的事实公诸于世。对此，苏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外交。圆月 圆日，苏军在长春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苏军原计划在 员月 员日全部从中国撤出，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请求”和“第二个请求”，最终不得不延期至 员月 员日。苏军已经从 员月 员日开始自沈阳撤退，“并且极大部分苏军已经由东北撤出了”，“之所以发生了一点耽误”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政府军队十分缓慢地来到苏军所要撤退的地带，因此苏军指挥部无法把苏军所要撤退地带的政权交给所要来接收的人。此外还有去年秋季，中国当局屡次向苏军指挥部提出要求，说苏军[不能]不等待中国政府军队来到就撤退。苏军指挥部不能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同样还有一种情况，东北铁路和车辆倍遭受红军打击而败退的日本军队所破坏，所折断了，石煤不足，冬季的条件，所有的一切，就严重地妨碍了东北铁路的运输”^②。

最后，苏方又将美国扯入其中，声明苏军撤出东北“一定会在美军指挥部把美军撤出以前，但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迟于他们”。苏军将

①张嘉璈 员月 员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员页。

②《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员页。



中国国内报刊上谴责苏军故意拒绝从东北撤退称为“反民主分子的造谣和仇视苏军的结果”。猿月 苑日,王世杰再次照会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声称关于苏军撤退问题,中国政府已分别在 员月 圆日、圆月 员日、圆月 苑日三次正式照会苏联政府,但“贵大使均以尚未接获报告为答”,要求彼得罗夫“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并将其撤退详情惠予见复为荷”。但苏联大使不但不对撤兵问题进行任何表态,反而继续询问中国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进展,王世杰大为恼火,抱怨苏方“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一张纸上的文字”,而且正式告诉苏方因为苏军对东北工业设备的拆迁与掠夺,“中苏经济合作之谈判恐难于苏军撤退前商议”^①。

中方此举完全打消了苏军以延缓撤军为要挟达到经济合作的算盘,但同时也将自己的东北接收推入僵局。在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苏军从猿月份开始撤军行动,但与此同时也向中方作出种种刁难行为,使得双方关于撤离地区的交接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圆月 圆日,苏方在事先毫无通知的情况下,从沈阳开出 员辆军车到西郊中国军队驻扎的地方,大搞军事演习,向中方示威。猿月初,长春苏军也进行公开的军事演习。猿月 远日,苏方军事代表向董彦平提交书面文件,对中国政府行政接管下的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齐齐哈尔等市的用水、卫生、电力、警察、消防、商业等一一抱怨,声称中方对苏方的屡次通知“除了口头上许诺以外,关于铲除这些不常规的现象,什么也没有做”,要求中方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规生活”。从猿月 愿日开始,沈阳、长春以及齐齐哈尔等市的苏军开始频繁调动,撤退的迹象越来越清楚,但苏方却没有对中方军事代表团透露任何消息。当董彦

^①《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员圆年 猿月 远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圆页。



平主动向苏方质询时，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增科等人均以“公务繁忙”、“奉令公出”和生病等理由拒绝会见，致使董彦平大为焦急，指出苏方此举故意造成“绝缘状态，避免接触，揆其用意，当系已布置从沈阳撤退，恐我方坚持正式接防；乃故作疑阵，使我方无从作接防之部署”。直到 15 日下午，特罗增科才通知董彦平苏方将于 16 日全部撤出沈阳^①。实际上，苏军在第二天就全部撤离，不仅如此，16 日深夜，驻扎在沈阳至长春交通要道四平苏军也突然全部撤离。

16 日，董彦平再次与特罗增科交谈，后者承认除了离开铁路沿线外出采购共 15 人的两个小队“因奉命不及”，以及在海城和沈阳留有少量的通讯部队外，整个长春以南的苏军部队已经全部撤出。对于四平被中共占领的质询，后者表示“我方尚不及贵方所明瞭者为多”。而对关于哈尔滨、松江、嫩江等地中方接收人员人身安全加强保护的要求，苏方仅表示中方“并无理由认为其安全及自身已受威胁”而未作任何承诺。不仅如此，他还在最后就沈阳苏军撤离后个别俄籍人员被害，以及铁路交通受阻等问题向中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根据有关协定维护铁路畅通。至此，双方关系公开恶化，董彦平当即建议撤离长春等地的不必要人员，“以防万一”^②。

与接收形势一样，之后的两国外交也流于形式。在中国政府的反复询问下，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直至 16 日才正式通知苏军将在 1 月底以前撤退完毕。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苏军从东北延长撤退时间的责任归咎于中国^③。两周以后，东北苏军正式宣布各地的撤兵日期，表示依照计划可以在 16 日以前全部撤至苏联国境，但 16

① 董彦平：《苏俄据中国》，第 152-153 页。

② 董彦平：《苏俄据中国》，第 152-153 页。

③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四月底撤退完毕照会》，1945 年 16 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152 页。



份从长春等地相继传来苏军撤退对大学校舍、工厂厂房等地加以焚烧和破坏、并协助苏籍侨民强行占领“最坚实最漂亮之新式住宅”等，而且还发生了中方再次要求苏联军队局部延缓撤退的谣言等^①。

苏军全部撤离中国边境的最后时间是 缘月 猿日。此时此刻，国民党的军队还正在四平以南，对于撤退后的交接问题，苏方已经全然置之不理。关于这一政策，猿月底特罗增科在与董彦平的一次谈话透露了真相：苏军在 源月底以前全部撤出中国。对于长春，中方可以在苏军撤离后开入，但在此之前须停留检疫。而对长春以北的地区，苏军不管中国军队能否到达，照样撤退，如果中国军队不能按时赶到，苏军“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②。

特罗增科此处的“地方现存之武力”当然是指中共力量。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接收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整个东北特别是北满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苏联政策变化的压力。自从 员月底苏联政策突变迫使中共退出各大城市以来，中共集中主要力量发展东北农村乡镇，反而使得在东北的整体力量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到苏军撤出东北时，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已经在整体方面强于国民党政府。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员缘年 员月下旬苏方为了避免外交破裂而要求中共退出各大城市至 员源年初，在此期间，中共迅速调整对策，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不但没有终止继续对各大城市的渗透和发展，反而利用这一时机迅速扩展和强化了对东北乡村的控制。在中央的直接命令下，东北局将最重要的领导分散到东北各地，并相继成立东、西、南、北满四大分局和军分区，领导各地的根据地建设。

① 《战后中国》（一），第 员猿页；《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愿- 愿、愿- 愿页。

② 《董彦平副参谋长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交涉东北各地接防问题电》，员源年 猿月 圆日，载《战后中国》（一），第 员猿- 员页。



西满地区主要包括中长铁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的洮南、冷安、雪开、鲁、阜新、双辽、乌兰浩特、齐齐哈尔及其以北的北安、黑河等地。西满分局和军区成立于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后，直接威胁的就是西满地区。因此中央对之十分重视，194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向东北局下达关于西满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央感觉西满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对西满全盘工作尚无统一的计划与部署”，要求东北局加强西满分局的建设，“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的合编西满的一切军队，保卫热河，有计划地肃清土匪，统一的筹措给养经费，划定军区、分局建立党政机关，发动群众进行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为此，中共中央直接任命了李富春、林彪、黄克诚、吕正操、李运昌等人组成西满分局及西满军区领导层，“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之内的一切党政军民工作”^①。据此，西满的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成立了西满清算动员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指示》，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和国民党势力，扩充军队，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并先后解放了甘南、讷河、嫩江、泰来、龙江、景星、富裕、林甸、布西等县城，消灭了那里的土匪和国民党势力残余，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壮大了队伍^②。

以中长铁路为分界，与西满对应的是东满地区，包括中长铁路沈阳、长春以东地区，主要下辖长春和吉林两市及长春、九台、榆树、德惠、农安、怀德、伊通、双阳、永吉、磐石、桦甸、敦化、额穆、蛟河、舒兰、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安图等14多个县市。东满分局和东满军区正

① 《中央关于西满工作的指示》，1945年11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年12月）》，第1卷，第100页；《刘少奇年谱》（上），第124页。

② 《邓华将军传》，第147页；《吕正操回忆录》，第124页。



式成立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由林枫担任分局书记并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又加入吉林省工委和军区，扩建成吉辽省委和东满军区，林枫担任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张启龙为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兼任军区司令员，陈光为军区副司令员。1946 年中下旬被迫撤出长春后，东满分局制定了“广占中小城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将先前聚集在长春和吉林等市的主力部队调到磐石、海龙、舒兰、榆树等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后方。由于长春是东北的中心城市，而国民党东北行营的主要力量也集中在这里，因此相比其他地方而言，国民党力量较为强大，因此，东北局也特别关心东满地区的发展，1946 年 1 月下旬再次重新组建东满分局，成立了吉辽省委和东满军区，下设吉林、吉东、通化和辽北四个分省委。在此期间，东满分局集中力量主要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军、扩军、整军、剿匪和建立政权的工作。到 1946 年春，在中共领导下的整个军队人数和作战质量都大大提高，多数县级政权也都建立起来^①。

由于其背靠苏联的战略优势，北满是中共最早经营的一块战略要地，主要指长春以北的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以及北安等地。北满分局和军区成立于 1945 年 11 月初，总部设在哈尔滨。陈云为书记，林枫任为副书记，高岗、张闻天为委员，高岗兼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下辖中共松江工作委员会和松江省军区司令部。中央当时下达给北满分局的任务是“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到后来中共被迫撤出大城市时，陈云、高岗和张闻天三人联名向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对满州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将北满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

^①《林枫传略》，第 194 页；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载《辽沈战役》（下），第 196-197 页。



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依托,以绥化、北安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财,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这封建议书当即征得中央的“完全同意”。之后,以张闻天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亲自深入北满的广大农村和乡镇,一面剿匪扩军,一面宣传党的政策,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与当地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实际上,根据当时北满有关领导人的回忆,除了长春,各县政权依然由中共控制,“国民党无法参与”^①。

南满是中共力量最早进入东北的地区,主要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在东、西、北满大力发展的时候,南满仍然作为重要的门户,尽管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锦州一路直逼沈阳,但东北局在撤出沈阳后依然在本溪、抚顺等地坚持斗争,并将主要力量集中在靠近大连的辽东半岛最南端,像其他三个地区一样,南满分局也在国民党力量不及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扩军整编、领导土改和歼灭土匪,整个南满的根据地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当1946年10月东北政治外交形势出现转机的时候,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10月1日在秀水河子重创国军,成为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个重要战役^②。

在着重发展东北农村根据地的同时,中共也没有放弃对城市的继续渗透工作。在1946年10月下旬撤出城市时,东北局明确指明大城市的工作任务:“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和,收复这些大城市,即组织地下党,组织地下军,并利用各种各色的合法宣传形式、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在各界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领导他们

^①《张闻天年谱》(下卷),第401页;《陈云文选》,第101-102页;钟子云:《战略后方的哈尔滨》,载《辽沈决战》(下),第101-102页;《李天佑将军传》,第101-102页。

^②《辽沈战役》(下),第101页。



进行合法斗争，以准备武装非武装的力量，特别是工人、苦力、保安队之力量，即各种小型便衣武装（在红军退却前，暂不做任何武装斗争）。以便将来配合城外大军，顺利占领或夺取现在暂时退却的大城市”^①。因此，在撤出大城市的同时，中共在各大城市内都留下了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诸如在东满，长春和吉林二市的市委、报社和部分共、青、妇干部都继续留在市内从事秘密的和公开的群众工作；在北满，大量的“哈尔滨市委和不穿军装的同志”继续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留在市内工作。尽管国民党在行政上接收了哈尔滨市和滨江省政府，但市内的实际管辖权仍然掌握在苏军手中，而留下来的中共人员则积极组织群众团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团结上层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特务活动，并将市委机关报《松江新报》改版为《哈尔滨日报》，运用报纸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等等^②。

到 1945 年春，中共力量在东满、南满、西满和北满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共从 1945 年初就开始公开争取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 月 10 日，《解放日报》载文《重庆各界人士主张成立地方性联合政府，以解决东北问题》，要求成立“能代表东北人民的多党派人士”参加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取代东北行营，并在各省、县等成立各级民选政府等^③。1 月 18 日，从长春返回重庆的张嘉璈与周恩来和董必武会谈时，后者明确提出东北政治委员会中应加入各个党派人士，由中共及政府派代表参加东北行营，就地解决一切军事问题。张氏注意到：“观其气概，与去年 11 月 14 日晤面时迥异。谅彼

① 《东北局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 年 1 月 10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年）》，第 1018-1019 页。

②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钟子云：《战略后方的哈尔滨》，均载于《辽沈战役》（下），第 156-157 页、158-159 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128 页。



方已估计其在东北之武力,足以抵抗吾方;且有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为其张目,故有此建议也”^①。

圆月 愿日,中共中央发言人首次明确表明自苏军进入东北后,原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华北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已组成一支近 猿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和北满各地”,而且还在各地建立了民主政权^②。几天后,延安《解放日报》就东北问题公开提出四项主张:

第一、现在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各级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不合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第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党政府派去的军队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

第三、对于东北各县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它们的基础尚不够广泛之处,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

第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党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如国民

^①张嘉璈 愿年 圆月 愿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猿页。

^②《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源页。



党固执武力解决，冲突将继续发生。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工作范围，应推及东北^①。

中共在东北行动的迅速，固然取决于自己的灵活战略，以及前线官兵的积极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得益于苏联政策的变化。尽管苏军在 1945 月中旬将中共赶出大城市，但出于城市管理的实际需要以及第一线中共与当地苏军官兵的关系等等，他们仍然需要已经颇有群众基础的中共力量的支持，因此对中共的秘密发展也予以默许。实际上，即使在农村的发展中，苏方也持续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诸如在张闻天被任命为合江（今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1955 年 1 月同松江省合并，1958 年又与黑龙江省合并）省委书记而赶赴佳木斯时，苏军还派出部队进行护送^②。当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与对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政策密切相关。支持和默认中共力量的发展一直是苏联用来阻碍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有力武器。从 1945 月中旬开始，伴随着中国政府在经济合作对话上的不合作态度、美苏对峙的加剧、将东北排除在外的国共双方停战令的达成，苏方对蒋介石和美国的担忧日益增长，为了有效地阻止中国政府军队的前进和军事接收，苏联政府自然在援助中共方面加大力度。1945 年 11 月 12 日，就在张嘉璈力劝中央在经济合作方面不能太过被动而引发苏联态度恶变的当天，苏方代表拒绝了已经答应的派遣苏军协同行营接收吉林的某一矿区，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停战令，苏联不想干预中国内政，而且如果中共不攻击苏军，苏军“即不予顾问”。张嘉璈立即认识到苏军这一举动的严重性，“以往苏方谈话中，从未露出中国共产党字样，今日公然

① 1945 年 1 月 12 日《解放日报》（延安）；张嘉璈 1945 年 1 月 12 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册），第 270-271 页。

② 《张闻天年谱》（下卷），第 270 页。



提出,即所谓非法武力,已公开化。亦即苏方将以不愿与中共军队冲突为词,而拒绝协助我方接收”。两个星期后,东北行营派人前往接收长春附近的九台县,遭到当地中共武装力量的包围,声称“在政治协商会议未得结果以前,不能移交”。董延平要求苏方协助取缔该县非法政府,苏方却声称此乃“人民组织之临时政府”,不能称为“伪政府”。在原定苏军撤离中国最后期限的 10月 15日的会谈中,马林诺夫斯基首次公开承认八路军及其他武力在东北已有号称 10万人的力量。10月 20日,中共《长春新报》复刊,正式宣告黑龙江省政府的成立,声称有关抗联将领建立了人民自卫军,成立省政府,并先后在克山、克东、绥化、嫩江、黑河等 15个地区成立了县政府^①。

实际上,就从这一时刻,苏联开始将撤出的各大城市也直接交给了中共,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也由此进入新阶段。有意思的是,像 10月中旬一样,苏联政策的突变不但导致了中共东北战略发生急剧变化,而同时也反应在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人事变动。10月 18日,苏方代表向东北局转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苏方正在争取全面介入整个东北事务,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经济合作谈判就是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步骤,但这势必会遭到美国和蒋介石的阻碍。为此,莫斯科希望中共应当在政治上对国民党保持强硬,在军事上加强进攻,苏方将为此在武器等问题上“尽可能予以满足”。第二天,双方负责人再次会面,苏方表示此前由于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态度温和,但是由于国民党借美英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在国内大造反苏运动,以及美国也出面公开反对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地位等因素,苏方决定改变态度,坚决支持中共成为东北的主人,并建议中共再次增调大批干部和队伍与国

^①张嘉璈 1945年 10月 15日、10月 15日、10月 20日日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第 283页-284页。



民党争夺东北^①。猿月初，苏军代表再次提出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乘苏军撤退之际与国民党抢占各大城市。猿月愿日，苏军突然从抚顺和吉林等地撤军，将当地的政权（此时苏军直接交给中共接收的地区包括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全部交给中共接管。怨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方通知苏军将于 猿日撤出沈阳（注：苏方告诉国民党政府的撤退时间是 猿日），希望中共派兵占领；此外，长春以南的苏军也不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交接手续，可以任由中共占领或破坏。东北局由此建议乘苏军突然撤退之际占领沈阳并控制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然而，中共中央拒绝了东北局的建议，不但不主张攻占沈阳，而且指示东北局对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城市也由国军接收。中共中央的意见引起了苏方的反对，他们要求中共抓紧时机，乘苏军撤退的有利时机，进占所有可能的城市，并明确鼓励在沈阳、四平街“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对包括哈尔滨在内的长春以北地区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对南满的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②。

中共中央此时的决定实际上与几个月来对国民党的整体政策一脉相承，即主张以政治和谈判的方式，而不是军事手段寻求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该政策受到了 猿年 月底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言、马歇尔来华后迅速在停战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猿年 猿月间，中共中央认为中国的民主和平时期即将到来，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中央甚至将未来参加政府内阁的人员名单都已经拟定。在东北问题

①《东北局致中央电》猿年 月 日，转引自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第 页。

②《东北局致中央电》猿年 猿月 怨日；《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攻占沈阳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猿年 猿月 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页。



上,以刘少奇为代理主持工作的中央依然承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直到猿月中上旬为止,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向国民党政府作出了巨大让步,在停战协定的谈判中,蒋介石以及马歇尔都主张向东北运送政府军队和在东北境内政府军的调动不包括在限定之列,中共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点。停战协定达成后,中央继续以政治与和平谈判的方式争取得到政府对中共东北地位的承认。然而,得到美国支持并在东北大力增加兵力的蒋介石不但拒绝任何让步,而且还以接收主权的名义向中共占领地发起进攻。就在苏军撤出沈阳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开入城内,受此鼓舞,杜聿明迅速派兵向四周各县市进攻,不到 五天,就相继占领了沈阳附近的新民、彰武、盘山、辽中、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地。由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承认,反而由于国军的行动使得东北联军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正如东北局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仍可以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①。在这种情况下,以刘少奇和周恩来所采纳的以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策略使得中共在东北陷入被动,刘少奇自己也承认允许国民党军队调运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失了一着”^②。

在此期间,病休中的毛泽东依然关注着东北和整个中共战略的发展,尽管他也时时参加中央的一些决策,但不满意的程度愈发强烈,实际上,他后来称刘少奇这一时期的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随

①《中共中央要求苏联出面发起东北问题谈判事件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 月 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页。

②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页。



着身体的康复，他开始寻找机会扭转这种政策，在 8 月 15 日参加的中央会议上，他以两天前重庆发生的“较场口”事件为契机，指出中共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法国不同”，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统一军队来消灭我们，声称“党政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军队的混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党史专家杨奎松称毛泽东此举阻断了刘少奇主张的“和平民主新阶段”^①。

毛泽东的批评意味着中共中央战略的转变。巧合的是，与毛泽东坚持斗争立场相并行的是苏方东北政策的急剧转变，实际上，后者显然间接促成了毛泽东重新执掌指挥东北的工作。以苏方的态度为依据，8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在谈判中坚持政府军队不能进驻哈尔滨，抚顺和营口力争双方都不进兵。16 日，他指示东北局和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绝不能让出地方。……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领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第二天，他致电东北局，明确要求彭真和林彪马上进驻苏军撤退的地区，“时间愈快愈好”，“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东北问题的谈判中坚持“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②。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同时也是在苏方的直接鼓励下，东北局开始集结重兵，向苏军刚刚撤离的四平发动进攻，两天后将其占领。与此同时，哈尔滨和长春附近的中共力量也开始积极准备进城。

苏方态度的转变与毛泽东的复出相辅相成，中共在东北乃至全国对国民党的战略和态度明显强硬起来。16 日，毛授意周恩来不能

^① 宰泽荣、刘建群、刘建群、刘建群、刘建群《毛泽东年谱》（下），第 156 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56 页-157 页。

^②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156 页。



签署任何含有重大让步的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①他又致电东北局、林彪和萧劲光，要求全力阻止从沈阳北上的国民党军队：

“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于将来”^②。

与毛泽东的军事布置相配合，苏军一方面以瘟疫和交通不便等借口拖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的速度，另一方面加大对中共的鼓励和支持，转交北满的日军军火库以加强中共的军事力量。猿月底，苏军通知将很快撤出长春，希望中共迅速派出主力部队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大城市，苏军代表还明确表示莫斯科希望中共能够占领东北，使得国民党政府和美国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源月 源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首次使用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发动进攻，猿日完全占领长春。毛泽东大为振奋，指出占领长春“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要求继续增兵四平，阻止国军北上，“发动长、哈、齐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二百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全力夺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二市”，同时考虑迅速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东北自治政府^③。在毛的直接命令下，北满的中共军队迅速集结，猿日占领齐齐哈尔，猿

①《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源猿页。

②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猿猿页；《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源猿- 源猿页；《林枫传略》，第 猿猿- 猿猿页。



日迅即控制了哈尔滨。这样,在苏军还没有完全撤出中国边境时,沈阳以北的整个北满地区都已被中共控制了。

四平争夺战与中国内战的爆发

在苏联积极帮助中共抢占东北大城市的时候,美国也在继续协助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东北。如前所述,协助国民党军队早日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一直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的一贯政策,早在 1945 年 1 月初,杜鲁门就干脆地承诺并指示魏德迈协助中国政府运兵华北和东北,到了 1945 年 5 月份,当蒋介石提出运送更多军队而遭到魏德迈的拒绝后,华盛顿当局的有关决策久拖不决,默认协助运兵的现行命令。到 1945 年 8 月中旬马歇尔来华时,美国政策的一条最基本方针仍然是坚持继续运兵东北。实际上,马歇尔来华两项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尽最快的速度将苏联弄出满洲”^①。正是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在停战协定的谈判中一直支持蒋介石的要求,迫使中共同意向东北运送政府军队,以及在东北境内调动政府军不在停战之列。当 1945 年 10 月国共双方围绕东北问题争论不休而难以达成协议时,美国依然将国民党新一军主力从香港九龙运至东北攻打四平。据有关统计,从 1945 年 10 月开始,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十三军(半美械装备)、第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桂系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相继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到 1946 年春,国民党在东北的正规军主力部队已经多达 100 万人^②。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以

^① 见《毛泽东传》1949 年 10 月 10 日日记,此人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公职。转引自 李海鹏《袁世凯》

^②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从内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00 页。



及杜聿明进驻沈阳后向附近进兵频频得手的鼓励下，蒋介石在 9 月 1 日的国民党参政会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公开宣称：

“东北问题乃外交问题，……东北主权未收复以前，决无内政问题可言，……对于‘民主联军’这种阻碍接收主权的行为和 他们所谓‘民选政府’的非法组织，我们政府和人民决不能予以承认”^①。

蒋介石显然低估了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大概也完全没有想到苏联已经准备将所有可能的地区都交给中共，再加之毛泽东重新返回直接指挥东北的岗位，中共迅速改变了先前以政治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政策。9 月 15 日，中共在苏军撤退后攻占了四平。四平位于吉林省西南部，南倚沈阳，北靠长春，西邻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东接吉林辽源，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东北地区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中长铁路和平齐、平梅铁路在此交汇，是通向长春和哈尔滨乃至整个北满地区的战略要衢。因此，对国共双方来讲，它无疑都是决定谁是未来长春和哈尔滨新主人并直接影响控制北满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中共占领四平后，毛泽东迅速致电东北局，指出苏军在 9 月底撤退完成后，蒋介石必定由沈阳出兵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他命令东北局动用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就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毛泽东显然将保卫四平看作是整个东北的关键，他为此还要求南满军区发动反击，“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

①《总统》卷六(上)，第 285-286 页。



北进”，但如果敌军北进时，“须准备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晓诚演李暉昌瀛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随着在苏军撤退后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等北满城市可能性的日益增大，毛泽东对保卫四平愈发重视。猿月 圆愿日、源月 远日、愿日他又分别致电东北局，强调“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街以南”，要求林彪“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同时，他还对准备“大规模作战的后勤组织”进行了专门安排，“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力争歼敌北进部队的大部或全部”^①。

蒋介石也同样为争夺四平而调兵遣将，他在 源月 远日指示熊式辉（杜聿明此时在北平治病）重新部署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要求对向南进军的部队在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指出中共的主力此时已经集结在沈阳以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它有力部队向北挺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②。

在向四平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国共背后的美国和苏联都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在苏联方面，苏军第一次允许中共利用北满的铁路干线，并提供火车在 源月 猿日和 源日分别从哈尔滨和哈拉屯等地向长春和四平方向调运中共军队共计 猿列车 猿万多人^③。而在美国方面，用于主攻四平的国民党新一军就是美国从 圆月中旬开始自香港九龙专门运抵秦皇岛，后直接赶到沈阳并继续北上，这支部队全部由

①《毛泽东军事年谱》第 源远-源苑-源愿页。

②《总统》卷六（上），第 苑圆-苑猿页。

③徐永昌致蒋介石，《总统》卷六（上），第 苑猿页。



美械装备并在缅甸战场上多次击溃日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①。实际上，从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开始，他们就从南北两个方向争夺已经被中共控制的城镇和地区，其中第六军向南进攻，第七十一军和第五十二军分别从左右两翼配合新一军沿中长路向四平挺进，在源月 苑日赶至四平附近并发起全面攻势，四平之战拉开序幕，中国内战的烽火由此而起。

结 语

以中国政府拒绝苏联东北经济合作的要求为爆发点，结合美国政府对苏联东北政策的公开批评，从 员源年 员月中下旬开始，中苏两国政府在东北接收问题方面再次发生严重危机。苏军不但单方面第三次延缓撤军时间，而且为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故意制造困难，拒绝将具体的撤退计划通知中国政府。与此同时，他们再次调整对中共的政策，正式支持中共直接接管苏军撤出的地区。就此，除沈阳以外的东北各大城市以及沈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被中共所控制。到 缘月 猿日苏军全部撤出中国边境时，由苏军支持下的中共和由美国援助下的国民党政府都将各自在东北主力部队集结在四平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对抗战。从 员源年 源月 苑日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到 缘月 苑日中共撤出四平，国共双方在四平整整僵持了一个多月。双方为此都动用了各自东北战场上的大半精锐部队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民党部队投入了东北 苑个军 圆个师中的 员个师，其中全部为美械装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中共方面也动用了整个东北 猿个团中的 圆个团，双方的损失都近万人。四平之战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之间

^①沈克勤编著：《孙立人传》，台北，员源年版，第 源页。



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激烈程度最深的第一场战斗，“战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国共军事较量中可称空前”^①。战斗的最终结果以中共的撤退为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一路挺进，1946年10月占领长春，1946年11月占领永吉，1946年12月占领德惠而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部队隔江相望。但是，部分由于对苏联干预的惧怕以及美国的压力，国民党军队没有进一步前进。在苏联方面，1945年底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曾告诉美国驻苏大使，中国政府当时无意继续攻占哈尔滨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北满的特别关注，因为斯大林曾警告过宋子文苏方“将不会无视破坏苏联在前中东铁路巨大利益的任何行动”^②。美国也反对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北进，除了东北军事恶化将危及整个停战协定而导致马歇尔使命的可能失败外，他们也担心国民党军队控制东北的能力以及可能引发苏联的直接干预，蒋介石为此不得不接受马歇尔的压力：

“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有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③。

蒋介石尽管有此说法，但实际上也显然有孤军深入、战线过长和兵力分散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1946年10月上旬，国共双方在东北达成了暂短的停战。但是，从四平引发的国共武力冲突已经全面展开，部分由于苏联“在关内另辟战场”的建议，毛泽东下令山东、太行、晋冀

① 汪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第199-200页。

② 傅秉常：《傅秉常回忆录》，第100页。

③ 《总统》卷六（上），第151-152页。

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乘蒋介石在东北布防重兵之机，在关内展开全面攻势，实施大规模“报复作战”，中国内战就此全面爆发^①。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04 页。



结 论

本书主要叙述了自 1945 年中国对日战争出现挫折后，美苏两国逐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直至 1949 年年中中国内战烽火燃起在东北的基本过程，期间经过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围绕该协定所进行的中美苏多边外交、1945 年 7—8 月间的中苏莫斯科谈判、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以及围绕东北问题所展开的三国四方间的复杂斗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及其对华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共斗争的进程与发展。美国将国民党主力部队运送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默认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国共军事冲突的始发地点，而且大大增加了未来内战的激烈程度。从 1945 年 8 月底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共坐一桌到半年后在东北刀枪相向，美苏两国围绕中国利益的具体斗争，以及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抗的国际结构，都在台前幕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美苏对抗助长中国内战爆发只是此间中美苏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国共两党的根本对立、中国政府“邀美抗苏”的持续外交、中共巧妙利用苏联反对美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激化和促成美苏冷战最终爆发的重要



原因。实际上,中国内战爆发和美苏冷战起源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史的完整图景。

美苏介入与中国内战的缘起

从二战后期到 1945 年夏天,美苏关系经历着从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抗并最终导致冷战爆发的过程。这一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进程,并成为中国内战爆发的原因之一。雅尔塔秘密协定是美苏两国合作对日战争并协调中国政策的直接结果,它也基本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斯大林苛刻条件的命运。然而,苏联随后在东欧特别是波兰的举动引发了华盛顿决策者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疑虑和不安,引起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大讨论。围绕中国问题,国务院协同军方在 1945 年 6 月份对美国是否继续执行雅尔塔秘密协定进行重新评估,最后决定在得到斯大林明确承诺支持美国中国政策的前提下维持现状。尽管此次讨论没有导致美国政策的根本转折,但它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其政策的基础已经发生转变。实际上,正如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言,美国政策转向的“时机”还未到来。

“时机”的到来是 1945 年 7 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在此之后,白宫和军方对抗苏联的信心大为增长,他们不但试图以鼓励中方坚守立场用中苏谈判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而且还准备抢先占领包括大连在内的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美国的政策遭到了苏联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联不但提前参加对日作战,而且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持续作战直至全面控制东北局势。针对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向华北和东北的海空大运兵,以及拒绝苏联参加共同管制日本等行为,莫斯科一方面默许和支持中共进入东北以增加国民党接收和控制东北的难度,另一方面数次延长撤军时间并对东北的工业设施进行了系统拆



运和破坏。尽管由于中国的外交努力苏联有所改变,最终在中美英的共同压力下开始从 1945 年 8 月撤军,但却将撤出的所有城市和地区直接交给了中共。到 9 月初苏联全部撤离中国边境时,由苏联支持的中共和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将东北“二分天下”^①,双方在四平展开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成为全面内战的导火索。

美苏两国的政策给国共双方的战略决策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从一开始,蒋介石政府就严重受制于中美关系的起伏。在一定程度上,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是他为了挽救中美关系而回避直接面对苏联的结果。雅尔塔会议之后,他依然将外交重心放在美国身上,力图将美国拉入中苏关系,尽管一再遭到拒绝,但他始终没有灰心,并持续加强对美外交。为此,宋子文在莫斯科谈判时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保持着非常频繁的接触和沟通,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开始公开介入中苏谈判。尽管美国在第二轮中苏谈判时的政策改变未能决定性地影响中苏谈判的后果,但随后对中国政府及时和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等都显然是中国政府“邀美抗苏”外交努力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是依靠美国海空大运兵的支持,蒋介石才能将主力部队北调,在遭受苏方重重刁难的情况下打开山海关,从陆路步步北进并成功收复沈阳,占领了东北的半壁江山。一位亲身经历中国战乱的美国普通士兵这样写道:

“正是我们使得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当国民党在第一次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进攻失败时,他再一次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上给予帮助,于是在 1945 年末,马歇尔将军奉派来华。……正是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大大延长了中国内

^①薛衔天:《中苏关系》,第 152 页。



战的时间，并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为残酷。”

这位观察家还提出，中国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华北和东北，而这些地方在对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国民党力量的存在，正是因为美国在 1945 年的“海空大抢运”将近百万的国民党正规军运到了这些地区，不但为蒋介石发动内战提供了基本的人员基础，而且从心理上鼓舞和纵容了蒋介石向中共发动武力战争，而不是政治妥协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苏美两国都不插手的话，中国共产党必将占据中国东北。归根到底，国民党之所以能到达东北，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帮助他进行了海空抢运”^①。

当然，美国对蒋介石政府也有另一方面的压力。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中国的形势看得更为清楚，诸如时任蒋介石参谋长和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的魏德迈早在 1945 年 1 月就认为，蒋介石“除了与俄国和中共达成满意的协议，否则他在很多年内也难以占领满洲”，因而拒绝为蒋介石进一步运兵，建议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东北实施联合托管，直至国民党政府有能力进行全面控制时再移交中国政府；再如这一时期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后来也认为如果美国“当时采用完全另外一种办法，恐怕结果就会好些。”他所谓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暂时接受一个分裂的中国”，因为“当他蒋介石在自己兵力十分集中的华南地区也难以控制得住的情况下，却指望拿下满洲的统

① 魏德迈著，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朱启明、赵叔翼译），三联书店 1987 年中译本，第 125 页。



治权,这对他来说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能够劝说蒋介石不要将他最好的部队送到东北,“那他的处境会好得多”^①。担任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看到国民党军队在占领长春后孤军北进的危险后,强迫蒋介石下令停止前进,而蒋介石却认为这是错失收复东北战机的主要原因。不管怎样,来自美国的这些正、反面意见都极大地影响着整个东北形势的走向和发展。实际上,直至1945年10月,中苏关系仍然存在转机的可能机会,斯大林在10月初通过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向蒋介石传话,表示可以在莫斯科与蒋介石会面直接讨论中苏关系。然而,蒋介石却由于担心此举有碍中美关系而最终以防止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阴谋”加以拒绝^②。为此,亲历此间中苏关系变故的美国外交官柯乐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政府未能成功接收东北的最大两个困难是:第一、不能与“快速挺进和急剧发展的共产党力量相竞争”;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几乎确定无疑地因为受到美国支持的原因,重庆不能与苏联建立顺畅的工作关系并达成有关协议”^③。

尽管自美国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以来中共也十分注重对美关系,但是随着抗战结束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中共还是将期望与外交重心落在了苏联身上。1945年10月下旬,正是部分由于斯大林的直接建议和安全保证,毛泽东才决定赶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之后,中共的东北乃至整个战略都随着苏联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就处在中美两国政府双重压力下的苏联政策而言,选择中共作为抗衡蒋介石政府也是当时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关于苏联驻军东北时期对中共

①《哈里曼回忆录》,第127-128页。

②《总统》卷六(上),第127-128页。

③《悦读与内战》,第127-128页。



的具体军事援助,史学家们还存有一定的争论^①。然而,抛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重要影响不言,作为未来发展的一块重要战略根据地,背靠苏联支持、经济基础雄厚、自然资源富足,以及国民党统治没有根基的东北为中共所提供的心理支持与保障是难以估量的。从本文的叙述来看,苏联在 1945 年 8 月间的正面鼓励和支持直接促成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的出台。而 8 月中旬的政策突变又迫使中共采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该战略反而促使中共在东北运用了自己最为得心应手并高度娴熟的发展根据地的政策,从而确立了对广大东北地区的基层性控制。到 1945 年 10 月苏联再次提出由中共接管东北时,经过这两次战略调整后的中共已经基本具备了这种力量。借用一位学者的话,经过短短半年的东北经营后,“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②。

二战后期,美苏两国的整体关系处在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他们的冲突范围遍布中东、东欧和亚洲等许多地区和国家,中国也不例外。实际上,正是由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结构性国际环境的存在,才使得本来就难以共存的国共双方都无心寻求以和平的政治手段去解决纷争,并最终走上了武力争雄的道路。

国共对抗与美苏冷战的爆发

美苏对抗助长中国内战爆发,不是这一时期中美苏关系的全

^①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载《党的文献》1999 年第 1 期;关于杨奎松的观点,主要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他后来专门答复刘统的一篇文章:《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载《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0 期。

^②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0 页。



部。实际上,国共两党的根本对立,及其各自借助美苏外来力量追求自身目的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激化和促成了美苏冷战的最终形成。

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美国对苏联外交本质和意识形态的判断。在这方面,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提醒”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50年7月中旬,当中蒙边境发生冲突时,他就大造声势,提醒美国当局“此实不能视为地方事件,而为苏联目前及将来远东政策一极重要之征兆”,既反映了蒋介石对美国对抗苏联的鼓励,又显现他对苏联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敌视。之后不久,他又指示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罗斯福表明苏联远东的目的在于“夺取中国政权,然后计与日本妥协媾和,使美日在东方两败俱伤,则其赤化远东,独霸世界之政策,乃得如计实现”。此外,他还将中共与莫斯科指为一体,当1950年美国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并极力要求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时,他当即指出罗斯福“此种政策,将来必陷美国于绝境。终有噬脐莫及之一日耳!”^①

蒋介石坚信美苏两国在未来一定走向对峙,而自己在这场未来冲突中的立场则是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因此,尽管对美国的政策也多有抱怨,但他依然将中国的外交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自始至终地力图鼓励和“邀请”美国加入到中国抵御苏联野心的对抗之中,依靠美国的力量制衡苏联对中国的威胁^②。“邀美抗苏”的政策,既是中国长期

①《总统》卷五(下),第 1000-1001 页。

②作者在此借用了挪威学者伦德斯泰德(即Lundestad)的概念,他在分析美苏冷战史时最早提出了美国是“应邀建立的帝国”(即Invited Empire)亦有“邀请的扩张”之译法)之说,后为治美国外交史学者们的广泛接受。见其著《The American 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0-11.



以来“以夷制夷”的外交传统，又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外交决策层对苏联的强烈疑惧心态和不信任感休戚相关，他始终将苏联视为中国的“世仇大敌”并“畏而远之”^①。这种疑苏、惧苏和反苏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无法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将中国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由此，当 1941 年中美关系走到了抗战以来最低点，而又正值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条件谈判的关键时期，严重受制于中美关系的蒋介石选择了回避和拒绝与苏联直接交涉的可能，从而将中国的命运推到了雅尔塔。不仅如此，雅尔塔会议之后，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等重要外交官员长期驻美，他们一面寻求更多的美援，一面在美国政府内外大力游说，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在 中苏关系的问题上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与中国政府携手对抗苏联。而从更为长远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努力更是巩固和发展了一个实力颇大的“中国帮”，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上述这一系列“邀美抗苏”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主动的政策选择，一直密切观察中国对外政策的美国外交官柯布乐指出，蒋介石本人完全认识到他这种政策可能在中苏关系方面造成的风险，但他始终“认为美国会在任何危机时刻出手援救”，最终还是“决定安全地不理睬这些”^②。

部分由于中国“邀美抗苏”的外交努力，以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为转折，从 1945 年 7 月下旬开始，美国的对苏政策出现转变。他们一方面开始积极援华、排斥中共接受日本的投降、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大

① 有关学者的研究见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155 页；在言论方面，蒋介石在 1941 年 7 月曾对他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表露“予愿坦白奉告，中国人民有传统惧苏、疑英之心理”，见《蒋委员长与拉铁摩尔谈话》，1945 年 7 月 1 日，载《战时外交》六·雪第 15 页；此外，更多的此类言论见他本人的一些相关著作，如《反共抗俄基本论》、《苏俄在中国》以及《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所摘抄的他本人日记。

② 转引自《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 155 页。



抢运进驻华东和华北、海军陆战队登陆重要华北港口并无限期延长其驻扎时间，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持续援助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试图利用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对日开战的步伐、协助国民党军队进驻东北、鼓励中国政府早日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严密注视苏军在东北的行动，并对其延缓撤军以及经济掠夺等做法加以指责，最终因为中苏经济谈判而与中国政府携手对抗苏联。实际上，对许多美国决策者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对抗苏联的一块重要阵地。美国上述政策的转变，自然有其内在逻辑，但中国政府精心和持续的“邀美抗苏”外交努力，亦当属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

相比蒋介石政府，中共的外交选择余地似乎要小得多，但他们也显然将美苏的对抗看成必然，并极力设法使之为我所用。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作出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的战略决策时就已经开始了与美国的决裂姿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以及协助国军占领了山海关大加指责^①。在1945年12月末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舰的运送下登陆秦皇岛时，中共驻重庆代表王炳南当即向美国大使馆抱怨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行为，并警告美国积极援助国民党的政策势必会引起“苏军觉有采取行动之必要”^②。到12月中旬，当苏联迫使中共力量退出东北各大城市时，中共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认为此举“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可以放手与美国进行斗争，便于全国人民展开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

^① 美军协助国军占领山海关确有其事，根据国民党第14集团军军长石觉的回忆，当国军军队前进至山海关时，一名美国军官驾驶吉普车载一名女子闯出警戒线游览山海关，受到射击后翻倒路旁，男女狼狈逃回，汽车被掠走。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12月卷，第286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12月卷，第286页。



中国内政之阴谋”^①。

从 1945 年春天开始，毛泽东更是公开将蒋介石与美国归在一起，而自己则选择站在苏联一边。1 月，他写成《关于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提出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和“世界反动力量”两大阵营的概念。从 2 月份开始，他公开谈论同时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关系的“两个破裂”，提出“反对美国援蒋是内战爆发前夕我党宣传的一个重点”。在他的亲自指示下，《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相继发表《美国应立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和《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公开社论，他自己也亲自主笔《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指出美国的军事援助政策是导致“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一切对华的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等等^②。

在国共各自刻意诱导外来力量介入中国问题的努力下，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美国和苏联不但对中国问题越来越关注，而且围绕中国的争夺和对抗也日益公开和尖锐。实际上，从抢占大连计划开始，到随后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国、马歇尔使华调停，以及源源不断的各种援华措施的出台，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对抗苏联的一个战场。1945 年初，杜鲁门指称批评其中国政策的人“更效忠于苏联而不是他们自己国家”^③。而苏联方面也在 1 月份公开指责美国利用援助蒋介石政府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在苏军撤离中国的同时，苏联媒体围绕美国在中国驻军大加批评。1 月 15 日莫斯科电台指责美国不但不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反而积极帮助中国政府运送大

①《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 年 1 月 15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 年）》，第 1025-1026 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02-103、104-105 页。

③《杜鲁门致罗斯福总统电》，1945 年 1 月 15 日，载《罗斯福总统档案》，第 102 页。



量的军队和武器弹药到达东北。下旬,《布尔什维克》杂志也批评美国“这种政策直接违反了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文件的原则”,《真理报》指称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反动势力,在满洲挑起战争,“尽管占的地盘很宽,但若不是依靠美国人的援助,早就被消灭干净了”。从 1945 月份开始,《真理报》刊登长文《美军在中国》,列举了对日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对 1945 年夏天美国政府再度酝酿的军事援华法案,文章作出了如下总结:“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法案将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使中国成为反对苏联的武装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事情是实质就是这样的”^①。之后,苏联政府在联合国掀起了谴责美军驻华的外交攻势,并要求立即全部撤离中国。就美国政策而言,一向熟知中苏关系发展的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来了著名的“长电报”,点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机会主义政策,统一了华盛顿决策部门内反对苏联与对抗苏联的共识,成为冷战“遏制”政策的先声。不久之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发表了“铁幕”演说,呼吁“英语国家”与美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由此,美苏冷战的序幕全面拉开。

^① 向青:《苏联与中国革命》第 238 页;《美军在中国》,载 1945 年 10 月 10 日《真理报》,见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 真理报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79 年 10 月原苏联《真理报》第三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8 页。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①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中译本。

②梅茵茨希著,张文武,李丹琳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 2005 年 1 月中译本。

③梅津和吉、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 10 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中译本。

⑤包瑞德著,万高潮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中译本。

⑥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等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 2005 年中译本。

⑦艾夫里尔·哈里曼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哈里曼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中译本。

⑧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原译名《珍珠》),商务印书馆 2005 年中译本。



■ 美国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41-1945~~）》（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福雷斯特·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谟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 ~~1~~卷，三联书店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赫伯特·费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迈克尔·沙勒著，徐泽荣译：《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41-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斯蒂芬·莱文著：《灾难的边缘：~~1945~~年的中美关系》，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袁明、哈里哈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

■ 美国 陶涵著：《蒋经国传》，新华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小查尔斯·米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 ~~1980~~年中译本。

■ 美国 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中译本。



瞿 演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5-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中译本。

瞿 演瑟夫·埃谢里克著,罗青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3年中译本。

瞿 演山极晃著,鹿锡俊译:《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9月中译本。

瞿 演西村成雄著:《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 3期。

《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6年版。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 真理报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46年 7月—1948年》第三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版。

陈嘉骥:《张莘夫殉国 1946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 10卷第 10期。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1985年版。

陈绍畴 刘崇文主编:《刘少奇年谱,1905—1952》(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陈云:《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据东北折冲纪要》,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78年版。

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 1期。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第 5册,中华书局 1985年中译本。

郭德全:《抗战时期驻俄武官回忆实录》,台北“国防部”时政编译局 1984年版。



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1985年版。

何迪：《1955—195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黄友岚主编：《1945—1949年争取和平民主》（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蒋永敬：《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纪实》，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1期和第2期。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1945年10月，台北，1985年版。

金冲及等主编：《刘少奇传》（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李靖宇：《大连20世纪创建现代化国际名称战略对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

梁敬鐔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0），1985年版。

梁敬鐔：《史迪威事件》，台北1985年版。

梁敬鐔：《雅尔达秘密协议始末》，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1期。

梁敬鐔：《中美关系论文集》，台北1985年版。

梁敬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美国远东门户开放政策之没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1期。

梁怡等：《仅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刘华，杨菲蓉：《“雅尔塔秘密协定”新论》，载《学术研究》1985年第1期。

刘天野等：《李天佑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1源期。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罗印文：《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45—195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孟默然编：《美蒋勾结史料》，新潮出版社，1986年版。

穆欣：《林枫传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牛军：《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1源期。

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苏国共关系》，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56》（下），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伍修权主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二）台北，1980年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0年版。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溧水中央研究院国史馆编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国史馆，1984年版。

秦孝仪等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卷六（上），台北，1982年版。



邵玉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国、苏联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载《美国研究》（台北“中研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第 5 卷第 1 期合刊 1994 年 1 月。

沈克勤编著：《孙立人传》，台北 1995 年版。

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沈志华：《苏联解密档案》（未刊稿）。

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时殷弘：《从雅尔塔协议到 1949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近现代国际关系》，1994 年 10 月刊。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以下简称《中苏关系卷》），台北 1994 年版。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3 期。

陶文钊：《1949 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陶文钊：《1949 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陶文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陶文钊：《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陶文钊：《战后初期美国是如何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3 期。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5—1949）》，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田居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0月—1946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屠传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万毅：《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版。

汪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

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汪朝光：《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之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月。

王春良：《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国领土主权之受损害》，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

王健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1986年版。

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转变，1945—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魏良才：《国民党最后的诤友——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载《欧美研究》（台湾）1994年12月，第1卷第1期。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59年版，1972年第4次印刷。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局1989年版。

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徐焰：《北国狂飙——苏联出兵东北》，沈阳出版社 1993年版。

徐焰：《日本关东军覆灭记》，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版。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78—198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9—1989）》，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炎黄春秋》1995年第12期。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章百家、牛军 主编：《冷战与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编（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曾克林：《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9—198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张培森 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1989—1992，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受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载《文史资料》第 198辑。

张庆国：《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载《民国档案》1992年第 10期。

张炜 俊歧：《萧劲光大将》，郑州 海燕出版社 1987年版。

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 3期。

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 3期。



赵绮娜：《美国亲国民党政府国会议员对杜鲁门政府中国政策之评估》，载《欧美研究》（台湾）第 10 卷第 3 期，1995 年 12 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3—1956）》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53—1956》（下），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56—1958，走向胜利》，香港明流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 1956—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钟子云：《战略后方的哈尔滨》，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53—1956》，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资中筠：《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载《美国研究》1983 年第 1 期。



后 记

这本书是自己的博士后课题研究成果。博士后导师梁碧莹教授及其先生林家有教授学识渊博、严谨敬业、宽诚待人，他们在学问和生活方面对我都多有关心和熏陶，使我真正理解与学到了“为人师表”的真谛。他们对本研究进行了悉心指导且将这份成果纳入本丛书出版，既体现了对后辈的提携，也显示了他们的胆识，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在课题的资料收集方面，中国东方历史学会的沈志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当他得知我的研究课题时，欣然应允并分两次将自己收藏翻译的未刊苏联解密档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来，成为本文的主要苏联档案来源；东京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吉田丰子从事同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她在百忙之中为我复印并寄来了自己收藏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相关部分以及《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中苏关系》；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研究项目主任奥斯特曼先生（悦读对岸 蔡树山 悦读对岸 蔡树山）专门为我寄来了（由于邮寄过程中的问题，他将同样的资料重复邮寄了两次）他们中心收集的胡世泽档案中关于中苏谈判的英文记录；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罗伯茨博士（悦读对岸 蔡树山 悦读对岸 蔡树山）曾为我提供过在香港大学的学习机会，当她得知我的研究课题时，决定再次资助我前往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进



行两个月的访学,此行大大富了本文的资料搜集。上述各位的无私帮助是本课题得以研究的重要基础。

研究过程中,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陶文钊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任东来教授和蔡佳禾教授、美国查布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莱文(Levin)教授、衣阿华大学历史系的刘晓原博士等或不吝赐教,或在不经意的闲谈中透出点拨,常常使我走出迷茫。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林悟殊教授、余定邦教授、暨南大学高伟浓教授以及广州大学的赵春晨教授阅读了全文、参加了博士后出站报告会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对向我提供两年博士后研究的广东省人事厅、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等人员和机构谨表谢意。此外,本课题还受到了暨南大学“圆月”青年引进人才项目的资助。

从江南古城南京移居南国花城广州,自然与人文环境迥异。期间得到了邓其熙和杨令仪前辈、杨晓维和邓榕兄嫂以及学友谷小水、周正庆、张宇权、黄荣斌、刘玉娟、姚昱、郭又新、何惠的关照与帮助;学兄周桂银、石斌、王琛、邵永灵等人的关心与鼓励总是及时与温暖。妻子施茵尽管有着自己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学习任务,但总是将我的这项工作放到全家的首位,并无微不至地营造着家庭的舒适与温馨氛围,使我没有后顾之忧,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此外,向我“苑”岁的幼子林博表示歉意,这项工作常常中断我们每个周末游览广州公园的约定;最后,向母亲许敬珍、岳父母林培钧、施丽及兄弟姐妹们致谢,他们的教诲、支持与期望是我不断前进的永恒动力。

张振江

2004年9月于广州